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瑞典首相帕尔梅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帕尔梅

第一章 夜半枪声

1986年2月28日夜。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斯德哥尔摩是欧洲最美丽的首都之一。繁华的市容、整齐的道路、宽敞的马路、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无一不可与伦敦、巴黎等欧洲著名城市相媲美。它那古老凝重的王宫，威严、雄伟的议会大厦和建于中世纪的尼古拉教堂向人们炫耀着它的辉煌历史，述说着瑞典民族的智慧；而喜来登大厦、塞格尔广场、球形体育馆等明朗壮观的现代化建筑楼群，又显示出它朝气蓬勃，风华正茂。至于斯德哥尔摩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宽松的氛围，则是伦敦、巴黎以及一般西方城市所望尘莫及的。伦敦曾被称为雾都，污染十分严重，现经治理，虽大有改善，但仍远不能与到处是苍翠树木、粼粼波光的斯德哥尔摩相比，而且伦敦始终无法掩饰它那数十万每晚流浪街头的女青年和白天拉着手风琴或小提琴、闭上眼睛或戴上墨镜在街上乞讨的穷汉的窘态。纽约现代化程度堪称世界之最，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看了使人目眩，但它的喧嚣、紧张、肮脏、恐怖也决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的。偌大的中央公园下午5时便无人敢于光顾——怕遭抢劫。警方甚至奉劝人们外出时身上别忘了带些面值不要太大的美钞，遇有强人最好采取“合作态度”，免遭杀身之祸。与纽约相比，斯德哥尔摩可算是世外桃源了。这里强奸、抢劫、凶杀、吸毒、卖淫等犯罪行为不能说绝对没有，但屈指可数。人们深更半夜在大街上行走，从不为自身安全提心吊胆。安居乐业的人怎么会铤而走险呢？

然而，1986年2月28日深夜，两声震惊全瑞典的枪声，打破了这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瑞典首相帕尔梅在步行回家的路上被枪杀，倒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斯维亚大街上。人们惊呆了，这是自1792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被暗杀以后，近二百年从未发生过的国家要人被害案。

2月份的斯德哥尔摩虽说不是滴水成冰，但仍很冷，寒风刺骨。特别是阴沉沉的天，难得见到太阳的笑脸。早晨7时天还未亮，下午5时已是万家灯火。2月28日也是这样一个令人压抑的、寒冷而沉闷的日子。

清晨，帕尔梅来到了瑞典皇家网球馆，与其好友、瑞典投资银行行长哈里·舍因打了一场网球。舍因与帕尔梅有20年的交往，那天因有急事，与帕尔梅约好下次打网球的时间，便先走一步了。帕尔梅与两位保安人员洗了桑拿浴后，便离开了网球馆。

8时15分，帕尔梅像往常一样走进首相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瑞典政府部门的办公时间一般为上午9时至下午5时，而帕尔梅几乎每天都是早到晚走，有时还要挑灯夜战。特别是周末，往往是他最繁忙的时候，不是出访或参加什么集会，就是做报告、发表演说，还有一些必须出席的应酬活动。难怪帕尔梅说：“在繁忙的星期六和星期日之后，我真盼望星期一的到来，开始正常的工作周。”帕尔梅有个“工作狂”的雅号，这正是他尽职精神的真实写照。

帕尔梅查看了工作日程安排后，欣喜地发现周末没有重要外事活动，便将两名贴身警卫一一打发回家。帕尔梅体恤下属，凡无必要，不让他们留在自己身边。

他批阅了几份文件。星期一去哥本哈根参加北欧理事会，要准备一下会上的发言稿。接着给保守党主席阿道尔松写封信，和他探讨一下计算机保密

问题。然后又写了一封复信，是给一个孩子的。耐尔舍地区一个男孩写信问他最崇拜的冰球球星是谁。收信要回，不管是孩子还是老人，这是帕尔梅的一条原则。上午最后一项工作是签署瑞典等六国（阿根廷、希腊、印度、墨西哥、瑞典和坦桑尼亚）发表的联合声明，呼吁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下次举行首脑会议之前暂停地下核试验，声明说：“你们对我们的共同生存是负有重大责任的。”

下午帕尔梅接受工会报纸《国营雇员报》的主编英瓦尔·伊格曼的采访，同他进行了长谈，话题是和平和裁军。帕尔梅满怀信心地说：“1986年是实现和平有可能的一年。”伊格曼是帕尔梅的朋友，写了几本关于帕尔梅的书。帕尔梅曾经同意他当“随军记者”，采访他的竞选活动。伊格曼与帕尔梅朝夕相处，长达一年，了解他的酸甜苦辣，他的长处与短处，他的欢乐与沮丧，甚至听到帕尔梅与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电话里的谈话。帕尔梅不向伊格曼隐瞒什么，他说“政治家不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伊格曼结束采访前要为帕尔梅拍照。他请帕尔梅坐在窗前，但是摄影师约翰·瓦尔贝伊不同意在这个位置拍照。帕尔梅朝窗外望了望，满不在乎地说：“老天才知道窗外有什么危险。”于是他离开窗前，坐在沙发上让记者拍下了一张照片。

傍晚6时，帕尔梅结束一天的工作，离开办公室，独自一人步行回家。帕尔梅首相这天的工作内容瑞典报刊后来广泛报道，大家都很熟悉。据说这天伊拉克驻瑞典大使也拜会了帕尔梅首相，对瑞典向伊朗出售先进的地对地导弹表示不满：几年以后透露出来的消息还说帕尔梅首相这天还会见了伊朗驻瑞典大使。帕尔梅走在路上，此时已是万家灯火。海风把他一向整齐的头发放乱，他步伐特别轻快，丝毫不因一大的繁重工作而显劳累。

空气虽然还是湿冷，但很新鲜，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好不惬意。这是一个异乎寻常空闲的周末，终于有时间和家人一起过个平常人的周末生活了。

帕尔梅的家就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老城。斯德哥尔摩被称为“北方的威尼斯”，由十二个岛屿和一小块内陆组成，岛与岛、岛与内陆之间由四十二座桥梁连接起来。老城座落在梅拉伦湖东侧的“圆木岛”上。1252年时，这里还是一个无名荒岛。当时的商业、文化中心在塞格图纳城。塞格图纳不幸遭强人洗劫，变为一片废墟。有位名叫贝尔格尔的“贾尔”（即伯爵），发誓要重建一座新城。他和其他几位商人将所剩的金银财宝放入一截挖空的圆木里，然后将圆木推进梅拉伦湖，圆木漂到哪里，他们便在那里修建一座新城。圆木经数日漂泊，终于在一个孤岛旁停了下来，贝尔格尔和其他商人便给这个岛起名为“斯德哥尔摩”（即“圆木岛”），并在此建立新的城市。这就是现今斯德哥尔摩老城。老城距今已有七百多年历史，仍完好无损，保留着中世纪建筑群的古老风范，如王宫、议会大厦、尼古拉大教堂等；加上上述宫式的狭窄街道、古色古香的店铺招牌，以及店里陈列的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常使国内外游人流连忘返。厌倦城市喧闹生活的人谁不把这里当作一片绿洲呢。

老城有条不宽的街道，叫西长街，是富人居住区。沿街的大楼多为砖石结构，墙很厚，正面又高又大，非常气派。住在这里的人大都身份不凡。帕尔梅就住在这条街的31号。

这座宅第原是老社会民主党人、前大臣古纳·米尔达尔夫妇的家。米尔达尔夫夫人爱尔娃出于对帕尔梅的关心，照顾他上下班方便，执意要将这所大宅子让给首相。这是一所豪华的房子，离首相办公室只是步行距离。帕尔梅

不敢夺他人之爱，再三谦让，但毕竟拗不过爱尔娃·米尔达尔夫人，只得愧领了。帕尔梅说：“我们前后想了半年。我们喜欢瓦林比的小屋，我们在那里已经住了25年了，开始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搬迁，如今我们住进这所有二百平米的大屋子，太大了，有点不习惯，而且，这是爱尔娃的艺术杰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精美了，不能消受。然而爱尔娃是不容你拒绝的，最后我们只能接受她的美意了。”

屋内陈设相当朴素，没有一件豪华家具，墙壁上也没有名贵的油画。如果有什么与众不同的话，那就是书斋。里面几个书柜，都装满了书。既有装帧华丽的精装本，也有便于阅读和携带的小册子。大多数是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帕尔梅是个嗜书如命的“书迷”，按中国的说法：“宁可十日无肉，不可一日无书”，去外地也带着书。帕尔梅演说、辩论、谈话、聊天所以能通今博古，旁征博引，与他爱读书有密切的关系。书房里有张沙发，虽已不新，但很实用、舒适。这所房子的缺点是：取暖条件较差，冬天有时冷不堪言。

帕尔梅走进家门后，妻子丽丝贝特见丈夫破天荒这样早回家，而且晚上没有任何安排，十分高兴。这将是一个难得的、宁静的夜晚，一个真正的俩人世界。

帕尔梅与妻子沉浸在夫妻的恩爱和家庭的温暖之中，工作中的烦恼早已抛在脑后。这也是妻子丽丝贝特订下的家规：家里不谈工作，如果有谁不知趣，打电话来家里找首相，她肯定挡驾。机器还要休息一下呢，何况是血肉之躯的人。帕尔梅的哥哥克莱斯·帕尔梅说，他如果要找奥洛夫·帕尔梅，宁可打电话到办公室，尽量不打到他家里。

晚上8点半，帕尔梅夫妇决定去看电影。当时格兰德电影院正在上映《莫扎特兄弟》，瑞典各界对该片评价很高，于是他俩给儿子莫尔顿打电话，请他和他的女友一起去。帕尔梅非常喜欢看电影、话剧，只要可能，他会悄悄溜进影院、剧院，但工作实在太忙，这样的机会一年半也只有一次。

8时45分，帕尔梅夫妇熄了灯，一前一后地走出了家门。

清晨或闲暇时，当他们外出散步出现在街头巷尾，路上的行人都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或点头致意。三十年来帕尔梅不断地出现在电视、报刊、杂志上，瑞典人不管是否曾经亲眼见过他，一眼便能认出他是首相奥洛夫·帕尔梅。他年青时相当英俊，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如今虽已年过半百，但仍很有魅力。深邃的蓝眼睛透出智慧，高高的鹰钩鼻显出刚毅，充满自信，工于心计。他的妻子丽丝贝特，比丈夫小5岁，尚不满54岁，是位儿童心理学家，身材不高，但很匀称苗条，因而看上去更比她实际年龄要小；黑色的头发，与她面部严肃的表情很协调。大凡医生、律师、教师都较严肃，这也许是职业缘故吧。她已当了十几年首相夫人，但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不是没有机会，而是不愿意：丈夫是首相，作为首相夫人，有些场合不得不出席。但我是丽丝贝特，是医生，是帕尔梅的妻子，我有自己独立人格，喜欢过平民生活。这一点与平民化的丈夫不谋而合。有些国家和政府首脑夫人喜欢出风头，抢镜头，甚至夫荣妻贵，作威作福。人各有志，丽丝贝特不屑为之。

此时的街上已很宁静，白天的喧嚣早已平静下来，川流不息的车辆似乎跑累了，或因周末之故，早早进了停车场。街上行人不多，只有一群年青人，背着日本产的、最新型号“索尼”立体声收录两用机，边走边唱，边打边闹

地走过。帕尔梅夫妇手挽手地向前走去。他们迅速地走过老城那一条条由石头铺成的马路，尽管路面上已结了冰。只有远处不时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伴随着他们二人急促的脚步声。

帕尔梅身后没有任何警卫人员伴随。他对严密的警卫制度很反感，除正式出访或重要的外事活动外，他很少让警卫人员紧随其后，特别不喜欢那些秘密警察和保安人员在他四周设防。他不顾秘密警察局的抗议，经常“解放”身边的秘密警察，他说：“只有当身边没有一个警卫人员时，才感到最自由自在。”帕尔梅所以无所畏惧，还源于他对自己国家的信心。这个生在斯德哥尔摩、长在斯德哥尔摩，正在为创建自由、公正、和平的“人民之家”而日夜辛劳的首相，熟悉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幢大楼，“微服私访”早已不是新闻，他为瑞典长期自由和平的生活环境自豪，他又有何所惧呢？据说已故国王古斯塔夫六世在位时，每天清晨只身孤影牵着狗在街上散步，也从不带警卫。一个美国记者在路上看见国王时觉得不可思议，便上前问道：

“陛下，您的警卫呢？”

“为什么要带警卫呢？”老国王反问道。看来他对这个问题也似乎不太理解。

帕尔梅夫妇离开西长街后，踏着老城纵横交错的鹅卵石小路穿过了与西长街相平行的两条街，向老城地铁站方向走去。他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下，通过地下人行通道，来到了灯火通明的地铁入口处。丽丝贝特出示自己的地铁月票（城内和近郊的公共交通工具通用），帕尔梅像普通乘客一样买了一张6克朗的车票。站口检票员是个来自俄罗斯的移民，叫谢尔盖·萨德鲁兹尼，42岁。他认出了首相，有礼貌地祝首相旅途愉快。谢尔盖对帕尔梅搭乘地铁外出，丝毫不感到惊奇，这已不是他第一次为首相乘车检票了。谢尔盖·萨德鲁兹尼后来回忆说，他没有看见首相身后有人跟踪，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情况。

列车穿过梅拉伦湖底下的岩石隧道，几分钟后便抵达中央地铁站。中央地铁站与位于它上面的中央火车站相通，地铁车厢里那些身着牛仔装、正在嘻笑打闹的年青人一轰而下，谁也没有注意到坐在旁边席位上的首相。帕尔梅只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看这群青年男女，也许他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列车继续向前开，经过赫托耶特站后便沿着斯维亚大街一直往北开。斯维亚大街是贯穿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地区南北的一条街道，宽阔的街道两旁座落着规模大小不等的商店、餐馆、咖啡厅以及宾馆、邮局等各种服务机构，五光十色的霓虹灯烘托着商店橱窗中琳琅满目的展品，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然而在寒冷的冬季，特别是夜幕降临后的周末，平时那种热闹的局面已不见了。

帕尔梅夫妇在罗德曼斯街站下车，走出地铁站来到了斯维亚大街上。今晚夜空晴朗，万里无云，点点寒星在空中闪烁，路边的积雪没有一点要融化的意思，虽说有些寒气逼人，但十分惬意。啊，外面的空气真新鲜，帕尔梅贪婪地吸了一口，接着便与妻子朝百余米外的格兰德电影院走去。儿子莫尔顿及其女友早已在电影院门口等候了，他们相互拥抱、问候以后，帕尔梅便去售票窗口买电影票。据电影院售票员后来回忆说：

“是的，帕尔梅首相来买票时我认出了他。他像所有人一样排队购票，但轮到他时，票卖完了。他是首相，总不能让他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说也凑巧，我手里还有四张票，是别人预定的，但未来取，我就把这四张给了他，但四张票的座位不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对年青人便不能和首相夫妇坐在一

起了。”

瑞典职员工会主席比扬·罗森格伦和夫人今晚也来观看电影《莫扎特兄弟》。他刚就座，便发现前排一位半躺半坐的中年男子是帕尔梅首相，忙起身向首相和首相夫人问好，并向帕尔梅汇报最近工作中的一些情况。帕尔梅听得很认真，不时问些问题，但丽丝贝特不耐烦了，“你们是来看电影还是谈工作？”丽丝贝特问。两个男人相互看了一下，会心一笑，中止了谈话。

电影院里，跌宕起伏的剧情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观众，令人陶醉的音乐在大厅里回荡；电影逐渐进入了尾声。11时15分，电影结束了，人们起身离开座位，开始向电影院的出口走去。

此时，在电影院外的斯维亚大街上，一个身穿深色大衣的中等身材的男子，正站在一家光线较暗的商店橱窗前。他面向橱窗，衣领向上翻起，戴着一顶拉得很低的帽子，帽沿齐眉，遮住了脸的上半部。约在电影结束后的二三分钟内，他转过身来，两眼死死盯住马路对面的电影院门口。此时正巧有辆小轿车经过，划破了午夜的宁静，散场的观众这时也陆续走出了电影院。站在橱窗前的男子似乎发现了什么，放在大衣口袋里的手稍稍动了一下。

电影院门前的便道上，帕尔梅夫妇正在和他们的儿子说着什么，随后帕尔梅夫人与其子的女友相互拥抱，帕尔梅也拥抱了一下儿子，一对年轻情侣便转身离去，帕尔梅和妻子沿着斯维亚大街左侧的人行道，由北往南朝地铁站方向走去。

橱窗前的男子左右盼顾一下，看到那对年轻男女在一个拐弯处转进了另一条街道，便从黑暗处走了出来，像幽灵一样尾随帕尔梅夫妇而去。那个男子始终与帕尔梅夫妇保持着一段距离。显然，男子早已观察好了这一带的地形，是有备而来的；当他看到帕尔梅夫妇接近吐纳尔街的时候，突然加快步伐，大步赶了上去。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加上电影院刚刚散场的观众亦不过五六个人。帕尔梅夫妇似乎还沉浸在《莫扎特兄弟》的电影情节中，静静地走着，似乎没有觉察到身后的动静。在距离格兰德电影院约二百米处，当那男子行至与帕尔梅夫妇几乎肩并肩的位置时，他突然敏捷地往前跳了一步，并迅速转过身来，就在这个男子与帕尔梅夫妇打了个照面的同时，男子手中的一枝史密斯及韦信密南型35.7毫米的左轮手枪响了。那男子连续打了两枪，见两颗子弹都击中了帕尔梅，立即调转头拔腿就跑，拐进了吐纳尔街。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几秒钟之内。吐纳尔街是一条步行街，车辆无法驶入，那男子沿街没跑多远就到了街的尽头，爬上那高高的石阶后，很快就躲进了与斯维亚大街并行的另一条大街，消失在夜幕中。

帕尔梅夫人丽丝贝特听到第一声枪响，还以为是年轻人在放鞭炮，正想回头问落在她身后半步的丈夫时，凶手开了第二枪，子弹打穿了她的外衣，擦伤了她背部的皮肤。丽丝贝特惊呆了，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受了伤，突然发现丈夫中弹倒地，她大声呼叫，扑在丈夫的身上。

凶手的第一枪击中了帕尔梅的肩胛骨，打碎了脊椎骨，穿透了主动脉和气管。帕尔梅血流如注，倒在人行道上，路边的积雪立即被染成了红色。17岁的护士安娜·哈格此刻正驾车经过此路口，目睹了眼前发生的一切，她迅速跳下车，对帕尔梅进行紧急救护。帕尔梅的脉搏很弱，已经感觉不到了，安娜立即对帕尔梅进行心脏按摩。此时，一个男子走了过来，对帕尔梅进行口对口的人工呼吸。但他做了几次后便放弃了，因为鲜血不断地从帕尔梅的口中涌出，无法进行人工呼吸。

一辆出租汽车此时正缓慢地行驶在斯维亚大街上，司机刚刚送完乘客，准备把车停在路边，计算一下一天的进帐，因而发生在午夜前的这一幕惨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名叫达尔斯博恩的出租汽车司机事后回忆说，“我听到两声枪响，”“我看见一个男人站在帕尔梅的旁边，看见帕尔梅突然倒地，然后看见凶手的枪和枪膛里冒出的烟。我清清楚楚地看见凶手站在那儿，右手握枪，看上去像美国西部电影里常常见到的那种左轮手枪——太可怕了。”达尔斯博恩立刻通过车内的报话器，向出租汽车公司急呼：“有人遭枪杀，快给警察局打电话，快叫辆救护车。一个男人躺在街上，已不能动弹……”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里，负责今夜值班的警探科西因今晚平安无事正闲坐在那里，困意悄悄地向他袭来。他打了一个呵欠，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11时21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响了，科西皱了皱眉头，心想：真的来事了？但当他听到出租汽车公司转来的司机呼叫，顿时紧张起来，睡意全无。

与此同时，一辆担任巡逻任务的警车正停靠在离斯维亚大街不远的国王街上，车里的两个警察正在闲谈。一位男子走过来，敲了敲车窗玻璃。

“什么事？”警官约斯塔·瑟德斯特伦一边摇下车窗玻璃一边问。

“那儿出事了。我听见了枪声，就在斯维亚大街上，离这里有二百米远处。”

瑟德斯特伦看了看那男子。男子很镇静，看上去蛮正派，不像是恶作剧的捣蛋鬼。他点了点头，命令司机向出事地点开去。车子刚启动，报话机里就传来了科西的命令：

“据报告斯维亚大街吐纳尔街上发生一起枪杀案，快去调查一下。”

“我正在向此方向驶去。收到你的指示是23时23分。”

“发生了什么事？”警官瑟德斯特伦问。

人们闪开在一旁，让出一条道。瑟德斯特伦看见地上躺着一个男人，满身是血，路旁的雪也被染红了。

有人叫道：“开枪的人跑进了吐纳尔街，逃走还不到5分钟，你们现在如果追上去，还能抓住他。”

瑟德斯特伦马上钻进巡逻警车，拿起报话机向科西报告。

“我看这家伙已经死了，凶手朝吐纳尔街跑了，发警报，并立即派辆救护车来，如果此人还有救的话。”

报告完毕，他又回到人群中。帕尔梅静静地躺在那里，人们默默地站着，瑟德斯特伦则按照常规干起了他的例行公事：把出事地点标出来，询问目击者，查明现场情况等等。他一边做一边想：“这个人为什么在市中心遭枪杀呢？并无搏斗的痕迹，也不像是抢劫。旁边这个妇女大概是受害者的妻子吧？”

丽丝贝特两眼紧紧盯住瑟德斯特伦，突然喊了起来：

“我是丽丝贝特·帕尔梅，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躺在这儿的是我丈夫，奥洛夫·帕尔梅，是首相！”

瑟德斯特伦眯起眼睛看着她，满腹狐疑。然后他仔细地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那个男人，顿时惊恐万状。一个国家领导人，一个比国王还重要的人物，就躺在他脚下，鲜血不停地往外流淌。他立即奔到车里赶快报告总部。

“首相被人用枪击倒，”他呼吸急促了。

接线员停顿了一会，然后说：

“请你再重复一遍。”

“天哪，首相遭到枪击了！”

科西吓呆了，但反应很快，立即派了两辆巡逻车去协助瑟德斯特伦，同时向警察总署、秘密警察局和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的头目们一一做了报告，并设法尽快通报内阁秘书长达尔斯坦。

最辛苦的是正在枪杀现场指挥的瑟德斯特伦。他看了看躺在地上的首相，不知如何是好。一辆救护车从这里经过，他赶忙跑到马路上把车子截住。一分钟后首相夫妇进了救护车，车子朝离这里最近的萨巴茨贝里医院疾驰而去。医院离出事地点不到一公里，院方已得到警方通知，医护人员早已作好抢救的准备工作。救护车刚到医院门口，车门立即被打开，抬着帕尔梅的担架很快进了手术室。此时离出事时间只隔 10 分钟。值班医生克拉斯·瓦林不用仔细检查便知情况十分严重：首相还活着，但已不省人事，有颗子弹打穿了主动脉，首相失血过多。瓦林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止血。正当瓦林医生竭尽全力进行抢救时，几个警察跑了进来。

“他能说话吗？”一个年轻警察问。

瓦林医生和帕尔梅夫人都没有答理他。

另一名警察走近帕尔梅夫人。

“我们非常难过，”这个警察说。“我们警方会尽一切努力捉住凶手。我们不会耽误您太长时间，不过请您尽量跟我们谈谈。”

“事情来得太突然，太快，我几乎什么也未看见。”

“不过你无论如何跟凶手打了照面。凶手是男的，对吗？”

丽丝贝特点了点头。“我肯定凶手是男的。”

“是不是你认识的人呢？”另一个警官问。

丽丝贝特迟疑了一下。“好像有点面熟，但不是我所认识的人。也许我在马路上见过。”

“请尽量想一想，”又一名警官说。“这很重要。”

丽丝贝特摇了摇头。她有点不耐烦了。“你们认为我不知道很重要吗？让我告诉你们，我记不起来了。他皮肤黝黑，我也许在电影里见过，也许在报纸、杂志上见过，说实话，我不知道。”

一个护士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她看见帕尔梅夫人后惊叫起来：“帕尔梅夫人，您受伤了！”

丽丝贝特看着护士，眼睛瞪得老大。护士指着她皮大衣上的一个窟窿。丽丝贝特此刻才感到疼，才知道她也被子弹击中。护士帮她把很沉的皮大衣脱了下来。正在此时，瓦林医生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看着帕尔梅夫人，摇了摇头。

“我很抱歉，”医生说。

护士向医生喊道：“瓦林医生，您难道没有看见帕尔梅夫人也受伤了吗？”

治疗帕尔梅夫人没有花多少时间。她的皮大衣保护了她，子弹只是擦破她一点皮。

不识时务的警察此时还来纠缠帕尔梅夫人。

“请再想一想，如果你还能记得什么的话。”

帕尔梅夫人火了。“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其他的事情我一概不知道。请别打扰我，我能告诉你们的都已经说了。”

此刻帕尔梅已被移至另一房间。一名警察被派到房间里守护。

12 时零 6 分，帕尔梅首相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帕尔梅夫人悲痛欲绝。她静静坐着，欲哭无泪，欲言无语。说什么呢？时间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真静啊，空气似乎凝固了。

两个儿子来了，帕尔梅夫人感到一丝安慰。一个护士轻轻地敲门，走了进来。

“对不起，打扰您了，帕尔梅夫人，有两个刑警要求跟您说句话。”

丽丝贝特对两个站在护士身后的刑警喊道：

“走吧，我已将我知道的告诉他们了，我再也没啥可说的了，看在上帝的份上，请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莫尔顿搂住母亲，向刑警做了个快走的手势。

“我们确有几个急事要问一下，”一个刑警坚持道。“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丽丝贝特实在不耐烦了。“但遇害的是首相啊。”

“是我丈夫！别烦我了。”

“您能允许我们将您的皮大衣拿去做化验吗？”一个刑警不甘心。

“上帝啊，大衣上就是这么一个窟窿，再也没有别的了。我的罪受得还不够吗，还要让你们用这些繁文缛节来折磨我吗？大衣放在这儿，别碰，快离开这里。”

护士将刑警推出门外，轻轻关上了门。

刑警失望之极，嘴里嘟嘟囔囔：

“太不合作了。他遇刺时她正挽着他的胳膊，她如不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们怎能抓到凶手呢？”

“帕尔梅夫人已经对其他警察说了。”护士纠正道。“没有对我们说。我们是暴力犯罪局的，凶杀案件是我们负责，不是简单的交通警察该管的事，也不是当时碰巧出现在凶杀地点的巡逻警或其他任何人的事。”警探摆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样子。

.....

坐在医院办公室里的帕尔梅夫人心都凉了，她对两个儿子说：

“请带我回家吧。”

莫尔顿摇了摇头。

“还不是时候，我们还得再等一会儿，警察还在您家里，正在检查。”

“秘密警察！他们在我家干什么？”

莫尔顿耸耸肩膀。

“他们要看家里是否被安装了窃听器。他们说检查完毕就给我们打电话。”

直到凌晨 3 点，帕尔梅夫人和两个儿子才在大批警察保护下回到寓所。6 小时前她和丈夫高高兴兴离家去看电影，满心希望度个愉快的周末夜晚，谁知飞来横祸。如今自己回来了，丈夫却直挺挺躺在医院冰冷的停尸房里，永远回不来，永远回不来了。帕尔梅夫人觉得房间里空荡荡的。

第二章 举国哀悼

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值班警官科西一面布置调查和保护枪杀现场的各项工作，一面将帕尔梅首相遇刺消息报告警察总署、市警察局和秘密警察局的头目。然后，他的职业本能告诉他：应立即报告政府内阁秘书长乌尔夫·达尔斯坦，因为此事应由他通报政府要员。

“船漏偏遇顶风雨”，通往乌尔夫·达尔斯坦家的电话一直占线，无法接通，科西警官心急如焚，让接线员不停地拨叫。

其实，秘书长达尔斯坦今晚早早就上床休息了。当他正在梦乡时，似乎听到电话铃声，他朦朦胧胧地拿起床头的电话，灯亦未开。电话是内阁的新闻秘书谢尔·林德斯特洛姆打来的，他告诉达尔斯坦，听说帕尔梅首相遇刺，已经死了。达尔斯坦听到此消息一下子从床上跳了起来：“你说什么？”达尔斯坦惊叫起来，“你和警察局、秘密警察局联系了吗？”

“联系过了，他们一无所知，至少他们是这样说的。”林德斯特洛姆继续说：

“事情是这样的，一个记者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在警方无线电频道上听到一条消息。您知道记者有个职业习惯，经常偷听警方无线电频道，取得独家新闻。开始我想这家伙大概跟我开玩笑，但为弄清事实，我给一个警卫人员打电话，这个警卫人员是帕尔梅首相保镖，晚上应该值班的。他说帕尔梅首相晚上放他们假了，他离开时一切正常。我想如果有人企图暗杀首相，他会听到一点消息的。他答应查一下再给我回电话。几分钟后他来电话了，说秘密警察局没有听到任何枪杀事件。但我刚把电话放下，另外一个记者又给我来电话。他是我朋友，我很信任他。他说他也听到这个消息了。几分钟后又有两个记者来电话，内容相同。我想无风不起浪，大概出事了，所以我给您打电话。”

“好吧，好吧，”达尔斯坦打断了林德斯特洛姆。“也许是场误会，但你打电话告诉我是对的，我再核实一下。”

达尔斯坦挂上电话，想了一会儿，给24小时值班的秘密警察局情况室打电话。情况室值班员称没有听到此类消息，答应跟斯市警察局核查后汇报，请他别挂电话。

这个值班员找到了科西，而科西还在千方百计找达尔斯坦！科西出言不逊地骂了一句，说：“我正有急事找达尔斯坦，而他的电话一直占线，现在才知道他在跟你聊天。请叫他马上挂上电话。”达尔斯坦就这样在事发三个半小时后得到官方消息：帕尔梅首相确实遇刺身亡。

秘密警察局的头目思文·奥克·耶尔姆洛特，夜里1时50分得到消息，立即部署对各部大臣的安全加强警戒，并将此事呈报国王。

与国王取得联系可不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首先，国王周末休息的行宫有六个，今晚他在哪个行宫过夜呢？当得知国王正在离首都六百公里处的滑雪胜地斯托尔林乡间别墅时，耶尔姆洛特立即挂通了电话。但无人接电话。国王早已安歇，电话离寝室很远，听不见铃响，而哨兵在外面站岗，警卫人员也不在室内。直到清晨5时30分国王才被铃声叫醒。然而，诚如秘密警察局的一个警官所说，国王知道与否无关紧要，他无权作出任何决定，告诉他只是出于礼节而已。

议长是重要人物。没有他新政府无法宣誓就职。

议长此刻正在西班牙度假。议长在西班牙的哈拉加有幢房子，但那里没有电话。

“但我们要设法请他马上回国，”耶尔姆洛特的副手赫格隆德说。

斯德哥尔摩市警察局长霍尔默也去外地度周末了，副局长韦兰德代行其职。韦兰德召集市警察局主要警官开会，他们围椭圆形桌子坐下。电话铃响个不停：巡逻警察不断报告他们的所见所闻，等候在楼外的记者要了解有关案情的最新情况。

林德警官拿出一篇写好的简短报告，念道：

“2月28日20时40分，奥洛夫·帕尔梅及妻子离开西长街31号寓所。帕尔梅把警卫人员遣走了，说不需要他们了。然后他给儿子莫尔顿打电话，他们约好在格兰德电影院门口会合。奥洛夫·帕尔梅和丽丝贝特·帕尔梅步行到离家最近的地铁站老城站乘地铁坐了站到罗德曼斯街，从罗德曼斯街步行到格兰德电影院，儿子莫尔顿及其女友已经到了。奥洛夫·帕尔梅买了四张票，电影11点结束，他们走出电影院，奥洛夫·帕尔梅和丽丝贝特·帕尔梅跟儿子道别后，开始沿着斯维亚大街朝赫托耶特地铁站走去。及至吐尔尔街街口，一个身份不明的男子跳了出来，掏出手枪射击。首相是23时21分中弹倒地的。”

达尔斯坦连夜组织力量将警方上述报告内容通知政府要员。不少大臣此刻正在外地度周末，接到报告后立即赶回。发生了这样的大事，哪能耽搁片刻。

外交大臣安德松正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听到噩耗，感到极度震惊，无法相信，但很快恢复镇静，立即要来一架直升飞机赶回斯德哥尔摩。

星期六，即帕尔梅遇刺的第二天早晨，卡尔松副首相召集政府内阁举行紧急会议。

会议在帕尔梅惯常召开内阁会议的会议室里举行，桌上点燃了表示哀悼的蜡烛。十五位男部长和四位女部长以及他们最亲密的助手依次就座。首先决定于3月15日，即两周后为帕尔梅举行葬礼，估计在此之前新的社民党党魁及首相人选业已解决，也需要给警方足够时间部署警戒，确保安全，届时定有许多国家和政府首脑前来参加葬礼。接着讨论首相人选问题。

安德松是党内元老，德高望重，曾任社民党书记长达20年之久（1963～1982年）。有人认为他接任帕尔梅首相最为合适，但他为维护领导班子相对稳定，主张选一年轻人接任党魁和政府首相。他心里想：首相人选非英瓦尔·卡尔松莫属。此事要速战速决，不能久拖，否则会引起外界猜测，说社民党内部出现分裂，权力斗争激烈云云，这对谁也不利，对党、对国家、对卡尔松都不利。此时他抢先发言，正式提议卡尔松为社民党的党魁。“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知道我们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理论的人，”安德松说，“并有能力找到足以团结全党的办法的人，”此时他转向卡尔松，“正因为如此，我们深信您是最适当的人选。”

卡尔松对此毫不怀疑。自成年后他一直为党工作。1934年他出生在纺织城布罗斯的一个工人家庭里，信仰社会主义，自商学院毕业后又获得隆德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前首相埃兰德组织了一个全由年青人组成的智囊团，卡尔松与帕尔梅同是智囊团成员，他们因而被称作是“埃兰德的孩子们”。在智囊团工作两年后，卡尔松赴美深造一年，1961年归国任社会民主党青年团主席。也像帕尔梅一样，他31岁进国会任议员，3年后升为内阁办公室次

长，1969年任教育大臣，1973年任住房大臣。1976年社民党在大选中惨遭失败，卡尔松奉帕尔梅之命制定一个夺回政权的战略和复苏经济的计划。1982年大选，社民党获胜，卡尔松当了副首相，负责制定瑞典社会发展的战略，因此被誉为是“负责未来的大臣”。1985年大选再度获胜，卡尔松再度任副首相兼环境大臣，负责争取绿党支持。此后他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此刻国难当头，他当仁不让，受命于危难之时。会议间隙他给妻子英格里德打电话征求意见，妻子说：“如果这是党的意愿，你就接受下来。”对瑞典社民党来说，党高于一切；理论观点有分歧无关紧要，但必须服从党的决议。

卡尔松返回会议室，平静地宣布自己的决定。内阁紧急会议通过由副首相英瓦尔·卡尔松代理首相职务。这项重大决定只花20分钟就解决了，这得归功于安德松等人的豁达。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甘当陪衬的绿叶。卡尔松行使首相职务的第一件事就是招来秘密警察的头目思文·奥克·耶尔姆洛特，命令他配合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局长霍尔默，做好15日葬礼活动的警卫工作，千万不能再出意外，因为届时会有几十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前来吊唁。卡尔松对警察头目说：“现在由你们向世界表明我们是一个开化的民族，我们不会惊惶失措地用武力去恫吓人们。”

“先生们，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们！”代理首相再三强调。

耶尔姆洛特自知责任重大。他对政府要员也提了一个要求：外出必须带警卫。

“先生们，你们知道凶手还逍遥法外，两周内如果还逮不住他，我们警卫工作就面临一场恶梦。所以我恳求你们，别再愚蠢地冒险了，免得把事情搞得更遭，你们每人都是下一个暗杀目标，如果不带保镖，请你们什么地方也别去，我是说什么地方也别去，”耶尔姆洛特对政要们说。

世间变化有时真难预料，一个祥和、宁静、社会秩序井然的瑞典，如今有点草木皆兵了，过去瑞典国王、首相只身一人在街上散步，是司空见惯、极其自然的事，如今大臣单独外出，被视为冒生命危险的不负责任行为！瑞典失去的不仅是一位首相，它那悠闲、宽松、安逸的氛围看来也将随帕尔梅而去。

官方正式宣布卡尔松代理政府首相时，距帕尔梅被害只有14个小时。恐怕这也是世界上最顺利的完成政权交接的国家之一。两天后，在社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上，全体委员一致同意任命代理首相卡尔松在下届党的代表大会之前担任党的代理主席。按照瑞典社民党的传统，执政期间首相职务均由党的主席担任，卡尔松实际上将是瑞典的新首相。

3月12日瑞典议会选举英瓦尔·卡尔松为瑞典政府新首相。“瑞典人民很镇定、很坚强。悲痛使我们团结起来。全国自发举行哀悼，这也许是凶手没有想到的，”安德松说。“凶手希望我们彼此会进行舌战，争论不休，希望这个伤痕将反映到社会上来，社会团结的局面会不存在。然而帕尔梅死后，不仅是他的朋友和政治盟友感到悲伤，他生前的许多政敌也来表示哀悼。有人说奥洛夫·帕尔梅使得瑞典在国际上的形象比实际更高大。这是千真万确的。在一个充满偏见、猜疑和日益离异的世界里，帕尔梅向世人表明我们相互都需要对方。他在时，我们对此感触不深，但他死后，我们认识到，他为人类理想进行工作的意义，比我们这些他的朋友们可能理解的多得多。”

帕尔梅首相惨遭杀害的消息不胫而走，无线电波也把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迅速传遍全国各地，瑞典全国惊呆了，人人在问：“这是怎么回事？”“这

是怎么回事？”在严酷的事实面前，大家如梦初醒，直到这时才意识到：瑞典并未完全摆脱恐怖、暴力等西方社会现代病的困扰。

震惊之后，便是全国哀悼。瑞典人是个很含蓄的民族，感情不轻易外露，但此时此刻却再也掩饰不住自己的悲哀。感情像决堤的江水一样，一泻千里。高大魁梧的汉子像妇女一样失声痛哭。

清晨，天还没亮，政府大楼前早已聚集了成百上千的群众，他们排着长队，等候进入吊唁大厅，表达他们的哀思。斯德哥尔摩市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拥到帕尔梅遇害的地点，献上一朵朵鲜红的玫瑰花，以表示他们的哀悼。整整两个多星期，悼念的人川流不息，帕尔梅倒下的地方已经堆起了一座两米高的花山，“人行道下沉十五厘米”。人们为凶手的残酷而愤怒，为失去一位好领导而伤心。一位名叫克拉里·努德海默的中年妇女说：“从此以后一切全变了。我无法理解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瑞典，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凶恶。帕尔梅总是考虑如何帮助弱小、患难中的人们。”

鲜花堆砌的小山上，点缀着无数张人们用血泪撰写的悼词和悼念诗文。一个署名为“玛丽·E”的悼念诗说：

“如果您能醒来看看我们多么爱您
如果您能醒来看看我们如何为您哭泣
如果您能醒来看看我们为您撒下的玫瑰
如果您能醒来看看我们对您多么眷恋
如果您能醒来看看我们多么愿意用我们的血肉之躯
为您挡住那罪恶的子弹
如果您能醒来看看我们为您对世界作出的贡献多么感激。”

一个年轻妇女长歌当哭，坐在路旁，写了一首小诗表达自己的哀思：

“上帝啊，
奥洛夫已经离去，
让我们用我们清醒的思路
为瑞典服务。”

这位妇女写完后对《每日新闻》的记者说：“我看见人行道上的血，像是鲜红的花，就像他的爱、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那么鲜红，那样炽热。我们要继续斗争，不能因他的死而出现空白。”

帕尔梅遇害的地点一下子成了斯德哥尔摩最拥挤的地方。人们千里迢迢来此悼念首相，献上一朵朵玫瑰，洒下一滴滴眼泪，并与业已不在的首相照张合影。千百万人又从这里赶往政府大楼，排起长长的队，等候签名，悼念首相，声讨凶手。悼念的人群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穿着简朴的工人与资产阶级贵夫人排队站在一起；蓄着长发的艺术家与不同肤色的移民站在一起；满脸稚气的孩子与穿着剪裁十分讲究的黑色礼服的交易所经纪人站在一起。悼念簿上有一首诗是写给凶手的：

“你这杀死帕尔梅的凶手
也许你知道你杀死的是只和平鸽
但你永远无法知道
千百万只和平鸽将从你射透的帕尔梅胸膛中飞出。”

举国悲恸，显出空前团结。六万八千名白领工人原定举行的罢工现在推迟。

晚间，上万名群众举着火把和油灯，自动聚集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塞

格尔广场，悼念帕尔梅。在全国各地，人们在帕尔梅曾经演讲和活动过的地方，在市中心、广场，以本民族特有的方式，举行各种各样的悼念活动，表达哀思。

社民党中央执委的声明指出，帕尔梅的去世是瑞典社民党和国际民主工人运动的巨大损失；他一生为公正、和平与自由努力奋斗；他使瑞典的阶级差别缩小，发展了经济民主，使瑞典的福利社会得到继续发展；他努力提高弱小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为和平和各民族的自由作出了贡献。

瑞典总工会主席玛尔姆赞扬帕尔梅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伟大贡献，是将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两支工运力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瑞典左翼党（即共产党）主席维尔纳，当时正在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七大，当他得知帕尔梅遇害的消息后，立即返回国内，对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去世表示哀悼。他称帕尔梅是工人运动的代表，随着他的离去，瑞典的政治生活将变得贫瘠。

瑞典自由党主席维斯特贝里认为，帕尔梅去世后之所以能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共鸣，说明他是位非凡的伟人，瑞典没有哪一位政治家能与他相比。

瑞典保守党领袖阿道尔松认为，帕尔梅被谋杀是民主理想的一个悲剧，帕尔梅对民主的追求像火一样炽热，他的名字将永远同争取世界和平的不懈努力连在一起。

为了纪念帕尔梅，瑞典政府决定将帕尔梅遇难的吐纳尔街，改称为“奥洛夫·帕尔梅街”。瑞典社民党中央执委和帕尔梅的家属，决定设立一项名为“帕尔梅为争取国际谅解和共同安全纪念基金”。设立该基金的目的，是为了“通过向青年人提供奖学金和助学金的方法，促进国际交流、和平和裁军的研究，支持反对种族主义和民族敌视，以及增进国际了解的工作”

噩耗传遍全球，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响，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发来唁电，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帕尔梅的不幸逝世表示哀悼。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非洲统一组织外长会议和拉美八国外长会议均联名发来唁电或通过决议，对帕尔梅的遇难表示痛惜和哀悼。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发表讲话，称赞帕尔梅是“和平战士的典范”、是联合国宪章最高理想的化身。

在世人的哀悼中，第三世界国家的哀悼活动更为引人注目：印度、阿根廷、斯里兰卡分别宣布为帕尔梅哀悼一天；尼加拉瓜和越南哀悼三天，坦桑尼亚哀悼七天。

中国《人民日报》3月2日在第一版，发表了“瑞典首相帕尔梅遇刺身亡”的消息，并全文刊载了中国政府总理3月1日致瑞典政府副首相英瓦尔·卡尔松的唁电，唁电中称赞帕尔梅首相是“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生前为世界和平事业和中瑞友好关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连续播发和报道了瑞典人民悼念帕尔梅的活动、有关瑞典国内情况和帕尔梅遇刺案的侦破情况，中国人民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该报记者许福瑞的文章《我所见到的帕尔梅首相》。文章回顾了帕尔梅首相1970年和1972年两次接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的情况，介绍了帕尔梅首相平易近人、无拘无束的谈吐，和他那愿意像普通人一样生活的作风，给中国人民留下了“平民首相”的印象。文章特别提到帕尔梅首相对中国新闻报道的注意。在1972年接见中国新闻代表团时，帕尔梅首相说，他反对美国对越南政策的言论和行动，往往在瑞典报纸上还没有看到，

却在中国的报道中见到了。

3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的特使、卫生部长崔月犁飞抵斯德哥尔摩，参加瑞典前首相帕尔梅的葬礼。

14日上午，瑞典外交大臣斯腾·安德松会见了崔月犁特使、周南副部长和中国驻瑞典大使吴家淦。崔月犁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对帕尔梅首相不幸遇刺身亡表示深切哀悼，并请安德松大臣转达他们对帕尔梅家属的深切慰问。崔月犁特使说，帕尔梅首相生前为促进中瑞友好和维护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安德松对崔月犁特使的讲话表示感谢。他说，瑞典政府将尽力完成帕尔梅首相的未竟事业，并将进一步发展同中国的密切关系。

葬礼活动期间，任务最艰巨的要数瑞典警方了。警察总署动员了全国警力，进行瑞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警察行动，以确保葬礼的顺利进行和每一个参加者的安全。

当警方的几个巨头看到外交部送来的外国代表团名单时，他们岂止是紧皱眉头，可以说是寝食不安了。不要说那一百二十个代表团，仅那三十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国际名人的安全保卫工作，就使他们面临严重考验了。

总探长韦尔纳·贝里格林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有点皱了的纸，用手一平，交给了警察署长桑德斯特洛姆，“截止到1985年底的十年里，警方通报的世界上恐怖主义袭击活动总共六千三百二十九次，其中二千三百二十九次发生在西欧。”

“你想说什么？”桑德斯特洛姆问。

“在我们西欧，几乎平均每一天半发生一次暴力事件，我们对来宾选择重点进行保护就毫无意义了，他们每人都是袭击目标。”

最终他们还是确定了几个“重点保护对象”：比利时首相马尔滕斯、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西德总理科尔、外交部长根舍、巴尔和维利·勃兰特。美国国务卿舒尔兹会带自己的警卫人员，这是美国习惯做法，还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他也肯定有克格勃秘密警察保护，但美苏代表团任何团员擦破点皮，瑞典警方也担当不起！赞比亚的卡翁达总统、莫桑比克的萨莫拉·马谢尔总统、南非的大主教图图和非国大领导人坦博、安哥拉代表团、黎巴嫩代表团、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等，也都在“重点保护”之列。

外国代表团被安排在四个旅馆下榻，贵宾楼饭店是其中之一。贵宾楼豪华气派，陈设讲究，房间宽敞，但喜来登等五星级旅馆建成后，它重温昔日辉煌的机会少多了。不过，瑞典政府接待的贵宾通常都在贵宾楼投宿。葬礼前一天的晚上，面容严肃的贵宾们在贵宾楼大厅右侧的“法国走廊”餐厅用餐，高得惊人的餐费显示用餐人的显赫身份。级别稍低一些或食欲稍差一些的，则聚集在大厅左侧消费略低一些的酒吧间和餐厅里用餐。外交部官员忙不迭地跟每个客人寒暄，像是花丛间的蜜蜂，在这位来宾面前轻声细语说几句，又到另一来宾处重复那几句已经说了几十遍的话。餐厅内外，旅馆上下到处都布置了秘密警察的便衣人员。在这群穿戴讲究、彬彬有礼的来宾中，加纳元首罗林斯独树一帜。他身穿丛林战军服，腰间束一子弹袋，袋里装满子弹，左右两个同样打扮的卫兵，大步流星地走进餐厅。

1968年3月15日，瑞典人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为他们敬爱的首相奥洛夫·帕尔梅送行。

3月的斯德哥尔摩，隆冬虽已过去，风亦不再那么刺骨，但仍很冷；路边的积雪虽已开始融化，但清晨路面上还有一层薄冰。人们期待着春天的到

来，但还得忍受这乍暖还寒的一段时间。

清晨，交通已经管制，通往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各条道路都已封闭，警察分兵把守，机动车辆一概不得通行。穿着桔黄色工作服的清洁工人开着清洁车清扫街道：雪化了，入冬时为防止路滑撒在路面上的沙子该清理了。他们格外精心地清扫着，不让一块污迹、一片废纸逃过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亲爱的首相帕尔梅今天将在这里走完他在人间的最后一个旅程，此后他将在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教堂坟地永远安息。

葬礼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举行。这座建于1923年的哥特式建筑，坐落在梅拉伦湖的北岸，因四周没有更多的高层建筑，显得更加雄伟壮观。这座历时十二个年头，用八百万块手制红砖和一千九百万块镀金的瓷砖构筑成的大厦，是当今世界上耗资最昂贵的建筑之一。当你走进金碧辉煌的“金殿”，面对着大殿正面那幅用金砖镶嵌的、描绘来自东方和西方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和睦挚爱的巨幅壁画，会使你感觉到仿佛置身于当今纷繁嘈杂的世界之外的世外桃源。市政厅里另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蓝厅”。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的大型宴会就在这里举行。今天，蓝厅成为悼念帕尔梅活动的主要会场。市政厅外和灵车将要经过的街道两旁早已挤满了肃穆而立的人群，在这近五十万人的送行队伍中，有不少是从全国各地专程赶来的，他们都默默地注视着市政厅。

下榻在贵宾楼的外国代表团成员们乘坐豪华轿车前往市政厅。车队浩浩荡荡穿过两旁站满人群的街道。街上没有一个值勤的军人，没有一个持枪的士兵。卡尔松首相反对动用军队来维持秩序，认为这有悖于帕尔梅的原则和瑞典民主价值。秘密警察和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只得服从政府的决定。而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却给警卫工作制造了一个大难题，他断然拒绝乘坐给他安排的轿车。因为这天是星期六，是犹太教徒的安息日，正统的、虔诚的犹太教徒认为乘车是违反安息日教规的。佩雷斯总理坚持从宾馆步行到市政厅。幸而两地相距不远，所有参加悼念活动的来宾都安然无恙地抵达市政厅。

瑞典没有举行国葬的传统，今天的葬礼，是由社民党按照该党的传统，为帕尔梅举行的民间葬礼。葬礼的仪式非常简短，不带任何宗教色彩，因为帕尔梅是个无神论者。大约一千五百名瑞典各界人士和来自一百三十二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国来宾静静地肃立在大厅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王后破例前来参加帕尔梅的葬礼。

帕尔梅的白色灵柩安放在蓝厅大理石石阶中间的平台，四周布满了鲜花。大厅的右侧摆放着花圈、玫瑰花束，中国总理和中国驻瑞典大使敬献的花圈也在其中。瑞典社民党的党徽悬挂在大厅四周，外面的过厅两侧树立着代表瑞典社民党二百八十个区委的红色党旗。市政厅外面，瑞典海军的一艘军舰守卫在大厅一侧的海面上，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盘旋警戒。

下午两点，葬礼开始，瑞典全国各地下半旗志哀，各个教堂的钟声同时响起。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新任首相英瓦尔·卡尔松、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以及社民党青年团的代表等先后致了悼词。

帕尔梅曾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社会党国际主席维利·勃兰特满怀深情地称他为“小兄弟”。勃兰特在悼词中说：

“从林肯、饶勒斯、桑地诺到阿基诺、甘地，以及现在的帕尔梅，他们每人以及与他们一样的人都为全人类留下最重要的遗产，他们的亲属、他们

的同事以及他们国家的百姓为此而骄傲。现在我们向我们敬爱的小兄弟告别。谢谢您，奥洛夫，感谢您的成就，感谢您的奋斗精神，感谢您为我们树立的榜样。奥洛夫将继续活在我们心中。他将被欧洲的工人、非洲的农民、亚洲、美洲以及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们铭记不忘。奥洛夫的榜样将进一步鼓励为美好未来而斗争的人继续努力。”

卡尔松悼词的基调是号召大家“化悲痛为力量”，他说“死是必然的，我们到死的时候也准备去死。但这样的死，则是另一回事。奥洛夫·帕尔梅的力量永不衰退，他总是精力充沛，热情洋溢。他富有长期经验汇成的智慧，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将会感到奥洛夫·帕尔梅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他突然夭折，像正在自由飞翔的大鹏突遭杀害一样，夺去了他许多最好的年华，也夺去了我们许多最好的岁月。这更使我们悲痛难忍。”

卡尔松立誓继续发扬帕尔梅的精神，“在尊重所有人平等价值和个性的基础上发展瑞典的民主，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证瑞典及全世界享有公正、伙伴关系和团结一致。”卡尔松特别奉劝正在观看电视实况转播葬礼的瑞典全国人民说：“但愿我们国家永不进行反省。我们向全世界开放，为民族间、国家间的和平、合作而努力。”

芬兰著名歌唱家阿里亚·塞永玛一双湿漉漉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白色的灵柩。她用瑞典语唱了一首智利著名歌曲《感谢生命》。两年前帕尔梅第一次听到这首歌，非常喜欢，对阿里亚·塞永玛说：这是一首人们愿为自己葬礼选用的歌。今天当阿里亚·塞永玛唱起这首歌时心里一直默默在说：好朋友，今天我就用这首歌为你送行。

歌中唱道：

感谢生命，
赐给我无数宝贝：
给了我眼睛，
使我区分黑白，
看见天空星星，
和我热爱的人民。
感谢生命，
赐给我无数宝贝：
给了我耳朵，
听见小鸟歌唱，
听见蜻蜓和蜜蜂低吟，
和我热爱的人们的声音。
感谢生命，
赐给我无数宝贝：
给了我语音和字母表，
我才学会
“兄弟”和“朋友”
这些像你明亮眼睛清澈的光，
照亮了我的字。
感谢生命，
赐给我无数宝贝：
让我漫步在

蔚蓝的大海，
长长的海滩和高高的山峦，走向沙漠和平川，
返回家园——
到你绿色的湖边。
感谢生命，
赐给我无数宝贝：
给了我一颗炽热的心，
当我望着理智的果实，
纯洁的善行，
当我看着你明亮的眼睛，
我的心颤动剧烈。
感谢生命，
赐给我无数宝贝：
给了我欢笑，
给了我悲痛，
所以我能区别
什么是幸福，
什么该哭泣。

歌唱家似歌似泣，非常感人。一般感情不易外露，且善于表演的政客们此刻脸上也呈哀色。最后由全国各城市小学生组成的唱诗班演唱了祈望和平的歌。低沉的哀乐缓缓终止，一队由社会民主青年团组成的仪仗队抬起灵柩，穿过大厅中央，将灵柩放在等候在市政厅外的灵车上，葬礼到此结束。

送葬的队伍缓缓走出市政大厅，踩着八面大鼓敲打的节拍，慢慢走过市区。帕尔梅的灵柩在仪仗队的护送下紧随在瑞典国旗后面。灵柩上是一簇用红玫瑰扎成的巨大花束——红玫瑰是社会民主党的标志。帕尔梅的亲属和生前友好分乘十辆豪华轿车跟在灵车后面，气氛庄严肃穆。当送葬队伍走出市政大厅前的鹅卵石广场上时，海鸥哀鸣了几声，与不远处的教堂钟声交织在一起，更增添几分凄楚。

灵车通过了帕尔梅两周前还每天来此上班的政府办公大楼。大楼前早已站立着七八层为首相送行的群众，许多人泪流满面，更多的人沉默不语。灵车走上议会桥，桥下是斯特伦河，梅拉伦湖的淡水就在这里与波罗的海的海水相遇，水面上就像划了一道疆界似的，泾渭分明，水闸的一边是绿色的湖水，另一边是暗色的海水。

灵车继续驶向圣灵岛，走过议会大厦前的人行道，这人行道不久前刚刚修成。帕尔梅从31岁进议会，一生唇枪舌剑，斗败无数政敌，如今他向自己战斗过的地方告别，去他永久栖身之处。

再往前数百米，便到了斯德哥尔摩老城，帕尔梅寓所所在的西长街就是从这里向南沿伸的。灵车没有向南去，而是住东拐，缓缓地向王宫方向移去，抵达了王家那褐红色的宫墙。按王室规定，凡国王在宫里时，宫顶上要悬挂国王旗帜。今天王宫上的国王旗帜和全国各地悬挂的国旗一样，降半旗志哀，并向这位年岁不大、资历不浅，为瑞典在国际上赢得众多声誉的政治家致最后敬礼。在瑞典历史上非王室成员死后受此殊荣的只有两人：帕尔梅和哈马舍尔德。哈马舍尔德是1953~1961年的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9月去刚果（金）（今扎伊尔），飞行途中，于今赞比亚上空失事殒命，死后被授予

诺贝尔和平奖。两人都是贵族出身的社会民主党人，但这俩人明显不同之处是：哈马舍尔德深受美英西方大国赏识，而帕尔梅则是常常使西方大国恼火的人。

帕尔梅自 1969 年接替埃兰德担任瑞典社民党主席后，两度出任政府首相（1969~1976 年、1982~1986 年）。今天，国王不但破例为他下半旗志哀，并且亲自参加他的追悼会，足以证明他在瑞典王室和瑞典人民心中的位置。国王在悼词中赞扬帕尔梅是位“有力地高举民主大旗的人，而自由瑞典的社会就建立在民主的原则和理想之上”，并说“几年来我与奥洛夫·帕尔梅相识，建立了友谊，他的离去对我个人是巨大的损失。由于他的逝世，瑞典在世界上的声音沉默了，一个每人侧耳细听的声音，一个强烈反对暴力和侵略的声音，一个呼吁和平、自由、公正和小国权益的声音，全世界将怀着悲哀心情怀念这个声音。”

灵车沿王宫宫墙走过，越过斯特伦桥，到了老城对岸的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停泊在岸边码头上的渡船一律降半旗、鸣笛向帕尔梅志哀。耸立在岸边的“贵宾楼”饭店前早已站满了送行的群众，神情肃穆，无不悲恸。

灵车继续缓缓前行，沿着国王公园街，经过国王公园——这是斯德哥尔摩最著名的公园，朝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行进。灵车所到之处，地上撒满了红玫瑰，向西拐上哈姆内大街后，便直接向塞格尔广场走去。哈姆内大街上楼房林立，高大的 PK 银行大楼、NK 百货大楼、瑞典学会和由四十三家商店组成的购物长廊，加上邻近两条街上的奥林百货大厦和 PUB 购物中心，构成了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繁华地区之一。往常这里是永无终止的车辆和川流不息的人群，呈现着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是今天，店堂里空无一人，四周静悄悄，听到的只是肃立在街道两旁的人们的抽泣声。

灵车来到了塞格尔广场。广场是以瑞典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广场的地面由黑白两色瓷砖铺成，正中央的水池中是一个三十多米高、一百三十吨重的用玻璃雕塑成的立柱。广场是斯德哥尔摩的中心，就像天安门广场是北京的中心一样。通常我们看到的路标上所标明的某地距斯德哥尔摩距离，就是指该地距塞格尔广场的玻璃雕柱的距离。灵车缓缓绕过广场，从文化大厦前经过。这里是文化娱乐的中心，大厦里不但有一个向所有人开放的图书馆，而且其展览中心的各个展厅长年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艺术展览；此外还有欣赏音乐、观赏戏剧的专门场所。塞格尔广场是斯德哥尔摩最繁华所在，五座摩天大楼以及鳞次栉比的办公楼、银行、商业大楼，使完全现代化的伦敦匹克戴里广场在其面前显得格外苍老、缺乏生灵。灵车继续前行，来到了以国王瓦萨名字命名的大街，这可能是市中心最宽的大街了，与地铁中心站相通的中央火车站就位于瓦萨街上，因而这里是交通运输的一个小枢纽，是一条繁忙的街道。但街道两旁的旅馆、贴有“免税”标志的旅游商店、皮货店、水晶制品店等也是目不暇接。灵车越过瓦萨街与国王街联接处，继续向北，来到了北班托耶特。为首相送行的群众静静地加入送葬队伍，使出殡行列越来越长。北班托耶特是瑞典工人运动心脏，瑞典总工会（Landsorganisation，简写 LO）大楼就在这里的一条大街上。帕尔梅对这里不无喜爱，因为这里毕竟是社民党力量的源泉；但这里又不时给他带来一些令人头疼的麻烦。灵车转向东，经过“人民大楼”。这里有剧场、餐馆、夜总会，消费较低，是一般工薪阶层的去处。剧场里上演的多是反映社会问题的话剧。还有个大会堂，社会民主党年会便在这里举行。

3月的斯德哥尔摩天黑得还是较早。下午4时许，夜幕悄悄降临，灵车此刻已在路上行走整整一个小时，被极大悲恸压抑着的人们忘记了疲劳，忘记了寒冷，不知不觉地便来到了位于斯维亚大街旁的阿道夫·弗雷德里克教堂墓地，这里将是帕尔梅首相长眠之处，距他惨遭杀害的地方只有一箭之遥。

斯维亚大街上挤满人群。天空是阴沉的，人们的脸色也是阴沉的，略带迷惘，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似信似不信，因为他们不明白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人们只是两眼盯着渐渐远去的灵车，静静看着它进了教堂坟地，久久不肯离去。斯维亚大街上也像灵车经过的街道一样撒满了玫瑰花，只是这儿花更多，有些地方，尤其是帕尔梅应声倒地之处及附近，鲜花堆砌了好几米高。几家电视台的聚光灯将鲜花簇拥的地方照得通明。

教堂墓地上举行了简短的仪式，帕尔梅灵柩便放入预先挖好的墓穴中。仪式由斯德哥尔摩大主教克里斯特尔·斯坦达尔主持。斯坦达尔是位激进的高级神职人员，对死者非常敬重。但帕尔梅不是虔诚的教徒。由于家庭宗教信仰，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是路德教徒，但他记不得成年后是否来过教堂做礼拜。这也反映了一般瑞典人对待宗教的态度。路德教是瑞典的国教，全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信仰瑞典路德教，但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人不到百分之五。许多人一生只去过教堂三次：婴儿时接受教堂洗礼，结婚时在教堂举行婚礼，去世时按宗教仪式举行葬礼。宗教在国家和寻常人的生活中，已不占据重要的位置，斯坦达尔主教对此十分了然，对此他虽然不无遗憾，但却非常明智大度。尤其是在自己好友的葬礼上，想到他的溘然离去，伤感不已。

帕尔梅的墓占地不足四平方米，墓碑是一块天然花岗石，上面镌刻着帕尔梅签名的手迹：“奥洛夫·帕尔梅”。这块取自波罗的海果特兰岛上的岩石，经历过风吹雨打，海浪冲击，大自然镌刻下的痕迹更使人联想起这位和平斗士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潇洒的气质。

葬礼结束了，外国代表团逐一离开。法国密特朗总统来得最晚，追悼会即将开始时他才乘专机到达，而葬礼一结束他就推说公务缠身，不能久留，旋即乘上等候他的专机走了。有些国家代表团却利用这次机会，相互进行非正式接触和交谈，尤其是那些平时不能进行正常会晤的人更得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因为外界对此不会引起注意和猜测。如果民主德国的昂纳克和联邦德国的科尔达成什么谅解，舒尔兹和雷日科夫对下次日内瓦美苏首脑会谈取得任何默契，以及其他有争议的国家改善了两国关系，这也算是帕尔梅对世界和平作的最后贡献了。

瑞典人看到这么多外国首脑来瑞典，车队络绎不绝，阿兰达国际机场忙得不亦乐乎，似乎刚刚知道，他们已故首相在世界上交友如此广泛，才慢慢品味出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悼词中所说的“由于他的逝世，瑞典在世界上的声音沉默了，一个每人侧耳细听的声音，一个呼吁和平、自由、公正和小国利益的声音，全世界将怀着悲哀心情怀念这个声音”的含义。有些平时不太喜欢帕尔梅的人看到这样情景，不免感到奇怪：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真有这么高吗？他真的那样重要吗？

英国《金融时报》1986年3月1日登载文章说：欧洲所有西方国家、苏联东欧集团、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都来吊唁帕尔梅，世界上没有一个首相、总理有此良好人际关系，这是对瑞典在国际事务和政治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认可。

基辛格一向与帕尔梅不睦，自帕尔梅六十年代带头反对美国越南战争

起，就关系紧张。基辛格说话一向严谨，他对帕尔梅的评价，准确表达了美国对他的复杂心情。基辛格说：“帕尔梅是极有个性的人。许许多多领导人是因为手握大权才变得引人注目，帕尔梅则不是凭借自己官职。他的知识，他的精明和孜孜以求精神说明一个人可以改变结局。一个中立小国，位处国际大事边缘，只是由于其首相的德行和智慧，取得的影响竟超出用传统方法计算的力量所能取得的影响。我们俩人每到对方国家时，都要会晤并长时间交谈。我感到，我不听听帕尔梅脑子里是怎么想的，我的想法就不会全面、完整。归根结底，尽管有争吵，帕尔梅的激情对西方价值是最为有利的。”

“实用主义者也许认为帕尔梅是浪漫主义者，居然毫无保留地相信人是绝对善良的，”基辛格说，“然而每一巨大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是一个美梦。不相信基督就不会有教堂，教堂不是由怀疑基督的人建成。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越来越把帕尔梅当作自由、警报、谆谆诱导等防护堤式壁垒碉堡的卫兵，高举对话旗帜，通过对话，自由和人类尊严才得到体现。我们对帕尔梅提出的答案可以提出质疑，但绝不可对他提出的问题置若罔闻。所以对所有与帕尔梅有过接触的人来说，这世界冷静多了。能与帕尔梅生活在同一时代是一大荣幸，我为能结识帕尔梅感到荣幸。”

参议员肯尼迪更把帕尔梅比作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总理上台又下台，来了又走了，各国皆如是。现在全世界深切悼念帕尔梅，是因为他是现代人物中最罕见的，他不只是一位首相，还是一位先哲。他的话有时逆耳，然而先哲的话从来就不是悦耳之词。”

美国总统里根的唁电真正代表了美国官方的看法，称帕尔梅是“世界上最受人尊敬的领导人之一，是一位使‘同情’和‘怜悯’成为瑞典政策和商标的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轻描淡写地说帕尔梅将被大家“深深怀念”。英国的冷淡态度表明它对帕尔梅的厌恶。帕尔梅自学生时代起喜欢英国尤胜于法国，但他为非洲国家呐喊，触犯了英国殖民利益，英国能不恼火？世界事情无奇不有。帕尔梅最恨的国家是前苏联，其中原因很多，有历史的，有现实的，有意识形态的，有现行政策的，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但前苏联对他表示最大的尊敬。帕尔梅逝世时，前苏共正在召开党代会，大会代表全体起立，为“世界著名的和平战士”默哀一分钟。

帕尔梅在国内也是一个极有争议的人物。并不是所有瑞典人都热爱帕尔梅。相反，他结怨不少，许多人反对他，憎恨他。他的好友、斯市警察局局长霍尔默说：“帕尔梅有很多敌人。左派对他不满，认为他是叛徒，将工人利益出卖给资本主义；右派恨他，说他背叛自己家庭，背叛自己的阶级，是蜕化分子，是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成了古巴、越南的朋友。有些政治党派言词忽左忽右，很难从他们的高谈阔论中划分他们的政治倾向。极左分子，不管自称是马列主义者，或托洛斯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认为帕尔梅比别人好些。喜欢莫斯科、越南的人也不认为搞恐怖行动或反对社会民主党有什么好处。”

对帕尔梅遇刺也不乏幸灾乐祸的人。遇刺当晚消息传开后，有些右派在简易舞厅和饭店里买了香槟酒为凶手干杯。瑞典名望最高、最受尊重的作家和评论家奥洛夫·拉格克兰斯在帕尔梅遇刺后第二天在《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说“帕尔梅之死产生了强大的、可怕的印象。鲜花撒满了他应声倒地之处，世界各地传播媒介倾洒了赞誉之词。允许我将同情投向另一方，投向污蔑、诽谤他的人。这些人指出他是自由和个性的敌人，指出他是将公共部门

搞到荒唐程度的人，并据此得出结论，他是出卖国家的人。对帕尔梅此等不恭之词在瑞典早已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是千万个瑞典家庭每天早晨喝咖啡时爱议论的话题，是使大家痛快地产生同感的仪式，有些大作家非常愿意在刊登他们作品的报章杂志上发表此类消遣性文章，并因此闻名遐迩，这实在是文人的羞耻。参与这场诽谤行径的人可能现在提心吊胆了，害怕他们憎恨帕尔梅的公开态度与帕尔梅遇刺有何关系……我不相信人们会怀疑他们，但至少值得我们考虑他们在胆战心惊，哪怕是象征性的考虑。”

拉格克兰斯认为，尽管帕尔梅谴责前苏联 1968 年入侵捷克，但他仍是亲共分子，因为他在东西方冷战中不愿站在任何一方。“在反共宣传占垄断地位的国际气氛中，他保留普通的常识性的立场观点，西方将帕尔梅之流认为是靠不住的人。如果在喝咖啡时的谩骂声中真的产生了憎恨，而不是为取乐而骂几声，那么其根源就在于此。不跟我们一起狂吠、叫喊和吹胡子瞪眼的人便是我们的敌人……对帕尔梅的恨是更大的恨的一部分，这个更大的恨有朝一日终会酿成第三次世界大战——一场世界性谋杀。”

此等耸人听闻的言辞英国人赞之为“冷静的思考”，并说它“产生在寒冷的三月的瑞典是适宜的。”

被一部分人反对是非常正常的，如果没有人反对，那就成为“老好人”，那倒不一定真是好人了。

其实，帕尔梅的目的只有一个：为了瑞典民族的利益，瑞典人迟早会明白这一点。诚如美国《华盛顿邮报》1986 年 3 月 1 日文章所说，“帕尔梅除了生命结束方式不具瑞典特色以外，其余都是十足的瑞典人”。由于他政治信仰不同，他制定的内外政策触犯了本国一些利益集团和一些国家的利益，这是在所难免的。同时也由于他争强好胜的个性，说话有时尖刻，也疏远了一些人。美国报纸说他“在与邻国、朋友交谈时不时露出自命不凡的神情。”瑞典“社民党”与“农民党”合作多年，瑞典人戏称它们是“红绿联盟”或“工农联盟”。但在一次议会辩论中，“农民党”党魁被帕尔梅用尖刻语言讽刺、挖苦后，发誓再也不与他合作。但大多数瑞典人喜欢他、支持他、热爱他。有人说他恃才傲物，但更多的人说他平易近人。

第三章 贵族子弟

1927年1月30日奥洛夫·帕尔梅诞生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非常富有的上流社会家庭。其全名为思文·奥洛夫·尤阿金·帕尔梅。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上，纬度很高，其南部边界在北纬55度20分，与我国最北部城市漠河的纬度相近。全国约有百分之十五的国土在北极圈内。

斯德哥尔摩位于瑞典中部，受大西洋暖流影响，气温比北部稍高，但一、二月份正值隆冬，是全年最冷的季节，下雪就像中国南方黄梅季节下雨一样，是日常现象。空中飘着鹅毛大雪，地上铺着厚厚的积雪，人们因行走困难，很少出门；路上也没有多少车辆，整个城市几乎处于冬眠状态，寂静无声——20年代的斯德哥尔摩与现在的斯德哥尔摩大不一样。

斯德哥尔摩市的东部地区，当时是富人居住区，东马尔姆斯大街居住的多是一些银行家、企业家、律师等。这里的建筑千姿百态，争奇斗艳，各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很引人注目。坐落在东马尔姆斯大街36号的，是一座四层楼的宅第，建筑面积很大，楼前有一道黑色栏杆将住宅与人行道隔开。正门在右侧，不大，拾级而上，进入门厅后，右边是衣帽间，左边是一个很大的客厅；距餐厅不远处是厨房；此外一层还有几个小房间，是仆役们的寝室。二楼有一间起居室，其余的是书房和寝室；三楼、四楼基本上都是作寝室用；地下室则主要是作贮藏室用。这所高大、宽敞的宅第，就是帕尔梅的家——奥洛夫·帕尔梅诞生和成长的地方，直到1953年，他26岁时才搬出这所房子。

这所房子的主人是帕尔梅的祖父思文·帕尔梅。据家谱学家考证，帕尔梅祖籍原在现今瑞典南方斯科讷的一个小城——于斯塔德。其祖先原是荷兰人，从事航运业；16世纪时来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经商，因生财有道，成了家财万贯的富商，王室为表彰其功绩，封为贵族，此后便在于斯塔德定居下来。至今在于斯塔德城还有一条名为帕尔梅——吕德尔斯的大街，是以他祖先的名字命名的。当时斯科讷尚属丹麦，后来归于瑞典。

祖父思文·帕尔梅很富有，是瑞典保险业的巨子。他是自由党人，曾当选斯德哥尔摩市政议员和国会下院议员。他曾谋求财政大臣的职位，但是当时的首相史达夫却将这一重要位置给了别人，思文·帕尔梅很失望，气恼之下便一心经商，闲暇之时写些政治评论文章，与其说是指点江山，不如说是发泄心中不满。他酷爱数学，遗憾的是，他的数学成就如同他的政治抱负一样，始终未能如愿。老人特别疼爱最小的孙子奥洛夫·帕尔梅，时常抚爱于膝上，但他做梦也未想到，孙儿长大后居然完全背离他的政治信仰，加入了社会民主党，为工人的自由、民主、平等奋斗。

祖母哈玛出身于芬兰一个著名的政客家庭。祖母的父亲是芬兰王宫里一个显贵，王宫中除王室成员外，地位无不在其之下。祖母爱好文学，从1861年起从事文化活动，1959年逝世。她是一个文学沙龙的成员，许多著名文人参加了这个沙龙，因而祖母为帕尔梅家族与文学界建立了联系。正因为奥洛夫·帕尔梅与芬兰有这一段血缘关系，芬兰德高望重的前总统吉科宁，在帕尔梅当选瑞典首相后，有次开玩笑说：人们常说出门在外，有个水土不服的问题，这孩子在那儿（瑞典）看来搞得不坏嘛！

帕尔梅的父亲贡纳尔·帕尔梅（1886~1934年），继承父业，并颇有建

树，成了 Thule 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现今瑞典保险业不少规章制度都是他创立的。可惜他健康状况不佳，患有严重哮喘病，1934 年在他父亲去世后仅几个星期，他因哮喘加剧，一口气没有上来，也跟着他父亲去了。

母亲伊丽莎白·帕尔梅（1890~1972 年），是德意志拉脱维亚人，做姑娘时也是个大家闺秀。她父亲古纳是德意志拉脱维亚贵族的后裔，本人是个大庄园主，同时还兼任塔林一所技术学院的教授。伊丽莎白·帕尔梅年轻时很有理想，是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为争取妇女平等权益，她离家出走，只身来到斯德哥尔摩。离开拉脱维亚时，瑞典驻塔林总领事为她写了封介绍信，请他好友贡纳尔·帕尔梅对这位年轻貌美的贵族小姐多加关照。伊丽莎白来到帕尔梅家，被聘为家庭教师，后与贡纳尔·帕尔梅相爱，结婚，生下两男一女，长子克莱斯·帕尔梅比奥洛夫大 10 岁，次女凯瑟琳娜比奥洛夫大 7 岁。奥洛夫·帕尔梅是他们最小的孩子，像天下父母一样，也是他们最疼爱的孩子。

奥洛夫·帕尔梅 7 岁时相继失去视他为掌上明珠的祖父和父亲，他诚然十分悲哀，但并未造成很大不幸。他很快适应了这偌大府宅里缺少两个男人巨大身影的新环境，在两个极有主见的女人（祖母和母亲）的爱抚、教育下成长。但父亲去世对克莱斯影响很大。第二年他便从斯德哥尔摩转到塞格图纳寄宿学校就读，1936 年高中毕业后学习法律，成为律师。

奥洛夫·帕尔梅幼时得过肺结核，体质较弱，母亲专门雇一保姆照料他。保姆初通文字，对瑞典民间流传的神话故事很熟悉，常给小帕尔梅讲述那些光怪陆离的故事，小帕尔梅对这些故事喜不自禁，每天不吃饭可以，不听故事不行。《天方夜谭》里的故事也就一千零一个，保姆为小帕尔梅讲的故事岂止一千零一个！

小帕尔梅幼时体弱，母亲伊丽莎白便为他聘请一位家庭教师，传授他小学基本知识，使他免受上学之苦。瑞典是世界上最早实施义务教育制的国家之一，1842 年制定了初等教育法，不久开始实施义务教育，每个学龄儿童必须上学，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义务教育制度为瑞典经济建设造就了人才和大批合格劳动大军，功勋卓著。但富家子弟可以聘请家庭教师，不去学校就读；穷人子弟也有被生活所迫未完成义务教育而辍学的。

小帕尔梅除了向老师学习语文、算术、自然等知识外，还学会了英语、法语。瑞典小学注重德育，教会学生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爱护自然，遵守社会道德和公共秩序；注重能力的培养，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教授基本的知识，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不强调死记硬背。小帕尔梅幼时学习并不刻苦，但他天资聪慧，记忆力特好，模仿力极强，学习外语毫不困难。算术成绩就很平常了。这一点他没有继承祖父的基因。祖父如果在天有灵，大概也不会高兴的。

每年夏天，小帕尔梅要随母亲去拉脱维亚，在外祖母家度暑假，因此他学会了德语。作为一位著名的国际活动家，帕尔梅从小就显示出他的语言天赋。

帕尔梅很爱他的外祖母，他后来对人说，外祖母虽是贵族出身，但她同情、支持革命，曾经长途跋涉为克鲁泡特金（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传递过消息。

就在帕尔梅嬉戏童年之时，瑞典已经摆脱了昔日的贫穷、落后，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之列。在这一时期，瑞典发生了两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两起导

致国家命运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其一是 1932 年 3 月 12 日“火柴大王”伊瓦尔·克鲁格开枪自杀和他那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垮台；其二是 1931 年 5 月 14 日，瑞典政府派军队镇压工人罢工，造成五死五伤的惨案。

20 年代是瑞典经济蓬勃发展的时代，许多产品走上国际市场，丽都公司、瑞典滚珠轴承公司、瑞典火柴公司等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瑞典再也不靠外国贷款，相反，开始资本输出。瑞典火柴在世界火柴发展史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此时，瑞典火柴公司不仅垄断了国内的火柴市场，而且利用其安全火柴的先进技术和自动化设备两大优势走向国际市场，垄断了世界三分之一的火柴市场。克鲁格利用当时并不正常的国际经济、金融关系，不仅成为世界上的“火柴大王”，而且建立起他的金融帝国，控制了瑞典的几个大公司，开始国际性资本借贷业务；其“规模越来越大，到 20 年代可以与马歇尔援助（注：指战后美国的扩张计划‘马歇尔计划’）相媲美”。故有些史学家又称这个时期为“克鲁格时代”。

不少人从克鲁格的股票里发了财，“开香槟酒的喜庆响声此起彼伏，鱼子酱满桌皆是，‘卡帕莱’（即带有歌舞表演的餐馆）和上演时事讽刺剧的剧场爆满”，像帕尔梅家这类社会档次更高的人则去瓦萨歌剧院欣赏玛吉特·罗森格伦和拉斯·埃格表演的《最后华尔兹》或奥斯卡剧场欣赏约斯塔·埃克曼和托利·塞尔曼主演的《古堡闹剧》。电影院放映拉斯·汉松主演的《罪》，场场客满。帕尔梅快两岁时，即 1928 年 10 月的儿童节那天，首次上映有声电影，这是他自出生以来第一次看电影，虽然根本不记得看的是什么。这时人们竞相显示自己多么富有，妇女们穿金戴银，钻石戒指闪闪发光，毛色特别光滑的貂皮大衣显得格外暖和；而年轻的贵妇人则喜欢银狐皮。男人们穿着燕尾服戴着高帽，一副英国绅士打扮，坐上奔驰或别克高级轿车，穿梭在两个以上晚宴之间……“20 年代是少数人的黄金时代，是少数人垄断的时代，他们盼望的未来是股票无止境地上涨，可观利润滚滚而进，永不停止。”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群众的贫困。20 世纪初工会会员失业的占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历史学家 A·埃尔默写道：

“1922 年 1 月失业工人约有 22 万，这就是说有几十万人缺乏生计。22 万人中，3.2 万人获得临时救济性工作，主要是筑路；6.4 万人依靠地方政府的救济，但大部分失业工人只能自己想办法寻找生计。”

筑路通常是在荒芜凄凉、渺无人烟的地方。“对一个每天正常情况下能挣 12.5 克朗的手艺人来说，离乡背井，跑到渺无人烟的地方去筑路，工资比正常情况下挣得最少的还要少，住在原始房子里，吃的是无法下咽的饭食，实在不是什么美差，然而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干。”

社会上两极分化在加剧，阶级矛盾趋向尖锐。

克鲁格是 20 年代特有的产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使得 20 年代国际贸易和资金，尤其是美国资金向欧洲流动障碍重重。许多障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设置的，战后并未完全拆除；美国的关税政策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德国根据凡尔赛条约规定，需要支付赔款；英国莫名其妙的货币政策又使资金流动更加复杂化；种种因素，造成了美国与欧洲之间不合理的贸易关系。

商业往来轻而易举地可予阻止，但偷税和偷逃资金却无法阻止。这就为克鲁格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为他的国外贷款，主要是美国贷款创造了独特条件。投机商则视克鲁格为最理想的担保。与此同时股票市场价格飞涨，股票投机商利润大增，抵押品主要是无主的土地，故可大量逃税。克鲁格一面搞投机，一面将其火柴公司建成国际垄断公司，更增加了投机商对他的信心，他在投机商眼里是“金融奇才”，神通广大，没有办不到的事，尤其是1927年法国向美国借贷横遭拒绝，克鲁格借给法国贷款后，他的声誉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克鲁格之所以得逞，当然不只是有办法搞到借款和得到投机商对他的信任，他还设法让大家看到他有个“工业帝国”。他兼并了几家瑞典的公司，其中包括现居瑞典十大公司之首的爱立信公司。兼并不单纯是为了赚钱。外国贷款已使克鲁格背上了巨大的财政负担，为了稳定市场，他得冒险，他得购进这些公司。不买进这些公司，他拿什么做抵押呢？他的巨额利润又从何而来呢？他贷不到款又怎能借钱给别人呢？流动资金形成危机，最终必得垮台。

正如 K·塞缪尔松在《从大国到福利国家》一书中所说的那样，“然而瑞典太小，那些瑞典公司太弱，不足以支持克鲁格的庞大活动；克鲁格的许多‘突出价值’都是空中楼阁”。克鲁格施展了阴谋诡计，才掩盖了他的亏损和他在欧洲公司的重重困难，使他的窘境从未完全暴露。

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快波及瑞典，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克鲁格这个泥足巨人在经济危机的洪水冲击下，终于彻底垮台了。1932年3月12日，克鲁格开枪自杀，许多瑞典商人随之破产，也纷纷跟着自杀。3月13日，即克鲁格自杀的第二天，瑞典著名诗人斯坦·塞兰德尔对采访他的记者说：

“结束以前瑞典大国梦的是一颗子弹：即1718年11月30日发射的那颗子弹。今天这颗子弹的回声在全世界荡漾，这颗子弹是否也标志着瑞典又一伟大时代的结束？”斯坦·塞兰德尔所说的“那颗子弹”，是指枪杀国王卡尔十二世事件。17世纪时瑞典是欧洲强国，拥有波罗的海海上霸权和波罗的海沿岸的许多属地。1697年卡尔十二世继位后继续对外扩张，与正在寻求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彼得大帝爆发了“北方战争”（1700~1721年）。1709年卡尔十二世兵败波尔塔，败局已定。但卡尔十二世率残部逃回瑞典后，不顾大臣反对、集结兵力再战。1718年率部攻打挪威，11月30日黎明前，正当即将发起进攻时，卡尔被一颗子弹击中，至今死因不明。1721年俄国与瑞典签订《尼斯塔特和约》，瑞典丧失了其在波罗的海的海上霸权和波罗的海以东的地区。瑞典从此不再重温大国梦。

事件之二，是1931年军队开枪镇压工人罢工，打死罢工工人。

位于瑞典北方翁厄曼兰的海讷桑德与索莱夫特奥之间的奥达伦（奥河河谷地区），是20至30年代瑞典木材工业基地之一。木材工业随国际市场需求变化，起伏较大。20年代末、30年代初，厂主借口世界经济危机，木材销售下降，减低工人工资，减少工作日，并增加工人居住的工房的房租。工人采取罢工的方式相抗争，厂主则以停工停产相威胁。一时间劳资纠纷接连不断，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瑞典工人运动兴起于19世纪下半叶，1898年成立了总工会，到20年代末，其所属的全国性行业分会有36个，会员人数达50万人。奥达伦地区的工人大多数都参加了工会组织，其中造纸工业工会和木材工业工会的力量

都很强，其他工会组织和共产党在此地区也很活跃。

1930年和1931年，厂主又提出了进一步削减工资，增加房租的要求。工人无法接受厂主的苛刻条件，1930年玛尔马纸浆厂的工人首先对工厂实施封锁，与厂主发生了冲突。1931年春，厂主从外地招聘来许多非工会会员的工人，企图破坏罢工。5月12日被雇佣来的外地工人到达时，举行罢工的工人们自动集合起来进行抗议，与前来破坏罢工的外地工人发生了冲突。地方政府害怕罢工工人把事态闹大，派军队前来镇压。在市长签发了命令后，5月13日军队开进奥达伦。罢工工人群情激昂，向前来镇压的军队投掷石块，进行抗议。

5月14日，罢工工人再次举行集会，其中一部分群众（约四五千）向市政府所在地进发，开始了示威游行。傍晚，游行队伍到达市府所在地。早已在此严阵以待的军队兵士们，骑在高头大马上，肆意地抽打示威的工人，勒令游行队伍解散。罢工工人拒绝解散，政府命令士兵开枪，当场打死5名工人（其中一名青年女工），打伤5人，酿成了瑞典历史上著名的流血惨案。无数的工人和工会领导人被逮捕，就连那些报道了罢工情况和事件真相的新闻记者也被捕入狱。

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立即声援罢工工人。各个派别的政党也被激怒了，右翼政党无理谩骂罢工工人和工会肇事者；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猛烈抨击瑞典的政治制度，谴责工厂主和地方当局，矛头直接指向军队和埃克曼中央政府。5月21日中午5名被害工人安葬时，斯德哥尔摩的所有工厂停15分钟，向死难者志哀。

奥达伦和克鲁格的两次枪声，使瑞典朝野震惊，阶级矛盾日趋尖锐。1932年夏天，首相埃克曼因接受克鲁格贿赂案发，被迫下台。是年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抓住这个天赐良机，在选举中一举获胜，阿尔宾·汉松组阁，成立了社民党政府，开拓了瑞典社会民主党长达44年的统治（1936年3个月的短暂时期除外），开创了瑞典历史上长治久安的稳定局面。尚在孩提时代的帕尔梅，当然不懂得这两起事件的含义，更不会想到这两起事件造成的后果，将会给他的一生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

1937年，年仅10岁的帕尔梅告别母亲，离开家到斯德哥尔摩40公里以外的塞格图纳寄宿学校求学。

塞格图纳是一座历史名城，建于公元970年，是瑞典历史上第一座城市，第一个首都。瑞典历史上第一枚硬币就是在这里铸造的。今天，它那狭窄的街道，中世纪教堂的遗址，矮小的木屋以及宁静的公园，处处都记载着瑞典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这是瑞典宝贵的财富，每年都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观光。

塞格图纳寄宿学校是一所全国闻名的私立贵族学校，与英国的伊登公学相似，都是培养政界、军界、财界、商界要人的摇篮。英国保守党政府的首相、重要政客、高级将领几乎都出自伊登公学。英国历史名将惠灵顿勋爵在打败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后说：“滑铁卢战役胜利是在伊登公学足球场上奠定的。”1968年爱德华·希思当选为保守党的政府首相后，英国报刊异口同声强调希思是有史以来第一位受教于普通中学的保守党领导人，似乎这有什么象征意义。塞格图纳寄宿学校同样是贵族学校，瑞典许多著名的政客、银行家、工业家、艺术家皆是这座学校熏陶出来的，瑞典当今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曾就读于这所学校。它被誉为是瑞典最好的学校，老师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设备一流，学生毕业后可选送全国任何一所大学，有的学生可按学校与其他国家院校签订的双边合同，直接送国外学习。塞格图纳与伊登不同之处在于：私立的伊登学校偏偏把自己冠以“公学”的头衔；塞格图纳寄宿学校却不在校名上作文章，其身份是明确的。也许伊登公学有它的道理：我的学校是向全社会开放的，凡缴纳得起学杂费、住宿费、伙食费以及其他费用者，均可入学，难道还不“公”吗？在伊登公学看来，就地入学原则限制了父母和学生本人选择学校的自由。试问，能享受这种自由的又有几人呢？

塞格图纳寄宿学校已有 250 多年的历史。17 世纪中叶的一场大火，将学校烧成灰烬。此后，“校址虽在，然空无一人。教员因数年未得薪俸而挂鞭离去。”当时教员的薪俸未自农民向教会缴纳的什一税，因年景不好，农民交不起赋税，教员遂无收入。当地政府向国王求助。1666 年，国王曾批准从斯德哥尔摩中学拨给塞格图纳学校一份税粮。1748 年，学校重建，逐渐恢复了昔日的风貌。如今，这所名闻遐迩的学校，像一棵苍松古柏，枝繁叶茂，生机盎然。穿戴整齐、训练有素的学生们以其特有的素质受到世人们的青睐；学校操场上比赛的助威声不亚于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面红耳赤的争论，折射出他们丰厚的知识功底，雄辩的口才和天才的想象力。

帕尔梅刚刚进入一个新环境，难免有些陌生。但他的适应能力很强，不久便习惯了寄宿学校的生活。帕尔梅因年幼，身材矮小，初来乍到，常受一些大同学欺凌，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是个新生而唯唯诺诺，更不因弱小而忍气吞声。他勇于抗争，决不屈服，大同学很快知道，这个新来的小家伙并非是软弱可欺之辈。

帕尔梅算不上是个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也许从未听说过什么“书山勤为路，学海苦作舟”之类的箴言，即使听过也会不以为然。他真正开始认真读书，是若干年后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瑞典中小學生跟中国学生很不一样，学习负担很轻，学校从不主张布置家庭作业，从不用无休止的考试折磨学生，课后完全是学生的天下，加之帕尔梅天资很高，完成一般学习任务毫不费力，因此他边学边玩，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少年生活就像他童年一样，天真烂漫。青少年时代正是人生的春天，他像蝴蝶一样，沐浴在温暖的阳光里，嬉戏在美丽的花丛中，跟这朵花亲吻一下，然后心满意足地飘然离去，再跟另一朵花低语一阵，留下开心的欢笑。当然也有个别学生在这明媚春光里刻苦学习、像蜜蜂采蜜一样，贪婪地吸吮着书本上的知识，不懈怠。只是瑞典这样勤奋的学生实在不多。

帕尔梅有两个一般学生所不具备的特点：一是记忆力超群。由于记忆力好，他学习十分轻松，年仅 17 岁便完成了高中学业。二是顽强。像其他男孩一样，帕尔梅喜欢体育活动，几乎对所有竞技项目都感兴趣，尤其是手球和曲棍球。打手球时他当守门员——手球攻防激烈，对抗性强，要有高大的身材，强壮的体魄，否则吃亏。帕尔梅身材矮小，但反应敏捷，当守门员很出色。他争强好胜，在比赛中从不服输，即使败局已定，他仍顽强拼搏，直到最后一刻。这个特点陪伴他一生。

帕尔梅在学校里比较懒散，生活自理能力不强，这个毛病也几乎伴随他一生。特别是他好奇心强。有时特别调皮，喜欢搞些恶作剧。有一次他和同伴被学校的督监从女生宿舍的窗帘后面揪了出来，男学生进女生宿舍在当时是违反校规的行为。他的同伴至今还记得他的一次恶作剧。不知是因为好奇，还是因为他一向讨厌牧师，一次，帕尔梅将一枚自己制作的手榴弹从神学院

的烟囱里扔了进去，幸亏没有发生意外，帕尔梅躲过了一次处罚。

帕尔梅在学校里很快给老师、同学造成爱表现、好出风头，喜欢吸引他人注意的印象。一个对那时的帕尔梅还有印象的同学说：他当时貌不出众，语不惊人，但很想成为大家注意的中心，很想起主导作用。另一位女同学后来也回忆说：帕尔梅长得并不特别漂亮，舞也跳得不算太好，但他特别风趣，十分机警、反应敏捷。

尽管帕尔梅天资很高，但学习成绩平平。在各门学科中他最喜欢的是历史，成绩也是最好。塞格图纳整个城市是座历史博物馆。它的每条街道、每个小屋、每个墓碑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帕尔梅也许因为酷爱历史，才更喜欢塞格图纳；也许因为塞格图纳才更钟爱历史。

塞格图纳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古城，记载了瑞典的盛衰荣辱。

公元8世纪至11世纪中叶，来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北欧人，对欧洲各国进行了海上贸易和抢劫商船活动。欧洲人称这些人为“维金人”。Vik这一北欧名词的原意是指海湾、峡湾，尤其是指挪威奥斯陆峡湾以南的水域；Vikingr则意味着来自海湾或峡湾的人。人们在使用这一词时往往与海盗同义，所以8世纪至12世纪的北欧人又被称为海盗，历史学家便将这一时期称为“北欧海盗时代”。

瑞典人，尤其是孩子们和年轻人，特别崇拜海盗，将海盗奉为顶天立地的英雄，比中国孩子崇拜《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更有过之。每到仲夏节或其他重大节日和大的集会时，男孩脸上用五颜六色的油彩涂成奇形怪状的脸谱，头上戴一顶尖尖的帽子或用布扎一个头饰，身上披一块浅棕色的麻布，腰间扎根腰带，敞胸坦怀，扮成海盗状。他们认为海盗为瑞典和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创造了一部惊天动地的历史：他们骁勇善战，充满豪气；他们南征北战，所向无敌；他们在波涛汹涌的海上与自然搏斗的勇气不是一般人所能比拟的；他们高超的造船技术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他们的足迹遍布欧亚大陆的广大地区，向东到达俄罗斯，并沿黑海和里海深入中亚，到达拜占庭帝国；向西到达英伦三岛、冰岛、格陵兰，甚至北美洲的东海岸。海盗是精明的商人，是文化使者，在促进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海盗留下了无数传奇故事，是瑞典重要的精神财富。从小就喜欢吸引他人注意、喜欢成为中心人物的帕尔梅对海盗岂能不顶礼膜拜。

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对海盗看法就截然不同了。他们把海盗形容成赤发长毛、青面獠牙、杀人如麻的强盗。海盗会突然出现在他们海岸附近的海面，然后一跃登岸，抢劫村庄、寺院和庄园，消息还未传到内地，他们早已扬长而去。英国人不会忘记公元973年海盗对他们东北海岸林第斯法恩的袭击，一个著名的寺院，一个主教宅第和有名的讲学所遭到洗劫，献身于宗教的人们遭到杀戮或被掳去为奴。消息迅速传遍西欧，人人毛骨悚然。

历史学家格温·琼斯则奉劝大家历史地、客观地评价海盗的功过，不能片面强调他们对欧洲的破坏作用，而忽略他们对贸易、发现、殖民、政治、文化、习俗等方面的贡献。“做海盗是一种职业”，“至少是一种谋生手段”，琼斯说。海盗是人，要过可以忍受的，甚至美好的生活，他们需要土地去养活孩子，他们渴望获得白银和能用白银换回的什物，他们的首脑通过行动追逐名誉、权力、财富和食物……正是这些欲望刺激海盗们在波罗的海，北海、黑海和里海，穿越大西洋并沿俄罗斯的一些大河进行贸易和运输。“他们地处要冲，可以满足欧洲和伊斯兰教徒对毛皮和奴隶的无穷无尽的需求，而且

着手弄到一切可以出售的商品：粮食、鱼、木材、皮毛、盐、酒、玻璃、牛、马、白熊、苍鹰、海象牙和海象油、蜂蜜、腊、麦芽、生丝和毛织品、琥珀、棒果、皂石盘和石磨、精制的武器、装饰品和白银”。“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制造了船只，建立了市镇，扩展了贸易道路，保持了势力范围，并通过海外的掠夺和征服而强化了商业活动。”

塞格图纳就是在海盗活动巅峰时期兴起的城镇，它坐落在梅拉伦湖畔，水陆交通方便，既便于往来商人的进出，又不易受外来势力的侵袭，是一处理想的贸易集散地，11世纪初成为国内和国外贸易的中心。随着硬币的流通，塞格图纳出现了铸造硬币的造币厂，来自英格兰的铸币者在这里传授技艺，于是诞生了瑞典历史上的第一枚硬币。

塞格图纳的繁荣时期，正是基督教逐步向瑞典传播、扩展时期。基督教的传播不仅为瑞典带来了新的宗教，同时带来关于人的新的观念，带来新的艺术、新的拉丁文字母、新的建筑和建筑技术。塞格图纳的教堂由原来的本质结构逐渐变为石头结构建筑，并略带有英格兰的建筑风格，也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变化。基督教传入后很快就占据了统治地位，瑞典便纳入了以罗马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教会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直到1520年瓦萨国王建立封建帝国后，教会势力方逐渐衰弱。16世纪30年代中，瑞典退出罗马教会，改奉路德教。教会改组后，实际被置于国家管辖之下。乌普萨拉成为新的宗教中心。

塞格图纳是伴随着海盗时期贸易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北欧海盗时代的结束也使这一时期的辉煌逐渐消失。从13世纪起，塞格图纳在政治上，经济上便失去了其中心地位，而位于它附近的斯德哥尔摩、恩彻平等城市很快发展起来，并超过了它。

帕尔梅漫步在塞格图纳这座历史博物馆里，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也许是由于对历史的偏爱和更深入的了解，帕尔梅从塞格图纳的变迁中、从瑞典历史的盛衰荣辱中，领悟到更多的东西，它不只是简单地述说着昨天……

在塞格图纳度过的时光是美好的。1939年9月，当帕尔梅和他的伙伴们正陶醉在金色秋天的怀抱中，尽情欢乐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大战开始前，瑞典、丹麦、挪威宣布中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坚持其“中立”外交政策，免遭战火的洗劫，可以说获益匪浅。而欧洲其他参战国创伤累累，损失惨重。如今，当大战再次临头时，瑞典政府如法炮制，明确地宣布了其立场，再次幸免于难。

然而丹麦、挪威就不那么幸运。1940年4月9日凌晨，德军同时向丹麦、挪威发动进攻。在德军闪电般的攻击下，丹麦政府惊惶失措，在德军人侵一小时后便决定投降。德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丹麦，所花代价仅为两人死亡，十人受伤。当德军列队开进哥本哈根时，不少市民还以为是好莱坞在拍摄一部战争片呢！

挪威的情况与丹麦略有不同。国王哈康七世率全国军民奋起抵抗了两个多月，终因力量悬殊，不得不带领王室和政府内阁成员逃往瑞典，组织流亡政府，继续抗敌。哈康国王是挪威独立的象征，鼓舞着挪威人民顽强作战，被视为民族英雄。而叛国投敌的吉斯林，却组织了“民族政府”，充当德国

的傀儡，将挪威置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从此，“吉斯林”成为叛徒、卖国贼的同义语。

目睹两个邻国的沦亡，瑞典噤若寒蝉。然而瑞典安然无恙！人们不禁要探个究竟。据当时瑞典外交部贸易司司长古纳·霍格洛夫解释，瑞典已向德国表明，一旦遭到侵犯，将立即炸毁基律纳等铁矿。换言之，如保持瑞典中立，瑞典将继续向德国提供铁矿石、钢等战略物资。希特勒3月1日签发的代号为“威塞演习”的作战指令也说明为什么德国将瑞典与丹麦、挪威区别对待：“斯堪的那维亚局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准备用武装部队占领丹麦和挪威（‘威塞演习方案’）。这一作战行动，可以防止英国对斯堪的那维亚和波罗的海的侵犯，保证我们从瑞典获得铁矿的提供，并为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提供进攻英国的广阔基地。”

瑞典幸免于难，重要原因是它一一接受德国要求。自1940年4月，即丹麦被占领起，瑞典向德国作出一系列让步，其中包括：德国可利用瑞典国内的火车向挪威纳维克（NARVIK）德国占领军运送粮食、被服、医药、医生和护士；将在挪威的德国海军、文职人员、伤兵运送回国。瑞典声称此举乃出于“人道主义”考虑。6月5日瑞典外交部宣布同意德国假道瑞典向被德军占领的挪威运送军火物资。1941年瑞典外交部索性抛开人道；同意德国将恩格尔布雷希特十师通过瑞典铁路从挪威调至芬兰，去攻打苏联，如此等等。瑞典许多政客和报刊舆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无耻背叛中立政策”，瑞典政府却屈从德国要求，取缔和封闭了国内许多家批评希特勒纳粹暴行的报纸。战局发生根本性转折后，瑞典对德国态度又急速变化，思想感情上向美国靠近，“对德国使用更为严厉的语调，采取对盟国有利的中立政策”。1943年7月瑞典通知德国，德军必须停止从瑞典过境。历史学家斯蒂格·海德纽斯坦率地说：“瑞典的标准是看谁的力量大。我们需要有个大国作为依靠。”与此同时，瑞典又同意丹麦、挪威在其领土上训练警察部队，以便德国撤离丹麦、挪威时，这些部队能立即回国恢复秩序。瑞典从未停止向德国提供铁矿砂，1943年供应量达到顶峰，为1001万吨，此后开始下降。英语此时取代德语位置，成为瑞典第二大语言。瑞典在二次大战中本着民族利己主义，谁强大投靠谁，正如瑞典著名记者、瑞典最大日报《每日新闻》主编汉斯-英瓦尔·约翰松说：“瑞典的战略是实用主义重于英雄主义。只要德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瑞典就顺从德国要求。”“正式说来瑞典联合政府始终执行中立政策，但有时被迫对德国做些让步，而这些让步在瑞典国内以及国外都觉得是有问题的。”

1931年出生的瑞典著名历史学家海德纽斯对瑞典明哲保身的中立政策的是非作了颇具代表性的回答：“毫无疑问，瑞典不为它站在战争之外而感到内疚，我本人、我父母以及我所有朋友都不为此感到内疚，我知道的人中谁也没有感到内疚，我们为能获得和平而庆幸。”后来成为首相的帕尔梅也并不为瑞典在二战中的表现而内疚（参见帕尔梅演讲稿《世界和平，超级大国和民族独立》）。

然而，“苏芬”冬季战争”却使瑞典的中立政策备受煎熬。

（德）特雷弗·罗珀编：《希特勒的作战指令》（1939—1945），第23页。转引自朱贵生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5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汉斯—英瓦尔·约翰松著：《瑞典一瞥》、第68页。

芬兰与瑞典关系不同一般，它远非近邻而已。历史上芬兰曾属瑞典，1712年瑞典在“北方战争”中败给彼得大帝后，被迫同意将芬兰划入俄国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以维护其西北边境安全和保护列宁格勒为由，多次要求与芬兰交换领土，并租借芬兰军事基地。1939年11月9日双方谈判彻底破裂，11月28日苏联宣布废除1932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次日中断两国外交关系，11月30日苏芬战争爆发，苏联派遣20个师（45万人），2000辆战车和一千余架作战飞机，以泰山压顶之势，向芬兰飞扑而来。“苏联发动苏芬战争的原因，还是那个古老的安全问题：苏联想把列宁格勒（现为圣彼得堡）和俄国西北部防线推到波罗的海海边的芬兰湾河口……1939年，芬兰已准备将卡累利阿的一部分划给苏联，但是芬兰湾基地不能给。”（参见马蒂·克林格《芬兰简史》）

“冬战”前一个月，瑞、芬、丹、挪四国曾在斯德哥尔摩达成一项协议：芬兰如遇侵略，其他三国要予以支援。但此刻都“严守中立”，缄口不言——瑞典略为不同，它宣布自己是“非参战方”。瑞典群众却要求政府支持芬兰，全国上下吵吵嚷嚷，一片沸腾，政客喊破嗓子发表一个又一个演说，报纸连篇累牍地发表一篇又一篇文章，呼吁支援芬兰。妇女动员起来了，开展“支前”活动，织了许多袜子送到芬兰前线；青年人更是一点就着的干柴烈火，8500人报名参加志愿军，要与芬兰军队并肩战斗。海德纽斯说：“瑞典十分同情芬兰。这种感情以前从来没有过，以后也未曾有过。我们瑞典从来没有对任何事有如此强烈的感情。”

芬兰人开始打得很勇敢，很顽强，芬兰的“白色鬼魂”（即滑雪部队）确是“以一当十”，苏军战略上虽占优势，但由于“白色鬼魂”运动迅速，苏军战术上经常顾此失彼，显得被动。瑞典为芬军取得的胜利欢呼雀跃，支前更加积极。但人数上占绝对优势的苏军很快稳定局势，适应了芬军的雪地战，战局逆转，瑞典开始坐立不安。瑞典首相阿尔宾·汉松虽然也很激动，但仍然非常冷静，没有失去方寸而违背瑞典的处事原则。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参战。他的政敌、社民党第二号人物、外交大臣桑德勒这时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前蹿后跳，声嘶力竭地高呼支援芬兰，要求参战，并派兵加强奥兰岛的防务（奥兰岛在波罗的海上，芬兰声称属它所有，瑞典亦对该岛提出主权要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裁决该岛归属芬兰，但为开放岛屿）。汉松首相拒绝桑德勒意见，桑德勒因此提出辞呈。桑德勒的辞呈正中汉松下怀。汉松知道全国、全党情绪，知道支持芬兰的大有人在；桑德勒窥视首相位置已久，这次演的是“项庄舞剑”，无非是想利用群众情绪，威胁他的领导地位。汉松顺水推舟，暂时稳住桑德勒，宣布成立“全国联合政府”，要桑德勒将辞呈推迟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桑德勒同意了。12月13日联合政府组成，邀请所有党派参加内阁，社民党占五个位置，三个“资产阶级政党”各占二个位置，唯共产党被排除在外。被排除在政府之外的还有桑德勒，他的外交大臣一职由克里斯蒂安·云特接替。克里斯蒂安·云特是职业外交官，决不会提出令人不安的冒险想法。此刻像任何时候一样，只讲民族利益，不能奢谈原则。社会民主党发表声明，要求瑞典政府奉劝苏芬停战，打下去双方受损。桑德勒嘲笑社民党“中立到愚不可及的程度”。

桑德勒一直是社民党的麻烦，他从来不是社民党的主流派，所以社民党今天再也不提他了。但帕尔梅忘不了他。帕尔梅那时快13岁了，也许是与他家感情吻合的缘故，也许是他的正义感更强些，帕尔梅对这位生不逢时的老

政客印象颇深，后来曾为他平反，给他不少赞誉之词，称他“敢在专制主义面前站起来说话”。1964年帕尔梅发表为他自己一生定调的重要演说，题为《政治就是追求》，说“人需要实现他的价值，桑德勒奉行的就是这条原则。每人有自己的目标，谁也不能被迫成为执行他人意志的工具。”

帕尔梅家一直非常平静，就像一湖秋水。1939年苏芬“冬战”却像一阵北风，吹皱了湖面，掀起了小小涟漪。这也不难理解，帕尔梅的祖母就是芬兰人嘛。这年圣诞节全给搅乱了，失去了往常欢乐祥和的气氛。人人都很激动，帕尔梅也很激动。22岁的帕尔梅兄长克莱斯血气方刚，参加志愿军去了，“但只上过一次前线”，克莱斯后来说。

“冬战”很快结束。苏军战略上占绝对优势，胜负早成定局。1941年芬兰倒向德国，企图借希特勒力量报这一箭之仇，苏、芬重新开战。但此刻，瑞典对芬兰战局已经不感兴趣。

帕尔梅的中学时代几乎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时期度过的，但是他的学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与近在咫尺的丹麦、挪威、芬兰学生相比，不知幸运多少倍。命运有时很不公，对有些人来说，人生就像在青藏高原上跑马拉松，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而对有些人来说，则像是在沙滩上散步，悠闲、雅致。当丹麦等国的孩子们被德国占领军的铁蹄声、枪炮声吓得胆战心惊，魂不附体时，帕尔梅同他的伙伴们，在依山傍水的塞格图纳照常读书、游戏、散步，没受到战争的惊吓，没领略过枪口下偷生的滋味。

不过，帕尔梅也听到过一次枪声。那一年夏天，帕尔梅偕一好友去西海岸一座滨海城市度假，路上又结识了两位豆蔻年华的姑娘。他们在岸边玩得还不尽兴，想到不远处的小岛上，去品尝一下与世隔绝的罗宾逊生活。他们驾舟登上了这个小岛。谁知道这个小岛是军事要塞，据这位朋友回忆说：“我们俩人带了两个姑娘，划船上了小岛。我们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军事禁区，直到守岛部队向我们鸣枪警告时，才恍然大悟，慌忙逃离。我们很快爬进小船，奋力划回岸上。”这，就是帕尔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听到的唯一枪声。

1944年5月，17岁的帕尔梅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中毕业考试），其中历史的成绩最好，外语也很出色，其他科目成绩平平。

毕业了，学生们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尽情地欢庆。当摄影师要给他们拍一张“标准像”时，帕尔梅和另外一个喝得同样醉醺醺的同学却百般捉弄这位摄影师，手里拿着白色的校帽，不停地摇晃，使摄影师的“标准像”终未拍成。

帕尔梅的哥哥克莱斯从炮声隆隆的战时伦敦飞回歌舞升平的斯德哥尔摩，参加为庆祝帕尔梅毕业举行的家庭晚会。克莱斯驱车陪同母亲去塞格图纳接帕尔梅回家，但到了学校却不见帕尔梅的踪影，教室里没有，体育馆里没有，图书馆里没有，宿舍里没有，甚至厕所也找遍了，都没有。克莱斯忽然想起什么事似的，撒腿往丛林里跑，看见弟弟正和一女同学离死别呢。“我们死拉硬扯地把他拖走，”克莱斯回忆说。

晚上帕尔梅家在东马尔姆斯36号的宅府里举行晚会。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仍然是硝烟滚滚，但晚会气氛欢乐极了，众人开怀畅饮，好不热闹。只有帕尔梅却闷闷不乐，晚会大部分时间他独自站在凉台上，有时凭栏眺望，有时低头沉思，情绪低沉。“这是为他举行的晚会，可他一点也不

高兴，” 克莱斯有点莫名其妙。

帕尔梅不是不悦，更不是思念林中那个姑娘，“ 中学毕业了，下一步做什么呢？升大学，就业？升大学读什么专业呢？就业又干什么工作呢？今后的人生道路该怎样走呢？” 一向寻欢的他，现在陷入思考中。

“ 每个时代都需要伟人，但并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产生伟人。由常人到伟人，可从其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寻找到生命的轨迹，” 一位作家这样说。帕尔梅的青少年与平常孩子一样，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他的同窗、校友几乎没有一人想到他会成为未来的首相。当然国家或政府首脑不一定是伟人，首脑中有一代英杰，也有魑魅魍魉。帕尔梅是首相，不是伟人。作为首相、众多瑞典人还说他是“ 有争议的人”。伟人不仅要有非凡的才能和气质，而且要有特定的客观形势和条件。尽管帕尔梅尚不具备跻身于伟人的某些要素，但青少年时代的帕尔梅已显示出某些天赋和领袖欲。他天资聪颖，争强好胜，逆境中勇于拼搏，不沮丧，不沉沦。

人生的下一步将迈向何方？

第四章 心中偶像

人生的路并不是笔直、平坦的。中学毕业后志向的确定，完成大学学业后职业的选择，面临突发事件时的决策，恋爱，结婚……这，往往是人生旅途中的几个路口。有些时候，一时的迟疑无足轻重；但在人生的路口，一个轻率的决定也许会影响今后的一生。在那些与事业、前途、个人生活至关重要的人生路口，如果还没有十分把握，宁可放慢脚步，沿着中心转盘多转几圈，认真思考一番，明确了方向再下决心。帕尔梅现在正处在可以通向几个不同方向的路口转盘处，他不急于作出决策，他还有时间，等他考虑成熟后，“不待扬鞭自奋蹄”。

母亲伊丽莎白曾与其好友、帕尔梅的监护人伊瓦·安德松博士谈及帕尔梅的前程。安德松博士是保守党喉舌《瑞典日报》的总编。作为该报总编，他当然是右翼政治家。安德松博士看了伊丽莎白带来的帕尔梅习作和毕业论文《英国新的历史危机时刻》，颇满意，遂为帕尔梅在报社里安排了一份差事。帕尔梅首先在一位著名的体育记者手下工作，担任体育版的临时记者，后来又在文艺评论版及其他几个部门任过职。帕尔梅初试牛刀，相当成功。这时他用“SOJ”的笔名发表文章，SOJ是帕尔梅名字SVENOLOF JOUCHIN的缩写，全称是思文·奥洛夫·尤阿金。当时，《瑞典日报》的体育版没有索引，因此无法统计出他写了多少文章。但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在帕尔梅当兵、上学，留学以及参加工作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仍然给《瑞典日报》写稿。据不完全统计，他在除体育版以外的几个部里共发表文章：

1944年	33篇
1945年	10篇
1946年	14篇
1947年	3篇
1948年	10篇
1949年	2篇
1950年	1篇

帕尔梅的文章辛辣、刻薄，完全违背了谦虚、谨慎、息事宁人的《扬特准则》；凡不适合他口味的东西，他讽刺、挖苦，毫不留情。他不喜欢传统的民间舞蹈和大众音乐，把瑞典民间音乐中不可缺少的手风琴称为“风箱”，说，“今晚拉风箱的女人无休止地折磨我们”；将业余交响乐斥之为“低级”、民间音乐则归入“俗不可耐”之类。对民间舞蹈，他也颇不以为然，说“舞台上的演员跳得欢快极了，简直忘乎所以，殊不知台下观众并不分享他们的快乐”。有一出颇受欢迎的喜剧《市场前夜》，作者是当时瑞典文艺界最受尊重的剧作家之一：威尔海姆·莫里贝。帕尔梅看了演出后写了一篇评论，居然出言不逊，说“坐在后排的观众只见演员嘴在动，却听不到一句台词。听不到倒是好事。这件作品很难说有何独到之处，肯定不能算是瑞典艺术作品中的上乘之作。”帕尔梅喜欢美国爵士音乐，但对伴随爵士乐乱蹦乱跳的舞蹈，却从不恭维，称其为“群魔乱舞”。

帕尔梅对他短暂的记者生涯，似乎并无留恋之处，用他的话讲“我写稿是为了挣钱，从未从中获得乐趣。”1947年3月，安德松博士在一篇有关谁

关于《扬特准则》，详见《国际明星》一章。

能接替《瑞典日报》政治编辑职务的文章中，却将帕尔梅的名字列在那些候选人的名单上。安德松博士所欣赏的，也许正是帕尔梅那犀利的文风？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瑞典也和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出现一股“美国热”。全国各行各业的人都在大口吞噬美国影响，加之瑞典 19 世纪 60 年代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期间，约有 140 万人移居国外，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因而与美国有着众多的亲缘关系，亲美、崇美的风气急剧上升。帕尔梅对美国尤其崇拜。他和其他“年轻的花花公子”一样，穿着松松垮垮的黑色学生制服，沉醉在纳伦歌舞厅里，听着美国爵士音乐，乐而忘返。在音乐方面帕尔梅基本上算是保守派，“我年轻的时候认定鲍勃·克洛斯贝（BOB CRASBY）乐队是最好的乐队，”他回忆说。“也许我这个判断根据不很充分。我那时喜欢的音乐其实都是相当传统的：比利·霍利德本尼·古德曼、西德尼·比切特，后来又渐渐喜欢上迈尔斯·戴维斯。”

帕尔梅身在欧洲，心却向往美国。对他来说，战后欧洲已成一片废墟，而美国却是旭日东升，富裕而强大。一天，瑞典曲斯弗尔桑姆海特教育协会主席彼得·哈默贝里建议帕尔梅去美国留学。这话正中帕尔梅下怀。帕尔梅便向“美国斯堪的那维亚基金会”申请奖学金，要求去凯尼恩大学攻读学位。凯尼恩是俄亥俄州一所私立大学，富有自由主义传统，建于 1824 年。

帕尔梅中学毕业后不久，便到了选举年龄。有了选举权，成为公民，就应该履行公民的义务，也就是说，帕尔梅服兵役的时候到了。

瑞典实行义务兵役制。女性公民志愿当兵，男性公民则必须服兵役一年（陆军）、一年半（空军）或两年（海军），唯两种人可予照顾，适当推迟服役时间：一是正在学校学习的大学生，二是正在国外执行任务的企业雇员。此外一视同仁，不可特殊。当然精神失常、小儿麻痹症患者等免服兵役。帕尔梅因不在照顾之列，便穿上军装参军了。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恰值胜利的前夕。

帕尔梅要去报到的部队是 K4 骑兵团，驻扎在北部城市于默奥。瑞典此时仍效仿德国的传统，贵族子弟当兵要到骑兵部队，要当军官。帕尔梅的哥哥也在这个团当过兵，后为骑兵军官，不过他很快就转业了，选择了律师职业。

于默奥是波的尼亚湾的两大重镇之一，靠近北极圈，是瑞典西博腾省的省府，城市不大，只有 2.3 万人口，但其军事位置非常重要，是瑞典战略防御重点之一。于默奥以白桦树闻名。道路两旁一排排白桦树非常整齐。但，更使帕尔梅兴奋的是那里的寒冷气候。

帕尔梅领取了陆军颁发的全套装备和一件皮大衣，到 K4 骑兵团报到。

新兵训练很紧张。军人举止、单兵动作、队列动作、武器训练等等，单调而艰苦。仅仅“立正”、“稍息”、“敬礼”就做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做到令上士满意为止。上士整天沉着脸，说起话来生硬、粗暴，操练时下达口令就像吆喝牲口，从来没有平等待人的习惯。他很苛求，整天指手划脚，这个不对，那个也不是，他总能找出一些毛病来，要他满意是很难的。一支步枪，拆了又装，装了又拆，而且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每天总是重复这些简单动作，枯燥极了。上士每天要检查内务、着装，帽子要戴正，皮鞋要擦得锃亮，一尘不染。别看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于习惯了衣着随便，动作懒散的帕尔梅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好的事。操练就苦了，每天摸爬滚打，几身汗，一身泥，回到营房，腰疼腿酸，几乎不能动弹。

帕尔梅从小是保姆侍候大的，生活自理能力很差，军营生活对他未免过

于单调，过于机械，也过于艰苦。但军营生活对他又是那么新鲜，富有刺激。由于他生性好强，不甘落后。荣誉感驱使他刻苦锻炼，竭尽全力去完成各项训练任务。争强好胜的性格和他在比赛中、考核中的敢于拼搏的表现，使上士对他也另眼看待，从不对他说句粗话，有时还给他吃点小锅饭，对他进行个别辅导。帕尔梅后来回忆当兵生活时说：“我真怀念与战友们的同志情谊和那里的新鲜空气。部队里的锻炼确实使我受益匪浅。如果没有部队的锻炼，我后来不可能应付自如。”

帕尔梅最喜欢雪地里的演练项目，有的是在雪山上，有的是在丛林里。有的室外课目很简单，就是在雪地里“拉练”：每人带上滑雪板，背上行装和武器，在规定的时间内从甲地滑雪到乙地。每遇这个课目帕尔梅尤其兴奋，因为这是他的“强项”。但也有难度很高的课目，如看图行军。这个课目距离较长，要穿越丛林、高山，要在雪地里行军好几天，而且只准带一半口粮，其余粮食需要自己解决，为此士兵要学会破冰捉鱼，识别哪些蘑菇可吃，哪些蘑菇有毒，万一中毒又如何自救等等自我保护、维持生命的技能。瑞典军队称此为“生存训练”。士兵通过地图，观察周围的地物、地貌，判断正确前进的方向。到了目的地，拿到“回执”，又要不顾疲劳，马上返回营地。夜里很冷，没有村庄，无处投宿，遇有暴风雪，气温会骤然降到零下 40 。士兵如果没有受过寒区训练，缺乏常识：如果不会挖雪窟保护自己，那只能等死。其实挖雪窟并不复杂，不需要什么特殊技术，关键是把雪窟的入口选在背风方向，藏身的洞穴与入口之间要拐一个弯，以防风向转换时风会直接吹到洞里：（如图所示）

藏身在雪窟里非常安全，无论气温多低也无生命之忧。外面狂风怒吼，飞雪乱舞。这时躺在洞里，就觉得格外温暖——事实上洞里的确不冷，通常在零下 1 ~ 0 之间，有件皮大衣，垫也好，盖也好，足可御寒。一个要诀是洞里温度定要保持在 0 左右，温度高了，洞里冰雪将会融化。而两个年轻小伙子躺在里面，就像两盆火，不用多久，体温就会使洞里温度升高的。因此要注意通风，不要把入口和洞口堵死。另一要诀是，进洞后立即将出汗湿了的衬衣、袜子脱下，千万不可将就，须知用体温烘干衣服需要多少热量？保持体内热量就是保持生命。因此部队雪地行军时，指挥员一定要掌握行军速度，注意休息，不可贪路，原则上以战士身上不出汗为度。在雪地里走了一段后，身上热了，就要停下休息，最好烧点开水，每人喝上一口。在无遮无盖的荒山雪地里，身上如果穿湿衣服、湿袜子，那简直比敌人的子弹杀伤力还大。

帕尔梅曾随全排“拉练”到过基律纳。

基律纳是瑞典最北方的城市，在北极圈里。当斯德哥尔摩已是阳光明媚的春天，这里却仍是茫茫雪原。说来使人难以相信，基律纳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是指面积而言。在基律纳全市 11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河流、湖泊、沼泽，森林、铁矿，以及瑞典最高的山脉凯布纳山（海拔 3300 米），称它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不言过其实吧。然而基律纳的市区里只有 2.3 万人口！这是瑞典北方的特点：地广人稀。瑞典北方为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强，二分之一弱，但人口只占全国人口的 15%。在一大片渺无人烟的北极圈以上地区内，基律纳是瑞典的一个战略要地，拉练的目的就是训练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基律纳，在万一需要的时候，增援基律纳。

基律纳在世界钢铁业中是赫赫有名的。在一座已开采了 60 年的露天矿

里，形成了一道 5000 米长， 110 米宽， 280 米深的“峡谷”。 “峡谷”里的铁矿早已被矿工们开掘并输送到欧洲各地。如今，这个矿已全部在井下开采，井下有数百公里长的隧道公路，深达 600 米；公路纵横交错，来往车辆井然有序。现在井下许多工作借助电子计算机进行，有检修机械的工厂，有可供 3 千人就餐的 8 个餐厅……但是这些工厂和餐厅也即将成为历史，因为生产将全部实行自动化，工人们再也不用下井作业了。

基律纳的铁矿是瑞典的骄傲，在瑞典历史上有其不可磨灭的功绩。19 世纪下半叶，瑞典经济经历了三个高速发展时期，在 90 年代的第三个发展高潮中，瑞典北方铁矿砂的大量开采、出口是作出了特殊贡献的。瑞典北方蕴藏着丰富的铁矿资源，矿石含铁量高达 60%~70%，但是这些铁矿砂的含磷量也相当高，在新式的托马斯碱性转炉炼钢法问世之前，这些矿砂只是一堆无法利用的矿石。80 年代托马斯碱性转炉炼钢法的发明，为这些沉睡在地下的铁矿砂找到了出路。80 年代后期，瑞典开始开采铁矿， 1895~1904 年间年均产量达 268.4 万吨，年出口量达 174.2 万吨；到 1905~1913 年间年均产量翻一番，年出口量达到 431.2 万吨，铁矿砂在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 1891~1895 年的 0.4% 上升到 1911~1913 年的 8%。至今，基律纳铁矿的可采储量估计仍有 20 亿吨，还可开采近百年。

新式炼钢法和铁矿砂的充分利用，促进了瑞典钢铁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不但向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优质的钢材和机械产品，而且使与之相适应的工业部门破土而出，瑞典的各个经济部门都活跃起来，为其跻身工业化国家的先进行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免遭希特勒铁蹄的践踏，原因之一也是德国法西斯需要基律纳的铁矿砂，希特勒不想让瑞典口头上的威胁变成现实。历史一再向我们证实着基律纳的重要。

也许是出于对北部国土和基律纳的特殊感情，也许是争强好胜的性格和顽强的毅力，帕尔梅在这种枯燥的训练中总是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永远不会忘记他胜利完成的生存训练和看图行军课目训练。

出发的时刻到了。帕尔梅兴奋不已，他早早做好准备，带上必备的装备：背囊、冲锋枪、子弹、食粮、指北针、地图、火柴、手电筒、药品、大衣、内衣裤、一柄小铁锹、一副滑雪板等等——滑雪板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寸步难行。排长检查了所带物品，交待了任务，然后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圆圈说：

“这就是你们要去的地方，这里插有一面国旗，旗上有营部指示，你们去把它取回来。”

“是！”

帕尔梅接过地图，与同行的另一名士兵作了一番研究，确定了行军路线，并熟悉了周围的地形。原来目的地在大山后面的一个丛林里，离营地约百公里，往返五天，时间足够，遂信心十足地与战友出发了。

帕尔梅和战友身背行囊，胸前挎着冲锋枪，脚踏滑雪板像两支离弦的箭，很快便消失在纷纷扬扬飘落的鹅毛大雪中。四周寂静无声，路上没有遇到一个过路人，没有看见一部机动车辆，不远处的港湾里停泊着一些结成木筏的木材，散发出阵阵的松油清香。空气格外的清新，使人精神振奋。帕尔梅二人无暇顾及周围的景色，不久就进入了一片丛林，然后是一大段上坡的山路，他们用力地挥动滑雪杖，上了山顶。山顶上到处是皑皑白雪，一望无际，此外就再没有什么可引起人们注意的东西了，就连飞禽走兽也不见踪影。不过，雪山有其独特的美、圣洁的美。置身在这洁白的世界，让人忘掉一切，忘掉

纷争的世界，忘掉一切不愉快。但是帕尔梅不能忘记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两人休息一会儿后继续西行，不敢有任何耽搁。

他们运气真好，一路风平“雪”静，未碰到任何难题，顺利完成任务。他们到达目的地、拿了国旗后方知道，原来这里是一个隐蔽的野外军火仓库。这是瑞典战场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和平时期，瑞典的军队装备保存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不同形式的仓库里。在战争动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应该到哪一个仓库去领取装备。遇有战争，每个营要能独立行动，弹药补充要就地解决。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完全结束。尽管战争胜负的大局已定，纳粹德国的投降只是时间问题，而且不会太久，但是战后的欧洲又将是什么样呢？世界的格局会有什么变化呢？在战争中采取中立立场的瑞典，对战后的局势自有其缜密的分析和对自身地位的考虑。西欧的恢复有待时日，而与瑞典近在咫尺的苏联，将成为欧洲军事大国的事实也不容置疑。历史上，瑞典与俄国的积怨较深。在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中双方曾进行过多次较量。16至17世纪中叶，瑞典占据了波罗的海及其南岸的广大地区；俄国为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发动了对瑞典的战争，史称“北方战争”（1700~1721年）。卡尔十二世御驾亲征，率一支万人的军队与彼得大帝的三万五千俄军会战纳尔瓦，大败俄军。1709年，卡尔十二世的四万精兵在进军莫斯科的路上，经受了俄罗斯平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冬的侵袭后，损兵折将，与彼得大帝的军队在波尔塔瓦进行决战，几乎全军覆没。瑞典相继失去了其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一些地区，并与俄国于1721年签订了《尼什塔特和约》，结束了瑞典波罗的海帝国的统治。如今苏联战胜了德国，它在欧洲和世界的地位又会对瑞典造成什么影响？瑞典军队在北部地区的布防，当然是为了防御苏联的，但是瑞典能抵挡住苏联吗？

在返回连队的归途中，帕尔梅与战友决定在山上度过最后一个夜晚，第二天一早开始下山，在规定的时间内绝对可以到达营房。他们要尝试一下在冰天雪地的山上野外宿营的滋味。天气晴朗时，在雪山上挖雪窟比孩子们在海滩上用沙子造城堡还要容易。雪窟挖好后，两人躺在里面，疲劳很快就消失了，在谈笑中没有一丝寒冷的感觉。

1945年帕尔梅随全团回斯德哥尔摩参加王宫里的换岗仪式。为国王站岗放哨是一大荣誉，只有历史上有战功的部队，如龙骑兵团等，方有此殊荣，王宫卫队的换岗仪式是斯德哥尔摩老城最吸引人的一个景观，每逢周末和节日都要举行换岗仪式。午时许，身着礼服，披盔戴甲的武士们，骑在高头大马上，在鼓乐队的引导下穿过老城市区来到王宫门前举行换岗仪式。列队行进在大街上的武士们，表情肃穆，缀着长缨的尖顶头盔随着马队的碎步上下窜动，阳光照在铜盔上发出耀眼的光芒，礼服上的金黄色经带伴随着卫队的行进轻微地晃动，更显得威严。卫队途经之路，车辆为其让道，行人驻足观看。

世界各国仪仗队换岗仪式，令人印象最深的当数英国伦敦白金汉宫的皇家卫队和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卫兵了。白金汉宫大门口的卫士，穿着鲜红的军上衣，黑色裤子，骑在高头大马上，纹丝不动，神气极了。尤其是那高高的军帽，几乎把整个面部遮住，只留一个下巴，滑稽可笑。来伦敦观光的游人总要来此一看，方不虚伦敦之行。克里姆林宫的换岗以威武雄壮见长。战士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身材高大匀称，两腿修长，线条清晰，个个都像希

腊雕像中的美男子。他们两人一组，从克里姆林宫里出来，迈着正步，一手托枪，一臂摇动，上身纹丝不动，双腿交替落地铿锵有声，离红场很远就能听到。他们行进约三四百米后，来到列宁墓前，将上一岗的卫士替换下来，开始执行他们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守护列宁墓。瑞典王宫前的仪仗队与他们相比当然要逊色了，但是当你知道瑞典王宫卫队的武士们并不是“专业”的仪仗队，而是由来自各防区的义务兵组成，并且定期轮换时，你会为他们喝彩的。

帕尔梅完成义务兵训练后，部队给他作的鉴定是：“政治可靠、稳定，没有不良嗜好，绝对忠诚……”随后帕尔梅又转到驻扎在舍佛德地区的 K3 团接受军官训练。

瑞典陆、海、空军的军官都是从义务兵中选拔的，总司令、三个军种的司令，以及所有将校军官，无一不是从义务兵开始他们的军旅生涯的。选拔军官，理论上是以军事技术过硬为基本标准的。不过，帕尔梅对军队生活的兴趣不大。担任骑兵军官是贵族青年必须具备的资历，他当然乐从；但是，军官职业恐怕不是帕尔梅的首选志愿。1945 年，帕尔梅退役了。此后，他曾在《瑞典日报》社工作了一段时间，并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开始攻读法律。

就在帕尔梅长大成人的时候，他的世界观也在逐步形成。对于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外界的影响有时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偶然的时机，帕尔梅随一位朋友到斯德哥尔摩音乐厅参加一场政治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人人都关注的税收问题。会上的主讲人是当时社民党政府的财政大臣厄恩斯特·维格福斯。

前面我们提到克鲁格和奥达伦的枪声，使瑞典朝野震惊，在 1929 ~ 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下，执政的资产阶级政党处境艰难。人们开始认识到，必须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改革，否则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弊端无法克服，工人罢工难以平息，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社民党则抓住这天赐良机，在攻击资产阶级政党无能的同时，抛弃了以往竞选中一些过激的政策和口号，代之以更为灵活、实际的，能有效地帮助受压迫的贫困的人们的政策，向社会各界广为宣传。在工人阶级强有力的支持下，社民党在大选中一举获胜，组成了以阿尔宾·汉松为首相的政府内阁，开创了此后社民党连续执政 44 年（除 1936 年三个月的短暂时期以外）的历史。汉松上台后，立即组织内阁按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派的观点，制定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实行膨胀性的经济计划和积极的劳工政策的反危机纲领，同时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人民之家”的构想“人民之家”的瑞典文是“FOLKHEM”，是将“FOLK”（人民）和“HEM”（家）两个单词组合成的一个新名词。汉松在 1928 年的竞选演说中就将国家比作一个家庭，说家庭的基础是相互合作和团结一致。国家也应如此，瑞典要成为好的人民“大家庭，就要消灭阶级差别，发展社会福利，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平等、民主。”“人民之家”的指导思想是，‘按照团结、合作的原则改变社会’，平等、福利和合作是“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因为“只有通过共同的劳动，才能减轻负担，奠定富裕的基础，取代阶级利益，为全体人民带来好处。”因此，社民党执政后便把建立普遍的社会福利，实行阶级合作、维护、发展民主等任务作为其近期的奋斗目标。自 1933 年开始，社会福利措施一个接着一个出台，每年都有新举措。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排排公寓房建起来了，工人失业率下降了，市场购买力增强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家织的粗布衣不

见了，穿戴讲究了，街上的马车渐渐让位于汽车，消费品的档次高了），“工人教育协会”、“人民学校”、公共图书馆日益增多，全国出现了一派新气象。1938年汉松邀请瑞典全国总工会和雇主协会的头目，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萨茨巴登“共商国事”，研究如何缓和劳资关系，减少罢工和关厂停产事件。双方最终达成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萨茨巴登协议”（又称“咸水湖浴场协议”），规定了劳资谈判制度，将劳资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为此后瑞典劳资关系的相对平静奠定了基础。

在社民党执政后制定一系列重大决策过程中，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便是厄恩斯特·维格福斯。

维格福斯是社民党的思想家、理论家，1881年出生于工人家庭、自幼酷爱读书，从书本上接触了社会主义。他在大学里攻读的是语言专业，却对政治兴趣更浓，加入了社民党，并成为学校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层成员。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理论存有异义，认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工厂的民主化和扩大工厂生产资料所有权。从1932年至1949年，他一直担任政府财政大臣。是他首先根据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提出了适合瑞典国情的反危机纲领，将斯德哥尔摩学派的理论在实践中加以运用，使瑞典摆脱了周期性经济危机。他是福利社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又是将福利制度具体化的实践者。他在1908年发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阶级斗争》一书中，既承认“经济的必要性”，同时又强调思想的“独立重要作用”。他一贯主张高就业、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强调政府干预。他认为只有高就业方有高消费、高投资，从而刺激经济增长。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对收入进行再分配，达到经济平等。他的建设福利社会计划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1944年，战争即将结束时，他又主持制定了一个包括27点内容的改造社会的纲领《工人阶级运动的战后计划》。为了实现社民党的社会改良计划，维格福斯主张战后继续维持二战中的税收政策，让有钱人多承担一些经济负担，以保证社会福利计划的执行。维格福斯“采取改良主义方法，追求的不只是改良主义的目标。最终目标是采取财富再分配的政策，达到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

维格福斯坚持高税收政策（收入高的人须缴纳75%的个人所得税），与其他政党和利益集团发生了冲突，因而在税收问题上引起了激烈的辩论，他本人成为许多人攻击的目标。那个晚上的辩论会上，谴责、谩骂维格福斯的喊声铺天盖地而来，但支持维格福斯的声音更强，更有力。帕尔梅觉得维格福斯的话句句在理，社会财富本来就不该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里，让大部分人受冻挨饿；而且这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还会造成社会动荡。帕尔梅被维格福斯的演说深深打动了，对他由衷崇拜，甚至对他的风度也钦佩不已，使他萌生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想法。他回忆说：“音乐厅里人涌如潮，整个大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辩论十分激烈，空气非常紧张。维格福斯遭到一个又一个尖锐的攻击，听众有的鼓掌，有的喝倒彩。他不为听众的反应所左右，继续耐心地、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解释他税制改革的目的是社民党政策的公正性。回家后我仍在想：有钱人已经有很多钱了，钱对他们难道就那么重要吗？值得这样大喊大叫吗？我并且想：厄恩斯特·维格福斯不仅明智，而且极有同情心。这次辩论对我政治观点的形成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认为维格福斯非常雄辩，摆的道理极有说服力。”

事实上，维格福斯成了帕尔梅心目中的偶像。他崇拜维格福斯。他在后来的一次讲演中说：“厄恩斯特·维格福斯头上有道光环，这光环就是他的个人风格和魅力。他清澈的凝视、友好的微笑无不透出温暖和浓郁的人情味。他与别人接触中处处平等相待，他那自然流露出来的亲切和友善，不能不使他人对他折服。厄恩斯特·维格福斯说话流利，口才极好，非常雄辩，而且他还能耐心倾听他人意见……向不公正和压迫进行斗争时，需要自身具备极好的条件：诚实、对未来坚信不移，以及相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智驾驭社会发展，而诚实和信念正是维格福斯和瑞典工人运动的巨大力量。”然而，维格福斯并不知道他有这样一个信徒。1954年，当埃兰德首相准备正式任命帕尔梅为他的秘书而征求党内元老意见时，唯一提出保留意见的竟是维格福斯！

时至1968年，主持全党思想工作，并即将接任社民党主席和政府首相的帕尔梅，对那天晚上维格福斯的演说仍记忆犹新。他继承维格福斯的衣钵，为实现社民党党纲而奋斗。他谈到社民党奋斗目标时说：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与三十年或四十年前的瑞典相比，我们也前进了一大步；

但如果要实现无阶级社会，我们走得还不够远。就此而言，我们任重道远，大部分工作还有待去完成。”

1947年，帕尔梅收到了美国俄亥俄州的凯尼恩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于是他换上那套松松垮垮的西服，梳着略带稚气、中间分开的头发（这是那时男孩非常流行的发式），打着蝴蝶结领带，到他向往已久的美国求学去了。他的蓝眼睛还是那么天真无邪，充满热情和对知识的渴望。他才20岁，是那么年轻，对美国抱有十分美好的幻想。他认为美国是最强大、最自由、最民主的国家。他对美国的这份感情始终不渝，从未动摇，即便在60年代和70年代、80年代他当了内阁大臣、首相，美国政府对他十分不恭乃至相当敌视时，他也丝毫没有改变对美国的好感。“他是批评过美国的对外政策，但你知道，他对美国的信念从来没有改变，从来没有！”他哥哥克莱斯·帕尔梅说。

凯尼恩学院跟塞格图纳寄宿学校一样，也是一所贵族学校，学生多数来自上流社会家庭，将来都是特权阶层的接班人。帕尔梅很喜欢凯尼恩大学里的同学，觉得他们与塞格图纳寄宿学校里的学生不一样，有趣多了。他们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关心国家和天下大事，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或激扬文字，或辩论于校园，俨然以国家和世界主人自居，颇有舍我其谁的味道。但帕尔梅在凯尼恩学院学习期间很少与同学交往：他忙于读书，变得内向了。保罗·纽曼与帕尔梅是同窗，而且同住一个宿舍。纽曼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学业，参加海军，当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帕尔梅入学时，他也在凯尼恩继续学习，两人同住在一幢房子里，合用一个洗漱间，而且在同一个橄榄球队里打球，然而两人始终是点头之交，见面说声“你好！”而已，从未作过深谈。纽曼说：“我们在校期间彼此并不十分了解。然而当你认识一位像奥洛夫·帕尔梅这样的朋友，你当然会注视他的最新情况的。”

帕尔梅到了凯尼恩学院后，开始用功了。他埋头读书，图书馆里经常有他的身影，在阅览室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只是到了美国以后才知道发愤读书，”帕尔梅后来自己说。“为了通过考试，我不得不刻苦学习。我如

此用功确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结果他只用了一学年时间便完成了所有的学分，取得文科学士学位。

帕尔梅生活也勤俭起来了。他也像其他穷学生一样，在学校里干点粗活，挣点零用钱。学生在校园里能找到的活无非是送报纸、杂役，替助教批改作业等。帕尔梅则在餐厅里当小时工，每小时 45 美分。马布尔·金女士在凯尼恩学院餐厅里工作了五十余年，对帕尔梅仍有很深的印象。她记得帕尔梅不是很会干活，但很卖力，而且十分随和，平易近人，极有礼貌，因此餐厅里的人都喜欢他。“他干完活就到厨房里去亲切地跟每个人说上两句话，从厨师到最不受人尊重的洗碗工，一个不落。”这也许是帕尔梅天生就有的优点，从小他就跟家里仆人打成一片。斯维亚·爱立克松在东马尔姆斯大街 36 号的帕尔梅家里当过女佣，她也能说出许多与此类似的故事。她说帕尔梅在家里经常帮助佣人干活，佣人们很感动，因此说他是“小乔达摩”。他们认为如果没有一个菩萨般善良心肠，像帕尔梅这样的贵族子弟不会对下等人有如此同情心的。帕尔梅自己有一次解释说，“我一向厌恶瑞典上层人士的那种优越感，那种不可一世的轻蔑别人的态度。我之所以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有人瞧不起别人。”1977 年帕尔梅对采访他的法国记者谢尔盖·理查德说：“我没有在工人阶级队伍里长大，但我属于工人阶级。我认为我是根据工人阶级标准去为工人阶级服务，并获得工人阶级认可，加入到他们队伍中。现在我一切都属于工人阶级。”

“我们家里对他政治信仰转向社会主义颇感不悦，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克莱斯·帕尔梅说。“但是我们兄弟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我没有奥洛夫的经历，与他相比，我所受的教育更加传统。我没有理由成为社会主义者，我生活很优裕，我当过骑兵军官。我朋友常用奥洛夫开我玩笑说：‘他当然是因为有了你这位兄长才成为社会主义者的。’我和奥洛夫谈起政治问题时经常要争论几句，但他一直是我可以信赖的弟弟。甚至他当了首相以后依然如此。我如果要请他来帮我把家具挪一下，或请他谈谈某个问题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诸如此类的琐事，我知道我只要打个电话就行。奥洛夫家庭观念很强，很重感情。他曾悄悄地说，他接到家里人来电时，声音立刻变了，变得柔和了。”

帕尔梅去美国求学以前并未显示出任何激进倾向，只是到了美国，到了凯尼恩学院后方才渐渐变化。

帕尔梅在凯尼恩时，美国政府时常派些官员到学校做报告，宣传政府观点，解释政府政策。帕尔梅对此极为反感，称此为政府当局的“宣传性讲学”，便与其他思想激进的学生组织“社会主义辩论俱乐部”，消除官员演讲在校园里造成的影响。他向亨利·亚伯拉罕姆和保罗·帕尔梅尔学习政治哲学。直到后来他还念念不忘这两位老师的教诲，称他们是“极有天赋的老师”。他同时学习保罗·泰特斯教授的经济学。他的毕业论文洋洋数万言，详评弗雷德里奇·奥古斯特·冯·哈耶克的经济学观点，说“哈耶克对我信仰社会主义起了很大影响”。只是不知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因为哈耶克的经济理论是为“新保守主义”服务的。他的理论核心是价格体制在传播信息方面起决定性作用，坚决反对凯恩斯及其他经济学家通过调节或其他干预手段动摇自由的市场定价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必将导致独裁。1974 年哈耶克获诺

乔达摩是佛教始祖释迦牟尼的初名。

贝尔经济学奖，近十几年来他成了主张彻底消灭计划经济的所谓“新自由派”的崇拜偶像。帕尔梅怎会与哈耶克经济理论有缘？颇令人费解。不过帕尔梅在 80 年代中期的一次演说中批判了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参见附件三《就业与福利》，第 285 页）

帕尔梅显然感到他的政治信仰与他家庭出身不很协调，后来多次解释他家与社会主义渊源颇深，他之所以成为社会主义者是受家庭影响。他说他祖母哈玛·帕尔梅与俄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关系密切，多次在一起探讨革命问题；并声称英国前共产党领袖拉吉亚尼·帕尔梅·达特与他家同属一宗；他甚至说他祖父思文·帕尔梅是个“与社会主义非常接近的”自由党人；说他母亲伊丽莎白·帕尔梅是“争取妇女平等权益的斗士”。其实，不满社会不公平现象、背叛家庭而同情受压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富人子弟，比比皆是。

帕尔梅在凯尼恩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开始接受他自己所称的“真正的教育”——周游美国，向社会学习。这次旅行对他一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英国历史上有个传统做法：贵族子弟在校完成学业后，要渡过英吉利海峡，去欧洲大陆旅行，名为考察，实是游山逛景。他们带上仆从，从一个国家走到另一个国家，每到一地都有上流社会的亲朋好友接待。他们在高级旅馆下榻，晚上有人为他们举办盛大晚宴、舞会，为他们接风洗尘，让他们有机会接触达官贵人，阔夫人、娇小姐，一路上少不了欠下一些风流债。

帕尔梅这次旅行与英国贵族少爷的旅行实有天壤之别。他在家虽然也是少爷，但此刻只是一介书生，身边只有 300 美元，要遍访美国 35 个州！由于经济原因，他只能一路搭便车。

出发前，帕尔梅仍然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人人畅所欲言，为所欲为，否则人们怎敢将耸立在纽约港的自由女神雕像手里高举的、象征自由的火炬改变成男人的阳具，画成大幅漫画张贴在大街上，刊载在报纸上呢？自由到这种程度该是无以复加了吧？他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人人丰衣足食。然而他沿途耳闻目睹却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是对比强烈的贫富悬殊，用帕尔梅的话说是“退化的贫困”，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种族歧视。黑人受非人待遇，难道不会起来造反吗？帕尔梅说在美国的所见所闻是促使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帕尔梅到底特律时特意拜访了“汽车工人联合会”。使他受宠若惊的是工会主席瓦特·鲁瑟先生亲自接见了。鲁瑟不久前遭人暗杀，他大难不死，子弹竟未击中要害，只是打伤了他的肩膀。“他肩上中了一弹，坐着接待我时，手臂吊在一个宽大的绷带上，手里紧握着一个小橡皮球”，帕尔梅回忆说。“他反对迫害穷人，反对暴力和暗杀行为，认为这不能解决问题。他的态度明确：还得继续活下去，未来才是重要的。”

一天帕尔梅又站在公路边，伸出右手，作出要求搭车的手势（即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卷曲，拇指指向要去的方向），希望有个好心人顺路带他一程。碰巧有个黑人驾车经过，让他上了车。此人是大名鼎鼎的歌星“全国歌王”科尔的内弟。他们一边开车一边聊天，帕尔梅从交谈中了解到许多美国种族歧视的情况，这些事情使他难以置信。然而当他在美国南方几个州作社会调查时，亲身经历的许多种族歧视事例，使他信服了。这些都是他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一天我搭上了一个好心商人的车。那是一辆‘克莱斯勒’

牌豪华轿车，又宽敞又舒适。他是从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来的，”帕尔梅说。“在我们前面有辆卡车，车里坐着约有十五个黑人，有说有笑。我们超了过去，商人朝他们看了一眼，用一种轻蔑的语气说：‘瞧这帮家伙，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我看到商人一副家长式嘴脸，感到一阵心寒。”帕尔梅不禁想起小时候保姆给他讲过的一个故事，也叫《最快乐的人》，说的是很久以前一个暴虐的国王得了不治之症，所有御医都束手无策，后来来了一个江湖郎中，说唯有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身上的衬衣能救国王，国王穿上他的衬衣立即病祛。国王派遣所有卫士去寻找这“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卫士走遍全国上下，却找不到一个快乐的人，宰相、大臣都忙于争权夺利，富人整天担心财产被盗，或在商战中败北，而愁眉不展；至于穷人，他们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骨瘦如柴，岂能快乐！然而在卫士绝望之际，一天傍晚，夕阳西下，他们在京城外的田野，忽听到有人唱歌，歌声不美，但很欢快，遂喜出望外，循着歌声寻去，看见一个乞丐正架着一堆柴禾烤鸡，鸡快熟了，散发出阵阵诱人的香味，乞丐唱得更欢了，卫士像见了救命菩萨似的赶快跑了上去。“你好像很高兴，我的朋友，”卫士说。

“当然高兴，今天我可以饱餐一顿了，”乞丐说。

“赶快脱下你的衬衣！”卫士命令道。

“可我赤身露体，哪有衬衣啊！”

帕尔梅心想：一旦穷人连衬衣都没有时，他们不仅不能救国王，恐怕会把国王剁成肉泥的。

密西西比有个小镇，叫劳里尔镇，居民黑人、白人参半。帕尔梅刚来到这里时，搭了一辆公共汽车，上车后便随意坐在一个空座位上。谁知道这是黑人席位，“几个白人过来硬要把我推开，我坚决不走。我没有遭到毒打，我想他们肯定将我看成是某种神经失常的外国人了。”帕尔梅渐渐地知道，黑人的孩子不能上白人的学校；黑人乘坐公共汽车时，在车子后面有他们特定的座位，绝对不能坐到白人的位置上；黑人不能进入白人的餐馆用餐。总之，黑人与白人分属两个世界。在这里黑人和白人是没有平等可言的。

夏天，帕尔梅在墨西哥住了一段时间。墨西哥与美国毗邻，历史上遭受美国无数欺凌。1848~1853年，美国发动侵略战争，抢走墨西哥大片领土。墨西哥人发动过无数次反抗，无奈力量悬殊，一次又一次失败。墨西哥总统波非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1828~1915年）仰天长叹道：“墨西哥啊，你太不幸，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墨西哥人对美国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把仇恨埋在心底，直到本世纪60年代，墨西哥人还以“绿鬼”作为对美国人的憎称，就像中国人称“日本鬼子”、“英国佬”、“老毛子”一样。

帕尔梅有两位堂兄在墨西哥城经商，叫拉蒙·帕尔梅和雷尼·帕尔梅。两位堂兄见到小弟来访十分高兴。他们是1920年来墨西哥的，因为他们母亲是德籍墨西哥人。他们在墨西哥城经营几片联营店，经销五金，生意不错，但他们思念祖国，催促帕尔梅给他们谈谈家乡情况。尽管两位堂兄政治观点属于右翼，帕尔梅与他们谈得仍很投机。他谈了瑞典战后在社民党政府领导下经济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帕尔梅在店里帮助堂兄做生意，也学会了一点西班牙语——帕尔梅简直是语言天才——墨西哥工人也很喜欢帕尔梅，称他为“长着一对会说话眼睛的瑞典人”，说他们会从帕尔梅脸上知道他想说什么。

帕尔梅帮助堂兄催债。他说“客户欠债不还，非得亲自上门去催。收款时你要施展种种伎俩对客户进行贿赂——你得实实在在地贿赂他们，否则别想拿到钱。”帕尔梅的蹩脚西班牙语和他刚刚滋长起来的激进思想并不妨碍他催债。欠债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况且欠债的也是商人，不是穷人。

在墨西哥的假日结束了。帕尔梅回到美国，给两位堂兄写了封信，谈旅途见闻和一次艳遇——信中显示出帕尔梅年轻时已不乏幽默感，这在瑞典人中不很多见。瑞典人沉默寡言，不像英国人那样能说会道，风趣幽默；也不像法国人那样活泼开朗。瑞典人有悠久的经商历史，他们是经商民族，非常实际。帕尔梅的幽默感使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在结交朋友和政治斗争中占了很大便宜，至于艳遇，这在瑞典人中是极其平常的事，如果谁没有艳遇倒是反常了。美国人以性解放自豪，但瑞典人会使他们“自惭形秽”。瑞典人对性可以说是到了大彻大悟的程度。务请不要误认为瑞典人性生活很混乱。实际上应该说，瑞典人在两性问题上很少是出于金钱考虑，也不完全是为了爱情，而是双方互有需要，或一方需要，另一方并不反对，就像帕尔梅的经历一样。帕尔梅信中向两位堂兄简述他返回美国途中的艳遇：

“火车上我遇到一位姑娘，漂亮极了，是哥伦比亚人。她坐在我对面，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英语，此刻却一句英文不会。她教我唱西班牙歌，可爱极了，她从头到脚，没有一处不使你动心；同样可爱的是，她晕车了，吐了我一身。

“一般说来，姑娘如果漂亮，她有权在我身上随意折腾，我决不抗拒。不过她这次有点过分了。于是我拿出随身带着的药。我们家里人管这药叫做“专治傻病特效药”。这药厉害极了，一次最多只能服用一片，我却给她吃了四片，即使大象胃里翻江倒海，吃了四片也会立刻停止呕吐的。

“她果然不吐了。然而她却忧郁消沉起来。她囊中羞涩，身无美钞，又不会当地语言，所以到了圣安东尼市后，我们中途下车，住进一家旅馆。我为她宽衣解带，把她抱进浴盆，帮她洗个热水澡，然后……我上街替她用比索（拉丁美洲国家的货币）换了一些美元，为她买了车票，行李箱上贴好标签，又借给她10美元，送她上了公共汽车，告诉司机在什么地方提醒她下车以及换乘什么车等等就与她分手。如果这位小姐没有到达纽约，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整个事情经过的奇妙之处是，我以前从未像这次如此充分地发现我自己。”

北上途中，帕尔梅途径查塔诺加，在查塔诺加给哥哥寄了张明信片。克莱斯·帕尔梅说：“他在上面只写了‘查塔诺加，啾—啾’几个字，其他什么话也没有。”（啾—啾是美国人形容火车发出的声音）帕尔梅后来说：“1952年我再次去美国时，又特意绕道200公里，目的是给克莱斯寄张相似的明信片。”

旅行结束后的帕尔梅又处在他人生的十字路口。美国社会朝气蓬勃，充满活力，是施展才华的场所。他对美国社会的种种弊端当然也感触很深，但毕竟敌不住美国对他的诱惑。他给母亲写信说，他想留在美国，去哈佛大学深造。凯尼恩学院的院长非常赏识帕尔梅，竭力鼓励他去哈佛，为他写了推荐信。校长并写信对伊丽莎白·帕尔梅说，她儿子是凯尼恩学院少有的优等生，天赋极高，前程不可估量。伊丽莎白跟大儿子商量，拿个决断。克莱斯回忆说：“当时我对母亲说，如果让奥洛夫留在美国，我们就会永远见不到他了。所以我们回信告诉他：马上回家。”

1948 年秋，帕尔梅从美国返回瑞典。瑞典差一点失去一位未来的首相，美国却多了一位猛烈抨击它侵略越南战争的外国领导人。

第五章 学生领袖

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秋天，更是一派别致的迷人美景。湛蓝的天空，有时万里无云，使人感到天是那么的高，离我们那么遥远；有时是朵朵白云点缀，让你浮想联翩，意境万千。清澈碧绿的湖水，与蓝天交相辉映，不知是湖水因蓝天而更碧，还是蓝天因湖水而更蓝。远处的山林，一天一身装扮，春夏期间的郁郁葱葱渐渐褪去，淡淡的黄色悄悄染上枝头，而那淡红、桔红、深红的枫叶，似乎在一夜之间就使万山红遍，到处是层林尽染的画卷。变化多端的色彩使人陶醉，遍地金黄的落叶更使人增添了丰收的喜悦。大自然对瑞典太偏爱了。瑞典是一个多森林的国家，全国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一半以上被森林所覆盖，除南部的阔叶林区外，大多是针叶林。瑞典人民将大自然所赐予他们的一切，视如珍宝，不仅保持了它的完美，不去破坏它的平衡，更用自己的双手增添它的秀丽和清新，谱写着大自然与人的和谐乐章。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瑞典人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他们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入秋以后，繁忙了近一年的人们，渐渐地放慢了生活的节奏、要逐渐去适应昼短夜长，令人压抑的漫长的、寒冷的冬季。

每年，在这一时间，也就是冬季即将来临前的深秋，在郊外游玩的人们会听见远处传来的阵阵枪炮声，在一些地区和路段上也会发现各种醒目的、提醒行人请勿靠近的标志。对此，大家早就习以为常了，因为这是每年参加军队“复训”的预备役军人在进行实弹演习，每个符合预备役条件的年轻人、中年人都有这番经历。

帕尔梅从美国归来后不久，就接到了去骑兵团参加复训的通知。

瑞典人口稀少，劳动力缺乏，因而义务兵服役时间较短，一般为七个月到十个月；但他们复员转入预备役后必须定期参加复训，时间视训练科目不同而有长有短，大部分人要参加五次18天至25天的复训。遇有陆、海、空三军合同演练时，约需一个月时间，不过这是多年不遇的事。以后会更少，特别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形势变化以后。然而打靶练习仍旧要搞的，甚至还可能举行一些连防御、排进攻之类的小范围战术演习，绝对不会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众所周知，瑞典自19世纪起就逐步形成了“中立”的对外政策，其具体表述是“和平时不结盟，战时守中立”。其“中立”外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的特点，其中之一便是武装中立，即强调以强大的国防作为中立外交的后盾，建立独立的防务力量。

此时，练兵场上的帕尔梅已是骑兵少尉。这是家庭出身给他带来的荣誉，瑞典贵族子弟中十有八九是当骑兵军官。

第二年，也就是1949年，帕尔梅又回到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继续攻读法律专业。帕尔梅在回忆他的青年时代时，曾对记者说，当他从美国归来，回到瑞典以后，已不再那么重视学位了，觉得应该干点什么。正是在那一年，帕尔梅开始参加学生联合会的工作。

1948年12月20日，刚刚被授予少尉军衔不久的帕尔梅，在社会民主党的《晚报》上，首次发表了阐述其政治见解的文章。文章是为英文版的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所写的一篇书评。英国著名政治家及工党领导人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年）为新版《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写了前言。帕尔梅在文章中介绍了拉斯基所写的前言，对《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作

了具体阐述。

年轻的帕尔梅对《共产党宣言》简直佩服之至，说“《宣言》的观点透彻明亮，对最终胜利充满信心，坚定不移，而且《宣言》的艺术性极高，确是完美无缺的作品。”与此同时，他又指责共产党人，说他们歪曲了马克思原意：说共产党国家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剥夺了本国老百姓的自由，“马克思从来就没有对传统的自由和权力的必要性产生过任何怀疑。”他认为只有在民主国家里，具体的行动纲领才能得以实现。言外之意，只有高举自由、民主旗帜的社会民主党，才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也许是由于初出茅庐，知名度不高，帕尔梅这篇文章没有引起多大注意，至今仍鲜为人知。但帕尔梅却认为这篇文章是他变成一个社会民主党人的文字依据。

相比较而言，另一篇文章，即1949年2月21日，帕尔梅在《瑞典日报》上发表的《战后一代》，却颇有影响，特别是引起了某些关键人物的注意。

《战后一代》是帕尔梅的得意之作，他认为这是他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篇文章。这是帕尔梅看完两本书后所写的书评，一本是德国作家乌尔夫根·博彻特的《赤身露体的人们和捐躯沙场的人们》，另一本是美国作家诺曼·梅勒的小说。两本书形成强烈对比。博彻特的作品充满颓伤情绪，无限悲观：一部分年轻人从战场上活着回来了，他们是幸存者，但活着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满目疮痍，全国一片废墟，看不见前途，看不到出路，生不如死。而梅勒笔下的美国战后一代却完全是另一番情形，他们踌躇满志，脑子里充满了五颜六色的美丽“理想”，他们以自己是美国人而自豪，认为未来是他们的；他们关注世界上发生的各种问题，认为解决这些问题是美国的责任。帕尔梅在书评中写道：“欧洲晕头转向了，不知所措，美国会来主宰欧洲，并为欧洲文化制定指导路线。美国人质朴可爱，对生活充满希望和追求，这就是美国希望之所在。”他说：“美国人讲究实际，挥金如土、十分慷慨，十分自信，生来认为‘世界是我们的，等着我们去安排’。”

帕尔梅后来成为职业政治家后，不知是他发现自己当初的结论错了，还是觉得美国变得跟他想象的不一样了，他大失所望，有时不得不批评美国的政策，特别是侵越战争。历史学家斯蒂格·海德纽斯跟帕尔梅是同龄人，跟帕尔梅多次促膝夜谈，对他的首相非常了解。他说：“帕尔梅失望极了。他把道德看得很重。他年轻时在美国身上看到的崇高理想已荡然无存，他觉得美国违背了这些理想。”

帕尔梅这篇断定美国将取代德国地位，主宰欧洲和世界的文章引起多方注意。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主席韦尔海尔姆·佩普勒对帕尔梅的高见深表欣赏，便请帕尔梅来学联合国国际部工作。帕尔梅接受邀请，担任佩普勒的副手，并很快作为瑞典、美国、英国学生代表团的一员，应盟国占领军邀请，访问联邦德国，调查战后联邦德国学生状况。代表团中的英国学生代表只把访问当作公费旅行，只图玩个痛快。他们发现帕尔梅过于认真，而且他精力充沛，搞起调查来兢兢业业，又不免为有这样的伙伴而高兴：总得有人干点实事，否则回去无法交差。

同年（1949年）春天，帕尔梅又去布拉格参加世界学生大会，实地考察捷克斯洛伐克青年学生的状况。

当时，世界已分成东西方两个阵营。其一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则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

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被丘吉尔称为“铁幕”的这一边，便是苏联及东欧等社会主义阵营。

帕尔梅这次到“铁幕”后面来搞实地考察，是有政治任务的：与捷克斯洛伐克学生广泛接触，了解学生思想动态；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鼓励他们的自由主义倾向。当他从捷克斯洛伐克返回瑞典后，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布拉格的示威》的文章，大肆攻击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说这个共产党政权剥夺了公民个人自由。“需要创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使共产党国家内部产生一种抵抗力量。这股力量只能是隐蔽的然而又是非常积极的，足能与那个完全取消个性的集体的力量相抗衡。不能着眼于物质，而应重视意识形态的选择上的抵抗力量。”看来，帕尔梅是懂得“攻心为上”的道理的。

帕尔梅在这次考察期间又有一次艳遇，不过这不只是男女苟欢，而与政治活动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帕尔梅这次到“铁幕”后面来考察，果然发现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其中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叫杰丽娜·雷尼诺娃。苏联和东欧国家姑娘一般都很漂亮，非瑞典姑娘可比。而杰丽娜·雷尼诺娃又是校花，非一般捷克斯洛伐克姑娘能比。帕尔梅被她的美貌倾倒，而她非常向往西方，两人各有所求，一拍即合。那时，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去西方非常困难，必须有正当的理由，才能向政府提出申请移民。于是帕尔梅和杰丽娜·雷尼诺娃宣布结为夫妇。帕尔梅会议结束返回瑞典后，又和雷尼诺娃情书不断，说了无数海誓山盟，和使陷入情网的年轻女孩想得死去活来的甜言蜜语。两人终于在1949年圣诞节前夕（12月21日）在布拉格举行婚礼。婚礼完毕，帕尔梅便偕杰丽娜·雷尼诺娃离开布拉格回国，因为几天后（1950年1月1日起）捷克斯洛伐克将修改移民政策，对要去西方的公民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杰丽娜·雷尼诺娃那时恐怕就插翅难飞了。

帕尔梅在这方面可谓起了带头作用。自50年代起，西方国家常常通过婚姻关系，将他们所需要的人从前苏联和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移居到国外。世界变化也真快，如今瑞典和西方国家却要严格限制俄国和东欧的移民流入。即使两人已经结婚，还要通过各种方式审查婚姻的真假！

帕尔梅将“妻子”杰丽娜·雷尼诺娃带回斯德哥尔摩，但没有带她回家见婆婆，也没有像丈夫一样和她在一起生活，而是将杰丽娜·雷尼诺娃安置在另一住所，两年后（1952年）两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此事帕尔梅一直守口如瓶，20年后才予透露。杰丽娜后来再婚，至今仍住在斯德哥尔摩。

在瑞典，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逐年在增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像杰丽娜那样“嫁”到瑞典的，他们和瑞典人生活、工作在一起，享受着瑞典公民的一切权利。在瑞典生活下去不难，但是，你如果要使自己完全融合到这个民族中去，却不是很容易的。一位祖籍是波兰的女性文学家，在介绍自己的经历时，曾说过一句引人深思的话。她从孩提时代就来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后来随丈夫定居在瑞典。她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并小有名气，她早已把自己当作了瑞典人。但是，若干年以后，她发现“在瑞典人眼里，我永远是个外国人”。许多移民也有相似的感觉，这就是瑞典与美国的不同之处。

从《战后一代》和《布拉格的示威》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帕尔梅当时的观点是亲美的，是理想主义的，对共产党国家则是敌视的。

1950年春天，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副主席。在1949年至1950年间，帕尔梅曾多次出席世界学生大会或参加有关的活动。在1950

年8月“国际学生联合会”召开的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以瑞典学联观察员身份出席大会的帕尔梅，与大会组织者发生了冲突。

会前，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曾就是否派观察员出席会议一事，发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际学生联合会已被莫斯科所控制，他们不想被别人所利用，主张对于国际学生联合会的邀请信不予理睬。一部分人认为，各国学联之间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系，增进学生之间的了解和友谊，通过各种交流计划和人员的交流来达到此目的，保卫学生的基本权力，把政治观点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抛在一边。有人主张能否通过搞走廊政治，另外组织一个国际学生组织。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帕尔梅没有表态，认为应再观察一下后作决定。但是在加强各国学生联合会的联系方面，帕尔梅较为关注，他倾向于不能建立一个和国际学生联合会唱对台戏的组织，这样会在国际学生联合会中造成一种分裂。最后，瑞典学生联合会还是决定派遣观察员出席大会。

帕尔梅参加国际学联代表大会后回到瑞典，在给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写的一份报告中，说他对共产党国家控制大会的做法极为不满，对会场的布置感到极不舒服，“到处是呼吁和平及其他口号的各种标语”，“一个战士刚从朝鲜战场上来，穿了整齐的军装，挥舞步枪在大会上做报告，内容充满敌意，可怕极了，”帕尔梅写道。“报告结束后，紧接着是一阵狂嚣：‘打倒侵略朝鲜的美国佬！’”

帕尔梅并说大会发言结束后，他和其他同情社会民主党的学生遭到围攻，“我们成了大会攻击的目标，共产党国家学生代表将愤怒全部发泄在我们身上，时间长达30分钟。我们一共十八个人，有英格兰人、苏格兰人、斯堪的那维亚人和来自英联邦国家的学生，我们围着桌子坐下，组成了一道民主壁垒，”帕尔梅的报告说。“大会将矛头指向我们，担任大会主席的俄国人带领六百人将我们团团围住，又喊又叫，吹口哨。他们高呼斯大林的名字，管我们叫法西斯，希特勒的走狗，地球上的渣滓，并且喊道：‘法西斯已露出他们狰狞面目！’”帕尔梅想不通：“我们怎么成了法西斯呢？和平事业需要团结每一个人，不管他的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难道保护和平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吗？”

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之后，瑞典、丹麦和挪威等国的学生联合会，邀请了一批西方国家的学生组织，于1950年12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一次会议，交流了相互的看法，研究了今后的行动纲领。1952年，帕尔梅参与了创建“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的工作，并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但是该组织寿命不长，因为该组织被揭露出，其活动经费中有一部分是来自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资助，不久便垮台了。

1951年，帕尔梅完成了其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业，获得了法律学士学位。此时，又到了帕尔梅开始考虑自己人生的下一步该迈向何处的时候了。他想找份工作，倾向当一名律师，并急切地向兄长和朋友请教律师生活是否五彩缤纷，富于挑战性；他又想搞外交，又想研究国际法；……结果是每项工作都很有吸引力，搅得他心神不定。帕尔梅一时难以作出决断，他不想匆匆忙忙地选择一项他以后可能后悔的职业，故且暂时搁下，待考虑成熟时再作决定。于是，帕尔梅又在求学的道路上开始了新的征程。

1951年12月，帕尔梅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在担当此重任期间，帕尔梅充分发挥了他在学生社会工作方面的能力。尽管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从未从事过基层的学生工作，但是他善于学习，并亲自参加和领导各

项活动，如要求增加学生社会资助的活动等，赢得了人们的爱戴，特别是他的直率性格和幽默的谈吐，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好感。

布里特·海姆对担任学联主席时候的帕尔梅仍记忆犹新，因为帕尔梅的特点太突出了。布里特·海姆那时是学联秘书，与帕尔梅接触较多。她回忆说，“帕尔梅聪敏过人，然而干活笨拙无比，贴张邮票都不会。他很讨人喜欢，但每天早晨上班很不准时。他经常出差，但自己不会收拾行李。这些事都是我来帮他……同时还要替他检查一下鞋子是否带了，有无其他东西遗忘了。”

学生会其他几位领导人也有同感。他们说，学生会的经常性工作之一，就是外发宣传品和材料。材料要印刷、装订，然后贴邮票、送邮局，这些事需要大家动手，可帕尔梅从不参加。他从小过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动手能力很差。也许他不帮忙倒是好事，否则他会越帮越忙的。

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大学就读期间，曾以预备役少尉军官身份临时受聘于瑞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奉命整编西德共产主义运动的专题报告。帕尔梅年轻时曾三次接触情报工作，这是第一次。

据说，帕尔梅因明显地表现出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早就被瑞典秘密警察机构 SAPO 看中，他们找他为 SAPO 工作，搜集和报告大学里共产党人的活动情况，但是据说帕尔梅拒绝了。

而整编西德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则与此不同。情报工作主要分搜集和分析整理、编写两大类。帕尔梅的工作是根据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和情报，对联邦德国的情况进行分析并提出看法。帕尔梅对共产党素无好感，当时东德已归属苏联的势力范围，西德如出个差错，瑞典将直接受到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威胁，后果不堪设想。如何铲除联邦德国的共产主义势力，同时使这一行动在西方民主、自由的口号下进行，这是有一定难度的。手段服从目的。民主德国经战争破坏，全国一片瓦砾，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苏联又雪上加霜，将工厂剩下的机器、设备拆卸，运往苏联，科学家、工程师等几乎全部掠走，民主德国经济的恢复肯定艰苦而漫长。而联邦德国在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下，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很快恢复生产，废墟上渐渐盖起新的房子。共产主义是很难在富裕的土地上成长的，联邦德国必将成为阻止共产主义西进的一道屏障。

尽管这份报告并没有得到上司的赏识，但帕尔梅在瑞军总参谋部情报部，有了这么一段经历。1952年，帕尔梅得到了一笔去法国学习语言的奖学金，遂动身去了巴黎。在巴黎期间，他又担任了瑞军驻法国大使馆武官的助手。

武官是军队派驻国外的外交代表，是高级外交官。他在两军交往方面负责与驻在国军方的联络工作，但日常主要工作是搜集情报，是“公开的特务”。帕尔梅懂得法文，在总参谋部搞过情报整理工作，政治上可靠，陆军武官觉得聘雇他是个明智的选择。

作为助手，帕尔梅的主要任务是从报刊杂志等公开材料中搜集情报。公开材料是最主要、大量的情报来源，过去美国中央情报局 70~90% 的情报来自公开材料。二次大战前美国有位作家兼记者在报上将纳粹德国军队的布署公诸于众，使德国大本营大惊失色。希特勒火冒三丈，如此严重泄密行为岂能容忍，令盖世太保将这位作家捉来审问，誓要挖出暗藏的间谍网。美国作家被捕后，申辩说他完全是凭一把剪刀、一支笔，一点一滴地将德国报章

杂志上透露的某军某师驻地、主官姓名等材料积累起来，整理成文的。他并出示他积累的大量剪报材料作为证据，不容希特勒不信。在这方面，帕尔梅的才能是绰绰有余的。

第三次与情报工作接触，则是 1953 年秋天。当帕尔梅完成了他的“亚洲之旅”，回到瑞典以后，他没有选择律师的职业，也没有进外交部，而是再次踏进了瑞军总参谋部的大门，在总参情报部担任情报参谋。

1953 年春，在帕尔梅“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的任期即将届满之时，他又获得了一桩“美”差——去印度和东南亚旅游，时间是三个月。资助者则是 CIA——美国中央情报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势力遭到严重削弱，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长期置于西方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的亚洲首先觉醒，挣脱了殖民体系的枷锁。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朝鲜人民和越南人民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成为一面旗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戳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略军司令克拉克成为“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亚洲人民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反帝反殖的斗志，革命的浪潮风起云涌。在这“东风压倒西风”的年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特别是在战后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深感亚洲政治形势的变化，对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是一种极大的威胁。为了阻止共产主义运动在学生中扩大影响，中央情报局要求“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COSEC）开展反共活动。帕尔梅自布拉格世界学生大会后，已使瑞典学生联合会与世界学联脱离关系，正式加入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帕尔梅从不提及此事，就像从不提及杰丽娜一样，只是后来对他最信任的记者帕蒂尔·乌斯特尔格林说过一次。由此可见，中央情报局选中帕尔梅也是有其依据的。

是年 6 月，帕尔梅的“亚洲之旅”成行。在此之前，他原准备去美国哈佛大学研读基辛格博士的一个课程，后来还是决定去亚洲。此行对帕尔梅一生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是始未料及的。而此举的后果，与出资使他成行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初衷，更是大相径庭。

帕尔梅的亚洲之行是从印度南部迈索尔开始的。印度是亚热带国家，自然条件极好，物产丰富。著名的恒河流域土地肥沃，不用施肥便可长出茁壮的庄稼。难怪她是英国女王皇冠上的一颗明珠。然而，印度人民生活的贫困惨状，若非亲眼目睹，帕尔梅无论如何是无法想象的。在迈索尔参加了一个学生代表大会后，帕尔梅便与一位社会学家来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就在离班加罗尔市不远的山区里。他在山村里呆了十天，与社会学家一起，看到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带来的现代文明对印度农村生活造成的影响。帕尔梅回忆说：“我们住在一个破庙里。勤劳善良的印度人民整天辛苦劳动，默默不语。他们沉默的尊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后来脑子里经常浮现班加罗尔附近的那个山村。我在最容易接受外界影响的年岁来到了印度，因而印度将永远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印度是佛教发祥地，老百姓对菩萨特别虔诚，帕尔梅住的庙宇虽然破旧，但恐怕是山村里最好的房子了。普通农民的房子只是一个矮小的茅草屋，屋里昏暗，门檐很低，进出都要低头弯腰。做饭就在露天，

拾把干柴，支起锅，就像欧洲中产阶级郊游时搞野炊一样，但遇到刮风下雨天就糟了。

印度气候酷热，加之卫生条件很差，疟疾、霍乱、痢疾等传染病横行，每年死于这些疾病的人数以万计。帕尔梅尽管在饮食方面非常小心，但还是不幸得了疟疾。他说这很可能是在加尔各答感染上的，因为一到加尔各答，他看见到处都是瘦得皮包骨头的孩子，饥肠辘辘，沿街乞讨。“我先是一怔，惊呆了，后又情不自禁地跟他们接近，”帕尔梅说。

加尔各答素有“世界最肮脏城市”之称，街上到处是摊贩，有卖水果的，西瓜切成一片片放在摊上；有卖食品的，是印度的“特色小吃”。行人熙熙攘攘，尘土飞扬，苍蝇更是猖獗，满天飞舞，切开的西瓜上面落满了一层，红色的瓜瓤变成黑色的了。小贩习以为常，不去轰赶，更不会拍打，打死苍蝇就是犯罪，因为印度人是不杀生的。在此场合，“神牛”是少不了的常客，它们在街上晃悠悠，看到哪个摊子食物可口就吃上两口。“神牛”是印度“三圣”之一（即母亲、恒河和神牛），印度大概是世界上人均拥有牛的数量最多的国家，普通农民家里都有一两头牛。由于宗教原因，印度人不能宰牛，遇到疾病，无钱求医，只能求神保佑。一旦病愈，便兑现对神的许诺，放走一头牛，叫做“放生”。这头无主的牛从此成了“神牛”。它走东窜西，到处拉屎撒尿，但谁家也不能怠慢它。加尔各答是印度东海岸重要港口城市，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已相当现代化，可以与当时的瑞典城市相媲美：有平整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建筑，设备完善的码头。至于欧洲人和美国人的居住区，环境也像瑞典一样优美，花园别墅比瑞典的住房更漂亮，头上缠着头巾、身材高大、满脸胡子的锡克族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不断地来回巡逻，以确保洋大人安全，夜里睡觉踏实。其实，一贯奉行“非暴力”和“不合作运动”的印度百姓，是不会对他们无礼的，倒是洋大人有时闹得左邻右舍不得安宁。有个垄断印度电池工业的洋大人的老婆，一天夜里发现自家的猫深夜未归，便把清洁工、服务员、园工、厨师等从床上唤起来找猫。他们大呼小叫，直到把猫找到为止。这就是印度。贫富悬殊，天下罕见。年轻的帕尔梅心里震撼了。

从印度来到缅甸，在仰光作了短暂停留。仰光对帕尔梅印象最深的是满街的小和尚，剃着光头，穿着僧衣，有的十来岁，有的只有七八岁，帕尔梅大惑不解，后来方才知佛教是缅甸的国教，每家都得送一个男孩进佛门，这是义务，就像瑞典服兵役一样。仰光还有一景，是帕尔梅很感兴趣的：马路两旁设有许多自来水龙头，不时见一些行人走到水龙头前打开龙头，冲个凉水澡，再继续上路。在仰光时正是盛夏，天气很热，帕尔梅觉得这个水龙头确是便民之举。

从仰光来到新加坡时，帕尔梅疟疾发作，体温高达40℃。他赶快作了治疗，吃了奎宁，卧床休息。他住在一个学生家里，同屋的学生有华人、马来亚人和印度人。帕尔梅再次感受到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贫富悬殊，不禁哀叹道：“拉富尔旅馆和英国贵族俱乐部的世界，离开我们这群学生实在太遥远了！”

疟疾痊愈后，帕尔梅与同屋学生一起上街游逛，或到学生家中作客，或与善于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学生探讨政治问题。“我们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是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帕尔梅说。

约在一个世纪以前，法国殖民主义以保护传教士为借口，发动侵越战争，后将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越南又成为日本独占的殖

民地。1945年，越南人民利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一有利时机，发动总起义，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9月，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在美、英支持下，派遣远征军入侵越南南部，妄图恢复其殖民统治。年底前，法国殖民者又占领了柬埔寨、侵入老挝，并向越南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在越南、老挝、柬埔寨人民的英勇抗击下，法国损失惨重。为了挽回败局，美国和法国采取“联合行动”，大批美国军事顾问来到印度支那，援助法国的军事装备源源不断地运抵，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称要（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大规模惩罚，以拯救民主。在亚洲，印度支那战争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对这场战争，对殖民主义，帕尔梅有了更多的了解。

“但是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亚洲的贫困和亚洲的民族主义，以及如何组织新的社会。我们都是《新政治家》周刊的读者，都久仰拉斯基和刘易斯的大名。社会主义就是要社会公正，社会主义显然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帕尔梅说。

今天的新加坡已是亚洲经济腾飞的四小龙之一，经济繁荣，市容整洁，马路上没有一个果皮、烟头，没有一张纸屑，商店里配有空调，货物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但50年代的新加坡仍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是大英帝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是殖民地，就摆脱不了殖民地国家的一个通病：贫穷。“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出去闲逛，走到郊外一片沼泽地，”帕尔梅说。“沼泽地边缘有许多矮小的房子，里面挤满了成千上万最贫困的穷人。一个新加坡学生说，‘白人对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我们的人就是这样生活在亚洲的。我们要求独立正是为了这些穷人。正是为了这些人，我们必须改革社会，刻不容缓，没有任何人能为我们完成这项任务。然而你们一直在向我们灌输民主思想，一直向我们强调莫斯科和北京的威胁，一直高唱需要冷静和稳定的高调。我们不是共产党，我们要民主，但我们不要被稳定窒息而死。’”

面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遗产——贫困，帕尔梅惊呆了，心里隐隐作痛。以前他相信英国白人的宣传，相信英国为印度、锡兰（现斯里兰卡）、巴基斯坦、马来亚（现马来西亚）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带来了“现代文明”，甚至相信英国强迫殖民地国家接受英语为它们官方语言的文化侵略行为，是为世界文明作出的一大“贡献”。而帕尔梅这次亲眼看到的却是贫困、饥饿、死亡，难道这就是现代文明吗？

夜探贫民窟的第二天，帕尔梅已经完全康复，于是继续向印度尼西亚进发。

在雅加达，他参加总统府为他这样的白人举行的豪华晚会，欣赏了印度尼西亚民族舞蹈。然而就在咫尺之遥，“在灼热的夜晚，成千上万工人头上扎着红布条在总统府外面静坐示威，”帕尔梅说。呜呼，仅仅一墙之隔，却是天上人间。

亚洲之行结束了，帕尔梅返回斯德哥尔摩。三个月来没有看到瑞典报纸了，他想念得很。“一看到本国报纸，非常激动，急切想了解国内正在讨论什么问题，”帕尔梅说。他从报纸上发现全国正在讨论的中心问题是给瑞典学校里孩子的食物数量是否够、质量是否好的问题。“‘人民之家’里的好公民一个个站了出来说话，”帕尔梅不无讽刺地回忆说。“‘人民之家’的女主人为自己辩护，社会福利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公报，有人则在财政大臣那里游说，要他再拿点钱，”帕尔梅阅读报上这些报道时，脑子里浮现出来的是肚子胀得像一面大鼓的印度小孩。“报上对这些印度小孩怎么只字不提呢？

瑞典孩子肯定不存在营养不良问题，而报纸却连篇累牍地讨论他们 10 奥尔（瑞典货币单位）伙食是否太少了。”

1953 年 10 月，在一次学生联盟大会上，帕尔梅在演讲中谴责了殖民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侵略和剥削，提出“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和改善物质生活的斗争，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斗争。”用他的话来说，他之所以到处演讲、活动，就是为了让瑞典学生抛弃旁观者的态度，投身到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去。

在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英国、法国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促使帕尔梅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

帕尔梅承认，他那时眼界宽了，懂得应该从全球角度看问题了。他遗憾的是，他的同胞中没有几个人能把眼光放到国境线之外的。“正是美洲之行和亚洲之行，使他坚定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亲眼目睹被剥夺一切、受冻挨饿的人们惨不忍睹的生活状况，他震撼了，激动地起来谴责殖民主义，”帕蒂尔·乌斯特尔格林说。“在他政治生涯的每一阶段里，他对国际问题的热情都大于国内问题。历史学家海德纽斯说帕尔梅在国际问题上是个激进主义者，在国内问题上他首先是个实用主义者，继承和发扬了汉松、埃兰德确立的传统。此话颇有几番道理。”

帕尔梅人生航标就这样确立了。从亚洲回国后他正式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他在大学读书时只是“社民党学生俱乐部”的一个会员，而且还是 1951 年才加入的。

“我的政治信仰是逐渐形成的，”帕尔梅说。“我信仰社会主义，并不等于说，我这样一个上等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弟，突然背叛了家庭。我是经过思索、研究，经过一个过程之后，才站到社会主义方面来。这不是一条通往大马士革的路，也不是通往启示的路。对某些人来说，参加社会主义有些神秘感，像是自然的亮光突然一闪。对这些人我不敢苟同。就我而言，社会主义的亮光是徐徐射入的。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

有些瑞典人说，帕尔梅加入社民党是政客惯用的机会主义做法，因为社民党是瑞典“天生的执政党”，加入社民党，仕途平坦，就像英国政客为了做官，必须参加保守党一样。帕尔梅的朋友则认为不尽然，做官不是他参加社民党的出发点，甚至也不是他的主要考虑，建立平等、民主的社会才是他一生的追求。

帕尔梅不喜欢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极端的贫富悬殊，对被剥削者，对工人、穷人富有同情心。在他眼里，贫穷是一种罪恶，是造成冲突的根源。这个自幼酷爱历史的年轻人对瑞典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每一步，都是了如指掌的，他不会忘记瑞典的过去。

19 世纪初，瑞典还是欧洲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天灾和人祸更加剧了经济的困难。令人难忘的 1867~1868 年，是瑞典的大灾之年。头一年，气候格外寒冷，不是刮风，就是下雪，厚厚的冰层把北博顿省内的河流都封死了，直到仲夏还不能播种。勉强将种子播下后，8 月又突然降霜，庄稼全部冻死。全国举行祈祷，祈求神灵保佑。第二年又是奇热、干旱。中部斯摩兰地区从 4 月到 8 月滴雨未下，夏天气温高达 30℃，大江小川全部枯竭，井也干了，森林火灾此起彼伏，人们吃青苔、地衣、草根和苦涩的山梨。煮土豆加点盐是过节或招待客人才有的“佳肴”。营养不足，死亡率高达 22%，铁路沿线都是乞丐，抢劫屡见不鲜。

1869年终于盼来了好年景，然而生活水平仍很低下。19世纪60年代，瑞典男人平均寿命为42.8岁，妇女平均寿命为46.4岁，婴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一百三十九。贫瘠的土地再也负担不起她的众多儿女和后代的吃饭问题了。自19世纪中叶起，人们开始外逃，远涉重洋，到“新世界”去寻找安身之处。1815年瑞典全国人口仅为250万，1900年上升到510万；而到1902年时，移民总数已高达120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移民潮在70年代达到高峰，当时也正是瑞典经济开始起飞之时。移民到国外谋生，减轻了瑞典国内的经济压力，他们自国外寄回的钱财，支援了国内的建设，并通过他们使海外的一些新的技术、发明传到了国内，为瑞典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移民如此之多，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农村作坊里，雇工的劳动强度超出了常人的想象：一个冶金工人到了40岁，腰就直不起来了，50岁就瘫痪了。而13、14岁的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又蹈他们父兄的覆辙。北方木板房里的情况就更糟了。“地板上覆盖着木屑、尘土、碎石和垃圾，墙壁上斑斑点点，肮脏不堪，房顶被烟熏得乌黑，房里散发着猪圈般的恶臭。房里摆了两三个床铺，床上铺着凉席，有条不太干净的毯子和被，除此之外就家徒四壁了，”这是历史书上记载的情况。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工厂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生产任务忙时劳动时间更长。工作条件原始，工伤事故不断。据统计，从1875年至1913年，木材厂里童工占劳动力的20%，高出一般工业国家平均水平。

由于工人居住条件很差，卫生状况极糟。疾病，特别是肺病猖獗。在记者和作者的笔下，“斯德哥尔摩是欧洲最穷最脏的首都之一，十分拥挤，街道很窄，很脏，两旁的小木屋阴冷潮湿，与其说是街道，不如说是乡间泥泞小路。”

而19世纪90年代的码头工人的生活则是：住在最简陋的、东倒西歪摇摇欲坠的小木屋里，工人死亡率等于城里其他地区的两倍。这就是贫穷，是一种罪恶。

然而，这是瑞典的过去。今天的瑞典再也不见这种罪恶。帕尔梅把瑞典的发展、贫穷的消除，归功于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

在席卷全球的1929~1932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面前，瑞典和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然而，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上台组阁后，一方面制定和采取强有力的反危机措施，使瑞典国内市场好转，生产增加，失业率大幅度下降，缓解了危机；另一方面推行全面的社会改良，在汉松“人民之家”的旗帜下，实施新型的社会福利政策。

从30年代中叶起，瑞典的福利政策已改变了其原来的济贫性质，开始向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险体系这一方向发展。社民党上台后第二年，便开始兴建大批住房，以解决居住条件困难的工人家庭的需要；1934年开始实行失业保险；1935年实施老年养老金计划，对多子女的家庭给予住房补贴；1937年再次增加退休金金额，并对产妇进行补贴，向新婚夫妇提供购房、建房贷款，给予单亲孩子津贴，增加孤儿的补贴；1931年执行每年带薪休假12天的制度，并将每日8小时工作制扩大到农业工人。社会福利措施接二连三地出台，改革已逐步地向分配领域扩展，逐步向福利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化，向人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埃兰德继任首相后，进一步把“人民之家”的构想具体

落实，提出了“二十年内实现全面就业”的口号。

回顾历史的经验、教训，再面对严酷的现实，帕尔梅对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在亚洲旅行的日子里，他对那里的人们对白人种族主义所表示出来的仇视，印象极深，他说：“我感到他们或早或晚总会成功的。”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官逼民反。杀吗？看看巴黎公社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杀得越多，造反的人越多，问题就更严重。在帕尔梅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才是解救贫困的良药。自亚洲回来后，他对许多人说，民主社会主义是排斥亚洲共产主义唯一的、最好的选择。

帕尔梅对社民党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全面认识，恐怕还是在他正式加入了社民党的组织，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市恩格莱克地区支部的活动以后，特别是在他来到埃兰德首相身边工作以后。从1956年帕尔梅主管社民党的宣传工作时对年轻人的一次演讲中，可以看出他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这次演讲中，他从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一代领袖布兰亭，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作出选择”开始，分析、讲解社民党的方针政策。

布兰亭的早期思想是主张社会主义的，他认为“准备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当代工人阶级的重大使命……”“自由主义使工人得到形式上而不是真正的平等。”但在怎样实现这个过渡的问题上，他原则上主张渐变，而不是革命，但也不排除使用暴力的可能。到了晚期，布兰亭的思想已经转向改良主义，主张通过改良主义或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布兰亭的实践活动，和瑞典工业化过程起步较晚、工人运动与其他国家相比发展迟缓以及瑞典的具体国情和传统的影响是密切相关的。当瑞典工业化发展，工人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后，布兰亭坚决把工人运动纳入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给瑞典社民党带来一些震动，也引来不小的麻烦——一部分成员脱离社民党，另组瑞典共产党。但是，布兰亭也利用苏联武装夺取政权成功的经验，以及1918年德国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用暴力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事实，使保守党的贵族老爷们相信，手里拿选票的工人比手里握刀枪的工人好多了。用布兰亭的话来说，“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资产阶级就得接受革命法庭的裁决：破产！”社民党的第一个决定性胜利——争取普选权的斗争胜利完成了，也为社民党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布兰亭奉行阶级合作政策，被各方面公认为是“瑞典最宝贵的政治财富，瑞典最伟大的儿子之一。”

帕尔梅口若悬河，一口气将布兰亭奠定的瑞典民主社会主义事业作了回顾和分析。他从布兰亭讲到汉松，从“人民之家”讲到埃兰德，会场上鸦雀无声，帕尔梅心想台下年轻的听众大概不感兴趣，都睡着了。

“我抬起眼睛往台下一看，没料到大家都瞪着大眼看着我，全神贯注，我高兴极了，”帕尔梅回忆道。他一定想起了林肯在格拉斯堡罗发表著名演说的情景。

帕尔梅深信，只要能牢牢把握住瑞典工人阶级队伍，社民党就无往不胜。他说：“我的社会主义基本概念就是，如果大家团结起来，永不分裂，那么就没有任何不可战胜的困难。如果你整天为困难愁眉苦脸，牙疼似的哼哼唧唧，你肯定一事无成。”

帕尔梅这番话并不是说他遇到了困难。事实上他一帆风顺，太顺了。他一直住在东马尔姆斯街36号。他并不觉得他的社会主义政治信仰与他上等阶级家庭生活有何格格不入之处。1953年，当他26岁时，才搬出这座上等社

会的宅第，另立门户。

第六章 幸遇恩师

天资、勤奋和机遇是人生事业成功的三大要素。天资和勤奋是内因，是决定性因素；机遇是外因，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内因和外因皆具备时，成功就基本在握了。诸葛亮是在刘备三顾茅庐的情况下，被请出山，他的三分天下的战略设想才得以实现，他的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罕见的聪敏才智方得以淋漓尽致的表现。毛遂在平原君府里当了三年食客，无人赏识，最后逼得他“毛遂自荐”方“如锥入囊，锋芒毕露”，得到充分发挥其大智大勇的机会。当然，也不乏平庸之辈，倚仗其家族或势力集团而爬上权力高峰的。如阿朱别依，因岳父赫鲁晓夫当了苏共总书记，而跃居前苏共党报《真理报》总编之要职；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原是前苏联外贸部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凭借其父的官势地位当了高官，发了横财。这些人可以得势一时，但终难长久，更谈不上事业的成功。

帕尔梅天赋极高，又遇到了常人少有的机会，他最终登上政治生涯的顶峰，这是毫不奇怪的。天赋与勤奋结合在一起，定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1951年9月21日，应该是帕尔梅难以忘怀的日子。这一天，在一个偶然的会中，他遇到了后来把他带入政界，并引导他学会了参与和领导政治斗争、治党治国的埃兰德首相。

帕尔梅的原籍在南方。他对斯科纳平原虽不像沙文主义很浓的南方人那样，做视北方，认为南方一切都好，甚至说“斯德哥尔摩只是瑞典后门而已”，但帕尔梅喜欢南方。这里是瑞典主要产粮区，是德国、丹麦平原的延伸，景色与欧洲大陆相似，与典型的斯堪的那维亚风光相距甚远：宽广平坦的田野，肥沃的黑土，小落叶树丛林，农家石砌的“人”字形小屋，院里肥得难以迈步的白鹅，以及露出地面的花岗石和鹅卵石。鹅卵石恐怕是冰川期被最后冰块退走时磨光的。总之，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使他迷恋。

帕尔梅偕其好友、大学同学保罗·比约克去南方游览，9月21日乘火车回斯德哥尔摩。火车穿过斯科纳平原后，渐渐进入瑞典中部，跃入眼帘的景色也随着火车的移动发生着变化：众多的湖泊、河流接连出现，湖水碧绿如蓝，清澈见底。湖边错落着许多木屋，小屋烟囱里升起袅袅白烟，与远处的青山，茂密的森林，构成一幅幅和谐的画卷。这些小屋既不是乡间农舍，也不是旅馆、咖啡屋，而是瑞典人度假休闲时的“家”，瑞典人称其为“夏宅”或“休闲小屋”。据统计，瑞典共有30万所“夏宅”，一般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都有一座“夏宅”，蓝领工人拥有夏宅的尚不算太多，约占他们总数的百分之二十。每到休闲季节和节假日时，瑞典人常常举家迁徙到这里来小住几日或一段时间，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方式。名为“夏宅”，并不是夏天才居住的房子，有些家庭的夏宅建在北部地区，冬天滑雪季节时，这里也是炉火融融，欢声笑语不断。

帕尔梅正在欣赏室外景色，突然有个熟悉的身影从他们身旁闪过。比约克立即认出这是当今首相埃兰德，遂与首相握手问候——比约克是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分子，对自己党的领袖当然十分谦恭和热情！他并向首相介绍了自己好友帕尔梅。埃兰德首相获悉他们都是大学学生，正在攻读学位，非常高兴。也许是两个年轻人勾引起他对当年在隆德大学的校园生活的回忆，也许是因为他今天心情特好，兴致特高，便与俩人闲谈起来。——埃兰德刚刚平息了党内元老之间的矛盾，又成功地与农民党头目古纳·海德隆德达成一项

协议，从而巩固了他的政治地位，并进而扩大了他们的政治基础，他能不高兴吗？如果在家里的话，他定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的。

火车很快到达终点，埃兰德似乎余兴未尽，遂邀请两位年轻人去罗生巴德一家他常去的餐馆尝尝一个地道的瑞典菜——肉丁烤菜，即把肉末和土豆拌在一起，上面加一个煎鸡蛋，吃的时候配上一点泡菜（最好是甜菜根）。这家餐馆的房子后来成为首相办公室。只是这座首相府不如英国唐宁街 10 号那样著名。

埃兰德首相发现帕尔梅思维敏捷，见解新颖，虽然谈话有时过于尖刻，但健谈风趣，这在瑞典人中是很少见的。瑞典人一般不善言谈，缺乏幽默。帕尔梅与众不同，给埃兰德留下深刻印象。分手时埃兰德要帕尔梅去看他，再作一次促膝深谈。

帕尔梅第二次去首相府，则是 1953 年他即将卸去瑞典学生联合会主席之职的时候，那时他正在筹建“学生议会”，请首相从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给予支持。接待他的是阿瑟尔·林德贝克。这是社民党内一位红得发紫的大经济学家。遗憾的是，这一次帕尔梅没有机会同首相畅谈他对国家大事、天下大事的看法。不过林德贝克教授对这个年轻人留下极好印象，当埃兰德物色私人秘书时，林德贝克教授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帕尔梅。他与帕尔梅以后成了莫逆之交，直到帕尔梅当了首相后依然如此。

交待完学联的工作之后，帕尔梅开始了他的亚洲之行。归来后不久，埃兰德首相突然邀请他去首相官邸作客。这是帕尔梅到总参谋部上班的第四天，埃兰德邀请他的理由是想听听他去亚洲的观感。帕尔梅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这是他第三次见首相。

这时，埃兰德首相夫妇刚刚搬进哈普松官邸不久。帕尔梅进屋后，在来宾签名簿上发现，他是首相在新官邸接待的第四位客人。在他前面的一位是英国工党老资格政客休伯特·莫里森。

然而不久，这里的宾客就络绎不绝了，经常高朋满座。埃兰德首相喜欢在官邸宴请工商界、金融界首脑以及反对党党魁、工会主席等要人，请他们来此共商国家大事。埃兰德利用这个社交场合，在宽松的气氛中，在推杯把盏中，与各界重要人物互通信息，交换意见，讨价还价，最终达成妥协，取得一致。瑞典政治辞条中的“哈普松民主”便是由此而来。后来便发展成一种以执政党和各利益集团定期会晤为渠道，缓和双方的利益摩擦的民主形式。“哈普松民主”也就成了埃兰德二十三年首相生涯最成功的标志。

瑞典首富、大银行家、实业家瓦伦堡便常是哈普松官邸的座上宾。他回忆说，一次埃兰德表示想请苏联驻瑞典大使来赴宴，与大使探讨瑞典在苏美核大国核军备竞赛中的中立地位问题。瓦伦堡像美国大资本家哈默一样，被苏联视为友好人士。瓦伦堡赞赏首相的想法，说：“你发邀请吧，我也参加。”

“哈普松民主”的发明权实际上应属于埃兰德的好友、韦斯特罗斯市的朗纳尔·卡松帕尔松。有一年秋天，埃兰德出席南方小城韦斯特罗斯一年一度举行的博览会，好友卡松帕尔松是这里的最高长官，于公于私都得陪同首相参观。卡松帕尔松在博览会上遇到许多企业家和工商界人士，听到他们不少牢骚和怨言，遂向首相进言，建议他在乡间官邸定期或不定期地邀请工商界代表一起谈谈，听听他们的意见，广开言路，权作参考，首相也可向他们作些必要解释，消除误会，争取他们的谅解和支持，以达政通人和。埃兰德采纳了好友的意见，“哈普松民主”便由此开始了。

帕尔梅回忆这次接见时说：“我乘地铁去哈普松。虽然已是9月底，天气却相当暖和”。首相接见的实际日子是1953年9月20日。

埃兰德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听帕尔梅的亚洲之行观感才接见他，醉翁之意不在酒。

埃兰德此时就任首相职务已近七年，但至今仍是光杆司令，除一名打字员兼搬运工和一名门卫外，别无他人。由于前首相阿尔宾·汉松一生坚持搭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和外出参加活动，所以政府一直也没有给埃兰德配备一辆汽车，当然也就没有专职司机了。埃兰德因公外出时，不得不临时向邮电部或监狱看守处商借车辆。名义上有个首相秘书，但其任务是在内阁会议上担任记录。而且他是“国父”汉松首相留下的老臣，和埃兰德总保持着一段距离。埃兰德早就想改变这种孤家寡人、无所作为的窘境。

七年来他憋了一肚子窝囊气。党内元老自恃德高望重，从来没有把他首相放在眼里。当时社民党是与农民党联合执政。两党有个默契：首相、外相、财相等等都是相，首相只是排头兵而已。各部之间的协调工作，由财政部负责，不用首相操心。各个部成了独立王国，首相被架空。相反，埃兰德还得看元老们的脸色行事。1951年，埃兰德深感自己需要有个秘书，他整天忙于事务性工作和起草演讲稿（作为首相，一星期五个工作日他大概要发表六次演说！），时间都消耗在这些琐事上，无暇考虑国内外的重大问题。他曾想任命一位经济学家为他的私人秘书，希望身边有个可以商讨问题的人。这位经济学家在社民党内小有名气，是个颇有见地的人。但是，树大招风，当埃兰德将这一提名交到内阁大臣们手里时，几乎无一位大臣赞成，摩勒等前朝重臣还因此对埃兰德引起警惕，怀疑他自恃羽毛丰满，要夺他们手中大权。埃兰德自知势单力薄，只得退避三舍，暂时搁下此事。

1946年10月5日，挪威首相访问瑞典，前首相汉松在出席了欢迎宴会后，搭乘有轨电车回家。当他抬步迈出电车时，突然心脏病发作，碎死在有轨电车站上。当时，埃兰德只是个年轻的宗教事务及教育大臣。想当年，汉松首相任命他担任此职时，人们认为他的官运业已到顶。这次首相猝死，他也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肯定要从维格福斯、摩勒、斯科尔德等元老中道选一位，至少是暂且过渡一下，经充分酝酿后再推选一位年龄稍轻的党魁。然而，维格福斯和摩勒是一山二虎，谁也不服谁：维格福斯不想只当过渡首相，同时坚决反对摩勒出任首相。

为避免党内分裂，为长治久安，社民党领导决定毕其功于一役，挑选一位年轻人担任首相，于是由原国防大臣安德松找埃兰德谈话。埃兰德大感突然，他说他从未做过问鼎之梦，断然不敢接受。安德松回忆说：他根本不考虑这种可能性。他先是拒不考虑，后又以健康不佳等种种理由拒不参加竞选。但社民党内有一条规定：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为避免分裂，埃兰德也只有服从党领导的决定，勉为其难了。维格福斯宣布退出竞选，支持埃兰德。选举结果埃兰德以五票的微弱优势战胜摩勒，成为社民党党魁和政府首相，是年45岁。

起初几年，埃兰德在党内威信不高，党内外的人都说他是“无名小辈”，成不了大器。埃兰德听了一笑了之，说：“从‘无名小辈’干起也不错嘛。”人们甚至嘲笑他演讲时一口浓重的韦尔姆兰地方口音，取笑他说话的姿势，“他根本当不了政治家，充其量是个韦尔姆兰的福音传教士”。——埃兰德的父亲艾立克·埃兰德是当地的小学教员，兼教堂里的风琴师。他家原姓安

德松，他父亲觉得姓安德松的人太多了，就改成了埃兰德。

“他们想着恼我，”埃兰德说，“但是我把他们的话反其意而用之，贬意当作褒意，激励我前进。”埃兰德比起韩信的胯下之辱当是微不足道了，但他宰相气度，也非常人所有。

埃兰德对一帮老臣们忍气吞声，从不敢耍首相的威风。但到了1953年，他的地位业已巩固，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秘书了。

教育和宗教事务部国务秘书拉拾纳尔·埃德曼获悉首相意图，向他推荐帕尔梅。埃兰德想起曾与这位贵族青年有一面之识，遂用他那浓重的韦尔姆兰口音问道：

“别气我了，他是社民党党员吗？”

“这我不敢肯定。”埃德曼抱歉地说。

说来也巧，在此之前，帕尔梅刚刚正式加入社会民主党，否则他有可能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

“不是党员也行，但他一定要聪敏能干，办事迅捷，会说外语。”埃兰德又自打圆场地说。

后来埃兰德又征求经济学家阿瑟尔·林德贝克的意见。林德贝克在帕尔梅筹建“学生议会”时与他有过接触，对帕尔梅的精明早有领教，况且帕尔梅又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震动很小，因此林德贝克认为帕尔梅是非常合适的人选。

埃兰德还不放心，遂召帕尔梅前来面试（帕尔梅对此当然一无所知），结果十分满意。

为慎重起见，开始只是试用，向国防部暂时借调帕尔梅，在首相府帮助工作，行政关系尚归国防部管辖。但是，从此以后，埃兰德便再也离不开帕尔梅了。1954年5月，帕尔梅正式作为埃兰德的秘书，开始在首相府工作。

当埃兰德首相就帕尔梅的任命征求各位阁僚意见时，众大臣皆无异议，唯一人反对，而这位反对者正是帕尔梅青年时代崇拜的偶像维格福斯。维格福斯当时如知道他有这样一位崇拜者，会感到十分骄傲的。

一位好领导胜过一位好老师。帕尔梅遇到的正是这样一位好领导、好老师。年仅27岁的帕尔梅，乳臭未干，刚刚走上社会不久，就进入首相府工作，得到了埃兰德言传身教的栽培，真可谓三生有幸。

作为埃兰德的秘书，帕尔梅的工作开始主要是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工作，为首相起草演讲稿，担任首相的翻译，以及为首相的出访作准备工作等。由于帕尔梅的文笔清新流畅，文章活泼有新意，很得埃兰德的赏识；加之他掌握英、法、德、西班牙等多种语言，能承担重要会谈、会见的翻译工作，很快便得到埃兰德的喜爱和信任，成为其“放心的助手”。1954年帕尔梅正式担任埃兰德首相的秘书后，除协助埃兰德处理大量的日常事务外，还担任了埃兰德首相与政府各部、社民党、议会、舆论和宣传媒介以及其他人士之间的联络员。

帕尔梅超凡的工作能力，讲究实效的工作作风，使他很快就锋芒毕露。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埃兰德交办的各项工作，而且悟性特别高，无须多加点拨，便领会领导的意图。当埃兰德情绪低沉时，帕尔梅知道如何使他高兴起来。当他们一起讨论政策、方针等大问题时，埃兰德发现帕尔梅的观点很有见地，头脑里总能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去解决遇到的难题，真能为他出谋划策排忧解难，使他高兴起来。令埃兰德更为满意的是，帕尔梅不仅才华横溢，

而且极其勤奋。加班加点、挑灯夜战几乎成了正常现象，而他总是勤勤恳恳，毫无怨青，满腔热情地做好工作。一次，埃兰德要他将各方面对瑞典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意见写个综合报告，帕尔梅彻夜未眠，挑灯夜战，一直干到清晨7时。然后，他将写好的文件放在首相案头；到盥洗室里用冷水冲了一下头；踱步来到首相府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再回到首相办公室将埃兰德当天的活动日程安排妥帖。一切都进行得井然有序。当埃兰德早晨来到办公室，看到眼前的一切，他简直不敢相信，如此高效，如此勤奋，如此尽职，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帕尔梅不仅成为埃兰德得力的助手，进而成为一名不可缺少的高参。首相和秘书之间你尊我敬，成了“黄金搭档”。

埃兰德越来越赏识帕尔梅、称他是“无价之宝”，而且是“绝对的”。帕尔梅不仅视埃兰德为领导，而且是老师，是父亲。在帕尔梅心目中埃兰德已取代了八年前逝去的“国父”汉松的地位。

渐渐地，帕尔梅的工作由室内走到了室外，由幕后走上了前台，开始抛头露面了。在公众服中，帕尔梅是埃兰德首相的影子。无论埃兰德首相走到哪里，帕尔梅总是紧随其左右，帕尔梅很快便成了新闻界非常熟悉的人物。埃兰德身材高大，帕尔梅个子比较矮小，新闻界便以“高个和矮个”为他们的代名词，有时不带恶意地称他们为“贝纳德和爱犬”，或称帕尔梅为“埃兰德的影子”。

英国资深记者迈克尔·邵尔沙有次采访埃兰德首相，在门口见到帕尔梅。邵尔沙回忆说：“帕尔梅将我引进办公室，旋即转身离去。数月后我再次采访埃兰德。这次埃兰德让帕尔梅留下。采访过程中，埃兰德不时问坐在身旁的帕尔梅，‘奥洛夫，你有什么看法？’帕尔梅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取得埃兰德的信任。”

英国前首相、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对帕尔梅也留有很好印象。1954年春，艾德礼访问瑞典，与埃兰德进行会谈。是年秋，工党在斯卡保罗举行工党年会，艾德礼便邀请埃兰德参加，但他没有忘记邀请帕尔梅。艾德礼请他陪埃兰德同来英国。

瑞典由于社民党长期执政，“五一国际劳动节”一直是全国重大节日之一。劳动节这天，一些党派和工会要在首都和全国各地组织自己的党员或所辖工会的会员上街游行，举办演讲活动。游行队伍打着红旗、横幅和标语，边走边呼口号或唱歌。标语口号反映了工人及其他阶层的人最关心的问题和要求。社民党党员每人胸前佩戴一支玫瑰，队伍浩浩荡荡，在鼓乐队的引导下穿过闹市。

1955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帕尔梅奉命去南方小城克里马克拉参加当地社民党组织的游行。他“手里夹着一个黑色皮包，年岁很轻，看上去像个学生”（克里马克拉社民党市党部主席语），在游行队伍里，他一边走一边与路旁观众握手、交谈，俨然像美国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一样。帕尔梅这番表演在瑞典是空前的。在此之前，克里马克拉市的瑞典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帕尔梅此时便已脱颖而出，他开朗，潇洒，与瑞典人传统的拘谨作风很不一样。

50年代是瑞典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城市建设发展很快，面貌日新月异，环形公路、市内高层停车场、立交桥、地下人行通道等——建成。这是推陈出新，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年代。帕尔梅对这巨大变化感到欢欣鼓舞。他

不免想起社民党老前辈弗雷德里克描写的 1903 年斯德哥尔摩的状况：“我第一眼看到斯德哥尔摩的印象是寒冷，是肮脏，到处是飞雪，是半融化的雪泥，是尘土。当我跳下火车，眼前看到的是马车；街上跑的是马车，车夫因喝了烈酒，被风一吹，脸上红扑扑的：马车按规定路线运行，这是当时的公共交通工具，乘客只要打个招呼，随时可以上下车；马车也是运输工具，酿酒厂就是用四轮马车运酒，马是亚耳丁的雄马；数不清的饭店、沙龙，但都是最简陋的；清晨街上喝得醉醺醺的行人，走路踉踉跄跄，东倒西歪；穿着普鲁士制服的警察，人高马大，头上戴着头盔，迈着神气的步伐，走过来，踱过去；赤贫的孩子在寒风中索索发抖……老乞丐颤颤巍巍……偶尔出现一辆豪华马车，车里的男人戴着很高的礼帽；主要街道两旁也有政府大楼，其它地方则是昏暗的院子，地下室则是无产阶级居住之所……贫穷到处可见，就像巴黎一样，然而巴黎是以艺术包装起来的撒马尔罕，我眼前的斯德哥尔摩是赤裸裸的，穷得一无所有。”昔日斯德哥尔摩的贫穷落后已成历史，今日之首都如日中天。

帕尔梅的政治生涯也像斯德哥尔摩的发展一样，蒸蒸日上。1955 年他又前进了一大步，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中央执委，负责青年团的学习。同时他还成为瑞典工人教育协会（ABF）的理事。该协会是社民党和总工会于 1921 年联合创办的学习协会，其主要任务是普及科学文化知识。

这年夏天，团中央执委里一位领导克努特·林德贝里邀请帕尔梅去波罗的海上的佛乐岛休假，因为他在岛上有座不错的休闲小屋，设施齐全。佛乐岛面积很小，只有 25 公里长，8.5 公里宽，但非常美，有险峻的峭壁，美丽的沙滩；有奇花异草和数不清的小鸟。帕尔梅在岛上虽然只呆了两天，但深深爱上了这个小岛，以后每年夏天必来岛上小住数日，直至生命结束。有人曾问帕尔梅是否希望登月球，帕尔梅明确回答说：“不，佛乐岛岂不比月球更美。”

休假完毕，帕尔梅又参加军队复训，军阶又提了一级：中尉。

1956 年埃兰德也给他这位得意门生提了一级，晋升他为首相办公室首席秘书。此后，帕尔梅再也不搞文秘工作，而是主管社会民主党的对外宣传刊物：《政治与进步》。

这年他陪同埃兰德首相出访莫斯科，当时的苏联对这位年轻人格外重视，对他作了突出的报道，尽管他当时并没有显赫的官衔。苏联的报道给帕尔梅带来了小小的麻烦。瑞典《晚报》那时控制在社民党右派手里。该报借题发挥，对帕尔梅发起人身攻击，说：“小个子，鹰钩鼻，厚脸皮，但很聪敏，无偏见，这个年轻学生看来要在政坛上大显身手了。”文章作者署名为“Sic”，一般人猜测这位“希克”肯定是社民党里某个重要人物。帕尔梅向《晚报》提出质问，“希克”进而又在报上说：“帕尔梅演说确有一些煽动力，……他底下与人谈话时，就使用一种他想象是劳动人民使用的语言。据说他有次遇到一个劳动家庭出身的人，交谈时帕尔梅隐瞒了自己上层阶级家庭的出身，对他来说这是绝对必要的。”“希克”当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不会为一个无足轻重的晚生后辈而费笔墨的。他笔锋一转，讽刺的对象就成了埃兰德。他笑埃兰德沙哑的嗓子和韦尔姆兰的口音。“如果演讲稿是由埃兰德撰写，让帕尔梅去朗读，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乾坤颠倒的做法，那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将是一大改进！”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帕尔梅在政治舞台上刚以一个人微言轻的配角登

场，便招来各方攻击。斯德哥尔摩著名记者古纳·乌恩格尔也参加了攻击帕尔梅的队伍。他在报上给帕尔梅画了一幅素描，大大将他丑化一番，说他是“黄鼠狼似的小个子，灰脸膛，黄头发，浅灰色眼睛，”但也不得不承认他“聪敏过人”，然而又说“帕尔梅权欲极重，冷酷无情，很能讨主子欢心，使主子觉得他是必不可少的。”乌恩格尔说帕尔梅与埃兰德有许多相同之处，俩人臭味相投，只是埃兰德已经年过半百，精力不济，整天显得疲惫不堪；帕尔梅则年富力强，朝气蓬勃，俩人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乌恩格尔当然免不了在帕尔梅的家庭出身上大做文章，然后自己又觉得莫明其妙，说“他究竟如何摆脱其贵族家庭影响的，这还不很清楚。”

真正能够理解帕尔梅的是他的一位红粉知己，一位大家闺秀，即后来成为帕尔梅夫人的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1951年是帕尔梅的本命年，也许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中国这个古老的说法，但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一年肯定是他的吉祥年。他除了首次遇见埃兰德首相外，还遇到另一位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

这也算是缘分。他们两人那时都是学生。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才22岁，正在攻读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统计学。她身材硕长，亭亭玉立，非常美丽、文静，端庄的举止更衬托出她大家闺秀的高贵气质，使她迷人的外貌又罩上了一层不可侵犯的神圣。1951年正值瑞典学生滑雪运动会在克里姆普菲耶尔举行。克里姆普菲耶尔是北方西博滕省的一个小城，是个有名的滑雪胜地，每年接待无数旅游者。即使自己不参加比赛，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也会来此观战助阵的。碰巧帕尔梅也来克里姆普菲耶尔，而且在同一个旅馆下榻。

一天晚上，帕尔梅在旅馆的餐厅里吃饭，正在品尝咖啡，忽然看见也在用餐的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他眼睛一亮，感到血液直往上涌，身子发热，脸也红了。帕尔梅曾见过不少妙龄女郎，穿着华贵服装和一丝不挂的都有，但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激动。他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手里端着咖啡朝丽丝贝特走去。帕尔梅也许是太紧张了，居然在作自我介绍时，不小心将咖啡洒在丽丝贝特的腿上！帕尔梅吓坏了，不知所措，这双玉腿可是神圣的，绝对不能碰的。帕尔梅一面忙说对不起，一面赶紧从口袋里掏出手绢，心里埋怨自己犯下这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可不是好兆头啊！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平时像带刺的玫瑰，是不能惹的。但今晚不同，也许因为今天玩得尽兴，也许是因为晚餐的饭菜可口，也许是因为其他原因，总之，此刻她的心情特别好，脾气特别温顺，听到帕尔梅介绍后，觉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便毫不介意地接入手绢，擦去了腿上的咖啡，邀帕尔梅坐下。

两个年轻人的心灵撞在一起，拼出火花，从此再也无法分离。

他们俩人的共同点太多了，彼此间的吸引力太大了。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也出身在名门望族，父亲是男爵，母亲则是瑞典最大的家族之一，道林斯家族里的千金小姐。父亲是保守党，视社会主义为洪水猛兽，恨得咬牙切齿。女儿则认为社会主义最合理，最公正，毅然加入社会民主党，党龄比帕尔梅的还长！在大学读书时，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曾萌生出将来当医生的想法，但像所有充满幻想的年轻人一样，她又有其他不下十个理想，“我那时不知道究竟想干什么，”1986年3月2日她对采访她的工会报纸《晚报》录音说。“后来我自愿去辅导两个因家境贫困而辍学的孩子学习，又突然与穷人家的青年有了接触，我知道他们家几乎都是一贫如洗。我认为社会主义

青并不是要革命，我参加社民党是因为我是尊重现实的人。看到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我问自己：‘我们怎么办呢？’我的结论是：我们必须改造这个社会，要一步一步地改。”

这位贵族家小姐肯定不是唯成分论者，她认为舆论界抓住她的家庭出身喋喋不休，实是荒唐之举。“我认为追究家庭出身非常无聊，非常可笑，”她另一次对《晚报》女记者说。“抓住家庭出身只能说明你的偏见，肯定是违反社会民主党原则的。”

虽然他们都是贵族家庭出身，但他们的结合远远不是一般的门当户对。他们政治观点的一致，却是把他们紧紧连在一起的因素之一。两个年轻人从此就成双结对地进进出出，形影不离。周末和节假日里，人们见到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坐在帕尔梅的蓝色摩托车后面，紧紧搂着帕尔梅，去郊外野餐，晚上又同骑一辆摩托车去剧院看活剧，或去电影院看电影。冬天他们一起去滑雪、滑冰。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将这对年轻人分开了。

1956年春天，帕尔梅和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利用大家沉浸在假日和欢乐里，没有那份闲情逸志去过问别人事情的大好时机，巧妙地躲开新闻界的注意，悄悄跑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在一座瑞典教堂里登记结婚了。婚礼结束后他们立即去罗马，在意大利度完蜜月。返回斯德哥尔摩后，他们在远郊瓦林比的劳斯特朗兹街租了一套两居室的单元房，组织起两人世界。瓦林比不仅远离市区，而且环境较差。它有个不雅的绰号、叫“西伯利亚”，因为这里是风口，像中国的张家口一样，很冷。帕尔梅每天骑着摩托车到市里上班，直到摩托车被偷为止——摩托车是放在首相办公室门口被偷的。首相府门口大概是蜡烛台下的黑暗处吧，也怪帕尔梅大意。

在埃兰德身边工作以后，特别是在参与了党内思想理论的探讨和政府大政方针的制定过程，帕尔梅对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不移，在日常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作为伯乐的埃兰德，更是倾尽心血对这匹千里马给予更多的栽培，给他创造更多的机会，让他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得到锻炼。一颗耀眼的新星在政界悄然升起了。

1957年，“红绿联合政府”解散。其原因是农民党已更名为“中间党”，为了树立自己不左不右的形象，便与其他两个“非社会主义政党”一起，抨击社民党政府。他们反对社民党提出的《附加养老金方案》，认为这是社民党“企图从后门将瑞典推进社会主义。”

1958年举行大选，在埃兰德的举荐下，帕尔梅在此次大选中，作为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当选为国会上院议员，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从此开始了职业政治家的生涯。这是埃兰德首相为他设计的重要一步，是帕尔梅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

进入议会后参加的第一个战役便是《附加养老金方案》的辩论，帕尔梅在议会的精彩发言，更使他一鸣惊人。

埃兰德对他这个宠爱的属下和学生信任有加，常常委以重任。他在回忆录里承认：“帕尔梅（和我）一起负责全党意识形态工作”，制订扩大公共部门的计划，将汉松的“人民之家”推进到“健壮社会”。

1958年埃兰德扩大首相府工作班子，又吸收了一批政坛新秀，英瓦尔·卡尔松，即后来接替帕尔梅任首相的那位副首相，便是其中之一。卡尔松其貌不扬，漫画家构画他的漫画时最容易掌握他的特点，因为他的脸狭长，额头略宽，下巴有点向前翘，当有人要攻击他时，便以一幅夸张了的大皮靴的鞋

底漫画来代表卡尔松。在埃兰德班子内部，帕尔梅和卡尔松等亲密无间，外界将这个工作班子里的年轻人通称为“埃兰德的孩子们。”

工作时首相在办公室里不停的来回走动，经常是光着脚，袖子卷得高高的，边走边说，抛出自己的想法，工作班子里的“孩子们”将埃兰德表述的每个字逐一记下，然后进行讨论。帕尔梅是这个班子里的佼佼者，有些年轻人虽不甘服输，但也只能望其项背。此时此刻的帕尔梅不想继续充当“埃兰德的影子”了，正如他自己所说，他要“独立处理事务”了。而恩师埃兰德对他也另有安排，他要给这匹千里马提供更广阔的天地，任其在政治舞台上驰骋。

埃兰德不但扩大了个人办事班子，而且班子里的人个个加官进爵，帕尔梅、卡尔松便享受副部级待遇。党内、党外对此举不无非议。埃兰德对这些异议置若罔闻。但是当韦纳尔斯特罗姆间谍案事发后，埃兰德便借题发挥，抓住不放，强调此案暴露出的问题，正是首相府与各部委之间联系渠道不通所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韦纳尔斯特罗姆案件为埃兰德的决定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韦纳尔斯特罗姆是瑞典空军一级上校（即四星上校，因瑞典为减少将军人数，不设准将），曾任瑞典驻美国使馆空军武官，但据说被前苏联克格勃收买，向前苏联出售了许多机密情报。离任回国后在总参谋部任职，后又调到瑞典外交部裁军司工作。在此期间他继续向前苏联出售情报。他在家中豪华住宅顶层的卧室里安装了精密的无线电收发报机。一天，他家女佣打扫卫生时无意中发现收发报机、引起怀疑，但未报案。SAPO（秘密警察局）也早已怀疑上校对祖国不忠，便将女佣召来询问，韦纳尔斯特罗姆间谍案这才东窗事发。女佣说她早就想到警察局告发，但在斯德哥尔摩市电话簿上查不到秘密警察局的电话号码。秘密警察局从此在斯德哥尔摩市的电话簿上设了一个电话，这个电话安排有秘密警察日夜值班，随时希望再有哪位女佣或其他什么人来检举自己的主人或值得怀疑的人。

这是瑞典军方一件不光彩的事。本世纪20年代以后，50年代以前，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国家不少人士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同情或支持苏联，向苏联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但是50年代以后，前苏联的克格勃主要是用金钱和美色来获取情报。瑞典高级军官的薪饷已很丰厚，但仍为金钱而于此勾当，着实使瑞典军方难堪。不过，瑞典秘密警察局也不是世外桃源，后来也发生了类似丑闻。秘密警察局一个专门负责与总参谋部联系的警官叫斯蒂格·贝里林，也是为了金钱当了前苏联间谍。败露后他想逃往苏联，但犯了一个错误，半路上被抓了回来。这不是瑞典秘密警察局的功劳：贝里林逃跑时摆了个迷魂阵，企图绕道以色列去莫斯科，谁料在特拉维夫机场被世界上最杰出的情报机关——以色列的摩沙迪逮捕，未等瑞典提出引渡要求，摩沙迪已将贝里林押解到斯德哥尔摩。贝里林也被判处无期徒刑（瑞典对向苏联出售情报的人决不轻饶！），但贝里林后来越狱，又逃到苏联。

1963年6月20日晨，韦纳尔斯特罗姆上校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后被判无期徒刑（瑞典取消死刑，无期徒刑是最重的刑罚）。

四年前，秘密警察局曾通报国防大臣斯文·安德松，告知韦纳尔斯特罗姆有通敌之嫌。1961年春，当韦纳尔斯特罗姆调外交部裁军司工作时，秘密警察局也通知外交大臣鲁恩·约翰松：此人不可重用；1962年又通报司法大臣赫尔曼·克林和新上任的外交大臣托尔坦·尼尔松。但是唯独没有人通

报首相埃兰德。

1963年6月20日，即韦纳尔斯特罗姆上校被捕那天，埃兰德首相正与夫人在意大利度假，突然接到外交大臣尼尔松电话，称韦纳尔斯特罗姆已逮捕，请他立即回国。埃兰德赶回首都，责问有关部门为什么迟至今日才向他报告。司法大臣解释1962年他曾两次要向首相汇报，一次由于他感冒卧床不起，被迫临时取消已经定好的汇报会；另一次是首相那天太忙，也不得不改期。然而令埃兰德无法容忍的是，间谍案丑闻闹得沸沸扬扬，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唯独他还蒙在鼓里。显然首相与各部门联系渠道不畅，必须改进。埃兰德以一无所知为由推卸一切责任，并指示采取措施，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埃兰德在日记里再三提及此事，愤愤不满。1963年8月的一篇日记里说，“我的阁僚居然没有一人觉得此事有必要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无法想通，直到最后一个月也没有人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要忘掉这件事很不容易。”

埃兰德抓住此事大作文章，狠狠地批评了对他封锁消息的人；进而加强了首相办公室，即使有人觉得过分，也说不出任何意见。帕尔梅在首相办公室身兼数职，也没有人敢说这不正常。

第七章 青云直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瑞典迎来了其战后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重建战后的欧洲，一场轰轰烈烈的恢复运动在欧洲大陆兴起，国际市场上对建筑材料、原材料、机械产品等的需求日增。出口的扩大，对于以机械产品制造、木材和铁矿石加工为主的瑞典工业来说，是个极好的发展契机。加之战时对国内市场发展的某些限制取消后，国内市场迅速扩展，进一步促进了瑞典经济的发展。在 1945~1956 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 3% 以上。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公共部门的扩大，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实施提供了可能性，因而，“附加养老金”的问题便提上了社民党的议事日程。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瑞典蓝领工人退休后与白领退休工人的生活水平差距明显拉大。因为白领工人退休后，除了与蓝领工人一样享受其基本养老金外，还可以得到一份原聘用公司给予的养老金，该养老金的数额，视他（或她）在公司里工作的时间年限、贡献大小而定。社民党以此差距拉大为由，提出了“附加养老金方案”，以达到加强政府职能，扩大公共部门的目的。一场由“附加养老金方案”引起的全国性的大辩论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瑞典 50 年代重大的政治问题，是瑞典政治的分水岭”。

这场大辩论一辩就是十年，各党派、利益集团唇枪舌剑，吵得人仰马翻。埃兰德首相三次出任“附加养老金”问题研究小组主席（1947 年、1951 年和 1956 年），三次提出研究报告，但均无结果。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社民党在议会中尚不占多数（详见附表），与其联合执政的农民党又拒绝在此问题上继续合作，埃兰德是智穷力竭，几乎到了焦头烂额的地步。此时已经来到埃兰德身边的帕尔梅，不但深得埃兰德信任，而且积极参与了党内思想理论的探讨和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在解决“附加养老金”的问题上，帕尔梅不负师恩，出谋划策，力排众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个人也因此脱颖而出，一举成名。

社会民主党与“非社会主义集团”的这场辩论，不仅仅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理论问题，即加强公有制还是扩大私有制的争论，同时也是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

所谓“非社会主义集团”在当时主要指的是瑞典议会五大政党中的保守党、农民党和自由党。保守党（亦称温和联合党）成立于 1904 年，其成员主要是企业界人士，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高中级白领阶层的利益。农民党（后称中间党）成立于 1913 年，其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小企业主，主要代表农场主的利益。自由党（后称人民党）成立于 1895 年，其成员主

附表：1921~1969 年下院议席分布情况

年份	保守党	中间党	自由党	社民党	左翼社会主义党	社会主义党	共产党	总数
1921年	71	30	47	75	5	—	2	230
1922年	62	21	41	93	6	—	7	230
1925年	65	23	33	104	—	—	5	230
1929年	73	27	32	90	—	—	8	230
1933年	58	36	24	104	—	6	2	230
1937年	44	36	27	112	—	6	5	230
1941年	42	28	23	134	—	—	3	230
1945年	39	35	26	115	—	—	15	230
1949年	23	30	57	112	—	—	8	230
1953年	31	26	58	110	—	—	5	230
1957年	42	19	58	106	—	—	6	231
1958年	45	32	38	111	—	—	5	231
1961年	39	34	40	114	—	—	5	232
1965年	33	36	43	113	—	—	8	233
1969年	32	39	34	125	—	—	3	233

要是自由职业者、职员和知识分子，代表各个层次的白领工人的利益。

“非社会主义集团”一词是相对于“社会主义集团”而提出的。而“社会主义集团”就是指社民党和共产党。社民党全称是瑞典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于1889年，其主要成份为产业工人和其他蓝领工人、普通职员。共产党（亦称左翼党）成立于1917年，原是社民党的左翼和社民党青年联盟成员，后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组成社会民主左翼党，1921年更名为共产党。尽管该党被视为“社会主义集团”的一员，但从未参加过执政。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时联合政府”，共产党也没有被邀请加入。

与社民党长期合作，联合组阁的，则是农民党。1932年社民党上台执政后，制定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主要手段、以全面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反危机纲领。为了取得在议会的多数支持，汉松政府坚持与其他政党合作的方针，以巩固社民党的统治地位。1933年5月27日，汉松代表社民党同农民党达成协议：政府保证农民的利益，支持农民党关于农产品价格的要求，给农场以补贴，限制国外农产品进口等；农民党则支持政府的反危机纲领。该协议开创了社民党和农民党合作的先河，也是社民党阶级合作路线——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妥协与合作的最初结果。1936~1939年社民党与农民党联合组阁。1951年，埃兰德与农民党党魁海德隆德就农产品价格问题达成一致，再次实现两党联合组阁。人们曾将社民党与农民党的联合组阁，称之为“红绿联合政府”。如今，这一联合出现了危机。

“非社会主义集团”对形势的估计是：战后瑞典经济飞速发展，国民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世界各国除瑞士可与其媲美外，无一出其右。经济状况的变化已经带来了社会阶级结构和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贫困已经消灭，白领阶层壮大了，人们富了，都成了“小小资本家”，因而赞成私有化的人也多了。他们将反对社民党政府高税收的政策，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让政府将他们口袋里的钱，转移到政府手中扩大公共部分。因此，

几个反对党便认为时机已到，可以与社民党一决雌雄了，他们遂放弃了以往的协商妥协的做法，在“附加养老金”问题上寸步不让，企图借此次大辩论，从理论上击败社民党，并把社民党拉下马，夺回阔别已久的政权。

“非社会主义集团”主张，瑞典已经消灭贫困，此后应鼓励人们积蓄。积蓄起来的钱由个人处理，用于防老、安度晚年也好，留给后代也行。自己口袋里的钱是高质量生活的最好保证。自由党党魁奥赫林指责社民党在人民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还要继续扩大公共部分，是搞社会主义，“他们要更加社会主义化，我们则要更加自由化，”奥赫林这样概括双方观点对立的焦点所在。

保守党论点与自由党相似，只是提法不同而已。保守党提出的是要保障“所有权的民主”：国民收入增加，每人都拥有一笔资金。个人除享受国家提供的“基本保障”外，应该有权用自己积攒下来的钱改善生活，如购买住房、休闲小屋、游艇、汽车，或做点买卖，或炒点股票。买了瑞典某家公司的股票，个人就成了社会资本构成中的一份子，就可能成为资本家，应该鼓励个人走此发家致富道路。

保守党也像自由党一样，主张政府只对个人提供基本保障，除此之外不能再提供任何保障措施，包括附加养老金等。“归根到底是要有一个基本养老金，即国家给的养老金。养老金已经提高，可以有把握地说，这笔养老金足够每人购买绝大部分的生活必需品。应该鼓励个人在享受基本养老金的同时，选择他们自己安度晚年的安全措施，这包括集体合同、工作合同、自愿保险、传统的养老金以及新型的养老金等。”允许他们有选择的自由。“社会为公民组织基本的互助保险系统，公民自己可通过自由的合作来建设附加的保护措施，可单枪匹马按自己意愿和需要建立起附加的保护措施。”

保守党竭力反对社民党政府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不遗余力地阻止社民党政府扩大公共部分。”我们主张缩小中央和地方政府处理公民收入的权力……保守党是减税党。‘附加养老金’是将数万亿克朗从工人和工厂企业主手中移到政府手中，”保守党主席雅尔·伊尔姆松说。

农民党虽与社民党联合执政，但也同意保守党、自由党观点。尤其是由于瑞典从事农业的人越来越少，该党正将党名改为“中间党”，言其不左不右是也，就更不能支持社民党的“附加养老金方案”。农民党认为国家、个人富裕后，公共部门应该减少，不能扩大。国家富裕后，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形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持续繁荣和个人自由呢？答案是一个由无数小资产拥有者组成的社会最佳，既能抵御大工业对个人的压迫，又能抗击社会主义对个人的压迫。因而应该鼓励小型私营企业的发展。50年代生活水平提高很快，但赋税增加更快，这个趋势必须制止，国家创造的财富应更多地掌握在个人手中。“公民的基本保障应通过社会福利政策加以保证。这个基本保障由全国养老金制度解决，此外公共部门不应再设附加养老金。每个公民在享受基本保障的同时，应有决定如何提高经济保险系数的自由，”农民党的议会提案说。农民党主席海德隆德并说社民党的“附加养老金方案”是“从后门将瑞典推向社会主义”。

在政府作用上，保守党、自由党、农民党观点一致，或十分相近，即政府有义务向公民提供基本保障，以防不时之需，如疾病、意外事故、失业、年迈等等，除此之外，个人应该能够自由地支配他们不断增加的收入。个人钱多了，加强社会福利措施的必要性就应缩小；国家富裕了，政府掌握的国

民收入的比例就应减少。

作为理论上对反对党的回答，社民党发表了名为《前进的政策》的小册子，由埃兰德在议会宣读后广为散发。帕尔梅这时协助埃兰德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本宣传小册子形成过程中，帕尔梅倾注了他满腔的激情和心血。《前进的政策》主要论点是：水涨船高，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是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书中说，国家富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人们的需求和希望也提高了。因而需要建设一个“健壮社会”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希望和需求。30年代人们因吃不饱穿不暖而愁眉苦脸。今天社会变了，国家富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但他们仍有理由感到不满足，年轻人得不到自己理想的住房而不满，残疾人因经济问题没有解决而不满，新的不满取代了旧的不满。

“……现在的不满与过去产生劳工运动时的不满完全不同……依我之见，这是期望值提高后的不满。全面就业、社会福利安全网、生活水平年复一年提高，所有这些铸成了对未来的信心，同时也带来急躁情绪，觉得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还应更快些……”为满足人们对交通、医疗卫生、住房、教育等不断增长的需求，政府应加强而不是削弱它的经济职能。

埃兰德进而指名道姓批驳保守党观点，“保守党主张用国民收入的25%作为公共开支，‘不能少也不能再多’，这是极不合理的。全面就业加快了前进步伐，但要求和期望也提高了，个人和社会需要平衡……我们不能满足所有愿望，肯定会有许多不满，但这不满与以前的不满完全不同，正像我已说过，这是期望大高而造成的不满，这种不满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问题，恰恰相反，人民的不满足和对未来的憧憬，正是推动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大动力。”

社民党的结论是：广泛而充分的社会保障和经济繁荣、丝毫没有减低政府干预的重要性，相反，人们在新福利社会中期望越来越高，只有国家才能满足。50年代的瑞典人不再为穷困和失业而怨声载道；而是为没有足够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没有住进更宽敞的房子，没有享受更好的医疗条件而牢骚满腹。只有国家发挥新的、更大的作用，才能满足这些愿望。

社民党不能同意政府只需向人民提供一个基本安全网就行的观点。“我们大家都同意，老年人应该有个合理的基本保护……然而奇怪的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起来再往前迈进一步呢？为什么不能给老年人一个附加养老金呢？如果我们提供的、人人都能够享受的基本保护，保证人人可以转业改行，或去别的地方、别的公司工作，无后顾之忧，不必担心退休后的养老金岂不更好？”人民群众再也不满足就业和基本安全网的保护了，“要问为什么吗？因为在我们这个全面就业的社会里，人们需要享受一种比我们业已达到的生活水平更高的安全网。政府要提供这个保护，这是政府在新条件下的社会福利政策，富裕的瑞典能够采取这一步骤。”埃兰德首相向大家保证说，“在目前全国基本养老金的基础上，再实施一项附加养老金，以补充根据现代原则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有的其余部分，瑞典经济要做到这一点是游刃有余的。”

1955年6月，埃兰德在夏天休假季节开始之前，邀请各党党魁和工会、雇主联合会等有关方面头目来哈普松官邸再作磋商，企图达成折衷方案。他让社会事务部大臣作主要发言，让帕尔梅作记录。但结果依然使他沮丧，失望。时至1957年“附加养老金”问题仍旧毫无进展，埃兰德几乎到了山穷水尽地步。农民党坚持要求就此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这就意味着社民党定要失

败，因为社民党在历届大选中，除 1941 年大选外，得票率总徘徊在 45% 左右，从未取得绝对多数。埃兰德智穷力竭了。一个星期五下午，他精神憔悴，“踉踉跄跄地回哈普松”。但离开办公室前叮嘱帕尔梅再通盘考虑一下，提几个行动方案供他参考。帕尔梅又顾不上周末休息了（那时他和妻子还是新婚燕尔呢），他干了一个通宵，将草拟的文件赶紧送埃兰德一阅。谁料埃兰德读后兴奋不已，星期一上班时“满面春风，神采奕奕”，“像只长生鸟”，完全换了个人似的。埃兰德决定迎接挑战，同意举行公民投票。帕尔梅将问题的核心概括得非常准确，各种对策合理可取，对每个方案成败的可能性及其后果分析得十分透彻，埃兰德受到很大启发，在帕尔梅建议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作战方案，具体说来就是利用反对党之间的细微差别、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首先察觉埃兰德意图的，是他的好友、农民党党魁海德隆德。海德隆德在其自传里对此作了详细记载，埃兰德在自己的日记中将这一内容摘录下来：

政府大臣每天在政府大楼的小餐厅里吃午饭，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在首都的大臣都要前来参加午餐会。午餐桌上是大臣们沟通情况的场所。但更多的是大家说说笑话或讲个趣闻。维格福斯掌故最多，他退休前几乎总是午餐会上的主角，大家也乐意听他讲。但有时大臣们也提出一些不会引起争论的任命，或某位大臣自己职权范围内可以决定、但需通报其同事的小事。

事情发生在 1957 年 5 月（实际是 3 月，这里显然是笔误）一个星期四非常普通的午餐会上。午餐像往常一样从 1 点到 2 点。也像往常一样，古纳·海德隆德又迟到了——下午 1 点半他才步履蹒跚地走了进来，阴沉着脸，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每人都有自己固定的座位），服务员端上饭菜和一杯牛奶。

10 分钟后公务员部大臣西加德·林德霍尔姆起身告退，说他下午 2 点有个客人，他要先去准备一下谈话内容。

“行啊，你走吧，”埃兰德说。“不过你走之前……你们哪位有什么话要说的？”

“我有，”海德隆德说。“我有件小事。”

“你坐下，林德霍尔姆，让我们一起听听。”埃兰德说。

“是这样，”海德隆德说。“我想问一下公民投票的法律程序……”

“哦，”埃兰德开始坐立不安了。“有什么问题吗？”

“我在想一件事，”海德隆德说。“听说每个付诸公民表决的动议需在上下两院取得三分之一加一的票数方可通过，是真的吗？”

司法大臣海尔曼·泽特贝里点了点头，表示确有此事。“那么交公民表决的问题由谁来写呢？”海德隆德又问。“我一直在思考这问题。”

沉默片刻。泽特贝里说，“由要求交公民表决的人来写。”

“噢，”海德隆德说。“我在想……”

“你在想什么呢？”埃兰德沉不住气了。“这难道不对吗？”

“他们如果获得上下两院三分之一加一票，”海德隆德继续说，“他们要将自己动议交公民表决，但认为动议措辞不当，要求修改……这样做可以吗？”

泽特贝里点了点头，表示可以。

又是沉默。

“如果有些议员改变主意，又获得其他议员支持，在上下两院票数已达三分之一加一票，他们要求将自己意见交公民表决，并要自己措辞，那么全民表决的问题就可能有好几

个了。”

“什一么？”埃兰德几乎喊了起来。“这是行不通的，对吗？不过这个问题还得仔细考虑考虑。”

整个问题暂时搁下。泽特贝里通知国会，交公民表决的问题尚未准备就绪。保守党、自由党火冒三丈，因为他们强烈要求换个表决方法，公民只要对“附加养老金”表示支持或反对即可。

这个插曲显示出海德隆德何等精明。他立即看出表决战略的奇妙之处，也看出它的含意和结果。海德隆德搞过法律工作，不难看穿社民党的雕虫小技。结果交付公民表决的提案共有三个。第一个是社民党的、并得到共产党和工会支持的议案：普遍地、强制性地为雇员提供附加养老金，并志愿地为劳动大军中其他人员提供保障；第二个是农民党的议案：志愿地为各类雇员提供保障；第三个是保守党的，得到自由党和瑞典雇主协会和白领工人工会支持的议案：附加养老金要在自愿基础上由劳资双方谈判解决。

1957年10月举行公民投票。参加投票的人数占选民总数的72.4%，投票结果是没有结果，而每个党又都对表决结果满意，都认为是自己的胜利：

第一案	45.8 %
第二案	15%
第三案	35.3%
废票	3.9%

每个党都宣称自己是公民表决的胜者。社民党说它的提案获得最多选民的支持；农民党说它选民的支持率已从1956年大选的9.4%猛增到15%；保守党、自由党说公民投票结果是它们“非社会主义集团”战胜了“社会主义集团”，以志愿为基础的附加养老金方案获绝对多数！

“红绿联合政府”无法继续存在。保守党、自由党试图拉农民党一起组织联合政府，但被海德隆德拒绝，因为他不希望选民将其不左不右的中间党，看成是忽左忽右的跳梁小丑，同时他也不愿意如此迅速地背叛老朋友埃兰德。

而社民党政府提案最终难免在下院被否决，政府宣布解散，1958年6月举行大选。

在此次大选中，帕尔梅以斯摩兰的议员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成功，进入全国议会上院，成为当时议会里最年轻的议员。此次当选，除帕尔梅个人的努力外，埃兰德亲自出马是一决定性因素。

1957年6月，埃兰德给自己的挚友、斯摩兰地区最有影响的社民党人埃里克·弗斯特写了封亲笔信，要弗斯特在当地上院议员换届选举时，给帕尔梅安排个席位。信中说：

“几年来他一直担任我的秘书，他对我、对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他政治上的敏锐是我在其他人身上一从未见到过的，虽然我跟许多非常敏锐的人共过事……我认为，他如进入议会，成为社民党议会党团中的一员，对我党是极其宝贵的。我还认为帕尔梅最好投身政治，而不是走公务员道路。当然他走公务员道路的话也会获得成功的，但是他在政治领域显然有特殊的天赋。”

帕尔梅进入议会后，就从后台走到前台，为议会通过附加养老金法案而冲锋陷阵。

在议会辩论中，帕尔梅十分活跃，十分突出。社民党“健壮社会”的原则是他协助埃兰德制订的，内容非常熟悉，他不用讲稿便能站着说上几个小时。

“今天的年轻一代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失业，他们是在全面就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是在生活水准和社会经济安全保障水平不断提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将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们因此而比他们的前辈享受更大的自由——更自由地选择如何组织他们生活的方式……说来似乎奇怪，年轻人享受这个自由时，也为未来的开支，为长远的开支承担了更大的义务。年轻人通过购房、学习、组织家庭、买车，以及购买其它许许多多人们习惯用分期付款方式添置的耐用消费品而承担了义务。这些人如果收入突然下降，这对他们就是灾难，他们就将此视为真正的贫困，即使他家——不论是他家还是她家——还能买得起面包。建立一个结实的安全网，这话听起来不错，然而如果这个安全网只是意味着每月拿 300 克朗，这在斯德哥尔摩之类城市里生活，就是微不足道的区区小钱了。我们完全现代化的社会福利政策是要在安全网之外再加一附加养老金，使每人收入不会突然下降，保证每个人维持适当的生活水平。提供一个安全网，一个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这是 30 年代解决的问题，维持我们新的生活水准是 50 年代的任务，”帕尔梅说到这里，看见坐着的保守党党魁伊尔姆松，就情不自禁地要讽刺挖苦他几句。

“保守党 30 年代错过了修造安全网的机会，”帕尔梅说。“现在他们大谈安全网了，然而当他们奢谈安全网时，殊不知他们又第二次落后于时代，他们不明白，今天的政府应有责任保证人人享受正常的经济条件，保证人人能够保持很高生活水平，即使到了晚年也是如此。当然对保守党人来说，落后 20 年已算不坏了。”

帕尔梅这篇演讲顿时使他名扬全国，传播媒介对他作了突出报道。总工会机关报驻议会记者奥盖·马尔姆斯特罗姆像发现宝贝似的写道，“人们见到一位年轻人，整个议会里最年轻者，仅 31 岁，以清脆的声音和清新的语言，向人们唱出了他这一代人的心声。”自这天起，人人都意识到政坛上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新星。埃兰德更是为自己发现这匹千里马而高兴，说帕尔梅是“自维格福斯以来我们希望有的天赋最高的人才”。

然而 1959 年春，当社民党提案在下院表决时，又出现了非常微妙的形势。

社民党在 1958 年大选中议席有所增加，从 106 席上升到 111 席，加上共产党 5 席，共 116 席，在 231 个议席中，“社会主义集团”正好以一票优势超过半数。但由于议长是社民党人，议长不得投票，所以“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两个集团正好旗鼓相当，完全势均力敌，115：115！每个议员手中的一票都有千钧之力。

1959 年 5 月 13 日表决那天，各个党派都要求该党的每个议员必须到场出席，在国外出差的立即赶回，因病住院的赶快出院，即使卧床不起，也得想方设法、坐轮椅或者用担架抬进会场。万一表决结果是 115：115，平局，那又将如何处理呢？有人不禁要问。但是，宪法或任何法律对此都未作过规定。不过，社民党对此并不担心，他们胸有成竹，相信不会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

原来，社民党在下面早已做好了工作。自由党议员中有一位来自哥德堡的代表，叫杜尔·彻尼格松，是地地道道的工人出身。社民党为了争取彻尼

格松站到自己这一方面未，作了大量的“策反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了他。投票前，他宣布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投票反对自己的工友，他将在“附加养老金”议案表决时投弃权票。自由党中央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大为震惊，忙对彻尼格松进行批评、训斥，指责他背叛了自己的选民，违反了民主原则，令他改弦易辙。但彻尼格松主意已定，拒不收回意见。5月13日表决之前，他又作了简短发言，重申自己的立场，并为自己申辩。埃兰德、帕尔梅一面听，一面紧握拳头，作加油状，非常激动地鼓励他继续往下说。社民党议案就这样以115票：114票通过了，一场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斗争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

50年代另外一场大的斗争，是关于瑞典要不要搞核武器的辩论。这场斗争主要在社民党内进行，几乎导致社民党分裂。只是由于帕尔梅娴熟的政治斗争技巧，既维护了社民党中央的决定，又平息了党内分歧，渡过了危机。

瑞典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了很大发展，其空军的实力在二战结束时居世界第5位。瑞典博福斯军工厂是世界著名军工企业。瑞典无疑是北欧的军事大国。

50年代核武器在国际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核武器成了大国地位象征。英国从美国买了几颗原子弹，就算拥有参加“世界核俱乐部”的入场卷，是“核大国”了。

1954年秋，瑞典三军总司令不知是出于政治战略需要，还是出于军事战略考虑，向政府提议研制核武器。是年11月23日政府召开会议对此专门研究，与会大臣或表示支持，或暂且观望，但无一反对。

不管部大臣乌拉·林德斯特罗姆（女）没有参加会议，但在瑞典妇女联合会主席英佳·托尔松（F.V.托尔松的儿媳）家里听到这一消息。她们坚决反对，并联合议会里所有女议员向埃兰德首相和尼尔松国防大臣陈述自己的意见。林德斯特罗姆和托尔松并强调，这不属“党务问题”，而是关系到每个人的良知，不能用党纪压人，要允许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埃兰德保证在社民党议会党团讨论决定之前不采取任何行动。

1956年2月17日社民党执委会讨论研制核武器问题，有的赞成，有的态度暧昧，但多数同意暂不公开讨论，视技术攻关情况明朗后再作定夺。托尔松夫人反对，因为妇联已经公开表示反对研制核武器，决不收回。所有执委劝她冷静，不要造成党内混乱。党内元老斯科特是竭力主张发展核武器的。他威胁说，如果妇联不计后果，一意孤行，他将反击妇联“不可理喻的宣传”。埃兰德总结时只说暂时不作决定，以后再议。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附加养老金”，请妇联不要干扰中央部署。

妇联我行我素，利用妇代会等各种机会宣传反对研制核武器，并宣称社民党如决定发展核武器，妇联“要造反”。不仅如此，妇联并鼓动社民党青年团一起反对研制核武器。团中央主席帕蒂尔·勒夫贝里紧跟社民党中央，但青年团内反对核武器的人为数众多，议会和舆论也争吵不休，辩论无法阻止。斯科特联合六位记者写了一篇份量很重的文章：《瑞典核武器？》，从政治上、战略上、技术上阐述发展核武器的必要和可能。托尔松夫人立即进行反驳：《瑞典不能发展核武器！》，与托尔松夫人一起著文发表意见的还有维格福斯、桑德勒等党内德高望重的人物。

团代会就研制核武器问题也吵得不亦乐乎，反对之声响彻会场大厅。勒夫贝里作了长篇报告，要大家紧跟社民党中央决定，不要擅自发表意见，“否

则将使团组织、党组织和全国分裂，危害国家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团代表对其报告反应冷淡，赞同的掌声稀稀落落。勒夫贝里难堪至极。

又是帕尔梅此刻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会上发表讲话，表示尊重大家反对研制核武器的意见，但目前国际形势微妙，赫鲁晓夫上台后，苏美出现缓和兆头，大家应该密切注视形势发展，瑞典是否要搞核武器需要看形势发展，现在不宜争论，而应“休战”。大会最终以微弱多数通过帕尔梅建议。

社民党中央为统一各方意见，成立了“十八人研究小组”。埃兰德自任组长，实际工作由帕尔梅主持，组员包括林德斯特罗姆、托尔松夫人、斯科德等各方面人士。研究小组于1958年11月正式开始工作。每次开会都争吵不休，意见尖锐对立。托尔松夫人有次拂袖而去。帕尔梅任务艰巨，要调和双方立场实非易事，但他终于使大家接受埃兰德定的基调，于1959年11月11日向社民党执委会提交研究小组的初步报告，结论是：“在目前情况下，绝大多数人强烈反对瑞典研制核武器。最后决定可以拖到60年代中期再作，在此之前也不可能制造核武器。在作最后决定之前，研究工作不可停止，而且研究工作还要扩大到核防护方面，建议政府向有关部门发出指示。”

瑞典那时确也不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

1960年12月14日社民党执委会采纳了研究小组报告，自由党、中间党和保守党也同意此报告内容，只是保守党要求将研究工作扩大到核武器的设计方面。

一场激烈辩论平息了。帕尔梅在党内威信蒸蒸日上。党内元老感叹不已：后生可畏。

邻国挪威社民党对美国在挪威部署核武器意见分歧，最终导致分裂，一派另组社会主义人民党。帕尔梅则使瑞典社民党避免了这种局面。帕尔梅并从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党内出现分歧时要就事论事，不能扩大，否则会增加解决矛盾的难度。

帕尔梅为社民党执委会赢得了最宝贵的东西：时间。报告发表一年半以后，瑞典不能制造核武器业已明朗，斯科德放弃自己主张，其他持相同观点的人也尾随其后。瑞典政府表示不再研制核武器，则是1968年。

瑞典曾在《核不扩散条约》上签字，但它也曾向美国、法国购买了钚，搞了两次核试爆，但试爆结果不很成功。帕尔梅后来在国际上大声疾呼反对核武器，也确实为核裁军做了不少工作。前苏联记者葛里哥里·朱柯夫和安德烈·克拉西尔涅科夫还专为他写了一本书，题目是《爱国者、斗士和人道主义者奥洛夫·帕尔梅》，歌颂他为裁军、为世界和平事业“呕心沥血”。

应该指出的是，瑞典在核防护方面确实取得巨大成就。凡看过他们地下防护工事的人无不叹为观止。瑞典的“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体系非常完整，保证所有居民在听到核袭击警报后，能及时疏散并进入地下工事。

瑞典国防研究院所属“三防研究所”是当今世界上监测地下核试验的权威机构之一，如果不是当年帕尔梅主持工作的“十八人研究小组”建议，瑞典的核防护研究和该研究所恐怕不会有今日的辉煌。如今它们又是瑞典爱好和平桂冠上的一颗引人注目的宝石。

至此，帕尔梅已在公众面前树立了自己的形象：一个在埃兰德身边不停地记录、或在埃兰德身边低声耳语几句的年轻人；一个思路敏捷，伶牙俐齿，极富演讲才能的年轻人；一个勤奋好学，不辞辛苦地加班加点工作，协助埃

兰德排忧解难的年轻人。对于帕尔梅的出色工作，埃兰德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帕尔梅始终埋头苦干，从不宣扬自己。

帕尔梅先后主持了议会三个教育小组的工作，领导调查有关学生社会状况、中等教育现状和对成人教育问题的的工作。自 60 年代起，他经常作为代表出席社会党国际和西欧国家社民党的代表大会。1961 年，他又升任内阁筹备委员会（政府办公厅）局长，并在瑞典政府国际援助局任职，主管瑞典政府的援外工作，如向第三世界的贷款、赠款等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该机构后称瑞典国际开发署。

1963 年，帕尔梅被任命为咨询内阁成员（相当于不管部大臣），这仅仅是职务上的提升，而帕尔梅担当的工作并无大的变化，仍然是协助埃兰德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和青年工作。显然，帕尔梅此时已谙熟社民党的真谛，是一个成熟的社民党人了。1964 年，在社民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帕尔梅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机构。

1965 年，帕尔梅又官升一级，被任命为交通大臣。埃兰德早已年逾花甲，开始考虑解甲归田了。他有意让位给帕尔梅，任命其为交通大臣，就是加快这一接班步骤。

帕尔梅接任交通大臣不久，便实施瑞典交通规则的改革。

瑞典自 1734 年起车辆一律靠左行驶，而斯堪的那维亚邻国，如丹麦、挪威、芬兰以及欧洲大陆国家均为右行，瑞典人一出国界便得改变行车方向，很不习惯。帕尔梅纳闷，老祖宗当年规定车辆左行时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50 年代以前不改尚可，60 年代以后瑞典车辆多了，（人均世界第一），瑞典人驾车出国的人越来越多，这条沿用了二百多年的规则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

1965 年 9 月 3 日清晨 5 时起，瑞典车辆一律改为右行。政府为此项改革耗资 6 亿克朗。

这天早上帕尔梅亲自披挂上阵。他组织 8000 名警察、部队官兵和 1.9 万名志愿人员上街指挥交通。

原估计开始会发生一些严重交通事故，但由于宣传工作做得好，组织工作有序，事故反而比改革前减少。改革后头十四天，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 284 起，死亡 16 人，大大低于改革前的交通伤亡事故比率。死人当然不是好事，但交通事故在所难免。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已大大超过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的总和。要改变人们多年养成的习惯实非易事，瑞典这次交通改革绝对是成功的，从中可以想象出帕尔梅及其领导的交通部为此付出了多少心血。这是帕尔梅一生中的一个伟大成就，应该名垂青史，就连帕尔梅的政敌也承认，“这是帕尔梅对瑞典生活作出的唯一真正的、永恒的政治贡献。”

帕尔梅虽为大臣，但事必躬亲，坚持深入第一线，深入群众。他也因此被人称颂，人们有问题也找他解决。

有天夜里 3 时，帕尔梅被电话铃声叫醒。

“你是交通大臣帕尔梅吗？”

“我就是，”帕尔梅梦梦懵懵回答。

“从埃斯洛夫去洛玛的下一班火车是他妈的什么时候开？”

帕尔梅哭笑不得。担任交通大臣和教育大臣期间，他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一直留在斯德哥尔摩市的公共电话簿上，甚至当首相后的一段时间

里，在电话簿上仍可找到他的名字和电话。在家里经常接到各种人打来的电话。对于类似这种惹人恼火的电话，他已经习以为常，从不发火，当政客是要有这点修养的。

但帕尔梅是个“有争议人物”，有人说好，有人说坏，甚至有人认为他大逆不道，违背瑞典古训。这从他第一次在议会发表演讲就埋下了种子——恶语伤人誓不休啊，谁叫你出言不逊呢。

在一片赞扬声中，他也经常受到攻击。

为宣传新交通法，他拍了一张照片刊登在报刊上：帕尔梅站在轿车旁向交警作指示，轿车停在马路右侧。他的政敌则反其意而用之，说这张照片证明交通大臣违反交通规则，知法违法，交通警察要他罚款！

又有一次，政敌指责他违反交通规则，而且狂妄自大，滥用职权。

1967年8月的一天，他邀请埃兰德首相去佛乐岛的休闲小屋小住数日。他和首相驾车同往，但在公路上被一列军车车队拦阻。帕尔梅要赶渡船，心急如焚，据说他这次发火了，将身子探出车外喊：“我是交通大臣，现在听我指挥。”车队让开以后，他夺路而去。

轩然大波由此而起。政敌控告帕尔梅无视军队“停止通行”的路标，违反了交通规则。帕尔梅后来去部队探望，政敌又火上加油，说他公然对战士说：“尽管有你们指挥官在场，但还是由我来负责。”帕尔梅否认说过此话。检察官见双方各执一词，尽管事出有因，但查无实据，不予起诉。帕尔梅对电台记者说他是无辜的，确实没有做过滥用职权的事。并邀请记者去佛乐岛，用他儿子的玩具排演路上发生的情况。

这年暑假结束后，帕尔梅又出任教会与教育大臣，兼管电台与电视台。像在交通部一样，他非常勤政，教育部官员都觉得他平易近人，可敬可亲。他主张学校是教书育人、培养合格公民的基地，不可成为“贵族社会和竞争社会的堡垒”。

在帕尔梅任职的两年期间，可以说政绩卓著。其一，是教育改革。1968年瑞典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根本性改革，将当时存在的各种中等学校合并成一种新型的普通高中，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延续。瑞典把高中教育视为整个教育系列中最关键的一环。根据瑞典教育法，高中教育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于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年轻人来说，如何使他们继续发展，逐步进入成人社会，是一个转折。而高中教育，就是要使学生为今后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为从事未来的职业，为当一名合格的公民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实行这种改革的目的是为了使书本知识与实践更好地结合，使每个学生都能达到进入高等院校学习的基本要求，同时又能适应就业的需要，成为既能动脑，又能动手的人材。

当然，1968年只是改革的开始，其成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这一步的迈出却是决定性的。在此之前，瑞典和许多国家一样，在高中教育中分成普通高中和职业中学。普通高中是专门为培养进入高等院校的学生而设置的所谓“大学预科”，侧重于基础理论的学习，学期较长。而职业中学，则是以就业为目标，以实际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短期训练。打破这种二元性的教育体制，实行整体的综合义务教育制，对提高瑞典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提高国民素质，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而伴随着这一改革同时起步的，还有成人教育。自60年代以来，瑞典议会通过了若干与成人教育有关的法案，1967年确立成人教育的目标是：缩

小社会教育差别，为人们补充知识、提高工作能力提供机会。成人教育的发展，为提高大众的教育水平，为适应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更新知识，提高劳动技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二，是净化电台与电视台。瑞典明文规定，电台与电视台不得接受任何个人或公司的赞助，不得刊登广告，不得放映含有暴力内容影片。至于色情影片嘛，帕尔梅认为性爱和情爱是人的本性，无可厚非，影片里有些色情内容也无伤大雅，但不能太暴露，因而有关部门有一些具体的实施建议，没有作出文字的硬性规定。事实上，帕尔梅被一些人视为瑞典 60 年代性解放的旗手之一，有两个摇滚乐队居然以帕尔梅的名字命名他们的乐队，双方并为这一名称争得难解难分。一些古板的人也因此指责帕尔梅，要他下台。

瑞典电视台的节目相对来讲乏味枯燥，缺乏生气，与当时德国、法国、英国电视台无法相比。英国当时最著名的电视评论员大卫·弗格斯特曾俏皮地说，他想象中的地狱，是“一个说荷兰话，吃英国饭，看瑞典电视，加上德国警察和俄国政客的地方。”

帕尔梅在 60 年代后期成功地解决了瑞典的学潮问题，可以说是其政绩之三。由于他在处理该问题的过程中，以及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抗议活动中，出尽了风头，得到了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拥护，对其日后的政治生涯不无影响。

帕尔梅从 1951 年到 1961 年先后主持全国学联和青年团工作，对青年问题十分熟悉，他也被不少青年看作是表率，是偶像。

然而，平息学潮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有些学生高喊当了教育大臣的帕尔梅是青年的叛徒、学生敌人的情况下，能顺顺当当地解决学潮，更是不易。大概也正是因为如此，埃兰德认为帕尔梅成熟了，可以担当重任了。

60 年代后期的学潮席卷西方各国。法国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险些把戴高乐政权颠覆；联邦德国学生在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下，使许多大学陷于瘫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不满校方管理，群起攻击教育制度，他们占领图书馆，袭击校长办公室；意大利许多城市大学生，要求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计划，参加学校管理，他们批判传统的旧大学，要求创立新型的大学；美国学生开始“自我教育”，把校长、教授轰出校门。瑞典学生当然不甘落后，也纷纷将学校占领。

这场声势浩大的学潮来得看似突然，其实有其必然原因，它反映了学生、工人和广大群众“对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不满和对社会现实的厌恶”。学潮在各国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从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的各国学生高喊的口号中，从他们手执的标语横幅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主要有二，一是强烈要求改革教育制度，一是谴责美国侵略越南战争。学潮的起因很多，但主要原因还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对美国越战。

1968 年 5 月的一天夜里，帕尔梅在熟睡中又被电话铃声吵醒。这次是警察局长打来的。斯德哥尔摩几个大学学生把学校占领了，他准备带领警察冲进校园“恢复秩序”。帕尔梅一听几乎骂他是蠢猪。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威望何等之高，但因当局对学潮处置失当，激化矛盾，结果使将军狼狈不堪，几乎下台。帕尔梅制止了警察行动，立即赶赴学校、与学生对话。他耐心听取学生意见，采取具体问题具体解决策略，成功地将学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避免了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紧张局面。当然瑞典学潮规模和强化程度，也远不能与法国等学潮同日而语。

帕尔梅曾经是学生领袖，并且也习惯于在学生中充当领袖，但此时不少学生已将他视为统治集团一员，而不再是他们往日的学联主席。他也能“礼贤下士”，丝毫不敢怠慢学生。学校里贴满了反对他的标语：“帕尔梅的讲话是扯蛋！”“每个人都有笑的权利，”等等。学生指责他背叛工人阶级利益，揭露他执行的教育制度，实质上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学生说，资本家为追求高额利润而千方百计强化生产，同时引诱人们大量消费，从而使每个人都身不由己地、而且是不知不觉地、毫无痛苦地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机件。整个社会淹没在单纯的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之中，而置其他问题于不顾。学校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它所需要的活的工具的工厂，学生成了从属于学校物化关系的商品。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再被社会所重视。大学原有的继承发扬和整理批判文化遗产的作用，现已逐渐消失。

帕尔梅对谩骂他的语言不仅没有生气，还耐心听取学生的意见，虽未说学生“造反有理”（那时中国“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造反有理”口号几乎为每个西方学生所熟知），但他确实承认“学生左翼造反行动毕竟有些道理”。他还说：“当年轻人环顾四周时，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们看到的是（人类）为登上月球而作出巨大努力，同时他们看到广大人民群众食不果腹。他们经历了如此巨大矛盾，视此为道德问题。他们并不反对民主，他们只是感到（民主）不可信任，因为民主未能解决这种矛盾。”学生生气了，学潮也就渐渐平息了。不仅如此，帕尔梅还利用学潮的解决来宣扬西方民主，指责社会主义国家“独裁”；并利用学潮造成的激进政治气氛，在议会迫使“非社会主义集团”同意社民党的改良方案。

与上述政绩相比，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可以说是帕尔梅一生中最辉煌的一章。此举不仅使他在国内赢得许多政治资本，特别是赢得瑞典千百万青年的拥护，同时也使他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赢得许多朋友。他一下成了名闻遐迩的国际风云人物。当然，瑞典保守党以及许多与美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政党、财团，对帕尔梅胆敢冒犯美国而大为震惊，一再对他进行攻击。这也是帕尔梅成为瑞典当代历史上“有争议人物”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瑞典政府对美国侵越战争素有不同看法，但从未有人公开表态。1965年8月5日美国制造所谓“东京湾事件”，悍然扩大侵越战争。是年秋，社民党在耶夫勒市召开一个大会，帕尔梅在会上发言，温和地批评了美国，引来美国极大不满和瑞典国内亲美派势力的猛烈攻击。这，都在预料之中，不足为奇。帕尔梅的讲话稿事先经埃兰德首相审阅。瑞典政府也只是以此试探各方反应而已。

随着美国侵越战争升级，数以千万计越南人民惨死在美国狂轰滥炸之下，世界人民，包括美国和西方国家人民反对美国暴行的呼声越来越高，美国青年、妇女几乎每天上街示威游行，高声责问“伦敦·约翰逊，今天你又杀了多少人？”“约翰逊，今天你又杀死多少越南孩子？！”西欧国家人民群众遥相呼应，反战之声一浪高似一浪，震耳欲聋。瑞典人在这方面当然更不会落在各国后面。反战游行连续不断。

帕尔梅自1965年后未公开发表批评美国的言论。1968年2月21日，他参加“瑞典（支援）越南委员会”组织的反对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火炬游行。六千人的庞大游行队伍穿过斯德哥尔摩的主要街道，声势着实不小。帕尔梅身穿大衣，头戴皮帽，顶着寒风，与越南驻苏联大使并肩走在队伍最前

列，边走边呼口号（瑞典此时与越南尚无正式外交关系）。到了市中心的塞格尔广场，帕尔梅发表了演说。他呼吁美国立即停止轰炸越南北方，承认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越南谈判，结束战争。“民主的目标永远不能用压迫的方法达到，”他说。“你不能用消灭一个村庄——烧毁田园、摧毁住房、捆绑村民或索性将他们斩尽杀绝的方法来拯救这个村庄。当我们考虑越南战争时，我们首先要认识到的就是这点。”

“三年来，投掷在北越的炸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投掷在纳粹德国的炸弹还要多。我们知道这对一个国家的破坏，对每一个人造成的苦难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感到焦急，感到绝望，寄予同情。有人会说：‘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在越南丧生了，他们是为民主理想而战的斗士。’诚然，这是很糟的事。年轻人死了，伤了，残疾了，是很可悲——他们在一场非正义战争中，为一个不值得的事业作了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很可以在自己国家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而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为消灭贫困、饥饿的斗争中作出建设性的贡献。”

帕尔梅参加的这次游行掀起轩然大波。美国 367 家报纸广泛报道，世界千万家报纸也刊载帕尔梅与越南驻苏大使手执火炬参加游行的照片。美国被激怒了。一个小国的教育大臣居然胆敢与越南驻苏联大使并肩地高举火炬一起反美，太离谱了。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官员敢于走这么远。（社会党国际直到 1972 年才开始抗议美国的侵越战争。）是该教训教训这个帕尔梅和瑞典的时候了。美国立即召回驻瑞典大使，两国外交关系顿时紧张。

帕尔梅此举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后来他作了一些解释，说他事先并不知道越南驻苏大使也参加游行，只是到了现场才看见他，但为时已晚，他已无处可避。

但帕尔梅对此后果心中十分清楚。他这样做完全符合瑞典利益，体现社民党新时代的政策，是得到埃兰德首相支持的，决不会因此而断送他的前程，相反更会使他和他的国家名利双收。

帕尔梅虽然遭到国内亲美势力的批评指责，但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无数瑞典人给他写信表示拥护赞赏他的行动。一些美国政界要人也给他发来贺电，其中有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尔布赖特参议员。

帕尔梅说：“我跟北越那个人谈了很久，他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是人，有其自豪，有其感情。他感到骄傲的是，北越社会在美国如此狂轰滥炸之下仍照常运转。然而一个小国的人民受到如此可怕的损失，他的感情会是怎样，让我们去正确理解他们。”

帕尔梅从此在国际上更进一步树立起左派政客的形象，更加积极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要活动和游行，并利用这些场合对政敌，尤其是保守党党魁 Y·霍尔姆贝里的指责进行反击。“霍尔姆贝里要我辞职，这丝毫不奇怪，这是他的职责所在，”帕尔梅说。“但是他如果因为一个外国大使被召回，而在一个外国压力下吓得惶惶不可终日，要我辞职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在首都阿兰达国际机场上给他修一个安全岛，使他坐在安全岛里观看大使们的来来往往，清点来往人数是否正确，并决定他应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是今秋大选时我们等着瞧吧，霍尔姆贝里是不会获得主持瑞典外交政策的差事的。”

反对美国侵越战争大游行后整整半年，即 1968 年 8 月 21 日，苏军开进布拉格，镇压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发动的“布拉格之春”。帕尔梅

当天在马尔默发表演说，用更强烈的言辞谴责苏联。他高喊：“人民渴望自由，这是无法用武力镇压下去的，它还会继续，直到最后取得胜利。”

帕尔梅演讲时总是喜欢两腿交叉站立，左脚放在右脚的右边，或右脚放在左脚的左侧。而这一独特的站立姿势也会引起一些人的非议。

帕尔梅力主与越南建交，给越南战场上厌战的美国逃兵以政治庇护。美国的恼怒是可想而知的，美国给瑞典施加强大压力。但瑞典拒不屈服，埃兰德首相更为帕尔梅撑腰。

已近耄耋之年的埃兰德时常觉得力不从心。是该告老还乡了。他感到欣慰的是，在他卸任之前已物色到理想的接班人，因而他可放心地过其退隐生活，写他的回忆录了。

埃兰德 1965 年便选中帕尔梅，又经几年考察，确信帕尔梅完全有能力继承他的衣钵，特别是近两年的表现说明，他是社民党新时期最合适的领导人。

1968 年大选，社民党大获全胜，有史以来第二次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和超过二分之一的议会席位（得 240 万张选票，占 50.1%，获议会 233 个议席中的 125 席）。埃兰德选举前便公开宣布，将退隐山林。

1969 年秋天，社民党举行三年一次的党代会。会议最重要的议题是遴选社民党党魁。大家已经明白，党魁人选非帕尔梅莫属。因为埃兰德亲自为他拉选票，做各方面的工作。党内唯一能与他进行一番较量的是财政大臣古纳·斯特朗德，一个老式的工会领导人。斯特朗德及其他志同道合的党内要人诋毁帕尔梅，说他在议会辩论中只顾显示其口才，到处树敌；与社民党的政党合作精神相悖。说他偏激，对经济平等强调过分，对低工资工人、妇女、残疾人照顾太多；说他过于倾向第三世界。埃兰德则把斯特朗德说得一钱不值。“斯特朗德赶不上时代发展，”埃兰德说。“姑且打个比方吧，你认为他对堕胎问题了解多少呢？”

埃兰德早就有意让位于帕尔梅。究竟什么时候他产生这个想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人们从 1965 年埃兰德的日记里看出一二。日记说：“今天午饭后同鲁恩·约翰松谈起一个老掉牙的问题，我的接班人问题……我说眼下唯一人选是他和霍尔姆奎斯特，问他有何看法。他说他们俩人对此都无兴趣，而且他们两人搞政治缺乏创造力。帕尔梅还没有完全准备就绪——还得五年吧。由斯特朗德组织个过渡政府——这是一种可能。鲁恩对此不加反对……与鲁恩的谈话使我更加相信我该辞官了，虽然不是最近。”

帕尔梅知道有恩师全力支持，他已胜券在握。早在夏天他已开始考虑组阁人选及新政府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但他表面上很平静，很谦虚，说他不敢有当首相的奢望。他对英国电视评论员大卫·弗洛斯特说，“能作为领导集团中的一员我已完全心满意足。”后来他又假惺惺地说是斯坦·安德松、英瓦尔·卡尔松竭力劝他竞选党魁一职的。安德松、卡尔松俩位邀他去北方斯托尔林度假胜地滑雪，度假期间说服他参加竞选，他才勉为其难的。

党代表大会上，斯特朗德见大势已去，宣布退出竞选，“以避免党的分裂”。帕尔梅以全票当选。他从 1953 年进首相办公室当兼职秘书起，仅用 16 年时间便登上首相宝座。是年 42 岁。

有人问过帕尔梅，埃兰德是什么时候决定让他接班的，帕尔梅回答得很

干脆：“从无此事。”是啊，一个民主社会里，党和政府领导人是大家选出来的，怎能由某人御笔亲点呢。这个问题不是问得太傻了吗？

第八章 入阁拜相

1969年秋，帕尔梅正式从埃兰德手中接过首相大印，开始主持瑞典内政外交的大政方针。

帕尔梅为求稳定，效仿恩师以前做法，组阁时原封不动地保留埃兰德的全班人马，只是增添英瓦尔·卡尔松填补他升迁后留下的教会与教育大臣的空缺，其余大臣一概留任。

“瑞典社会民主党现已面向人人平等和自由的大家庭的未来，”帕尔梅向全国发表他的就职演说，阐述他的施政纲领。“任何社民党主席的首要任务是倾听（工人）运动的声音。”他说他今后10年要达到的目标是缓解由于科技进步和自动化程度提高而带来的消极后果，要“扩大和深化瑞典社会的民主，为实现平等而努力。”换言之，他将沿着他年轻时的政治偶像埃恩斯特·维格福斯开拓的航向继续前进。殊不知瑞典社民党的“福利社会”经40年的经营，已出现许多问题。瑞典经济在70年代初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日趋剧烈的国际竞争的夹击下，发展速度缓慢，明显走向下坡，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瑞典病”的方方面面已渐渐暴露无遗，新首相非拿出新的对策不可。

帕尔梅少年得志，但此时他却故作谦逊，强调社民党的领导，个人作用微不足道。“社会民主是一场运动，从来不是，也不会允许任何个人来导演，”他说。他领导的党都将采取群众路线，将“研究党代会的辩论和决议，将深入到各个区和工会组织，听取他们的辩论”。

右翼报纸对新首相不无批评，几乎天天都有攻击他的文章，这都在预料之中。《每日新闻》是全国最大的报纸，写了一篇评论，指责帕尔梅是机会主义者，专门看风使舵，忽而把自己打扮成激进派，忽而把自己装扮成温和主义者，担心他这个上层社会出身的人，为了博得社民党的欢心和信任，有时难免表现得比社民党人更加激进。评论警告说，“这样会导致不必要的对抗。”

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诚如历史学家海德纽斯所说：“帕尔梅在对外政策上有些激进，但对内政策却是实用主义的。”

帕尔梅担任首相后，公务更加繁忙，需要考虑的问题更多了。担任首相十余年（1969~1976年；1982~1986年），生活作风几乎一切照旧，无甚变化。他和妻子丽斯贝特仍旧住在郊区瓦林比，每天仍由丽斯贝特驾车送他上班。夏天人们还看见他像以前一样，骑着自行车上街采购或散心。他仍像绝大部分瑞典人一样花钱十分谨慎。他口袋里仍旧只装些现金，从不使用信用卡。

他与寡言古板的瑞典同胞不同，作风随便自然，全无贵族痕迹。当了首相，依旧如此，从不为条条框框束缚，不装腔作势，不端架子。首相应该是个什么“架子”呢？世上有那么多首相、总理，有无标准的“架子”呢？帕尔梅似乎从未考虑过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作为首相在瑞典能像平民一样地生活，我只感到高兴。”一次他出国访问，在去阿兰达国际机场途中，车子出了故障，抛锚了。司机检查了汽车的电路、油路，找不出故障所在，急得满头大汗。帕尔梅见飞机起飞时间快到了，打开车门下车，拿出他二十年前在美国当学生练就的搭便车的本领，站到路旁，伸出右手，作出要求搭车手势。不久有个送丈夫去机场的妇女把他捎到机场。他的挚友和心腹记者迪特尔·斯特朗德有次亲眼目睹他的“狼狈样”。斯特朗德住在南郊的一幢公

寓房里。这里是典型的工人居住区。一个夏天夜晚，斯特朗德听到凉台下有人吹口哨，探出头一望，原来是首相寅夜造访！

斯特朗德还记得有一次记者招待会，帕尔梅首相迟到了。他是从佛乐岛的休闲小屋赶来的。只见他身穿恤衫、牛仔裤，手提一包替换下来待洗的衣服。妻子丽斯贝特要他将这堆衣服洗一下，并将使用洗衣机的程序写在条上，说明洗完衣服后要按逆程序——关闭洗衣机的键钮。

克莱斯·帕尔梅回忆说，有天奥洛夫·帕尔梅给他打电话，问他是否想看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田径赛。奥林匹克体育场位于斯德哥尔摩里汀屿大街的南端，是里汀屿岛进入市区的必由之路，建于本世纪初，是为迎接奥运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而建的，外面看来像个城堡，朱红砖墙黑大门，很有特色。用现代标准衡量，这个体育场显得太小、太陈旧，但使用率相当高，每年仍有不少重大赛事在这里举行。克莱斯说：“奥洛夫特别喜欢田径运动。我同意一起去，他便开着他那辆小得可怜的轿车来了，车里已经坐着体育部长思文·阿斯普林。我们都塞进小车，实在过于拥挤，坐在里面无法动弹，好不容易到了奥林匹克体育场，我们都急忙下车，舒口气，活动活动手脚。然而我们来晚了，没有停车的地方。奥洛夫突然发现体育场旁边有一小块空地，犹豫不决地对我们说：‘你们认为我可以把车停在那儿吗？’我们说：‘当然可以。’但他仍满腹孤疑，我们就一个劲劝他快去。然而，正当他要把车停到那儿时，一个大个子警察发现了，他先站正了身子，脸上露出不可侵犯的严肃神情，朝我们走了过来。看来他决心要为破坏不知哪条规则而对我们兴师问罪，进行处罚了。但是当他看见车里的人时，他的脚步变的怯生生的，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见到老师一样。奥洛夫摇下车窗玻璃，说：‘对不起，我能把车子停在这儿吗？’警察迟疑了一下，遂即敬了个礼，说：‘我将亲自看守这辆车，先生。’奥洛夫感谢他，车子停妥，锁了车门与我们一起朝入口走去。‘克莱斯，让阿斯普林走在前面，’奥洛夫对我说，‘门口收票的人都认识他，我们可以不买门票了。’”

帕尔梅在政治舞台上时刻处于战备状态，但他也是个普普通通的人，需要休息，需要松弛一下紧张的神经。他说：“总当政治家是不可能的。有时你需要休息一下，跟朋友在一起聊聊天，说说笑话，有些笑话也许已经听过一百次，但我愿意再听一百零一次，也不愿去讨论最近签订的农业协议。”上班为官，下班为民。首相业余时间何尝不能开个玩笑。

帕尔梅收到过十几万封来信，1984年一年便收到1.9万封，有些信开头很随便，“你好！帕尔梅”或“你好”，这是现代瑞典人朋友之间写信最通常的方式，有的比较正式，开头要说“最尊敬的奥洛夫·帕尔梅。”许多信是孩子写的，问他最喜欢的瑞典冰球球星是谁，有的反映学校伙食不好。对这些来信，他力争一一回答，不用秘书代劳。因而回信花去的时间无法计算。对反映伙食不好的信，他抱歉地回答说，政府对学校食谱影响不大，不能对厨师下行政命令。但他有次对一个班级学生说：“饭菜应该是既有营养，又很可口。问题是：汉堡包、可口可乐难道真有营养吗？”麦当劳公司生财有道，在瑞典设了许多店，搞了无数促销活动，瞄准的消费对象却是孩子。他们用些花钱很少但很讨孩子欢心的小纪念品作为馈赠，孩子仅仅为了这小纪念品就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去买一份麦当劳。童心纯洁无瑕，童心也极易受骗。

据说帕尔梅对孩子信中提出的问题都一一转告有关当局，请他们解决。

他收到那么多信，都很好收藏起来，无一扔进纸篓。他有次对一年轻记者说，“信太多，回信就很难及时了。”很可惜，有几封是恫吓信，他没有很好重视，导致悲剧。

帕尔梅做官不像官。不论这些是否都是装出来的，却赢得不少民心。他逝世十年后，今天仍有许多瑞典人怀念这位贵为首相、凡如俗子的帕尔梅。

作为首相，作为个人兴趣，帕尔梅最关心的是外交和国防。

外交上帕尔梅最关心的是与美国的关系。瑞典是一个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国家，商品的进出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左右。而美国一直是瑞典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到 80 年代后期，美国已成为瑞典第三贸易伙伴，对美出口占瑞贸易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一，从美进口占瑞贸易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十。美国是超级大国、是西方之首。瑞典社民党意识形态上与美国虽有分歧，但基本价值观念是一致的，都崇尚民主、自由。与美国关系降至最低点，对瑞典，对帕尔梅本人总是不利，要设法改善。

帕尔梅恩师埃兰德也为此担忧。他虽已告老，但未还乡，仍留在斯德哥尔摩。他把帕尔梅扶上马，还要送他一程，助他一臂之力。

埃兰德对帕尔梅最为了解。帕尔梅在反对美国侵越战争中的言行与其说是出于他个人良心，不如说是为了瑞典利益。美国人恼火是预料中的事。但尼克松政府迟迟不派新任驻瑞大使，美国人扬言要抵制瑞货，不买沃尔沃汽车，码头工人还说不为瑞典货物装卸，这就过分了。许多瑞典商人不理解帕尔梅的用心，谩骂之声每日见于报端，这就太委屈了帕尔梅。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于是埃兰德亲自出马，向美国人作解释，尽快使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帮助爱徒渡过难关。

1970 年 4 月 9 日，尼克松似乎觉得已经教训了帕尔梅，选派杰罗姆·H·霍兰德为新任驻瑞大使。霍兰德是个黑人外交家。当他到达斯德哥尔摩阿兰达国际机场时，发现欢迎他的除瑞典外交部礼宾官员和一大批警察外，还有一大群示威群众！他们抗议美国侵略越南，惨杀越南无辜村民。不过瑞典人有教养，懂礼貌，对新任大使没有任何过火行为，示威也只是静静站着，表达自己感情而已，点到为止。据说后来一人冲破警察警戒圈，向霍兰德大声喊道：“滚回去，杀人犯，瑞典不欢迎你！”美国使馆为此提出抗议。瑞典外交部向美国使馆表示道歉。

4 月 29 日霍兰德为美国新落成的文化中心剪彩，身上又被示威群众扔掷的臭鸡蛋击中。

示威群众在另一次反美游行中烧了美国星条旗。

霍兰德一次又一次提出抗议，并说他在瑞典旅行时，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他说有人还骂他是“黑鬼”。

示威群众主要是瑞典人，尤其是青年学生，但也有从越南战场上下来、在瑞典政治避难的美国逃兵。他们因厌战而逃来瑞典，他们的反战情绪是可想而知的。瑞典政府收容他们，这就是对美国政府的不敬了。

帕尔梅严厉批评了过火的示威游行，特别谴责了焚烧美国国旗的行为。但美国并未就此罢休。

1970 年，即帕尔梅参加斯德哥尔摩反美示威游行后的第二年，凯尼恩大学决定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这一荣誉的获得对帕尔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6 月，帕尔梅偕夫人丽斯贝特赴美接受这一荣誉。但是，帕尔梅的

这次访问，不但受到美国政府的冷遇，而且遭到一些美国人的污辱。

一踏上美国国土，“欢迎”他的便是码头工人的示威游行。帕尔梅说这是右翼势力组织的。码头工人打着“帕尔梅是种族主义者！”“帕尔梅是瑞典的华莱士！”“帕尔梅滚回去！”等标语牌，散发反对帕尔梅的传单，说帕尔梅“亲共反美”；“共产党国家喜欢你，他们那儿才是你该去的地方……”

凯尼恩大学毕竟是高等学府，是帕尔梅母校，师生对帕尔梅夫妇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为帕尔梅举行隆重的学位授予仪式。帕尔梅满含深情地在会上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演讲稿，题目是《人的自由和民族的自由》。他说：“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凯尼恩度过的，见到大学里的人我总是非常高兴。”当他正在阐述人的自由与民族自由的关系时，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组织一批人，聚集在校园里的草坪上大喊大叫。帕尔梅起初不予理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谈其自由观——一个他从学生时代就对东欧和东南亚青年学生宣传的题目。后因会场被喧嚣声破坏，他便离开讲稿提高嗓门说，学术自由“也包括声音被别人听到的自由！”

演讲完毕，帕尔梅与学生在树下的草坪上席地而坐，欢快交谈，也不让记者参加。联邦调查局派来的十名特务，散布在离帕尔梅不远的地方，比尔·麦基便为其中之一。麦基戴副墨镜，手持对讲机，腰间挂着手枪，在圈子外面徘徊。麦基奉命紧随帕尔梅，寸步不离。帕尔梅上厕所他也跟进厕所。有时他为提醒帕尔梅注意他的存在，高声喊道：“这屋里有医生吗？”英文里面“医生”与“博士”是同一个词。他用这双意词同这位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帕尔梅开个玩笑，但帕尔梅不与其计较，而且以德报怨，临行前送他一副袖扣作为纪念。

记者后来问麦基：“帕尔梅与学生谈了什么”，麦基满不以为然地说，“无非是性和越南。”

帕尔梅无法掩饰他对美国的失望。他说：“美国是世界上超级大国，人们期望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民主国家的行为与其民主理想相吻合。美国有责任体察人们这个希望，人们期望它这样做并不是反美。”

帕尔梅在记者招待会上，也不掩饰对码头工人的不满，说“他们是受雇于人。拿人钱财，为人示威。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知道他们并不代表真正美国工人。”他说示威是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的。记者指出尼克松是右派，但许多工人投他的票，选他上台。帕尔梅说：“美国不少工会对国内政策态度是激进的，在对外政策方面却是反动的。”

“您认为美国有希望变得更激进些吗？”

“啊，那是肯定无疑的，”帕尔梅回答说。“美国还有一股民主暗流。我是乐观主义者。”

帕尔梅访美期间，美国官方避而不见，后来安排国务卿罗杰斯接见。帕尔梅有些受宠若惊，而谈话时间之长更使他喜出望外。“我原以为是礼节拜会——一刻钟便结束——但结果谈了两个小时，讨论热烈，四分之三时间谈的是东南亚。”帕尔梅对随行记者斯特朗德说。

“这使我有机会谈谈我们对入侵柬埔寨的看法。谈话有时很僵，因为我们将入侵柬埔寨与（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我们坚持这个观点。1968年我们问俄国人：‘谁请你们去捷克斯洛伐克的？’又是谁邀请美国军队去柬埔寨的呢？柬埔寨政府没有发出正式邀请。我们把入侵柬埔寨比作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是完全恰当的。这关系到一个小国的主权问题。”

“然后他们又提出一连串其他国家：你们瑞典认为我们对希腊应该怎么办呢？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典型的超级大国作风！”帕尔梅说整个辩论很“严肃，但很友好，罗杰斯还在家里设宴招待”。

帕尔梅在华盛顿未见到尼克松。他到已故的肯尼迪兄弟墓上献了花圈，去纽约参加了莉娜·霍恩和哈里·贝拉方特两位歌星举行的招待会，见到了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雷尔夫·艾伯纳西和马丁·路德·金的遗孀科雷塔·金。贝拉方特高歌一曲：《你们在哪儿？》，这是一首纪念肯尼迪兄弟、马丁·路德·金，以及其他遭到暗杀的美国人的颂歌。帕尔梅很激动，说“这是美国迄今最了不起的事”。

斯特朗德问帕尔梅：美国之行的好的一面是什么？帕尔梅答：“是我们能够表达我们对越南战争的看法。”坏的一面呢？“是看到美国这个国家糟糕透顶地撕成碎片。”

最使帕尔梅难过的是美国居然管他叫“种族主义者”。这是因为美国大使霍兰德被人唤为“黑鬼”而引起的。帕尔梅回国后顾不上休假（瑞典人对休假十分认真，几乎是雷打不动。七八月份许多工厂停工，因为工人都去度假了），在佛乐岛给霍兰德写了封长信，解释他对种族歧视的态度，回忆他1948年在美国密西西比的公共汽车上无意坐到专为黑人划定的座位上、白人要他离开，他坚决拒绝、险遭白人毒打的经过，信最后说：

这只是许多类似事件中的一个。这早在民权运动开始之前就发生了。22年后当我再去美国旧地重游时，有人竟对我打出“帕尔梅是瑞典的乔治·华莱士”、“帕尔梅是种族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标语。这种人身攻击是令人不快的，但使我更加奇怪、更加震惊的，是在几次记者招待会和会议上，人们连续不断地向我提问有关瑞典人民种族偏见的问题。美国公众相当一部分人显然有个印象：瑞典人是种族主义者。据说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曾被人唤为“黑鬼”，因而使美国大使蒙受了种族偏见的污辱，因而出现对瑞典人的上述指责。这种指责损害了瑞典人民的名誉。这个问题很重要，很严重，对我们两国关系亦有影响。所以我从美国回来后，立即指示外交部详细调查。美国大使馆并未就种族污辱向外交部提过交涉，但外交部从警察总署以及其他方面搜集了情况，并从目击者（即4月9日看见您抵达阿兰达机场和4月14日看见您坐马车去王宫的人），处获取了报告。跟您同坐一辆马车的人以及骑着摩托（为您开道）的人都被找来谈话。从瑞典当局已掌握的材料来看，没有证据说明发生过种族歧视性质的事件。

在此等情况下，我建议，（瑞典）外交部与美国大使馆一起把问题澄清。

我原想与您当面交谈这个问题，但我眼下正在佛乐岛休假，因此我给您写了这封信。

向您和您夫人致以热烈问候。

您的忠诚的

奥洛夫·帕尔梅

霍兰德复信简短，寥寥数语，但几乎每个字都透露出大国沙文主义态度：

亲爱的首相先生：

您7月25日提及我家和我在瑞典经受的某些不愉快事件的来信收到。

与其让（瑞典）外交部和本使馆讨论这个问题，我建议您和我找个双方方便的时间当面交谈，讨论此事以及与此有关的事件。

你的忠诚的，

杰罗姆·H·霍兰德
美国大使。

按瑞典惯例，外国大使有事，一般只能见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或政治司司长，如果事关重大，而且确有必要，方可安排外交大臣接见。礼节上不需要首相本人出面。帕尔梅是否与霍兰德大使找到“双方方便的时间”“当面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1970年7月29日帕尔梅在《每日新闻》发表以《美河在我心中》为题的文章，强烈谴责美军1968年惨无人性地屠杀越南美河村民的暴行。帕尔梅写道，参加这次大屠杀的不是魔鬼，而是你们每天可能见到的人，他们受战争驱使而变得惨无人性。“我们大多数人心都有一个美河，”帕尔梅写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此类似的情况下，应该如何作出反应。重要的事情是我们一定要设法避免使我们陷入这种情况。惨暴行为必须受到谴责，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不管由谁承担责任。”

“普通的美国男孩参加了这次大屠杀……当幻想破灭时，该是何等痛苦。美国出兵是去保卫自由和民主的，是去保卫越南独立和美国荣誉的。人们可能‘为我们的孩子’感到自豪，因为他们无所畏惧地为崇高理想而战斗。然后传来大屠杀的照片，被屠杀的正是军队派去保卫的人。他们在去往塞莫皮莱的路上来到了美河。”帕尔梅文章并说他在美国遇到针对他的示威，是美国为其错误进行的自我辩解，反映出美国自感有罪。“美国希望政治解决的愿望与日俱增，对此我深信不疑。”

帕尔梅上任后除去美国外，还正式访问法国、前西德等国家，每次都将是美国侵越战争作为会谈主要议题之一。帕尔梅这种不畏强暴的精神在国内外赢得不少赞誉，也招来国内右派的不少批评。他们指责帕尔梅不务正业，不认真考虑国内问题，反而整天在国际上招摇过市。右派当然不会理解这位瑞典首相和瑞典社民党主席的“鸿鹄之志”，但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瑞典福利社会此刻已出现不少问题，“人民之家”或“美好之家”虽然不是大厦将倾，但已多处屋漏，危机业已出现，确是需要首相多加关心。可惜这位政治上十分敏锐的首相，未能及时察觉问题的严重性而采取对策。

1970年9月瑞典大选，帕尔梅首次率领社民党进行“卫冕之战”。结果只获得45.3%的选票，在议会中失去绝对多数。但帕尔梅决定单独组阁，声称“社民党人在逆境中战斗得更出色”。他知道社民党加上共产党的议席，在议会仍占多数，“非社会主义集团”掀不起翻船的风浪。

二次大战以后，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直至1965年前后。这是瑞典经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此后便出现下降趋势。经济学家将1965年前后称为瑞典经济发展的“分水岭”。帕尔梅恰恰是在经济走下坡路时上台的。

帕尔梅刚刚上台，瑞典基律纳等三大矿区的5000名矿工不顾工会劝阻，举行罢工，抗议计件工资制。其他地区也接连爆发“非法罢工”，对政府征收过高的个人所得税和雇主表示强烈不满。罢工尚未结束，中产阶级的家庭主妇又走上街头，抗议政府为吸引妇女就业而制订的、新的鼓励已婚妇女工作的税法，称这将“破坏正常的家庭单位”。工人阶级妇女也上街示威，抗议粮价飞涨。

这些社会现象反映了经济滑坡后，社会各阶层、各方面产生的不满情绪。瑞典不少经济学家已经发出警告，必须对政策进行重大调整，否则福利社会将难以为继。然而，一是由于各种矛盾尚不十分明显，二是调整实非易事，

帕尔梅遂对各种罢工、抗议、示威游行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仍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国际事务方面。

1972年圣诞节前夕，美国悍然恢复轰炸北越。帕尔梅闻讯趴在自家的饭桌上起草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声明，谴责美国：

人们对每件事都给一个正确的名字。越南发生的事是一种酷刑。军事上轰炸是毫无理由的，西贡的军方发言人已经否认北越有加强兵力之举。

不能让谈判桌上抱顽固态度的人决定去从，正如《纽约时报》指出的那样，主要是西贡阮文绍总统反对巴黎达成的十月协议。

他们正在于的只能使人民，使一个国家遭受折磨和痛苦，蒙受羞辱，迫使它投降。因此轰炸是个暴行。

现代历史上有过许多这类暴行。大家都知道这些暴行的名字。格尔尼卡、奥拉多尔、卡廷、利迪策、沙佩维尔以及特雷布林卡。暴力得逞了。然后后代对那些要为此负责的人的裁决是严厉的。现在，这一长串名单上又增加一个新的名字——河内，1972年圣诞节

华盛顿对此声明十分恼怒。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对即将离任的瑞典大使休伯特·德贝切说，尼克松认为帕尔梅的声明是对美国的莫大污辱，从不记得瑞典政府对纳粹德国犯下的罄竹难书的暴行曾发表过言辞如此尖锐的声明。基辛格博士对帕尔梅将美国轰炸北越，与纳粹死亡集中营相提并论，感到特别沮丧。

帕尔梅于圣诞之夜收到尼克松的一份电报：瑞典新任驻美大使 Y·摩勒不受欢迎。帕尔梅也不甘示弱，给尼克松复了一份电报，表示他对“越南正在继续进行的生命涂炭的悲剧感到最深切的焦急”。

帕尔梅的声明在国内掀起轩然大波。许多瑞典人觉得帕尔梅简直胆大妄为。然而更多的人虽为瑞美关系恶化感到不安，但认为帕尔梅有勇气，好样儿的。帕尔梅本人每天收到 1200 封美国人的来信，感谢他如此直言不讳他说出他们要说的话，对他表示钦佩。帕尔梅说，他是与包括埃兰德在内的社民党领导人磋商后发表这份声明的，他获得所有社民党领导人的支持，他似乎有恃无恐了。

然而中伤他的谣言四起。他去探望因病住院的母亲，立即有人说他得了绝症已经住院；有人说是精神失常，有人说他正在住院戒毒；更有人煞有其事他说，帕尔梅眼圈发黑就是精神病或瘾君子，或两者兼而有之的病兆。有人鼓唇摇舌，说他爱好女色，纵欲过度。

政敌诽谤，不屑一顾，帕尔梅担心的是经济形势继续恶化，国人牢骚怪话颇多，不满情绪日增，而且党内意见分歧，对今后发展方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1973年9月又迎来了瑞典大选，政府议员又得受次煎熬。议会每三年换届选举一次，时间相隔太短，坐椅刚刚坐热，就得面临选民考核。新官上任三把火还未烧完，就有下台可能。有人建议大选时间延长一年，帕尔梅认为这不是不可考虑，只是目前还得维持现状。

这次大选辩论的主题是经济。

1973年和1974年交替之际，国际上爆发了著名的“石油危机”，中东、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结成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将每桶石油价格提高了4倍。

西方国家经济此时已在周期性萧条中挣扎了几年，此刻更是一片混乱。瑞典经济在世界经济萧条、石油危机和国际激烈竞争的几重打击下，更是步履艰难了。埃兰德是福将，当政时正值瑞典经济蓬勃发展，因而做了 23 年太平盛世的省心首相。虽然他也遇到一些问题，跟反对党也有争吵，但许多争吵只是为了取乐，谈不上严肃的政治斗争。如今情况不大一样。俱往矣，“黄金时代”。现在一副沉重的福利社会担子都搁在他帕尔梅肩上了。

1973 年的石油危机对瑞典经济打击沉重。瑞典本国不产一滴石油，每桶油都是从国外进口。油价扶摇直上，导致其他物价上涨。为应付石油危机，帕尔梅政府宣布瑞典未来能源政策的四个基石：

一是放慢能源消耗速度。把每年能源消耗增长率从百分之四至五减少到百分之二；

二是减少对石油，尤其是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三是寻找新的能源供应。按瑞典现有条件，能源来源有三：水电、石油和核电站。核电站是新的能源政策的核心，将在能源中占重要位置，因为瑞典在兰斯达德蕴藏丰富的铀。核电站可满足瑞典数百年的能源需要；

四是国际合作。

很显然，帕尔梅政府的意图，是将发展核电站视为解决石油危机的最佳方案。政府计划在 1985 年前兴建 15 个核电站。能源政策一公布，有人拥护，有人反对，全国一场要不要发展核电站的大辩论从此展开。

核电站在 50 年代、60 年代初建时平安无事，各方并无异议。1970~1971 年议会表决时几乎全票通过建立 11 个核电站的决议。然而形势此刻大变，一向关心环保的瑞典人，似乎环境保护意识更强了。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国王公园里榆树太多，公园根据发展规划，决定将它们砍伐。大群酷爱大自然的瑞典人（主要是青年男女）闻讯立即赶来，有的爬到树上，有的在树下围成人墙，誓死保卫榆树，就像虔诚的锡克教教徒爱护自己发须一样：此乃父母所生，岂能剃刮。榆树乃大自然所赐，岂容砍伐。警察进行干涉，与护树群众发生冲突，群众始终拒不退让。帕尔梅只得下令召回警察。但发展核电站与砍伐榆树不能相提并论，它事关国家能源战略，是不能退让的。

中间党主席费尔丁利用群众情绪，在环境保护上大做文章。他到处发表演说，煽风点火，强调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生态平衡，“坚决制止进入核电站社会的步伐”。共产党议员也加入其行列，一场反核电站运动突然爆发，而且来势迅猛。议会中共产党与中间党站在一起，是反方，社民党与保守党站在一起，为正方。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 50 年代关于“附加养老金”的辩论。帕尔梅从来不将说话缓慢、思维迟钝的费尔丁视为令他看重的对手。殊不知费尔丁通过辩论捞取了很多政治资本，大选中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中间党成了不可忽视的反对党。

大选前帕尔梅遭到的批评越来越多。一个社民党重要人物归纳他的窘境时说：“非社会主义方面对他的指责铺天盖地而来，说他左右摇摆，很不可靠；缺乏与各方达成妥协的能力；不必要地挑起冲突；没有阿尔宾·汉松、埃兰德所具备的道德形象和品质。党内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大选结果，社民党与共产党一起共得 175 席；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共得 175 席，“社会主义集团”与“非社会主义集团”平分秋色。帕尔梅决定社民党继续单独组阁。

临近投票时，年逾 90 高龄的老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逝世。帕尔梅

出席了国王葬礼。他神情肃穆，俨然是一般政府首脑惯常老成持重的样子。

从理论上讲，社民党与国王水火难容，但社民党不会将国王彻底推翻，帕尔梅更不会。1974年帕尔梅主持修改的新宪法在议会通过，取代了从1809年起一直沿用了一百多年的老宪法。新的国家根本大法规定瑞典实行立宪君主制，为王室留有一席之地，仍尊国王为国家元首。但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仅履行代表性或礼仪性职责，不能干预议会和政府的工作。

帕尔梅就任首相后，在议会通过的另一部重要法典是《就业保障法》。工人的劳动权利受到法律保护，雇主如无正当理由不能随意开除工人。如果工厂减产，需要裁员时，也要遵循“最晚进厂，最先辞退”的原则。许多跨国公司以此为由，纷纷将资金移向国外。ABB公司即为其中之一。它索性将公司总部迁到瑞士。雇主眼见瑞典税率这么高，劳动力这么贵，又不能显示自己的威风，此刻不走，更待何时。

资金大量外流，说明瑞典政府经济状况已很不妙。帕尔梅此刻或未看到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瑞典病”的种种险情，或日子尚过得去，或虽已看到，但无能为力。总之，他未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经济恶化。

帕尔梅仍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外政策上。197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动智利军事政变，杀害智利总统阿连德。帕尔梅拍案而起，义正辞严地大声责问道：“阿连德是人民选举出来的，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人们总不能把他看作是对民主的威胁吧？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他在智利人民帮助下，正努力使他的祖国摆脱外国的剥削。”

同年秋天，帕尔梅又声援西班牙反对佛朗哥独裁统治的抵抗运动，亲自上街为他们募捐，谴责“双手沾满鲜血”的佛朗哥法西斯主义者。

与在国内情况相反，帕尔梅的国际声望与日俱增。

从1971年到1976年他出访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前西德、奥地利、坦桑尼亚、葡萄牙、加拿大、南斯拉夫、墨西哥、美国、前苏联、古巴等等。他是西方第一个正式访问古巴的领导人。古巴给他极其隆重的接待。卡斯特罗亲自陪同。帕尔梅也乐于接受给他戴的“左派”帽子。他并飞往阿尔及利亚与巴勒斯坦解放阵线领导人阿拉法特会晤。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也视他为朋友，纷纷来斯德哥尔摩访问。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等都来了。

至此，许多瑞典人才认识到帕尔梅在国际上的作用。《每日新闻》主编思文一埃里克·拉尔松曾陪同帕尔梅访问拉丁美洲，见到他每到一处皆受到的热烈欢迎，欣喜地在报上撰文道：“有人只看到帕尔梅在国内与中间党领袖弗尔丁、保守党领袖博曼在挖苦讽刺、互相猜疑的气氛中唇枪舌剑地进行辩论，他们也许很难想象他在今日之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在我与他访问拉丁美洲的日子里，我收集到许多证据说明，瑞典首相在我们访问的国家里威信是何等之高——这对我来说是出乎意料的。”这时期帕尔梅还会见过美国基辛格博士。两位博士谈得并不投机，然而却结下了“不解之缘”，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

他们谈了六个小时，帕尔梅说“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观点相左，”不过他和基辛格都觉得谈话很有益处。

外交上的成功并不能解决国内的困难。1973年后瑞典经济继续下滑。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伦德堡分析说，瑞典70年代开始的巨大经济困难，究其原因，“不仅是周期性经济运动造成，同时也是经济结构的改变和经济结

构危机造成的。”原料工业、采矿业、造船业等历来是瑞典创汇大户，如今却连年亏损。50年代初原料工业、采矿业纳税前的毛利润率为65~70%，“黄金时代”过后开始下降，到70年代未反而亏损30~35%。钢铁工业1950年的毛利润率为29%，到70年代初便降至7%。造船一向是瑞典传统的出口创汇部门。50年代后期，日本造船工业崛起，英国造船业很快落马，瑞典尚能抵挡一阵，平均年增长率仍为5.2%。但到70年代，南斯拉夫、波兰、韩国、巴西、新加坡等国造船业起来后，瑞典造船业便被挤出国际市场。瑞典造船业像许多工业部门一样，投资少、技术陈旧，产品成本高，在国际市场上当然缺乏竞争能力。日本一艘普通商船的生产成本只为瑞典的75%，而韩国只为瑞典的65%！

因此经济结构必须调整，亏损部门必须转产。帕尔梅肩负这样庞大工程，也实在难为自己了。

70年代初，西方世界陷入“滞胀”困境：公共开支猛增、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加剧、资本投资疲软、技术更新缓慢、竞争能力削弱。作为福利国家典范的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更是突出的一个。

试以公共开支（即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国家企事业单位、社会保险、社会福利部门、学校、医院的开支）为例。瑞典福利设施由三方掌管：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保障部门。由它们分别征收税赋和收取保险费，也由它们为福利设施项目支付经费。它们为居民、企业发放各种补助、津贴、救济、赠款、建造住房、公共建筑物以及为医疗卫生、教育事业支付费用等。70年代起，公共开支平均每年以5.9%速度上升。公共开支急速增加，是因为经济开始不景气，企业亏损，工人失业，需要补助（到1982年公共开支竟增至3756亿克朗，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70%，就是说公共开支一年吞噬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

瑞典为支持福利社会，一向是寅吃卯粮。1950~1960年间中央财政赤字增加1倍（从3.1亿增至6.1亿克朗）；1960~1970年间增加4倍（从6.5亿克朗增至32.3亿克朗）。1970年后财政状况更加恶化，10年间增长12倍（即从32.3亿克朗增至429.1亿克朗。1981年更增至662.7亿克朗！）

由于巨额赤字，政府不得不发行国债。1970年初，国债为100亿克朗，（到1981年便累积到2950亿克朗，全国每人负债3.5万克朗，高于美国国债的水平。70年代初，瑞典几乎没有外债，到1981年外债达520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5%。）债务高，支付利息也多。（1982年政府支付的国债利息便达335亿克朗）。财政赤字带来了通货膨胀。1974年后物价上涨通常达到两位数字。物价飞涨，给国民经济和靠工资谋生的劳动群众带来了严重困难。

物价上涨，工资就得提高，否则工人就要闹事。1974~1976年工资提高50%。工资提高，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必然增加，瑞典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必然削弱。

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也是一个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1965年后瑞典像日本、美国、英国、联邦德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经济增长处于停滞状态，生产率的增长率呈下降趋势。在60年代，瑞典加工制造业的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为7%，1973~1981年则降为1.8%。

进入 70 年代后，目睹瑞典经济陷入困境，帕尔梅和许多人一样，感到不能长此以往。公共开支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若超过 50%，必然给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1970 年公共开支为 51%，但未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抑制，而是一味上升，显然是“过头了”，势必给储蓄、投资、生产率等等造成严重伤害，形成恶性循环。必须进行重大改革，这是确定无疑的。至于怎么改，帕尔梅心中无数。

瑞典总工会的经济学家梅达纳尔经数年研究，于 1975 年提出医治“瑞典病”的药方——“雇员投资基金”。

梅达纳尔创议的根据，是社民党要实现第三阶段战略目标——“工业民主”，改变工人在工厂、企业管理中的无权状态。社民党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是“政治民主”，已随着 1921 年普选权的实现而完成；第二阶段战略目标是“福利社会”现也大体完成；而第三阶段战略目标就是说改变所有制，将私人企业变为“雇员投资基金”所有的企业。这是很大胆的设想。

梅达纳尔方案的基本内容是将企业利润分配给职工一部分，变成企业中的“雇员集体股份”由工会代表职工掌握。“雇员投资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将企业缴纳的职工补助养老金保险费提高 1%；二是从公司超额利润中提 20%。例如一家公司资本额为 1 亿，正常情况下平均利润为 15%，即 1500 万。如果它的公司利润增加了，比如说到了 3000 万，则 1500 万为超额利润，要从中拿出 20% 作为“雇员投资基金”。瑞典总工会估计，全国企业的雇员投资基金一年可得 20 至 30 亿克朗。

根据梅达纳尔方案，各省、市设一“雇员投资基金会”，全国共设 26 个基金会，掌管本地区的“雇员投资基金”。各基金会都有自己的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各地工会提名。董事会中包括省、市政府代表。由此可见，基金会基本上为工会控制。

雇员投资基金赋予职工参加企业管理的权力，有权对企业投资数额、投资方向等发表意见（他们是股东，他们的代表在企业董事会上有表决权）。

据估计，“雇员投资基金会”不用多久便成为企业的控股一方，私营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改变过来了。梅达纳尔直言不讳他说，这个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传统的社会主义学说所要求的、生产资料由工人集体占有”。

这个改革计划在瑞典各界产生极大震动。企业界强烈反对，学术界争论不休，从而又引起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全国性辩论。

反对这项计划的人中有一位经济界权威人士。他就是林德贝克教授。林德贝克教授是国际经济学界瑞典学派的当代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委员会主席，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社民党党员，是社民党高级幕僚，同时也是帕尔梅的好友。其实帕尔梅就是他推荐给埃兰德首相当私人秘书的，对帕尔梅有知遇之恩。他对政府经济决策曾发挥过重要影响。他除理论上指出“雇员投资基金”不能医治“瑞典病”外，并强调这项计划一旦实施，“工会官僚”随之得势，后果不堪设想。他斩钉截铁他说，如果社民党采纳梅达纳尔的馊主意，他就退党。后来他果真退出社民党。

帕尔梅左右为难了，社民党第三阶段战略目标不能不搞，“工业民主”不能不实现，否则雇主仍是主子，雇员依旧为奴为婢。然而权威朋友的话不能不听。改变所有制问题实在太大了，暂且搁下，从长计议。

随着 1976 年大选逼近，社民党威信下降。社民党官员的官僚作风越来越使老百姓憎恨，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干涉，老百姓甚至觉得

最简单的小事都要获得官僚批准不可。是该让社民党靠边站了。有项民意测验问：“你眼中的社民党人主要是老板、官僚、狗群中的大狗，还是认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改革家、穷人和被压迫者的朋友？”41%的人答他们认为社民党人是前者。普通选民投票是看自己工资袋里的钱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眼见物价上涨，生活水平下降，社民党官僚又如此骄横，选民情绪是可想而知的。大选前景对帕尔梅颇为不妙了。

这时对社民党另一不利变化是，保守党、自由党、中间党联合起来了，决心要与社民党决一雌雄。过去就是因为它们不团结，几次失去执政机会。这次他们推费尔丁为首，尝尝执政的滋味。

帕尔梅从不掩饰他对费尔丁轻视和鄙视的态度。哥德堡大学研究员彼得·凯塞雷尔说：“帕尔梅在议会讲话时，费尔丁按照礼节，认真倾听；而费尔丁讲话时，帕尔梅大部分时间都转过身去，背朝着他。或打断费尔丁讲话，或对他的话连连摇头，发出啧啧的声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轻蔑费尔丁的表情。”

但今非昔比了，费尔丁哀兵必胜，他现在好像胜券在握。

正在此时，帕尔梅的警察总署署长皮尔松给他送来一根救命稻草，据说能扭转大选颓势。

事情是这样的：

警察署长皮尔松素与司法大臣谢盖尔不睦。一次，斯德哥尔摩警察局抓到一名女贩毒嫌疑犯，在她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有司法大臣谢盖尔的大名及地址、电话。警察知道这案子麻烦，牵涉到大人物。

“你认识此人吗？”警察审问道。

“当然认识，她是我的男友，”女嫌疑犯答道。

“嘿嘿，”警察冷笑起来。“我还说英国女士是我的女友呢。”警察嘲笑她，并再三诱导她更改供词，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女嫌疑犯一口咬定不放。警察无奈，只得将此案推给总署处理——事关司法大臣，市警察局不敢作主。

皮尔松拿到报告后如获至宝，忙将此事呈报帕尔梅首相。岂料首相正为大选之事心乱意烦，未予置理（况且谢盖尔还是帕尔梅的挚友呢）。

但皮尔松并未就此罢休，他还想从女嫌疑犯处钓出一条大鱼来。他把女嫌疑犯释放，暗中监视，发现她原来是个拉皮条的鸨母，又从她身上搜出一份嫖客的名单，其中竟有那位道貌岸然的中间党党魁费尔丁的大名！

1976年8月20日，即离大选还不到一个月时间，皮尔松又紧急晋见帕尔梅首相。皮尔松知道，他手中这份材料虽非重磅炸弹，但大选在即，只要将费尔丁这件桃色丑闻在新闻媒介一抖，费尔丁难以招架。嫖娼卖淫在瑞典不算犯法，但堂堂未来首相行为如此不检，总不光彩，公众形象肯定受损，当首相的美梦恐怕要等选民对此渐渐淡忘再去圆了。这至少是下次大选的事了。

但帕尔梅对此只是淡然一笑，还是不予重视。一是因为他相信他的社民党还能在大选中获胜。过去多少急流险滩都闯过来了，这次也一定能；二是他觉得采取这种手段打击政敌并不光彩，即使获胜，也胜之不武。

皮尔松大失所望，然而更使他吃惊的是，大选结果社民党败了，以费尔丁为首的“非社会主义集团”上台了。皮尔松慌了手脚。他告发司法大臣和当选首相的材料还在首相办公室里，肯定要落入费尔丁手中。也果然不出他

所料，新政府上台后，他被发配到一个偏僻的边远地区去当警察局长了。

1976年9月16日是投票日，晚间大选结果揭晓。这个晚上是帕尔梅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他整晚坐着，神情紧张，不断抽着烟斗，眼睛盯着电视。当最后结果尚未揭晓，但他领导的社民党败局已定时，他掐灭手中的烟，轻轻说了声：“罢，罢，罢，看来最后结果就是如此了。”随即做好准备，等待即将采访的电视记者。大选结果是费尔丁率领的“非社会主义集团”获50.7%选票，社民党、共产党获47.6%。社民党连续执政44年的历史就此结束。

帕尔梅成了社民党的千古罪人。但他对电视记者谈话时，装出对胜负若无其事的样子。他说：“我们党作为一个强大、团结的党参加竞选。大选后我们仍是强大而团结的党。这个党将在反对党的位置上，继续为实现自己目的而奋斗。”他认为导致社民党失利的原因是核电站问题。他认为在这问题上谁是谁非，历史自有公论。“70年代我们在两次大选中获胜，第三次，也就是这一次，我们离胜利非常非常接近。我是不是当首相，这对我决非重要问题。”

帕尔梅去办公室收拾文件，不显丝毫倦意，更无沮丧情绪。他对心腹记者斯特朗德说：

“现在我们置身于政府之外了，现在我们成了反对党，这会很有意思的。”

“你疯了吗？”斯特朗德问。

“谁？我吗？”

“如果我处在你的位置上，现在我早已把半瓶威士忌倒进肚里，或躺在床上，无可奈何地望着天花板，或是听听布拉姆斯音乐，或是大哭一场。”

“我也会哭，”帕尔梅平静他说。“但我决不在公众面前流泪。”

斯特朗德看得出来，他敬爱的下野首相决心要报仇雪耻，把政权夺回来，以谢社民党人。

有人猜测，帕尔梅要去当联合国秘书长或世界银行行长。就是说他要退出瑞典政坛，或退居二线。他的心腹斯特朗德斩钉截铁地否定这种可能，说他的首相是从不服输的斗士。“他至少要报完仇，要再当一次首相，为社民党把政权夺回来。以后嘛……”“我有时想，有朝一日也许有人约他在台球桌上决一胜负，而他从未打过台球，他也会接受挑战，然后关起门来苦练三天，届时肯定赴约。如果他输了，他会苦苦思索很久，决不会原谅自己。”

1976年9月20日，晚上6时45分，帕尔梅正式向他一直蔑视的费尔丁交权。一向能言善辩的帕尔梅此时只向议长亨利·阿拉德说了一句话，“我在此请求辞去首相职务。”交权仪式就算完毕，真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帕尔梅知道，费尔丁、博曼在竞选中向选民许下的既要减税又要提高社会福利的诺言，是个十足的谎言，永远不能兑现。一块蛋糕，吃了就不能留，留了就不能吃。看你们怎样圆这个谎吧。

帕尔梅根据当时瑞典的经济状况和他本人执政的经验，根据“非社会主义集团”中三个政党在许多问题上的不同政见，肯定新政府日子很不好过。他说新政府要经过一个“漫长而痛苦的磨练”。

不幸给帕尔梅高中了。三党联合执政的六年，是“瑞典政治史上最可悲的大失败”。

新政府政不通人不和，加之领导人能力平平，根本不是治国之才，拿不出新招，只能沿袭社民党政府的做法。是地道的穿新鞋走老路，而且办事效率很低。

在世界经济危机打击下，瑞典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物价继续上涨，答应给工人增加工资的，不能食言。工资上涨，产品成本就得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必然下降，许多工厂企业濒于倒闭，政府不得不加以收购，或给予大量补贴。新政府收购的企业比历届社民党政府还要多。福利项目就像印度的神牛，是不能砍的。因而公共开支和政府补贴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直线上升，无法抑制。

新政府被迫无奈，三次宣布克朗贬值，总数达 26%。

执政的三党领导人很少能在一个问题上意见一致的。首先是保守党党魁博曼（经济部长）和自由党党魁皮尔·阿赫马克（劳动部长）坚决反对取缔核电站。他们还经常为一些微不足道的细小问题闹得不欢而散。阿赫马克觉得他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与费尔丁的农民意识、博曼咄咄逼人的保守主义很难搞在一起。他们只在一个问题上观点一致：不让帕尔梅重返首相府。

帕尔梅冷眼旁观热闹，等这些官迷心窍的人把国家搞成一团乱麻，等他们内部打得头破血流时，他再在他们伤口上擦点盐，然后来收拾残局。后来他觉得议会辩论水平太低，坐在那里听他们就一些琐碎小事喋喋不休地念经简直受罪，也浪费时间，索性离他们远些，出国访问去了。

1977 年 1 月 30 日是帕尔梅的 50 大寿。北欧人对 50 岁生日十分重视，都要举行盛大宴会，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庆祝一番。政府处长、军队上校以上官员的寿庆还要登报，政府、工商界头面人物以及社会名流则要上电视。帕尔梅无论多么新潮，也得遵守这条祖训，邀请几位至亲好友热闹一下。

妻子丽斯贝特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是一辆新自行车。帕尔梅非常感动，知我者夫人也，他心里想。很多人此时送的寿礼是根精美的手杖，上面镶嵌银，非常名贵，但告诉收礼的人：你老了！帕尔梅尽管刚刚遭受大选惨败，心里时时隐隐作痛，眼神掩饰不住伤感，眼圈四周和面额上的皱纹更深了一些，但他自我感觉良好，身体由于近几月来跑步锻炼比以前更棒了，腹部多余的脂肪也消失了。他离老还远着，他还准备报仇雪耻呢。

帕尔梅性格有其矛盾的一面。他对政敌傲慢无礼，没有耐性听他们噜里噜索的讲话，但他有时也能移尊就教，礼贤下士，非常谦逊地听取他人的批评意见，能站在街上听听老百姓的牢骚，尤其当他们是社民党的支持者的时候。

此后，帕尔梅基本上在国外东奔西跑，他觉得他是条大鲤鱼，瑞典或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只是个小池塘，太小了，他要到世界这个大江大河里去跳龙门。

1978 年，三党联合政府的头目出了内江。费尔丁首相不同意安装两个新核反应堆，保守党、自由党表示不再支持这位首相。自由党党魁阿赫马克弃官而去，费尔丁率中间党脱离联合政府。一场小小的政治危机爆发了，帕尔梅忙从国外赶回首都。帕尔梅听取社民党议会党团汇报，对形势略作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接替阿赫马克任自由党领袖的、47 岁的奥拉·乌尔斯滕对他形不成威胁，遂表示：自由党“诚实”，乌尔斯滕为人“不错”，他愿支持自由党组阁，但反对自由党与保守党组织联合政府。帕尔梅此刻当然是决定三党领导人谁能当首相的最关键人物。自由党是个小党，它组阁后还不是

一切听命于帕尔梅。难怪保守党青年团出了张招贴画，印着咧嘴大笑的帕尔梅像，文字注释是：“自由党组阁——帕尔梅当家。”

此后风平浪静。帕尔梅发现他暂时不能出国了，应该更多关心党内问题。党内有一部分人组织起一个反对核电站的 SAFE 团体，党有分裂危险。1979年3月18日美国三哩岛核电站出了事故，瑞典舆论哗然，人心惶惶，帕尔梅意识到，必须认真去研究一下，便召集社民党最高层领导开会。后来人们将此会议叫做“疯狂的星期三”，因为帕尔梅在会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居然同意就核电站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当然是在大选之后。帕尔梅这样做是因为这年是大选年，他不希望自己的党在核电站问题上争论不休，以致分裂。

帕尔梅从此投入竞选。他几乎走遍全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主要谈失业问题。

“自1976年，我们工业已经失去十万个工作。急需刺激投资。”他向选民保证，社民党上台后，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地处理地方上的问题。帕尔梅周围的人，包括他的经济顾问卡尔·约翰·阿贝里，都知道帕尔梅的许诺纯粹是为了竞选，无法兑现。在果特兰岛的一次竞选午餐会上，大家都在谈论如何改善果特兰岛与大陆的摆渡问题，帕尔梅忽然想起越南战争，说：“直到美国效仿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的做法之前，我们不能让他们安宁——他们必须去河内双膝跪下。有朝一日我会公开这样说的。”参加午餐会的都是党的工作者。其中一人说：“帕尔梅世界上每个地方都去了，每样东西都看了，现在该谈谈我们自己的问题，谈谈果特兰的摆渡问题……”

帕尔梅的竞选演讲开口就是皮尔·汉松，闭口就是过去大好时光。待讲完最后一句话，掌声渐渐消失，他拖着疲乏的身躯，坐晚班火车回到斯德哥尔摩的家中的时候，心里对大选仍无必胜把握。

大选初步结果，除中间党惨败外，各党选票都有所增加，保守党增加18席，是最大赢家；社民党增加2席，共产党增加3席。最后结果取决于海外4万张选票。终于，“非社会主义集团”以一席优势超出。费尔丁忙不迭地宣布他将组织三党联合政府。

1980年，当帕尔梅为和平、裁军、反对殖民主义在国际上奔走呼号时，国内爆发了瑞典历史上少有的大罢工，谈判协商解决劳资纠纷的“萨奇巴登协议”此刻再也不起作用。罢工浪潮风起云涌，国家一度瘫痪：所有的民航班机不再起飞，轮船停航，加油站停止营业，医院只处理急诊病人，邮局不再准时递送邮件，电台只播放一个频道节目，电视只播放新闻。罢工高潮期间，全国有一百万人参加。他们不喊不叫，避免伤了自己身子，但雇主若不答应增加工资11%的要求，他们就不复工。

帕尔梅没有去火上加油。他不想为捞一点政治资本而使局势更加不可收拾。他只是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发表演说时很有分寸他说了几句。“谁能相信瑞典这个工业一向和平的国家会发生这种事呢？”帕尔梅说。“资产阶级政府与雇主沆瀣一气，给工资谈判设置障碍。”帕尔梅非常聪敏，适可而止，不再深谈。

罢工终于结束，国营企业为工人增长7.3%工资、私营企业为工人增长6.8%工资。

帕尔梅此刻信心大增，开始设法搞垮费尔丁的三党联合政府了。1981年

他与中间党、自由党达成逐步降低所得税的协议。报纸为此欢呼，但保守党怒不可遏，因为所得税下降幅度太小，离他们要求的距离太远，于是愤愤然拂袖而去，退出联合政府。

政治危机出现了，持续了三个星期之久。1.7 万名白领工人又火上加油，举行罢工，而且威胁说罢工还要逐步升级。

危机好歹过去后，费尔丁仍是两党联合政府的首相。但瑞典群众已不信任政府了。他们早已习惯于有条不紊的平静生活，如今却是接二连三地发生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这种混乱局面何时是了？帕尔梅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讲话中说：“瑞典处于经济、政治危机之中。今年五一节的任务，再也没有比劳工运动所表达的他们将瑞典从危机中解脱出来的决心更为重要了。资产阶级政府失败了，为了它自己，也为了国家利益，它应该辞职。”

此时，另一个对帕尔梅十分有利的形势出现了，这就是社民党正式接受“雇员投资基金”方案，并将此列为竞选纲领。1980 年帕尔梅在社会党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宣布，瑞典的“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现在一致同意雇员投资基金的目标”，认为这“将有利于经济的运行，并有助于我们恢复经济平衡发展的状态”。“将帮助我们建立一个道义的、平等的和公正的社会”。这一决定肯定会赢得许多蓝领和白领工人的选票。当企业的主人，他们能不支持吗？企业主几乎气疯了，VOLVO 等大公司反对最凶，组织数万群众上街游行。这是预料中的事。帕尔梅对工人讲话时，突出基金的宗旨是使工人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参与企业的管理；而对企业主，则强调基金是为了解决投资的资金问题。企业由于没有资金，投资不够，设备更新缓慢，产品竞争能力削弱。有了资金，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使企业主放心，帕尔梅还向企业主表示，他不会走得很远，决不会改变瑞典所有制。他对工业界说：“我们说，大选后请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会详细说明基金应该如何搞，如何使瑞典和瑞典经济再次强大起来。”

9 月 19 日的大选越来越近，选民对费尔丁已经很不耐烦，希望它赶快滚蛋。帕尔梅知道他已稳操胜券。这决不是说社民党已成了选民的香馍馍，而是说选民别无更好的选择。电视记者在街上问一个普通百姓，对大选结果有何估计，这个老百姓耸了耸肩膀说，“当然是帕尔梅胜了。”然后又接着说：“很不幸。”

帕尔梅果然大获全胜，赢得 166 个议席。这是社民党有史以来获得的最多席位。帕尔梅终于扬眉吐气了。选民希望，社民党坐了六年冷板凳后，现在该吸取些教训，革心洗面，为老百姓真正办些实事。

社民党上台执政后，与反对党的主要分歧仍在经济政策方面。反对党主张大力压缩政府开支，并削减社会福利，以改善政府财政收支状况。政府则主张“紧缩与膨胀”相结合，在紧缩政府开支、压低私人消费的同时，采取措施刺激投资和生产。

帕尔梅为拯救经济，上台后便宣布克朗贬值 16%。此举也果真奏效，连续两年出口增加了，经济渐渐好转。

帕尔梅并宣布，他和他的政府要为世界和平、裁军而努力，要增加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要给难民“慷慨的政策”。

帕尔梅也许急于向党内各派、向工会还债，也许因为自己已经是无可争议的领袖，一言九鼎，用人开始不很慎重，任命了一些不称职的部长、大臣，闹了一些笑话，帕尔梅也脸上无光。看来个人权势大了，就可能忘乎所以，

甚至为所欲为。

帕尔梅安顿一切后，就着手处理“雇员投资基金”问题，赶快把套在他脖子上的这块磨石卸下来。

1981年3月，瑞典总工会和社民党的联合研究小组，在梅达纳尔的报告和1978年联合报告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人运动和雇员投资基金》报告。这个报告与前两个报告相比，已有了变化。社民党重新执政后，立即组织了一系列研究机构，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并于1983年6月提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准备作为法案提交议会讨论。

在议会讨论前，雇主协会公开表示，将利用一切手段全力阻止通过这种基金系统；反对党并组织了一次有7.5万人参加的进军议会的游行，反对政府的雇员投资基金法案。这次由企业家为主要参加者的示威游行，开创了西方国家资本家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的先例。

1983年12月21日，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建立雇员投资基金的两项法令，次年生效。这个原来旨在改变所有制的复杂计划，尽管其本身就带有改良主义的色彩，但到这时，已经逐渐变成了成效不大的一次性措施。用帕尔梅的话来说，“基金根本不是什么革命，只是对瑞典混合经济一个好的、可行的补充。”自1984年起，政府每年向各企业征收的20亿克朗的超额利润税和工资税，用以在全国建立五个基金会，收购企业股票，基金投资的收益归人养老金系统。“这不是第一步，而是唯一的一步。”帕尔梅说。

帕尔梅那位极其能干的财政大臣谢尔·奥洛夫·费尔德就“雇员投资基金”写了两句打油诗：

雇员基金是臭狗尿，
现已被送进垃圾堆。

“雇员投资基金”作者梅达纳尔大失所望，说议会通过的两项法令是“分文不值的东西。”

瑞典总工会1987年发表的《三年来的雇员投资基金——评估报告》认为，“理论设想与最后形成的立法决定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过去若干年期间，对即将建立的工人基金制度所积聚起来的期望是很高的。因此，在雇员投资基金制度最后确定之后随即表现出的失望沮丧，与其说是因为现已最终证明这一制度实际上漏洞百出，倒不如说是由于先前的抱负未能实现的缘故。”

全国就基金问题吵了八九年。现在帷幕渐渐落下，观众、演员纷纷离去，且渐渐被淡忘。这正是帕尔梅这位导演所希望的。他轻轻舒了口气。

帕尔梅觉得国内无事可做了。瑞典是个小小的“养鸭池塘”，太小了，他无法施展。此时美国紧锣密鼓地着手在欧洲部署“潘兴一”巡航导弹，许许多多国家反对。帕尔梅抓住这个题目，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

第九章 国际明星

帕尔梅在国际上的频繁活动，也许可作为他为相 10 余年的标志。

帕尔梅重新登上首相宝座的第一年便出国访问 20 余次，平均每月两次有余。此外他还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和其他北欧社会民主党领袖来斯德哥尔摩。这年他还别出心裁地邀请罗马教皇访瑞。自 1527 年古斯塔夫·瓦萨国王断绝与罗马教廷外交关系后 450 多年来，这是教皇第一次踏上瑞典国土。帕尔梅确是开展全方位外交。

出国访问及迎来送往活动，肯定花费他大量时间和精力，使他无暇顾及国内问题。难怪《瑞典日报》在他一次出国访问回国时，用通栏标题讽刺说：

“帕尔梅今日访问瑞典！”

瑞典不像美国。美国几乎每届总统都有自己的“主义”。就近几十年而言，有“艾森豪威尔主义”、“肯尼迪主义”、“尼克松主义”、“卡特主义”、“里根主义”等等。连伦敦·B·约翰逊这个庸才也有“约翰逊主义”，不知现任总统克林顿是个什么主义。瑞典历届首相没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主义。布兰亭作为社民党创始人，巧妙利用工人阶级力量，在很短时间里使社民党成为执政党而名垂青史；皮尔·汉松成功地建设“人民之家”，使瑞典成为“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被瑞典人誉为“国父”；埃兰德洪福齐天，在瑞典经济处于“黄金时代”上台，经济走下坡路时主动让位，舒舒服服地当了 23 年太平首相，创西方领导人执政时间最长的纪录。帕尔梅在国内并无惊人建树，而且还有许多人痛骂他是“叛徒”、“法西斯”。赫赫有名的社民党右翼老政客阿尔夫·安纳尔斯特罗姆居然说他是“苏联克格勃豢养的特务”，保守党著名政客韦尼·布列坦顿咬牙切齿地对新西兰电视记者说：“请记住，瑞典有一半人憎恶帕尔梅。”有人把社会福利部门张贴在大街上，提醒大家谨防“艾滋病”的招贴画：“‘艾滋病’——我们大家都不能不防的病”改写成“帕尔梅——我们大家都不能不防的病”，以发泄心中的愤懑。然而，墙内开花墙外香，帕尔梅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里，声誉远远高于国内。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已远远高于他的各位前任。

不少瑞典人对此不能理解，甚至有些人还将此作为他的“罪状”，至少说他“不务正业”。最理解帕尔梅的还是他的恩师埃兰德。埃兰德当初之所以培养他当接班人，主要原因之一是他发现帕尔梅在国际交往中很有天赋。他对社民党宗旨有透彻的理解，对国际问题非常熟悉，而且掌握英、法、德、西班牙瑞典首相帕尔梅牙语。社民党需要这样的人才，瑞典需要这样的领导人，冲出斯堪的那维亚，扩大瑞典和社民党在世界上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亚非拉被压迫民族纷纷独立。它们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除马拉维的班达仍抱住原来的英国主子大腿不放外，其余都在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不少国家向往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尼雷尔、恩克鲁玛、卡翁达等等都宣称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学习，走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进而自称是发展中国家的“天然盟友”。

社会民主党囿于欧洲，影响也局限于欧洲。50 年代初社会党国际作出决议，向亚非拉第三世界扩张。但进展甚微。埃兰德并认为，瑞典国力与其国际地位很不相称，‘瑞典模式’需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世界上一般人对瑞典知之甚少，关心天下大事的人知道有个诺贝尔奖是瑞典评选和颁发的，

喜欢看电影的人知道英格丽·褒曼是瑞典人，有钱买得起轿车的人知道 VOLVO 是瑞典的公司，除此之外呢？恐怕没有多少了。甚至许多人将瑞典与瑞士混为一谈，连美国人都如此。不少去美国旅游、出差的瑞典人经常遇到这样哭笑不得的事：

“你是哪国人？”美国人问。

“是瑞典人。”

“啊，你们的手表不错。”

这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必须改变。帕尔梅当然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因而不辞辛苦地东奔西跑。这不是他的个人兴趣，不是游山逛景，不是公费旅行，这是社民党和瑞典国家利益所在。

瑞典民族比较内向，寡语，言行拘谨。在帕尔梅的影响和带动下，瑞典人性格开始变了，对世界大事开始关心了，有些人还以天下为己任，自觉是代表“天下良心”，对自己看不惯的事品头评足，甚至破口大骂了。个别外交官对第三世界国家还有意无意地露出鄙视的神情，有些在第三世界做生意的商人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但他们对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等又有些自卑感。瑞典一家很大的公司雇了一个英国职员。他只是一个级别很低的职员，但始终摆出一副英国人的傲气，从不把他的部门领导放在眼里。一天他去一个中国公司洽谈业务，接待他的中国人说：“啊，欢迎欢迎，你的老板思凡松先生已经来过电话了。”

“他不是我老板！”这个英国人傲慢地宣称。

晚上思凡松经理请客，办公室的白领工人全部参加，这个英国人也在邀请之列。但除他是英国人外，其余都是瑞典人，当然他们就以母语交谈，忽听这个英国人大声嚷道：

“我们这是国际公司，应该说国际通用语言。人家爱立信公司从董事会到各部门，开会都用英语，你们为什么说瑞典话呢？”

思凡松及其他瑞典人连忙道歉！

这个公司的一个高级职员一天去上海某公司参观、考察，接待他的是公司总经理。这位中国主人发扬中华民族好客的传统，热情地接待客人。可这位瑞典人却摆出一副君临天下、不可一世的样子。谁料这家公司刚刚与一家美国公司合资，碰巧美方经理刚从美国赶来，听说瑞典客商造访，便也来参加会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瑞典人见美国经理来后，态度立即变化，满脸堆笑，说话语气也柔和了，刚才的傲气全不见了，相反，倒是有点奴气了。这也许是瑞典这个民族在变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吧。瑞典（以及推而广之，斯堪的那维亚）民族是相当腼腆、自谦的民族，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他们恪守“扬特法则”，满足于自己安静的田园生活，与世无争，户外、村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是帕尔梅打破了这个法则，在世界上过问的事情太多，给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带来不少麻烦，因而他是“罪人”。瑞典人有的也许对帕尔梅抱有成见，但他们谁也不否认帕尔梅通过其国际活动为瑞典赢得了荣誉，不否定他砸碎“扬特法则”所起的巨大作用。

什么是“扬特法则”呢？

扬特是一座小城镇，那里民风淳朴，自古以来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人只顾自家的事，谦虚随和，不自以为是，不惹是生非。作家桑德摩斯把他们的生活准则归纳为十条，成了北欧人的行为规范：

1、千万不要自以为是，觉得你很了不起；

- 2、千万不要认为你比别人强；
- 3、千万不要认为你比别人高明；
- 4、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健壮；
- 5、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伟大；
- 6、千万不要以为你比别人见多识广；
- 7、千万不要对别人指手划脚；
- 8、千万不要嘲笑他人；
- 9、不要以为别人会把你放在眼里；
- 10、不要好为人师。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瑞典人变了，变得自信，甚至将自己国家视为世界中心。要其他国家抄袭它的“模式”。瑞典人被问及“扬特法则”时，他们往往哈哈一笑，说以前确实有过，现已无影无踪。据说桑德摩斯因此而痛心疾首，他独自一人跑到挪威的一个偏僻山村度过余生，就像伯夷、叔齐两个老头，因未能阻止周武王伐纣而跑上首阳山，从此“不食周黍”一样。英国作家莫塞对瑞典人精神面貌的巨大变化很不以为然。他说：“如今每个瑞典人都在休闲屋前设一旗杆，主人每天虔诚地将黄蓝两色国旗升起。这不仅仅说明瑞典人的爱国精神而已。瑞典发展很晚，当欧洲国家几乎都已完成或正在进行工业化时，它还是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但它发展极快，很短时间内便富裕起来，因此瑞典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我们是世界上最棒的’这句话从此便挂在瑞典人嘴边，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们自鸣得意的内心世界。这句话像录音机一样，不厌其烦地到处重复。与此同时，瑞典人又养成千篇一律的性格，缺乏个人特点。这些都是农民社会突然被推到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产物。因变化太快，他们根本没有机会来调整自己的思想及行为方式。”

“直到 20 世纪末，人们仍在瑞典人身上看到‘扬特准则’的影子，只见他们战战兢兢，畏首缩尾，垂头弯腰，走路时眼睛盯着地面，每走一步都小心翼翼，脚步轻轻落下，似乎有些内疚。然而，他们表面的谦恭掩盖了他们的诚实和正直。”

“今天有另外一部分瑞典人要打破‘扬特法则’的枷锁。他们是金发碧眼，白净皮肤、毫无缺点的完人。他们的皮肤被海滩上的日光浴染成金黄色。他们不再嘲弄自己，而是手持短棒吆喝前进，装着潇洒轻快的样子，常常莫名其妙地纵声大笑，表情过分夸张，一切放在脸上，但无任何实质内容。”

经济是基础。经济条件变了，意识跟着变化，这是必然规律。英国人、美国人不快了，以帕尔梅为代表的这一部分瑞典人触犯了他们，他们就对帕尔梅不恭了。

帕尔梅的国际活动是把瑞典塑造成世界中小国家利益的代言人，和平缔造者的形象，是慷慨的善人，不畏强暴，仗义直言，专为第三世界被压迫、被剥削民族鸣不平。

尼克松有句名言：任何国家领导人都为本民族利益服务。英国撒切尔夫人说得更彻底：“对外政策只不过是国家自私自利的表现。”帕尔梅决不例外。他在世界上奔波也同样是为本国利益。但帕尔梅在为瑞典、为社会民主党服务的同时，也反映了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部分利益，所以他的有些讲话能在世界上找到知音。

帕尔梅是西方第一个谴责南非种族歧视、支持南部非洲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人。

南部非洲人民的独立解放是帕尔梅对国际问题发表讲话最多的题目之一。1976年他下台后，直到他重新上台、不幸遇刺，他一再利用本国议会、社会党国际、联合国以及其他许多国际会议，猛烈抨击南非及前罗德西亚的白人统治（参见附件二：帕尔梅演说《社会民主与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明确表示社会党“永远不能站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一边”，“我们必须站在贫穷民族、被压迫民族一边，支持南部非洲继续进行斗争。”他提醒社会党国际注意博茨瓦纳总统的话：

“独立的非洲与西方世界的友谊是否会继续，这将取决于西方对南部非洲解放的态度。”帕尔梅认为非洲民族主义者追求的只是民族独立，反对种族歧视，他们独立后不会参加两个超级大国的集团，而会走不结盟道路，因而必须争取。帕尔梅揭露、鞭挞南非和前罗德西亚白人政权野蛮残暴的种族隔离政策，与他们势不两立。

英国等老殖民主义者以及美国在南非拥有重要经济、军事利益，总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维护伍斯特和史密斯的白人统治；伍斯特和史密斯也宣称他们是维护西方自由、民主而统治南部非洲的。帕尔梅大声疾呼：非也，种族歧视不能与西方民主、自由混为一谈。“史密斯最近说罗德西亚和南非达成一致意见，将为保卫白人带到非洲来的西方民主而继续斗争。伍斯特则要求其他国家支持他为‘自由世界’利益而进行的战斗，”帕尔梅说。“难道这些人没有汲取一点教训吗？让我们把话说清楚，民主社会党人将永远不会接受史密斯维护的西方民主，我们永远不会将伍斯特的压迫、种族主义纳入自由世界之中……”

西方领导人中有几个能为被压迫的中小国家说句公道话的呢？帕尔梅甘冒美、英等国之大不韪，说了！非洲国家领导人当然对他很感激，而且把他看作大善人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开始关注南非的种族歧视问题，50年代时对南非还多限于道义上的谴责；而对南非采取孤立和制裁的行动，主要是从60年代初开始的。对南非政权进行经济制裁，是国际社会支持南非黑人运动，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斗争的重要方面，是切断白人当局的外部供应和支持，削弱其镇压能力的有效途径。联合国大会多次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但由于美、英、法三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交替使用否决权，使安理会一直未能通过对南非实施强制性经济制裁的决议。60至70年代中期，西方资本大量涌进南非，西方国家和南非的贸易也在继续进行。

1976年底，帕尔梅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负责对南非问题研究小组的工作。1977年，他三次前往南部非洲进行实地调查。在帕尔梅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1979年瑞典议会通过了禁止向南非投资的法案，瑞典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行经济制裁的国家。瑞典的一些公司开始从南非撤离，瑞典企业不再向南非进行新的投资、贷款或进行技术转让；而南非的农产品、食品禁止进入瑞典。

与此同时，瑞典政府又从财政上给予南非解放运动以最大的支持。瑞典每年援外预算为12亿美元，其中给予南部非洲国家和解放运动的援助为5.4亿美元，占援助总额的42%。据统计，自60年代以来的二十至三十年间，南非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每年得到瑞典2000万美元的财政援助。

就在帕尔梅遇刺前的一周，1986年2月21日，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瑞典反对种族隔离人民议会”会议开幕式上，帕尔梅还发表了重要演讲，

呼吁全世界行动起来，向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施加压力，以消灭种族隔离制度。他批驳了南非当局要对现制度进行改革的作法，他说：“种族隔离制度是不可能改革的，只能被消灭。”

帕尔梅在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态度坚决，旗帜鲜明，越南当然感激不尽，其他亚非拉国家也无不喝彩。帕尔梅的这些表现为他、为瑞典在国际上赢得了众多朋友。当然他也着实冒犯了美国。然而为了国家利益，抱歉得很，只好得罪了。

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帕尔梅怒发冲冠，声色俱厉地痛斥前苏联，说苏军“野蛮侵略”是“疯狂战胜理智”之举，是公然侵犯别国主权的罪行，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遗臭万年。

“军事干涉别国内部事务，无论如何也是没有道理。人民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正当大家为控制军备竞赛，为消除饥饿和反对殖民主义奋斗之时，苏军入侵阿富汗事件给大家当头一棒，给另一个超级大国以口实，更加紧扩充其军事实力和在美国以前尚无军事基地的地方驻扎部队，给不结盟运动以沉重打击——阿富汗是不结盟运动的一员。”

帕尔梅心血来潮，1985年出访拉丁美洲时，居然正式访问古巴。古巴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美国千方百计去孤立它、扼杀它。西方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敢与古巴接近，小国固然不敢，英、法、德等大国也不敢。何必为一个共产党小国使美国不快呢？但帕尔梅去了。这确是需要相当魄力的。卡斯特罗当然倾全国所有，热情接待他。

帕尔梅为巴勒斯坦伸张正义。1983年春天，他送走应邀来访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后不久，在斯德哥尔摩大教堂的特别宗教仪式上，呼吁以色列“承认巴勒斯坦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致使旅居瑞典的犹太人骂他是“法西斯”，“是闪米特人的敌人”。

尼加拉瓜桑地诺革命成功后，帕尔梅又甘冒华盛顿雷霆之怒，成为西方国家第一个正式访问尼加拉瓜的领导人，而且发表了措辞相当激烈的演说。帕尔梅演说用的是西班牙文，能与听众直接交流，效果奇佳。二百多年前，林肯在格拉斯堡发表解放农奴的著名演说时，听众鸦雀无声，人人都被他的讲话打动，都在仔细咀嚼每个字的深沉含义，直到林肯演讲完毕，听众仍静静站立，一动不动，忘了鼓掌，更无欢呼。帕尔梅演说时情况正相反，听众对他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掌声和震耳欲聋的口号。从会场反应来看，帕尔梅的演说毫无疑问是绝对成功的。美国国务院声称帕尔梅讲话是“片面的、挑衅性的……有倾向性的。”美国驻瑞典使馆向瑞外交部提出抗议，两国关系又像以前那样僵冷。

帕尔梅也对美国的抗议作了回答。他利用社民党青年团代表大会，抨击美国在中美洲的政策。

“有人说桑地诺是共产党，是专制独裁，政府不是人民选择的，因而，反对他们的措施——华盛顿如是说——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美洲国家组织条约的。让我们来看看联合国宪章等文件所表达的国际法，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规则：任何国家不得干涉他国内政；任何国家均要尊重他国边界和领土完整——所以大国不应为所欲为；各国应尽力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

“中美洲继续是这些规则遭到破坏的地方。国际法对小国有特别重要意义，只要这些规则遭到破坏，不管是在阿富汗，还是在中美洲，我们都要进

行抗议。而且，美国看来要否认尼加拉瓜政府的合法性。尼加拉瓜的民主是有不足之处。要掩盖这个事实是无理由的。由于尼加拉瓜国内的政治形势，有些反对党没有参加去年的选举。然而选举毕竟是朝尼加拉瓜革命的民主目标迈出的重要一步。索摩查时代根本没有任何选举，美国也从来没有就此提出过批评。

“索摩查的卫队和雇佣兵根本不是拥护民主的旗手。也不是自由战士。所谓对付尼加拉瓜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只不过是抢劫贫穷农民的远征军而已。”

帕尔梅发表这一重要演说后四周，便与恩师埃兰德诀别。

1985年6月埃兰德逝世，享年84岁。五万人自动为他送葬。尸体运回老家兰赛特安葬时，沿途城镇居民夹道送行，将一朵朵红玫瑰撒在他的灵车上。在他生命垂危的日子里，帕尔梅多次去医院看望，他们谈话的主要内容仍是政治，谈起3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的分裂和希特勒上台。帕尔梅敬重埃兰德，称他是“技巧娴熟的政治家”。帕尔梅眼见瑞典人民把他捧为“国父”，场面令他感动。他想他也一定要使瑞典将他奉为“国父”

作为和平中立国家的首相，他最关心的当然是裁军、缓和美、苏超级大国和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及世界和平问题。

1976年他下野后，担任社会党国际副主席，是勃兰特的副手，他以此身份为社会党国际在国际上做了大量工作。他曾接受联合国秘书长的委托，担任调停两伊战争的特使。1980年伊朗和伊拉克爆发战争，两个阿拉伯国家兄弟阋墙，同室操戈，双方损失惨重，世人无不痛心。许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出面调停，均无果。是年帕尔梅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进行调停。他五下中东，在战火纷飞的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穿梭，使尽全身解数，奈何两伊积怨太深，帕尔梅无功而返。

裁军是帕尔梅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他为和平、裁军大声疾呼，几乎喊破了嗓子。他组织起“独立的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发起“五大洲和平倡议”，召开三十四国裁军会议，竭力推动裁军。

1974年，他作为首相，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举办的、庆祝瑞典一百六十年无战争的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帕尔梅列举美、苏核竞赛造成的险恶形势，呼吁他们裁军，说：“几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瓦尔德告诉我们，核大国手中武器的杀伤力相当于全世界每个人——男人、女人和小孩——十五吨TNT炸药。今天这个数字还要大。完全摧毁人类文明也不需要这么多炸药。……如今有种说法：确保同归于尽（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缩写就是‘MAD’——‘疯了’！把这一说法缩写成‘疯了’是非常恰当的……”帕尔梅接着呼吁两个超级大国缓和，说：“缓和对小国决不是毫不相关的。我们生活在超级大国的霸权日益变本加厉的时代。它们拥有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在武器制造技术方面最为明显，在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也是如此。这对小国的独立构成威胁。”帕尔梅进而号召中小国家加强团结，当然最好是在瑞典领导之下。“小国如果想要保持独立，它们必须具有建立相互一致和彼此团结的能力，以寻求国际问题的解决。”（见附件：《世界和平，超级大国与民族独立》）

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积极准备在欧洲部署“潘兴-1号”巡航导弹，1980年里根上台后，准备工作更是加紧进行。西欧各国（除英国外）强烈反对，前西德人民更是怒不可遏，群众示威游行，包围美国在欧洲军事

基地事件层出不穷。此事虽与瑞典无直接关系（“潘兴-1号”导弹无论如何也不会部署在瑞典国土上），但帕尔梅岂能置若罔闻。他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竭力制止美国计划。他驳斥美国“潘兴导弹只是中程导弹，是战术核武器”的观点，说“核战争不可能是有限的，一旦打起来，全世界都得卷进去，超级大国的国土也不可能幸免于战争之外。美国如果幻想核武器可能是有限的，那么他们的幻想肯定会破灭。

“美国这条战略正渐渐把我们引向核大战，引向最终毁灭。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今天宣布，它将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么整个欧洲会松口气。”

“独立的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又称“帕尔梅委员会”）连忙发表一份文件：《共同安全：生存蓝皮书》，提出一个重大建议：中欧无核武器走廊。这个文件以帕尔梅名义发表，作为瑞典的倡议。文件称这将促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和相互之间的信任。美国对此当然不感兴趣。美国的借口是前苏联在常规兵力上占绝对优势，而且就部署在前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前沿，部署在前苏联的第二梯队、战略预备队增援也很方便，不似美国需远涉重洋。所以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必须保持核威胁，必须更新中程导弹，使苏联知道，它一旦轻举妄动，就必然是核大战，就是同归于尽。

英国等个别北约国家对帕尔梅的建议非常反感；联邦德国、奥地利等国则非常欢迎，其他国家无动于衷。然而使帕尔梅难堪的是，瑞典外交部一官员跟记者聊天时说漏了嘴，泄露天机，原来这是“独立裁军与安全委员会”前西德代表埃贡·巴尔的主意，帕尔梅只不过是给联邦德国社民党效劳而已。此事很快见诸报端，帕尔梅当然矢口否认，但不少人相信这个说法。因为这项倡议的直接受益者是前西德等中欧国家，核武器像瘟神，谁愿将美国核武器放在自己家里呢？这项倡议如出自中欧国家将是不难理解的。

作为反对党领袖，帕尔梅并没有花很多精力去考虑如何夺回政权。1976年下台时，他责令副手英瓦尔·卡尔松制定一个夺回政权和恢复瑞典经济的战略，自己则去国外访问。他觉得议会整天辩论这里是不是要铺条路，那里是不是该修座桥等鸡毛蒜皮问题，太琐碎了，索然无味。政治家不能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他看到瑞典议员为建核电站问题慷慨激昂，个个争得面红耳赤，暗暗觉得好笑。能源问题总要解决的，况且核电站有的已建成，难道拆掉不成？！对不起，恕不奉陪，他又出国去解决世界问题了。

1981年国内政治形势已十分明朗，“非社会主义集团”政府完全丧失民心，不推自倒，下台是肯定无疑的。这年12月他来到日本，来到世界上第一个遭到原子弹袭击的长崎，向世界上第一批被原子弹杀害的死难者献花圈。他看了遇害者被活活烧死的照片，真是惨不忍睹。他心情沉重地说：“如果超级大国这场失去理智的军备竞赛继续下去，人类的命运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呢？”他对一个记者说：“这些不幸的受害者变成了一堆鬼魂，我今天还能听到他们当时喊着要水喝的声音，还能看到他们即将死亡前的挣扎。这是真正的人间地狱。”

回国途中，帕尔梅访问新加坡。这是旧地重游。二十八年前当他还是学生时，第一次来到这个岛国，不过那时它还是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贫穷落后，民不聊生，沼泽地旁边贫民窟的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而英国绅士一个个衣冠楚楚，淑女则婀娜多姿，这种强烈对比曾使帕尔梅心灵感到震撼。如今这个岛国独立才十多年，却完全换了人间：国家欣欣向荣，市场上商品琳

琅满目，街道清洁整齐，人民安居乐业，一切无不使人赏心悦目。帕尔梅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虽都信奉西方民主制度，但政见颇不相同。李光耀总理能把国家治理得如此井井有条，不能不使帕尔梅肃然起敬。难道世上真的有比“瑞典模式”更好的模式？

回到斯德哥尔摩阿兰达机场，儿子开车来接他。帕尔梅看到机场上几乎都是来自国外度假归来的人。

隆冬季节，整个瑞典好像笼罩在黑暗之中，斯德哥尔摩白昼不超过六七小时，北方更短。太阳更是稀客，偶尔出来一下，人们便放下手中的工作，走出家门，站在户外，享受这上苍给予的恩赐。

有些人此时去东南亚、以色列、太平洋东北部之加那利群岛，去寻找太阳。他们连续数小时躺在海滩上，把皮肤晒红、晒黑。回家后这红中透黑、黑中透红的肤色便是他们在海外度假的证明。机场上这些人，手上提着装满免税商品的大小塑料袋走出海关时，前来迎接的亲友欢呼雀跃，又搂又抱，对他们的肤色少不了赞美几句。

帕尔梅也是从充满阳光的亚洲回来，但他面呈倦容，还是那么苍白——他在东方访问时没有时间去晒太阳。

回到瑞典，适逢波兰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大将宣布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接管了国家政权。西方称之为“十二月军事政变”。帕尔梅又按捺不住心头怒火，痛加谴责。“这决不是内政问题”，帕尔梅说。“我迄今未谈过人权问题，但根据赫尔辛基条约，发生此类情况时，决无‘内政’可言。”

1975年的赫尔辛基会议迫使前苏联在人权等若干问题上作出让步，为东西方缓和起了一定作用。但随着美国里根政府上台，在欧洲部署潘兴-1号导弹和实施“星球大战”计划，形势又趋紧张。赫尔辛基进程遭到挫折，有必要把这快熄灭的火再燃起来。于是，1984年1月，帕尔梅倡议召开旨在加强欧洲信任和安全措施的会议，三十四个国家外长来斯德哥尔摩与会。帕尔梅又有机会扮演其“和平缔造者”的角色。会议开始前帕尔梅对记者大谈东西方对话、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以及裁军的重要性。

“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是保卫和平。每人都会认识到战争对他意味着什么。其实我们从长崎的遭遇已经知道了，然而不是每个人都从中吸取了教训。今天的核武器比投掷在广岛、长崎的所谓小原子弹要可怕得多。美国科学家最近作了一项试验，结论与他苏联同行相同，我对这份研究报告印象极深，即一场核大战，即使是使用现有核武器中的一小部分，也会导致气候发生灾难性变化，遭到核打击的城市将会化成一片火海，而塑料燃烧后释放的黑烟将笼罩整个天空，一切将坠入黑暗之中；然后是地球上气温下降二十度。问题就来了：核大战后地球上的生命还能存在吗？这前景令人不寒而栗。”

记者：“有些世界政治家和学者说核战争不会如此可怕，不会导致全球毁灭，甚至说美国在核大战后能完全恢复过来。”

帕尔梅：“纯粹是幻想。当然核大战后是否会有某种形式的生命残存下来，这可争辩，也许某种生命会保存下来，或核大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会再生出新的生命，然而……”

记者：“然而不是我们希望有的那种生命？”

帕尔梅：“当然不是。一场核大战是否全球毁灭，或

几乎全球毁灭，这是可以辩论的问题。但对核战争抱有任何希望的话，

这纯粹是幻想。”

记者：“有无可能打赢一场核战争呢？几乎所有负责的政治家和研究人员都说核大战中没有胜利者。”

帕尔梅：“肯定不会有胜利者。核大战只有战败国。

胜利本身已无意义。两个核大国对此都很清楚。

“即使国际关系恶化，也毫无理由停止裁军和安全方面的对话，恰恰相反——现在尤其十分需要对话。我们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对话，这是至关重要的。”

斯德哥尔摩为美苏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机会。但对话开始气氛较僵，因为美国利用不久前韩国 KAL007 民航客机被前苏联战斗机击落、机上一百多名乘客全部丧身的事件大造舆论，企图置苏联于被动地位。苏外长葛罗米柯是位老外交家，40 年代起就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驻美国大使等重要职务、当然知道外交上是不能当被告的，无理也要狡辩三分。他是堂堂超级大国代表，岂能认错。他指责美、韩利用民航班机飞越苏联上空时故意偏离航线，窃取苏联地面上的情报。KAL007 被击落是因为它不听从苏联军方警告，赶快降落，而是企图逃跑。葛罗米柯与舒尔兹一见面就发生争执。但俩人又很快言归正传，进行了认真会谈，帕尔梅认为这是他们提供的直接对话的结果。他感到高兴，自感又为缓和做了一件好事。

舒尔兹和葛罗米柯在前苏联大使馆举行长达五小时的马拉松会谈。表面看来会谈似乎有些成果。帕尔梅估计，正是这次会谈导致美苏同意废除两国部署在欧洲的中、短程导弹的条约——其实这些导弹已经过时，维持它们每年要花大笔开支，而废除后双方实力有增无减，何乐而不为。不过里根与戈尔巴乔夫签署这项条约时，已是 1987 年，帕尔梅已经躺进弗雷德里克教堂的墓穴里。

斯德哥尔摩裁军会议后，帕尔梅认识到现有组织和传统机构已不敷需要，得寻觅非标准的方法，动员更多的人注意当代最紧迫的问题。几个月后，即 1984 年 5 月他与阿根廷总统劳尔·阿方西姆、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希腊总理安德雷斯·帕潘德里奥、墨西哥总统米盖尔·德·拉·马德里，以及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共同发起“五大洲和平倡议”，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明说：

“眼下全人类的继续生存面临着严重威胁。军备竞赛的升级和国际局势的恶化大大增加了核战争的危险。哪怕使用现有核武器的一小部分就会给所有国家带来死亡和破坏。

“我们代表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然而我们在一个共同信念上团结起来：不能有核战争。所以我们决定共同保卫和平。“作为第一步，我们呼吁停止试验、生产、部署核武器系统以及它们的运载工具，随后立即和大量消减核力量。这第一步完成之后，要实施裁军计划，最终导致全面和彻底裁军。”

帕尔梅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是这份联合声明的起草人。两个核大国反应不一。前苏联表示支持，承担不对无核国家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义务，美国根本不予置理，而是加紧推行其“星球大战计划”。

1983 年 3 月 23 日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首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星球大战计划》。里根先展示四张卫星拍摄的照片和一些图表，说明苏联导弹力量“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强调美国必须进一步发展战略进攻武器，

同时要加紧研制空间时代的超级武器，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以便在苏联导弹到达美国之前，进行层层拦截，予以摧毁。就是说军备竞赛将发展到外层空间，使外层空间成为海、陆、空之外的第四战场，未来战争有可能是从外层空间向地球目标进行袭击的超立体战争。《星球大战计划》将耗资八千亿至一万亿美元。如果一切进展顺利（事实证明并不顺利），2000~2005年完成空间武器试验并全面投产和逐步部署，2005~2015年全部完成。

帕尔梅当然反对美国这项扩军计划。1985年1月，发起“五大洲和平倡议”的六国政府首脑在新德里开会。帕尔梅说：“我们觉得外层空间应该在军事对抗之外，全世界人民要求立即停止这场军备竞赛。”

六国首脑会后发表《新德里宣言》，呼吁美苏终止核武器试验，并签订一项完全禁止核试验条约。

这年秋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举行美苏“最高级首脑会晤”，帕尔梅又代表六国首脑向美苏首脑提议暂停核试验。

“我们建议你们停止所有核试验一年，一年后可再延长，甚至完全停止。我们希望其他国家也采取相应行动。”我们相信这将极大改善签订突破性协议的前景，将结束新的、速度更快、精确度更高的武器的发展。”

帕尔梅的呼吁如同落入聋子的耳中。更令帕尔梅焦虑的是波罗的海形势。

中立的瑞典不应有敌人。但瑞典与前苏联关系一直很僵，瑞典军队及其战略部署也一直以前苏联为假想敌。撇开历史宿怨与意识形态不谈，据说前苏联一直对瑞典虎视眈眈，时时侵犯其领海和领空，两国不愉快事件时有发生。所谓“威士忌加冰块”事件就是其中之一。这是指前苏联一艘“W-级”潜艇侵入瑞典领海后在一个小岛上搁浅而被擒事件。喝威士忌有的人要掺苏打水，有的人是加冰块，有的人则什么也不加。在小岛上搁浅的俄国潜艇碰巧名为“威士忌”，故将此事件戏称为“威士忌加冰块”。瑞典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全国沸沸扬扬，好不热闹。事件简单经过是这样：

1981年10月27日，前苏联一艘“W-级”潜艇在瑞典南部主要海军基地卡尔斯克罗那不远的小岛上搁浅，瑞典海军居然没有发现，而是被一个渔民看见后，打电话告知海军，海军赶快派人到现场查看，果然不错，是俄国“W-级”潜艇，趴在岛上不能动弹了！查看的军官还说，四周有放射性物质，潜艇很可能带有核武器！舆论哗然，全国震惊。海军司令胀红了脸。

俄国潜艇指挥员以及克里姆林宫诡辩说，这是潜艇导航系统发生故障所致。这种鬼话当然无人相信。前苏联远东舰队也经常派潜艇深入我领海侦察，美国，甚至英国又何尝不经常光顾我领海。五年前，一个英国海军上校对笔者说，他和他的潜艇有次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在离广州不远处的海底差点与一艘中国潜艇相撞。我国海军也许发现了，未声张，也许没有发现。但瑞典抓获了俄国潜艇，人赃俱在，不容抵赖。

“小国无外交，弱国无国防。”但瑞典不信这个邪，定要前苏联政府“澄清”自己的解释。俄国人置之不理。瑞典无可奈何，只得在提出抗议后将潜艇拖到国际水域，眼睁睁地看它开回俄国。

但报刊舆论并未就此罢休。几乎所有报纸每天都是通栏标题“威士忌加冰块”。当时的首相是费尔丁。他为转移瑞典人的视线，喊叫声更响。幸好外交大臣乌尔斯坦处置得体，方没有将此夸大到可笑的程度。帕尔梅作为在野党领袖，当然也不甘寂寞。他在青年团召集的群众大会上义愤填膺地谴责

俄国海军入侵。“俄国携带核武器潜艇潜入瑞典领海的消息就像一阵冰凉的风掠过全国，瑞典人焦急、忧虑、惊恐不安、愤怒异常。”帕尔梅说。他进而高呼必须将波罗的海变成无核的海，不准任何带有核武器的舰船在此游戈，他说：“苏联如果要使别人相信它，最好的办法是使波罗的海解除这些威胁，使其成为和平的海。”

从此以后，瑞典军方就隔三差五的向报界透露有外国潜艇入侵瑞典领海的消息，报刊照例大喊大叫几天，每次又都是捕风捉影，不了了之。一次军方宣布“不明国籍潜艇”确已潜入瑞典领海，军方正在搜捕。数日后，海军司令满面通红地对记者解释说，这次是值班的义务兵受附近震耳欲聋的斯科吵闹声干扰，从声纳监测器上错将基地上一台旧冰箱发出的声波当作潜艇发出的声波。“追捕”行动到此结束。

次年帕尔梅上台后，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调查外国潜艇入侵问题。1983年这个委员会发表报告，说“迄今”有两种俄国微型潜艇进入瑞典领海，并向新闻界出示微型潜艇在海底留下痕迹的录像，帕尔梅信以为真，召回瑞典驻前苏联大使“述职”，并非常自信地向前苏联驻瑞典大使鲍里斯·潘金提出抗议。潘金长期任苏联驻瑞典大使，对瑞典和瑞典社民党很有好感。他在叶利钦推翻戈尔巴乔夫斗争中是前苏联驻外大使中最先支持叶利钦的，斯德哥尔摩外交界以为他会升任俄国新政府的外交部长，结果被调到捷克斯洛伐克当大使。帕尔梅对潘金说：“瑞典政府要求苏联政府指示苏联海军：停止对瑞典领海的破坏。”

前苏联政府对帕尔梅的抗议置之不理。此刻瑞典海军又报告说，在其波罗的海东海岸的松德瓦尔市海域，发现不明国籍的微型潜艇，但不幸被逃脱。其他地方也呼叫发现微型潜艇。瑞典军方断定，尽管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对外作出缓和姿态，但微型潜艇仍是苏联派遣的，目的是利用瑞典沿海的深水进行演练，也是为了查清瑞典沿海海底情况，以备战时特种部队登陆用。一天军方宣布又在松德瓦尔截获一份俄文密码电报，正连夜组织破译。似乎这下又抓住把柄了。然而，密码破译后，原来是一架正在欧洲某地上空飞行的苏联民航班机发出的电报！不能否认前苏联潜艇当过不速之客（否则“W-级”潜艇搁浅怎么解释呢？），但瑞典军方夸大其词。殊不知这样做并不明智。不叫的狗会咬人，整天叫“狼来了”，人家也就不信了。帕尔梅认为瑞典海军大概是为了多要些军费而故意夸大事态的严重性。即使确有微型潜艇入侵，也不一定全是俄国的。叫喊太多后弊大于利，使人产生瑞典防御脆弱的印象，有损瑞典武装中立的地位。于是他跑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对正在那里开会的北约国防部长说：“我们对瑞典防御力量充满信心。世界各国都肩负保卫本国领土完整的责任，战时是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破坏瑞典领土主权的行为必须制止，一旦发生，必予还击。我们海军力量正在加强，我们会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来执行这项政策，谁也不应对我们的决心存有任何误解。”

他还通过阿尔巴托夫就潜艇事件向前苏联进行秘密交涉。阿尔巴托夫是前苏联的基辛格，是三朝元老，深得历届总书记的信任。他是“独立裁军与安全委员会”中的前苏联代表。据说阿尔巴托夫回答得很干脆：“瑞典必须认识到，潜艇入侵是超级大国战略的正常部分。”阿尔巴托夫的谈话被瑞典外交部一官员透露给报界。保守党的《瑞典日报》说，帕尔梅不但不气愤，还指示他的特使跟阿尔巴托夫交涉潜艇入侵之事时要适当“降调”。帕

尔梅看到报纸报导后，跑上电视，说这个外交部官员断章取义地泄露他跟阿尔巴托夫的谈话，是个“坏蛋”。斯德哥尔摩大街上立即出现右翼张贴的标语：“埃兰德——国父也，帕尔梅——叛徒也”。

尽管帕尔梅召集的“斯德哥尔摩裁军会议”似乎搞得不错，但据说俄国潜艇仍不断光顾瑞典沿海地区。就在俄国“W-级”潜艇1981年搁浅的卡尔斯克罗那海军基地附近，又发现“不明国籍”的潜艇，瑞典海军组织大规模的追捕行动，也是时间最长、花钱最多、最无效果的一次，出了不少闹剧。一次瑞典士兵说是发现两个“蛙人”。于是毫无目标地开枪射击；一次瑞典部队拦下一个抬着棺材的出殡队伍，坚持要开棺查看，说里面躺的是“蛙人”，引起当地群众不满。

帕尔梅对海军声势浩大的追捕活动沉默不语。新上任的保守党党魁，乌尔夫·阿德尔松批评帕尔梅不仅没有表态，且派外交部政治司司长扬·埃里亚松去莫斯科。帕尔梅反驳说，在抓到潜艇以前他什么话也不说。私下帕尔梅觉得海军也许是为了增加军费故意喊叫“狼来了”，他不能受其影响而中断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战略部署。

然而，1984年8月，前苏联一架苏式战斗机闯入瑞典南方果特兰岛上空，与一架瑞典民航客机“擦肩而过”，两机相距仅两公里余，几乎相撞。这次帕尔梅不再沉默，而是利用社民党代表大会的讲坛，对苏联进行愤怒谴责。同时阐述了瑞典中立外交与加强军事力量的关系。他说：

“如果这个世界开始怀疑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我们执行中立政策的能力无论如何要受影响，不管我们军事力量如何强大。正因如此，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我们的第一条防线。

“与此同时，如果我们用军事手段保卫自己的能力受到他人怀疑，我们也不能推行我们的中立政策。和平时期我们要借助我们的军事力量保卫我们的领土。我们一定要具备能把侵犯我国领海和领空的人击退的能力。我们必须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战时谁想进攻我们，就该再三考虑他们这样做所包含的危险。

“近几年来，有人已经表现出对我国领土的不尊重。我们对侵犯我国领空的人已准确地指出他们是谁，入侵了多少公里。对我国领海已发生多次严重侵犯，但此事更复杂，难于发现，更难于识别。我们对入侵者进行跟踪和打击的手段，包括情报与装备，每月都在加强。”

帕尔梅宣称，瑞典将击沉外国入侵的潜艇。

“我们不向超级大国屈服，我们必须有面对面正视他们的信心。在越南问题上，在美国超级大国对一个小国发动非正义战争问题上，我们是这样做了，在今天与苏联的复杂关系中，我们也一定要有信心这样做，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自己国家的安全利益。”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即1986年2月28日，他以“五大洲和平倡议”六个发起国政府首脑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的信，“你们对我们大家的共同生存负有重大责任。世界人民将支持你们采取的每一个引导我们向世界摆脱核大战威胁的目标前进的每一步骤。”

帕尔梅去了，世界从此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似乎缺少了什么。

第十章 菲薄遗产

帕尔梅遇害业已十年，凶手至今逍遥法外。警方曾逮捕几个嫌疑犯，因证据不足，均一一释放。其中一个叫彼得松的，由于帕尔梅夫人一口咬定，她那晚看见枪杀她丈夫的正是此人，彼得松于是被判有罪。

彼得松劣迹昭著，13岁起开始偷盗，16岁起吸毒，曾在大街上用匕首活活将人捅死，但因是少年，只在精神病医院里关押了半年。释放后劣性不改，又杀其生父，被判徒刑。然而这次他矢口否认与杀害帕尔梅有任何牵连，不服判决，上诉高级法院。高级法院审理后，判定证据不足，将他无罪释放，并赔偿30万克朗，以弥补他在监禁期间的损失。警方后来怀疑杀害帕尔梅有国际背景，提出了一长串有嫌疑的国际组织名单，其中有联邦德国“红色旅”、已被通缉的阿布·尼达尔及其同伙的恐怖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克格勃，智利皮诺切特当局，伊拉克情报部门，伊朗政府，南非秘密警察BOSS。然而侦察结果，因无证据而一一否定。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1996年10月），报纸透露，警方认为很可能是南非秘密警察BOSS所为。结果如何，谁也不能断言。

1987年11月20日美国《先驱论坛报》刊登一则广告：

悬赏

5000万克朗

（约合820万美元或1130.5万瑞士克朗）

瑞典政府奖励为破获1986年2月28日枪杀

帕尔梅首相

而提供情况者

奖金可根据有关国家规定在瑞典或在国外领取

请与斯德哥尔摩警察局帕尔梅专案组联系

地址：12256信箱

S-10226

斯德哥尔摩

瑞典

这份广告同时用法文和西班牙文刊载。

帕尔梅夫人看后不禁苦笑。她和她已故丈夫全部不动产加起来还不及这个悬赏金额的百分之一，而如今能够提供杀害她丈夫凶手线索的人竟可以得到5000万克朗！价值标准是否完全颠倒了。但是她丈夫只值5000万克朗吗？对她来说，她丈夫是元价之宝，无论多少金钱也换不来的。对国家来说，损失也太大了。凶杀像腐蚀性极强的酸剂，破坏了瑞典社会这块漂亮的刺绣。过去国王、首相、大臣等要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大街上、公园里散步，或上餐馆吃饭，或去剧院看戏，像所有平民百姓一样。今天准还敢呢？人人自危，要人外出必须带警卫、保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时代一去不返了。帕尔梅夫人自言自语他说：瑞典不只是失去一位首相，瑞典的灵魂也差不多随帕尔梅而去了。

瑞典许多人会附声同意帕尔梅夫人的。十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仍怀念他。一位瑞典名牌大学查尔摩斯科技大学研究生安妮卡说：瑞典再也找不到帕尔梅这样精明的领导人了，我们有种失落感。不知瑞典将会怎样发展。至于帕尔梅的崇拜者，他们仍将他视为偶像。他的心腹记者斯特朗德更是瑞典的沙

文。帕尔梅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他的楷模。他说：“80年代初，人们不乏崇拜的偶像。有些瑞典偶像在国外也久负盛名。精力充沛的滑雪运动员英格玛·史但马克，或是阿巴（ABBA）摇滚乐队，或是网球巨星鲍里斯·贝里（英国人释为“伯格”）。想想他垄断世界网坛霸主地位多少年吧。以前凡有史但马克、贝里的比赛，瑞典人都会回家看电视转播，街上空无一人。白天转播白天看，夜里转播夜里看。他们是瑞典人的骄傲。然而偶像就像时装一样，是短暂的，是经常翻新的。过不了多久。又有一位新滑雪冠军从积满白雪的山上猛冲下来，刷新世界记录，又有新的摇滚乐队使年轻人如醉如痴，忘我疯狂；又有其他球星得到网球迷的喝彩与崇拜。在我们这个变化无常的时代里，只有在人民需要的时刻，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人才真正热爱人民，永远热爱人民。对瑞典人来说，帕尔梅就是这种人。人民信任他有能力去稳定发展他们繁荣的经济，保护他们不受全球灾难的威胁。”

帕尔梅身边的工作人员滔滔不绝地叙述他如何热爱人民，热爱和平。他的秘书英佳·丽娜·乌林说“……他年轻时去过印度，看到过印度的赤贫，也目睹了美国的阶级矛盾和贫富悬殊，他看到富人的奢侈，穷人的潦倒，他把这些深深印在脑子里，他积累了丰富经验，已是老练的政治家，但他仍很年轻，政治生涯还是如日中天。”

“孩子和老人为和平而担心。他们给奥洛夫写信。信很多——一年约有2万封，其中10~15%是孩子们写的，有的信开头直呼其名，很随便，像朋友一样：‘你好，奥洛夫，我名叫安娜，10岁了，我要永远和平。’每个写信的孩子都得到他的回信。现在我们每每想念他，就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些。我想起年轻人在斯德哥尔摩大街的邮筒上写的关于他被害的话，‘是谁杀了我们的和平鸽？’今天我到墓地上去看他，看见人们拿着白瓷做的和平鸽，放在他墓前。和平是个重要问题，他促使许多瑞典人也去关心和平。他用不同于其他瑞典政客的方法将周边国家和世界政治介绍到瑞典来，奥洛夫使普通瑞典人与外交政策、和平、裁军问题贴得更近。”

但不是每个瑞典人都异口同声颂扬他的。痛恨帕尔梅的也大有人在，他毕竟是个“有争议的首相”。有些人对他存有偏见，给他安上莫须有的“罪名”，说他逃税；甚至编造许多男女关系丑闻，把他形容成“风流首相”，说他在国外有一百多个情妇。英国作家露丝·弗里曼觉得这对帕尔梅太不公正。她挥笔疾书，驳斥诽谤中伤帕尔梅的人。弗里曼女士肯定帕尔梅是个政治天才，27岁奉恩师之命修改宪法，充分显示出他娴熟的技巧，处置得很得体，既不与社会民主党过去宣布过的打倒君主的口号相悖，又不得罪国王，政治上机智圆滑，又有法律头脑，“如果世界上有天生领袖的话，这人就是奥洛夫·帕尔梅。1974年帕尔梅主持制订的新宪法在国会通过，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颠峰。”弗里曼女士并赞扬帕尔梅为官数十载，最后两袖清风，家里的陈设非常简朴，没有奢侈品。沙发虽很舒服，但已半旧，“他的敌人用几十倍放大镜查看，也找不出帕尔梅经济上有任何疏漏之处，连最擅长造谣的英国记者也无法编造出帕尔梅贪污受贿的故事。”弗里曼女士进一步写道：“唯恐天下不乱的报纸、电视台，电台竭尽造谣诽谤之能事，一再重复那些捕风捉影的谎言，寻找帕尔梅生活中不光彩的一面。英国记者编造出帕尔梅与他英国情妇的故事，似乎要人相信帕尔梅遇害是桩桃色纠纷。任何对帕尔梅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生前有个情妇，但不在英国，而是在瑞典。谁都知道他是个十分勤政的首相，对他来说工作比女人更重要，更有吸引力，花

的时间和精力也多得多。任何女人不会容忍帕尔梅对她的冷淡，而甘当他的挂名情妇的。美国管帕尔梅这样的人叫什么来着？‘工作狂’，不是吗？”

“世界上有几个（如果真有的话），像帕尔梅这样身居高位又两袖清风的人呢？他和丽斯贝特住的那间房子是一位好心朋友为照顾他上下班方便硬借给他的。他们夫妇在郊区确有一幢住房，但那是“一百万套”突击造房计划时的产品，比简易楼好不了多少，除低工资工人外，大部分工薪人员都买得起。”

“帕尔梅也有缺点，甚至错误。他不追求个人财富，或舒适生活，他追求的是权。如果有谁妨碍他，或企图要他做他不愿做的事，他会残酷无情。然而他有勇气，有原则，就像越南战争中他敢公然反抗美国那样。试问瑞典有谁有这样正义感，这样勇气和这样领袖品质呢？”

财政部官员、帕尔梅以前的私人秘书扬·卡尔松则把帕尔梅说成是十全十美的完人，生活简朴，“乡间的休闲小屋里没有电灯，也没有电视，这在瑞典是很不多见的”；说他对人体贴入微，“他对家里人非常关心——不只是关心他的妻子、孩子、还有他的亲戚。此外，他挤出时间来跟朋友聊天，很多情况下，都是在电话上聊，他通过这种方式了解许多情况。大约一年前，我离开首相办公室到财政部任职。每到星期六上午，我们一般要在电话上聊半个小时，无话不谈。帕尔梅尽管很忙，还能做到面面俱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还抽出时间跟社会党国际主席威廉·勃兰特打个电话，给几位上了年龄的人和身体不好的朋友打个电话，关心他们的健康状况，给他的球友打个电话，商量下一次网球赛何时举行，当然这场网球赛永远取消了。晚上他和我妻子在电话上聊了一阵，谈他老城的寓所里取暖问题（这房子里确实很冷），又跟我谈了一个政治问题。”

“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能为世界和平作出真正的贡献，因为他在世界上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他在‘帕尔梅委员会’里作的一切工作（跟阿尔巴托夫以及其他人士一起所作的工作），为安全问题找到了一个全新的途径——开始对东西方对话产生了影响。所有这一切表明奥洛夫·帕尔梅为国际上的和平发展，特别是反对核武器，真是呕心沥血……”

“我像其他所有具有社会主义世界观的人一样，认为个人作用在社会发展中只起次要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说，特定个人在某些情况下能起巨大的作用。我们已经失去了这样一个人。在今后十至十五年里帕尔梅会对制止军备竞赛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的。以前瑞典人身处瑞典，对此并无察觉。帕尔梅全心全意投入这场斗争，每星期与政治领导人、和平运动的斗士以及世界许多国家政府进行接触，这对许多人来说都是意想不到的。”

自己亲属、部属的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帕尔梅没有给妻儿留下多少财产，这是他为官清廉的见证。但他也没有为社民党、为自己国人留下更多的遗产。他是社民党第四代领导人。他的前任每人都为党和国家留下一笔可观财富，也为他们自己树立一块历史丰碑。唯帕尔梅政绩平平。帕尔梅中断了社民党连续执政近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将政权拱手让给“非社会主义集团”；也结束了瑞典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历史。在他执政期间，瑞典经济染上了“瑞典病”。帕尔梅留给他后人思考的不是他孜孜以求的国际问题，不是世界和平、裁军，而是国内经济，是“瑞典模式”今后何去何从，继续发展？半途而废？

与他三位前任相比，帕尔梅似乎是有罪之人了？

瑞典社民党官方宣传它的第一代领导人是 H·布兰亭。其实瑞典社民党的创始人是奥古斯特·帕尔姆。

帕尔姆是个裁缝，早年去德意志，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参加了工人运动，被德意志当局驱逐出境，来到丹麦；因“劣性不改”，继续宣扬革命，又被驱逐，最终回到瑞典。1886年11月6日，帕尔姆在南方港口城市马尔默发表他第一次演说，此后从马尔默北上，到全国去动员工人组织起来，为自己的权益斗争。是年12月27日他抵达斯德哥尔摩。那天正下着鹅毛大雪，风很大，天很冷，有钱人家仍在欢度圣诞节，帕尔姆却不顾鞍马之劳，在露天向六百位听众做了一个被当地一家报纸称之为“可怕的长篇演说”。他向听众分析工人为什么穷，如何从资本家剥削、压迫下解放出来，他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和社会民主组织。斯德哥尔摩工人反应不很热烈。他们循规蹈矩，甚至逆来顺受。帕尔姆认识到需要对工人弟兄进行教育，于是第二年（1887年）回到马尔默，创建了《社会民主报》；后又在斯德哥尔摩创办《社会民主报》自任总编辑，撰文猛烈抨击当时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在宣传、启发工人觉悟的过程中，帕尔姆几度被捕。一次当局又以污蔑议会罪将他逮捕，判六个月徒刑。就是这次在狱中六个月时间里，他策划了1889年瑞典第一次“社会民主大会”（Social Democratic Congress），这次大会正式宣告成立了瑞典社会民主党。这支由工人、革命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厌倦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男男女女”组织的队伍有3149人。

帕尔姆在今天瑞典历史上被称之为唤醒千百万工人的“晨钟”，而瑞典社民党第一代领导人的桂冠则戴在 H·布兰亭头上，尽管布兰亭1907年才被选为瑞典社民党主席。

布兰亭1860年生于斯德哥尔摩一个上层阶级家庭，是乌普萨拉大学学生，攻读天文，但更热衷于政治，在学校里就成立一个激进的辩论组织。他身材魁梧，体魄健壮，蓄一把海象式大胡子，当时一家报纸说他“天生就是治人的人，是赢家。他能使人对他看法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他深感社会不公，誓为平等奋斗。他弃学从政，大学未毕业就进入帕尔姆的编辑部工作，总编辑一职很快就非他莫属。他会暴跳如雷，爱卖弄学问。但他热情，有魅力，讨人喜欢。

开始他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号召工人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886年他发表《工人为什么必须是社会主义者》谈话，猛烈抨击温和的改良派，说他们是“半自由主义的太监”，缺乏阳刚之气，只想采取温和的解决办法。待越来越多的工人站在他一边后，他又强调工人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在选举，是争得普选权。他写道：“普选权是资产阶级必须付出的代价……否则资产阶级便得接受革命法庭的裁决：破产。”

布兰亭与党内主张搞暴力斗争的“极端主义者”，如 H·贝里格林等人渐渐势不两立。

布兰亭在社民党幼年时期，影响不大的情况下，采取“借窝孵蛋”的办法进入议会。1897年他与自由党人的老同学卡尔·史达夫达成协议，以自由党名义竞选下院议员。布兰亭当选后，便与史达夫一起为争取普选权而共同奋斗。

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在以自由党为首的政党联合行动中，由于得到了工人运动的强有力支持，未经多少挫折便取得了初步胜利——男性公民首先获得了普选权。在这一斗争回合中，不能否认瑞典民族惯有的妥协传统所发挥的

作用。

社民党内主张采取暴力斗争的人为数不少，仍有一定的势力。1908年工人举行大罢工，资本家用轮船从英国运来破坏罢工的工人。这艘运送工人的轮船停泊在码头上时被炸，造成死1人，伤21人的事件。据说炸药是一个名叫安东·尼尔松的工人安放的，证据就是船上发现一分传单，传单上有尼尔松的名字。尼尔松被判死刑（这是瑞典最后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后改为无期徒刑）。

事后，布兰亭开除了“极左”的贝里格林。贝里格林另组新党，这就是瑞典共产党。

1909年爆发了全国总罢工。这是瑞典总工会与雇主协会之间的一场较量。雇主联合会自1907年起，一直抵制工人增加工资的要求，并以国际经济衰退和加强竞争能力为由，进一步削减工人工资。1909年雇主联合会决定关厂停工，致使10万工人失业。总工会动员其所属工会的30万工人罢工。总罢工虽未获全胜，但已使资本家感到工人阶级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逼近时，工会力量又有很大发展。布兰亭本着民族利益，呼吁工人加强团结，支持政府中立政策，不许党内左派造次。布兰亭亲信摩勒说：布兰亭突然“成了瑞典最宝贵的政治财富，成了瑞典最伟大的儿子”。布兰亭自此青云直上。

1917年4、5月瑞典出现“最接近革命的形势”。由于自然灾害的影响，工人无法依靠“填不饱肚子的工资”生存下去，举行罢工。贝里格林及其同志一马当先，斯德哥尔摩、哥德堡、甚至最北端哈帕兰达旁边的小岛塞斯卡罗都发生了罢工，前往镇压的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政府遂动用军队。军队此时也出现爆炸形势：士兵因为吃不饱，也手挽手走上街头，与工人站在一起。

1917年11月7日，俄国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的爆发，对于正在斗争中的瑞典工人阶级，是个巨大的鼓舞。

罢工斗争到达高潮时，布兰亭访问俄国回来。他竭尽全力将罢工纳入法制、民主轨道，使革命形势渐渐平息（1921年布兰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毫不奇怪了）。这年选举结果，社民党选票猛增，与自由党一起组织了联合政府，布兰亭任财政大臣，他的九位社民党同事亦进政府里任大臣。

1919年保守党等在国内外形势压力下，被迫接受全民普选权。从此广大工人手中的选票就渐渐成为社民党的囊中之物，社民党的胜利就不可阻挡了，成了“天生的执政党”。1920年联合政府解散，布兰亭组阁，任首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少数党政府，但寿命不长，7个月后垮台。

1921年布兰亭又组成少数党政府，1923年解散。1924年他第三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组阁。1925年逝世。

布兰亭成功地将瑞典工人运动纳入议会道路，并通过工人的选票而掌握政权，企图向世人指出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布兰亭因而被尊为在瑞典点燃社会民主党改良主义理想的创始人。他完成了社民党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政治平等。

帕尔梅与布兰亭有许多相似之处，除家庭出身、所受教育等相同外，俩人都是口若悬河，极有辩才；俩人都善于同各方面作出妥协，但在社民党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俩人都倍受敬重，也很遭人憎恨。1925年3月1日布兰

亭逝世时，瑞典最著名的记者托里尼·塞格斯泰特为他写了最恰如其分的悼文：“他很刻薄，经常挖苦讽刺别人，用词之尖刻可谓登峰造极，别人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挖苦他，讽刺他。对此他也罪有应得。他是个坚强的斗士，从不埋怨，从不呻吟，从不长嘘短叹。但最重要的是，人们热爱他，他也最值得热爱”。当然，最爱他的是他妻子。妻子是位作家，对他近于崇拜，说他能言会道，“天哪，他那双眼睛多么漂亮啊，那么温和，充满幻想，睫毛长极了，像个姑娘，见面问候总是那么温柔。他擅长辞令，寒暄客套的话多极了，从来不会无话可说。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

社民党第二代领导人皮尔·阿尔宾·汉松与布兰亭和帕尔梅截然不同。汉松出生在马尔默一个工人家庭，12岁就开始干活挣钱，利用周末、节假日时间，步行一个多小时去市里给人家当童仆，帮助父母养家糊口。他完成小学义务教育后因家贫而辍学，在一家商店里当听差。1902年投身社会民主运动，参加了马尔默社会民主青年俱乐部。1904年进社民党报纸《劳工报》工作，后调斯德哥尔摩，成为“民主社会主义青年团”主要领导人之一，1905~1909年任社民党青年联盟机关报《前进》报主编，1918年步入议会，为下院议员，在布兰亭的三届政府中任国防部长。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他政治生涯的颠峰了，他如还想往上爬，就得进学校再读几年书。汉松回答说：“不见得！”他是社民党第二代领导人中最典型的代表，不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有时需要表现得激进些，可以说他头脑里容不得半点革命思想，他信奉民主，主张用和平手段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20年代末，当社民党在议会中仍处少数而不足以实施党的纲领时，他就努力争取工人群众，使每一条有利于工人阶级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法令，在议会获得通过。他创造了与资产阶级政党在议会里进行合作的记录，他坚信各党派应该、而且能够进行合作、不搞对抗。1928年他首次在竞选演说中提出“人民之家”口号，将国家比作一个家、说家庭的基础是共同体和团结一致，一个好的家庭里没有特权，没有剥削，只有平等，彼此关心爱护，互助合作。国家也应如此。瑞典社会若要成为好的人民的“大家庭”，就得消灭阶级差别，发展社会福利，实现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和民主。他把平等、福利和合作当作“人民之家”的基本要素。社会化当然要搞，否则就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但这是长远目标。当前任务是逐一实施改良措施，建立“人民之家”。

但在大选中，社民党仍不敌自由党而败北。汉松总结大选失败和以前社民党三次组阁夭折的教训，认为皆由于社民党某些纲领和政策过于偏激，尤其是取消继承权和实施社会化的口号，吓跑了许多有产者，必须放弃，而采取更加灵活、更加实际的政策。

1932年汉松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上台，组织少数党政府。他先与农民党达成妥协，支持农民党关于农产品价格的要求，照顾农民利益，农民党则支持社民党的改革措施，从而开创了与农民党合作达24年的历史。

地位稳定后，汉松着手修建“人民之家”，用福利社会对付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取得明显效果。一项接着一项福利措施出笼，如失业保险、养老金、产妇补助、子女补助、休假等等。

精密的社会保险网迅速编织起来，“人民之家”虽还不是十分富裕，但基本上人人安居乐业。特别是汉松1938年促使劳资双方签订“萨奇巴登协议”后，罢工事件几乎绝迹，劳资纠纷总能协商解决，瑞典总工会主席阿尼·盖伊尔和雇主联合会主席帕蒂尔·古纳尔贝尔到国外同台作报告，介绍瑞典经

验。1936年美国作家马奎斯·查尔兹考察瑞典后，发表了《瑞典：中间道路》一书，将瑞典描写成世外桃源，从此“瑞典模式”不胫而走，不少人认为瑞典模式是“可行的乌托邦”，国际上掀起“瑞典热”。汉松遂以“国父”载入瑞典史册。

第三代领导人埃兰德继承汉松衣钵，逐步完善福利社会。使瑞典成为几乎完美无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对瑞典很有保留意见的英国作家克里斯·莫塞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种族分离的国家，政府稳定，在大部分时期里比较开明，早已消灭贫困，没有贫民区，只有很小规模的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饥饿和艰难岁月已经绝迹，……绝大多数瑞典人生活得很健康，很有规律，从表面上看，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回到郊区的家里，家里很暖和，家具很齐全，附近有松树林，可以在林中沿着一条踩出来的淡淡的小道跑步；附近还有水如明镜的湖，否则就有一个海滩。电视节目除三个国家控制的频道外，还有卫星电视节目，供人尽情享受。喜欢学习的人还可以上成人夜校，各种科目都有。”生活如此舒适、恬静，百姓复有何求？因而埃兰德受到绝大多数人的尊敬和爱戴。他当了23年首相，从一个不显眼的“无名之辈”而成为社民党和瑞典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帕尔梅在社民党“不可战胜”的全盛时期上台，然而社民党在帕尔梅领导下，很快便从政治统治的颠峰滑了下来。帕尔梅是1969年10月接任首相的。1970年秋大选，社民党得票率便从50.1%下降到45.396%；1973年大选时又降至43.6%。开始尚能依靠共产党的支持，维持在议会里的多数；而1973年后“社会主义集团”与“非社会主义集团”完全打成平手，50~50%，而且三个“非社会主义”政党为把帕尔梅拉下马，显出空前“一致”，于是1976年大选后一直遭帕尔梅蔑视的中间党党魁费尔丁拉拢保守党和自由党组织起“非社会主义集团”政府，把帕尔梅的社民党赶下了台。

社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经济问题。即使在埃兰德执政最辉煌的60年代后期，瑞典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被经济学家后来称为“瑞典病”的不祥之兆。情况居然急转直下，客观说来还不完全是帕尔梅过错，而是福利政策本身内在的弊端。福利政策不是根治资本主义矛盾的特效药。

自70年代起，西方经济出现危机，西方国家纷纷出现“滞胀”困境，瑞典在这大气候影响下，加上它固有的内在矛盾，福利社会便危机四伏了。

作为福利国家，政府不得不支付巨额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等开支，结果导致公共开支猛增，因而更需增加税收。赋税增加，群众就更不满，生产积极性更低，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由于物价飞涨，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呼声更高，产品成本更贵，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更低。帕尔梅没能阻止这个颓势，高呼“减税”而上台的“非社会主义集团”不仅未能将公共开支削减下来，反而增加了；卡尔松接替帕尔梅担任首相后，也是一筹莫展。经济学家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很不令人羡慕的图景，使许多人向往过的瑞典这个世外桃源，变得不像当初那么可爱了。

医疗保险危机：医疗保险费直线上升，1960年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1970年增至7.5%，“非社会主义集团”执政的1979年则增至9.5%！

瑞典跟日本一样，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65岁以上老人占16%，医疗保险费的50%用于他们。换言之，65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耗去5%的国民生产总值。

瑞典“泡病号”现象之严重堪称世界之最。工厂为维持正常生产，一般

都要增加 10~20% 的编外人员。

养老金基金危机：由于瑞典早已进入老年社会，领养老金人数逐年增加，养老金入不敷出。养老金的来源本是在业职工交纳的保障税。保障税从 1960 年的 3% 增至 1982 年的 12.5%，就是说要青壮年劳动者每年拿出四分之一收入去奉养退休老人，他们当然不满。然而保障税还得提高，否则无力支付退休老人的养老金，“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网就崩溃，而增加养老金又使在职人员更加不满。何去何从？

失业保险危机：瑞典原是以全面就业而自豪的国家。但自 70 年代中期起，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到 1980 年每月领取失业现金救助金的人数竟比 1975 年增加了一倍多。

公共开支过于庞大：帕尔梅执政后公共开支猛增，平均每年以 5.9% 上长。1976 年“非社会主义集团”上台后不仅未能遏制这个势头，反而变本加厉，1981 年竟比 1980 年增加 15%，总额达 3750 多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65.9%，到 1983 年（帕尔梅重新上台）更增至 70%！就是说公共开支一年吞噬三分之二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这是任何国家无力负担的。

税务负担：瑞典赋税名目之多、负担之重实为世界少有。保守党自称是“减税党”，但它参加联合政府后的 1981 年，所得税仍为 71%。按瑞典职工平均年薪为 7.7 万克朗计，需缴纳 59% 的个人所得税（1981 年）。此外还要缴纳社会保险金等。不收税就没有办法搞福利，税太重，不但富人不满意，一般职工也怨声载道。

庞大财政赤字：财政赤字过去很小，但随着福利社会深化，财政赤字成几何级数增加，50 年代仅 3.1 亿克朗，1981 年则增至 662.7 亿克朗！

为弥补赤字不得不举债。1981 年国债累计为 2950 亿克朗，全国平均每人负债高于美国。

70 年代初瑞典尚无外债。帕尔梅创下了向国外贷款的纪录，反对党上台也不得不步其后尘，到 1981 年外债已达 520 亿克朗，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7.5%。

为弥补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扩大货币发行量。通货膨胀又带来物价飞涨。帕尔梅执政时，物价上涨率通常为两位数字，给国民经济、给工薪阶层生活带来严重影响。

竞争力衰弱：瑞典是高工资国家。帕尔梅第一次执政最后两年，即 1974~1976 年工资增长 50%。加之原材料、燃料价格上涨，产品成本必然提高，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就下降。这对主要依靠国外市场的瑞典来说，后果严重。

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与欧洲共同体国家相比，1973~1981 年期间，瑞典生产率只增长 16%，而欧共体国家同期增长 30%。

资本家将生产增长率下降归咎于工人“偷懒”，出勤率低，说平日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缺勤、病号、学习、休假以及在家照料婴儿，因而一面是就业人数不断增加，一面是总的工时不断下降。据资产阶级学者统计，从 1940 年起瑞典总劳动力增加 30%，而总的工时却下降 15%。出勤率低是实际存在的现象。在整个 70 年代，就业人数以 0.7% 速率增加，工时却以 0.7% 速率减少。以 1979 年为例，每个就业者全年平均出勤率仅为 78%。但这是工人的责任吗？其他人不也是同样缺勤吗？砍掉福利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吗？

1991年大选，“非社会主义集团”联合起来击败帕尔梅的继任者卡尔松，由比尔特上台组阁。年仅41岁的比尔特决心“改革”福利政策，削减许多国家补贴的福利，又迫使无竞争力的企业倒闭，致使失业大军一下增到14%，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结果又怎样呢？比尔特执政三年，处处碰壁，“改革”完全失败，以“给国家带来超过全年生产总值三分之二的债务”告终。1994年9月大选时，社民党以45.6%的选票卷土重来，但卡尔松首相困难重重，“显然已不可能把瑞典拉回到过去由政府全包下来的政策了”。

“瑞典模式”遇到了空前未有的困难。

瑞典著名的经济理论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在其1995年出版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瑞典模式”的经验与教训》一书中提到：“瑞典模式的核心实际上是社会民主党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与私人资本之间的一种‘历史性妥协’。”这个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指导下，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建设和实现的“瑞典模式”，在给瑞典带来繁荣的同时，又给它尔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到了帕尔梅执政时，“瑞典病”复发。不解决瑞典模式内在的结构性缺陷，“瑞典病”何能治愈？

帕尔梅是社会民主党统治时代的分水岭。社民党巧妙地利用瑞典工人运动，从微不足道的政治力量而成为“天生的执政党”，连续执政44年之久，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有政党执政之记录。而到了帕尔梅执政的第七个年头，却将政权拱手让给了“非社会主义集团”。对此，帕尔梅固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应该看到，70年代的经济滞胀，使瑞典经济陷入困境，这是任何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国家都无法避免的。而“瑞典模式”又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和其自身的种种弊病。当经济危机来临时，社会矛盾激化，日益强大的工人运动要求实现经济民主，提出了解决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问题的要求。社民党政府无法解决这些矛盾和要求，遂使人民大众对其政策失望，对社会民主党失去信心。这，不是帕尔梅的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帕尔梅遇害前虽率党众夺回政权，但他的继任英瓦尔·卡尔松1991年又竞选失败，政权旁落。1994年虽又夺回，但不知能维持多久。社民党很难再把工人大众的选票看作它囊中之物。

“瑞典模式”在其颠峰时期，羡慕的人很多，仿效成功的人几乎没有，因为不具备瑞典这样特殊的内外条件。瑞典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大规模内战，阶级调和思想根深蒂固；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没有战争，没有遭到外来侵略，没有遭受战争破坏，因而经济能够迅速发展，加之社民党巧妙地利用各种有利的国际、国内因素，顺顺当当地把福利社会建设到今天这种程度。其他国家想学也学不到。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何尝不想搞个“萨奇巴登协议”，缓和劳资纠纷，平息频繁的罢工？印度何尝不想走瑞典“第三条道路”，搞“混合经济”以摆脱贫困？50年代一位瑞典著名经济学家去印度讲学，宣传“瑞典模式”。他的演讲并无夸张不实之词，他介绍的瑞典成就也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实，瑞典人民生活水平之高都是有目共睹的，印度学者听后无不羡慕。但当他演讲完毕，一位印度学者问：

“瑞典有多少人口？”

“800万。”瑞典经济学家答。

“噢，是实验室水平。”

客观说来，“瑞典模式”在西方早已失去魅力。30年代被瑞典“第三条道路”深深吸引的马奎斯·查尔兹60年代又写了一部批评“瑞典模式”的书，

因为在他看来，在瑞典福利社会里，政府管得太多，大小事情都得由政府安排、批准，从而剥夺了人的个性发展，加之官僚、党僚对个人事务过多干涉，因而在他看来瑞典社会已无多少可爱之处，每个人都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今天这个实验室里的模式染上了疾病。这个“病”是先天性的，不应由帕尔梅承担全部个人责任。如果他有责任的话，就是没有及时诊断、治疗。英国战后经济一蹶不振，“走走停停”，形成“英国病”，到60年代得到一个“欧洲病夫”的美名。瑞典恐怕不会落得这样可悲结局。但“瑞典病”究竟应该怎样治疗，帕尔梅生前未及思考。瑞典业已加入欧共体，今后还能在国际上扮演帕尔梅梦寐以求的角色吗？这是帕尔梅留给他后人的遗产？

后 记

奥洛夫·帕尔梅这个名字，对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对于这位瑞典前首相的生平、事业，了解的人恐怕就为数不多了。这里，我们只是根据我们的了解，对帕尔梅首相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一客观的介绍。由于我们的水平有限，时间仓促，本书在很多方面难免有疏漏乃至错误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在我们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承蒙瑞典学会 Lars Romert 先生、瑞典工人运动档案馆和图书馆 Martin Grass 先生、乌普萨拉大学图书馆 Kerstin Herelius 女士、瑞典沃尔沃公司 Bertil Johnsson 先生和周衡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本书照片系根据瑞典资料翻拍而成。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

作者

1996年10月

附录一

帕尔梅生平年表

- 1927.1.30 出生在斯德哥尔摩东马尔姆斯大街 36 号。
- 1934 年 祖父，父亲相继去世。
- 1937 年 进入塞格图纳寄宿学校学习。
- 1944.5 通过高中毕业考试。
- 毕业后 任《瑞典日报》临时记者。
- 在于默奥 K4 骑兵团服兵役 8 个月；后转到舍佛德地区 K3 团接受军官训练。
- 1945 年 退役。
- 在《瑞典日报》工作了一段时间。
- 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攻读法律。
- 1947 年 赴美国凯尼恩学院学习政治和经济，获学士学位。
- 1948 年 夏赴美国 35 个州及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访问。
- 1948 年秋 返回瑞典。
- 1948 年底 参加军事复训，被授予预备役少尉军衔。
- 1948.12.20. 在《晚报》发表书评《论 共产党宣言 》。
- 1949.2.21. 在《瑞典日报》发表文章《战后一代》。
- 1949 年春 任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秘书。
- 赴西德、捷克斯洛伐克考察青年学生状况。
- 1949.12.21 与捷克斯洛伐克姑娘杰丽娜·雷尼诺娃结婚。
- 1950 年春 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国际部副主席。
- 1950.8. 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布拉格国际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
- 1951 年 加入斯德哥尔摩社民党学生俱乐部。
- 完成大学学业，获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学士学位。
- 1951.12. 当选为瑞典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
- 1952 年 参与创建“各国学生联合会协调秘书处”工作，当选为该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
- 赴法国巴黎学习语言，在此期间任瑞典驻法国大使馆武官助手。
- 1953.6. 赴亚洲印度、缅甸、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访问。
- 1953.9. 在瑞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任参谋，后转到外事局军政处工作。
- 1953 年秋 加入瑞典社会民主党，参加斯德哥尔摩市恩格莱克地区支部的活动。
- 1953 年秋 借调到首相府任兼职秘书。
- 1954.5. 正式调到首相府任职，成为埃兰德首相的秘书。
- 1955 年 当选为社民党青年团中央执委。
- 当选为瑞典工人教育协会理事。
- 1955 年秋 参加军事复训，被授予预备役中尉军衔。
- 1956 年 任首相办公室首席秘书。
- 1956 年春 和丽丝贝特·贝克-弗里斯登记结婚。
- 1958 年 当选为全国议会上院议员。
- 1858.11. 实际主持有关研制核武器问题的“十八人研究小组”的工作。

1961年 任内阁筹备委员会局长，主管政府国际援助局援外工作（瑞典国际开发署的前身）。

1963年 任咨询内阁成员（不管部大臣）。

1964年 在瑞典社民党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执委。

1965年 任交通大臣。

1967.9. 任教会与教育大臣。

1969.10. 在瑞典社民党第二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党主席。

数日后继任政府首相。

1970.6. 美国凯尼恩学院授予其名誉博士学位，携妻子赴美接受这一荣誉。

1970.9. “社会主义集团”在大选中获胜，社民党单独组阁。

任政府首相。

1973.9. “社会主义集团”与“非社会主义集团”在大选中各得 175 席议席。社民党继续单独执政。任政府首相。

1976 9. “社会主义集团”在大选中失利，社民党连续执政

44 年的历史至此结束。

20 日晚进行交权仪式。

1976 年 底当选为社会党国际副主席，负责领导“南非问题研究小组”工作。

1977 年 三次前往南部非洲进行实地考察。

美国斯坦福大学向其颁发杰克逊和平奖，以表彰其为国际合作，维护公民权益和社会公正所作出的贡献。

1979 年 在其积极倡导下，瑞典成为西方国家中第一个对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实行经济制裁的国家。

1980 年 发起成立“独立的裁军与安全委员会”，任主席。

1980.5. 以社会党国际代表的身份前往伊朗，解决两伊战争中的人质问题。

1980.11. 至 1982 年作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使，五次前往中东，对伊拉克、伊朗双方进行调停。

1982.9. 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出任政府首相。

1984.1. 在其积极倡议下，欧洲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会议”（简称“欧裁会”），第一阶段会议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开幕式，34 国外长出席。

1984.5. 与阿根廷总统、印度总理、希腊总理、墨西哥总统、坦桑尼亚总统共同发起“五大洲和平倡议”，发表联合声明。

1985.9. 社民党在大选中再度获胜。

连任政府首相。

1986.2.28 深夜 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遇刺。

1986.3.1. 零点 6 分去世。

附录二

世界和平，超级大国及国家独立

——在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74年8月4日
奥洛夫·帕尔梅

世界和平，超级大国及国家独立

今年瑞典庆祝一个举世无双的节日。我们享受了160年的和平。

我们庆祝这个节日并没有大吹大擂，我们也没有理由觉得自己一贯正确，而是感到自谦，感到幸运，庆幸我国人民幸免于战争浩劫，在和平中建设自己的社会。我们享受和平，能在和平环境中建设，决不是因为瑞典人民道德比别人高尚，而是由于巧合和有利的形势，当然在某种情况下也是由于英明决策的结果，同时也是由于运气不错。

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祖国和人民幸免于战争灾难，这是大幸。我们放眼环视周围的世界后，更使我们经常想起这是多大的宠幸，因为我们看到周围发生的战争和破坏，苦难与死亡。

整整十年前，塔格·埃兰德倡议成立瑞典和平研究所。成立和平研究所的想法来自于1964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的一项动议。由于瑞典有悠久的和平传统，因而它想支持致力于防止战争和国与国之间冲突的严肃而独立的研究工作。因此许许多多研究工作是关于战争潜力方面的。几乎没有研究过和平必须具备哪些条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是瑞典议会于1966年建立的。它已经成长为国际和平与裁军讲坛上一个令人尊敬的、重要的意见归纳机构。

军备竞赛有增无减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了近几年世界军备扩张情况报告，人们读后不能感到鼓舞。尽管目前有促进缓和的努力，尽管限制核军备及裁减常规力量的谈判在进行，然而武器技术的发展和武器的生产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快。裁军说的多，做的少；实际上军备竞赛有增无减。根据斯德哥尔摩研究所统计，1973年全世界军费开支总数已达2070亿美元，超过了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和的6%，相当于全世界所有穷国的国民收入总和。军事研究和开发工作，每年耗资约200亿美元，雇佣全世界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达40万之多。美国和苏联在这方面的开支就占世界总开支的85%。

富裕的工业国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的绝大部分。四个国家——美国、苏联、法国和英国——就占总开支的70%。但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参加到军备竞赛行列。看来发展中国家投入到军备方面的财力物力的比重正在增加，1972年和1973年它们订购的武器就近20亿美元。每年我们都看到国际军火贸易中第三世界签订的合同数目在上升。更加现代化的武器可供出口。不少国家在用武器换石油。

中东

中东已成为世界上最军事化的地区之一。从1967年的“六天战争”到

1973 年的“十月战争”，这期间以色列和埃及的军费增加了一倍多。4000 多辆坦克和 2000 多架飞机参加了 1973 年的“十月战争”。交战双方由于有了两个超级大国提供的非常先进的其它武器，所以参战的三分之一飞机和二分之一的坦克皆被击落和摧毁。除此之外还有大量人员伤亡。

据说物质损失的很大部分已被苏联和美国补充了。

除此之外，波斯湾周围国家也在大规模加强军事力量。由于石油危机结果，波斯湾的战略意义就大大增加了。

越南

斯德哥尔摩和研所提供另外一个例子：美国向南越提供军援。美国以此形式在印度支那战争中的开支，在 1974 和 1975 的财政年度里，估计每年超过 40 亿美元。世界上只有六个国家的军费总开支超过这个数目。尽管签订了停火协议，但这个数字说明越南军事活动的规模。越南肯定尚未获得和平。

军备竞赛当然是对世界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的可怕的浪费。让我们暂且考虑一下，如果这些资源能用于贫穷国家的发展，用于对付贫困和苦难的斗争，那将是什么结果。那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援助的国家，它们的军事开支几乎是它们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数额的 30 倍，如果所有知识、所有目前用于开发越来越可怕的毁灭性武器的创造力，全部集中用来与落后、饥馑和疾病作斗争，那将怎样呢？非常简单，必须采取实际的、建设性的行动来保卫和平。

请允许我将你们的注意力引向另一个使人震惊的方面。

世界庞大的军火库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它们造成并保持了一个爆炸性形势。

核威胁

为裁军所作的各种努力中，根本的一点是制止核武器领域里的军备竞赛。近两个月不下于六个国家爆炸了它们的核装置。这就是说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进行核爆炸的国家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形势本已非常危险，又如此升级，瑞典表示强烈抗议。

吸引所有国家参加“核不扩散条约”的努力已遭挫折。这些核试爆更是雪上加霜，使全面禁止核试验蒙上阴影。

现有的核大国要为这一不幸局面负责，因为它们没有为核裁军采取更为有效的行动。

超级大国在干什么呢？

从 1963 到 1974 年，美国已将其陆基洲际核导弹从 424 枚增至 1054 枚，潜艇发射核导弹从 224 枚增至 656 枚，而苏联则分别从 100 枚增至 1576 枚、和 100 枚增至 636 枚。仅 1972 年，即“限制战略核武器谈判条约”签订的那年，美国战略核弹头从 5890 枚增至 7040 枚，而苏联则从 2170 枚增至 2260 枚。从 1962 年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到 1974 年，美国进行了 260 次地下核试验，苏联是 136 次。

每人 15 吨 TNT

几年前，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瓦尔德作了一个计算。大国手中武器的破坏力相当于世界上每个人——男人、女人和小孩——15 吨的 TNT。今天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完全毁灭人类文明也不需要这样大的破坏力。

主要大国建立了摧毁敌手的程序化的体系。洲际弹道导弹已放上发射架，作好发射准备：放在陆上发射架和潜艇发射架，瞄准事先确定的目标。

主要大国已经搞成“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ABM），能击落入侵的导弹。它们正发展进攻性的“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MIRV）系统，每一导弹携带一束核弹头，因而打击可能的目标就增加了好几倍。现在还在谈论制造新的、破坏力更大的武器，甚至更加不可思议的战略。

但两个超级大国都不能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将对方摧毁。他们必须考虑到对手能够以可怕的力量进行还击。由于核武器极其精密，它们的杀伤力估计为：敌方 1/4 人口和 1/2 工业将在第一次核反击中被摧毁。

肯定同归于尽

这被称作“肯定同归于尽”（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缩写就是“MAD”（“疯了”），恰当极了。均衡或势均力敌的原则正是在互相毁灭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这是国家安全政策中考虑缓和的出发点。

现状对大国来说肯定是一场无法驱散的恶梦。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些现代摧毁手段，听起来就像是可怕的幻想曲，现实中不可能有的。而对大国的领导人而言，这却是日常的现象。他们为获得安全，在军备竞赛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

然而大国越强大，它们就越会不安全，越感到前途难卜。它们的领导人总是生活在恐惧之中，怕对方取得暂时优势，怕对方有了新的技术突破，从而一夜之间改变均势。他们驱使自己加速发展，而这又造成巨大经济压力。他们日夜面临巨大的危险：一个小的失误，一个错误判断，一个偶发事件将导致双方肯定同归于尽的结局。

恐怖平衡

两个超级大国近年来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关系的基础就是双方都承认，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们之间爆发核大战。无论如何这总是理智的胜利，如果我们将这叫做理智的话。它们为维持恐怖平衡，为使对方不会发动、或不会因怕中出错而发动第一次进攻，它们都制订了各种战略，规定必须如何强大、如何准确、如何坚不可摧。这已成了一种猜测游戏，其理论多少带有推理性，而这些理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都可用来证明它们双方继续加强各自业已无比庞大的武器库是完全正确的。不久前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和美国在争取达成协议时，都与它们的军人发生麻烦。基辛格此刻此话倒是诚恳而坦率。

裁军谈判

然而，双方已经有了一致看法，现在的军备情况被认为是均势，或叫做平衡。当然我们不能低估已经取得结果的意义：核禁试条约以及热线、外层空间条约、核不扩散条约、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条约，以及1973、1974年的高峰会谈。裁军尚未实现，不过已对某些方面的继续扩军作了某些限制。许多领域里的谈判仍在进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大国达成防止它们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协议的意愿。

然而巨大的威胁依然存在。不仅仅是由于两个主要大国存在分歧——战略上、意识形态上以及经济上的分歧——而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威胁。世界上还有许多地方处于动乱状态。有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和独裁的斗争，有争取从外国压迫者、本国主子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民族斗争。同一个地区内国家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在这里我们看到贫困、苦难和世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看到不平等。从长远看这是构成对和平的主要威胁。世界各个地区可能爆发危机，大国可能这样或那样地受到这些危机的影响。卷入危机

会有风险。对大国来说认识到这点无疑又是一场恶梦。

缓和的政治含意

缓和的政治含意是：华盛顿与莫斯科同意彼此要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利益，要密切注视世界上所有可能最终导致核战争的危机，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制止核战争。两个大国不想让这些危机所谓“失控”，它们想能用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干涉，以“控制”局势。他们使用这些词，暴露了他们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对其他国家利益，尤其是小国利益影响极大。我们可以简单地说，大国认为它们有权提出如下要求：

如果局部冲突将会演变成全球灾难，大国为防止核冲突（核冲突对每人都是灾难），就有权，几乎是有义务进行干涉。热线就是它们共同利益的具体表现。它们的意见是（看来有些矛盾）：为了世界和平，它们的核武器库使它们有权进行干涉。这种思维方式对小国就意味着某些麻烦和危险。对此我后面还要讲。

现在从缓和政策观点出发，考虑一下去年几个国际危机也许是有趣的。

中东和塞浦路斯危机

仅仅一年内，东地中海就发生了两次危机：阿拉伯对以色列 1973 年 10 月侵占的领土采取行动，以及现在的塞浦路斯军事政变，数周前土耳其因此而采取了军事行动。这两个危机的历史背景和事由曲直很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在这两个危机里，问题都是有关国家出于种族或宗教上是同宗同教原因，希望去保护或再次征服由属于他们民族的人居住的地区。阿拉伯国家对用政治手段收复 1967 年 6 月战争中被以色列侵占的领土已经绝望，所以它们决定使用武力。土耳其认为，塞浦路斯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因雅典纵容的军事政变而遭到严重威胁，所以他们使用武力。

在这两个危机里，有关国家认为形势对它们甚为不公，自身安全又受到威胁，所以它们发动军事行动。从它们对形势的认识看，它们已别无选择。

当然，这不能说明诉请武力是对的。不论形势如何，我们都得高举联合国宪章，禁止越过边界使用武力，我们要不遗余力去探索各种途径，和平地谈判解决。

然而有关国家是怎样陈述它们的理由的呢？

埃及和叙利亚显然已经得出结论：缓和气氛得势，它们无法获得两个超级大国的有效支持来改变现状，也就是收复被占领领土。这是它们诉诸武力的原由之一。不管战争的命运是好是坏，它们相信一旦开火，超级大国便会作出迅速而有效反应，以阻止冲突扩散，然后它们将终于完成政治问题的使命：收复领土。现在它们将坚持自己主张：只要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有爆发新的暴力冲突的危险，这将对缓和造成威胁。

暂且不论这样阐述是否准确表达了他们的理由，缓和机制按此思路是可行的。

终于提议召开以色列与其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和会，一个可能为灾难深重的中东民族带来和平未来的进程开始了，即使最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解决。

东地中海军事上、政治上都是极敏感地区，超级大国同样认为这地区对他们利益至关重要，要避免公开、持久的冲突。塞浦路斯危机一开始，超级大国彼此立即进行接触。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设想，热线频繁启动了。谁也不知道它们在热线上谈了些什么，但如果我们这样假设是不会太错误的：它们从始至终都一致认为，不允许塞浦路斯本土及其周围的形势继续发展，以免

平衡遭到根本性破坏，以免出现冲突扩大的危险。安理会之所以能够一致通过停火决议，土耳其之所以出兵第二天就同意举行谈判，其基本条件就是超级大国之间已达成协议。正是它们之间的协议，才说服土耳其和塞浦路斯在24小时内接受停火。

如今又签订了其他国际协议：日内瓦协议和安理会决定派遣联合国部队驻扎在土塞双方之间。

瑞典有些观察家说，塞浦路斯危机表明缓和是何等脆弱。有种说法，如果南欧能爆发战争，那么战争也很容易会在北欧爆发，所以我们（瑞典）必须有更多的武装，这种想法系扎根于一种错误的认识之中——认为这种想法不纯粹是用来批判我国国防政策的战术武器。当然，缓和根本不是对付危机和局部战争的保证。它没有能阻止土耳其诉诸武力，也许，诚如我刚才所说，它也是阿拉伯国家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的部分原因。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由于有了缓和，方能立即动用大部队去将冲突限制，使其局部化，并且开始了谈判，新冲突的火种被扑灭，这就是缓和的作用，就此而言，缓和有其积极一面。

缓和与小国

牢记缓和的积极一面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对小国而言，缓和也不是没有问题，注意这点也是重要的。我们生活在超级大国霸权越来越强大的时代。它们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在武器制造技术领域最为显著，在技术，科学和经济领域也是如此。这会对小国独立带来威胁。小国如要维持自己独立，它们就得具备能够彼此建立团结一致的能力，以寻求问题的国际解决。

这些意见发表出来后，大国领导人有时表示厌烦。他们说，我们才是和平保卫者，我们才能保证避免核战争，保证冲突得以限制，保证秩序良好。这是从所谓道义上为超级大国主宰权进行辩解。据说维护大国主宰权对每个人有利，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想法有些道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警惕大国主宰可能给小国带来的危险，这是格外重要的。

还有，超级大国要的是保持现状，不是变化。这是缓和的核心。然而国家社会如要保持其活力和宁静，就要不断作出努力，因为事物在发展中。这样我们在国际范围里（既有地区性的，也有全球性的）看到经常出现各种情况，是必须改变或消灭的情况，如果国际社会要想和平的话。但是超级大国为了缓和，它们对每一变化的后果十分恐惧，宁愿让非正义的、危险的情况延续下去。这样其它国家的利益也就被缓和损害了。

正如九年前我在你们的代表大会上说过的那样，现在世界上又有冲突。只要有决心，冻结核武器的现有水平是完全可能的，但冻结世界上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是不可能的。

第三世界要求变革的呼声尤高。许多国家发生民族解放、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运动，从而要求进行大规模的、迅速的变革。这些国家觉得自由和人的尊严比和平、缓和更为必要。从长远看，所有企图阻止解放的行为，会对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造成更大的威胁。在各民族获得自由之前，缓和与裁军的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我们这个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缓和。恰恰相反，我们衷心地支持缓和。但我们必须彻底考虑缓和的后果。在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都做了之后，人们发现，变革是可能的，即使在许多情况里变革是有条件的，是前途难卜的。

变革是可能的

去年一年里，土耳其的民主取得长足进步，今年葡萄牙的法西斯独裁垮台了。今年很明显，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到了尾声。我们终于看到安哥拉、几内亚（比绍）和莫桑比克的人民有了和平与独立的希望。可怜的希腊军政府开始退出舞台，至少目前是这样。

是谁造成这些变化？当然，联合国、欧洲理事会以及国际论坛的国际舆论被动员起来了，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们这里用词需要小心谨慎——也许无可争辩的是，有关国家是军事集团的成员国，当这些问题在军事集团里进行研究时，考虑的是强权政治和战略需要，而不是维护民主的理想。如果情况不是如此，而是相反，那么这些政权是无法继续存在的。至少不能在军事集团里继续存在。另一军事集团也许认识到，尊重对方利益是个重要条件，当本集团人民要求变革时，对方也不会干涉其势力范围内的事务，除了口头上说几句外。

促成变化的是人民。尽管有审查、恐怖，严刑拷打以及从不停息的压迫，要求独立、民主和社会公正的呼声是扑灭不了的。反对压迫者的长期斗争已经赢得胜利。不错，人们可以说葡萄牙的政权是军队推翻的，希腊也是军政府让文职政客进政府的，但是在葡萄牙和希腊，变革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是大众舆论，这是很显然的。

葡萄牙与希腊

得不到人民支持、不合时代潮流的政权和独裁军政府在政治上、道义上是注定要破产的，葡萄牙、希腊发生的情况就是明证。尽管它们发布法令、握有酷刑和武器库，但它们最终不能治理国家，不能使社会发挥其功能。它们最终垮在自己手里（似乎是），或被迫向文职官员交权。

压迫人民的政权含有自我灭亡的种子，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是永远不能被全部扼杀的，终将，也终会再次燃烧起来。对那些怀疑和害怕民主的人来说，这是重要的教训。

智利的恐怖

这也给仍在为自由而斗争的人们带来希望。在智利，和平改革一开始便得到人民的支持。他们用和平方式促成变革，尽管有外国资本利益的干涉，尽管有人破坏和经济遇到困难，尽管特权阶级疯狂反对。然而民主政权还是被无比残酷的军事政变所摧毁。没有任何可以帮助智利人民的强权政治和一丝一毫的缓和政策。相反，拉丁美洲有些国家感到阿连德政府对现状是个威胁。

现在恐怖在继续，一浪高似一浪。恐怖必须继续，因为军政府害怕人民。星期二圣地亚哥军事法庭判处四个人死刑——三个军人和前中央银行总裁。他们的罪行就是他们表示要与民主选举出来的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府站在一起。但是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是不可能被扑灭的。

双手沾满鲜血的智利政权迟早要消失，遗臭万年。然而想想人民在它垮台之前还要蒙受多少灾难就不寒而栗了。近几天来我们收到来自韩国令人震惊的消息：许多人被处死。

瑞典强烈反对死刑，多年来我们在联合国一直积极为取消死刑而努力。死刑是对人的生命的践踏，我们将继续为动员国际舆论反对死刑而工作。本政府所以呼吁韩国总统赦免汉城的人死刑。

当我们不断听到世界上战争、压迫和暴行时，也许有人觉得我们卷进这

些漩窝无济于事。这样看待问题是错误的。很显然，像瑞典这样一个小国影响事态发展的能力有限。但我们有义务竭尽全力参加国际舆论。如果我们回顾我们在越南、智利、希腊、葡萄牙和非洲国家的事件中参加的群众运动，我们已经考虑到我们的关注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个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认为，这会具有实际重要意义。

联合国的作用

如瑞典这样的小国，自然会将联合国看作是和平事业和组织国际舆论的重要工具。

当联合国要来制止对和平的破坏时，我们常常被迫无奈地看到联合国是那么软弱无力。但这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有何毛病，也不是联合国组织的毛病，不是一些可以通过几个独具匠心的改革能加以纠正的毛病。这是由于大国没有很好遵守联合国宪章，或大国缺乏远见，没有及时利用联合国机制来消除破坏和平的直接因素。然而即使联合国因此原因而未能阻止使用武力，联合国组织仍有重要作用。没有联合国的努力，破坏和平行为肯定会更严重。我们从最近的塞浦路斯冲突中听到许多意外事件。联合国部队，有瑞典的，也有其他国家的，因监督当地停火而挽救了生命，并用其他许多方法减轻了老百姓的苦难。

就向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提供人员而言，瑞典作的贡献比任何国家大。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强联合国驻塞浦路斯部队，我们也作出了积极响应。

当中东要完成各方业已同意的或计划就绪的安排时，联合国就承担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已成了规律，大家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任务除联合国外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够承担。所以我们看到，联合国是十分重要、基本上不可替代的保卫和平的工具——虽然应该承认它很脆弱，很不完善。

未来的问题

我谈了许多今天的形势和今天的危机，以及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然而问题的核心是，从长远看形势将怎样发展。这是世界长久安全的问题，是人们能不能生存、能不能在合理的情况下生活的问题。

核心问题是：我们能够一起去创造一个国际的和国家的政策，使我们能够明智地使用和公正地分配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以满足人民根本需要，不论他们生活在地球何方吗？古纳·阿德勒—卡尔松在他向世界人口会议所做的报告里已清楚说明这是核心问题。

尽管近几十年来技术有了巨大发展，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已显示，成年人文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国际劳工组织（ILO）也表明失业和非充分就业人数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世界卫生组织表明喝不上清洁饮用水的人数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多。

我们还可以把问题进一步简化：世界富裕的少数是否准备作出牺牲，放弃一些特权和权力呢？

当我们考虑这些问题时，联合国是必不可少的讲坛。今年联合国主持召开了许许多多次我们时代最重要的会议。

春天召开的联大关于原料及发展问题的特别会议。

现在正在加拉加斯召开的海洋法大会，本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世界人口会议，以及今年秋天在罗马召开的世界大会。

联合国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日内瓦裁军委员会、内罗毕的联合国环境委员会以及定期召开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都在进行紧张的工作。联

联合国从未像今天这样积极、活跃。

这些会议处理的每个问题都是大问题。这些问题又都相互交织在一起。这些问题应被看作是一个大的复杂问题。仅举一例：

石油匮乏可导致化肥短缺，结果造成粮食短缺。粮食问题又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加捆在一起——每年增加 7500 万张要吃饭的嘴。这与富国的生活水平也联系在一起，与更加迅速消耗地球资源的生活习惯联系在一起。

世界经济增长了，但现在分配不平等，一个国家内是如此，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这就导致一个可怕的情况：缺少社会内容。

联合国发展战略的主要目标是给发展中国家每个人以幸福和工作，使每个人享受较好的生活条件。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地为全体公民带来好处。许多地方的情况是：某些集团的人生活水平下降，虽然平均水平有提高。在发展过程中常有一些机制使许多人贫困，使极少数人财富增加。将单纯依靠私人盈利为目的的企业生产作为发展力量后，就产生了这个问题。发展中国家农业的“绿色革命”，一个无计划的工业化和机械化就是例子，这些进程已经制造了大批失业和低劣的贫民窟。很重要的一点是选择能够避免这些不良效果的生产种类，能够指明经济发展过程内在的冲突，制订一项能够为每个人而不是为极少数人带来幸福的计划。所以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是决定性因素。瑞典在制订国际发展政策时就考虑到这一点。

瑞典的对外政策

巨大任务有待国际社会去完成。瑞典面对这一形势，要作出建设性贡献。

简言之，瑞典政策可概括如下：

首先，我们希望促进和平与裁军。我们要继续奉行我们的不结盟政策。我们这个政策得到承认和尊重，认为是对我们这一地区稳定的贡献。我们不寻求获得核武器。瑞典参加核不扩散条约是决不含糊的。我们在日内瓦的国际会议上正积极为创建更人道的战争法而努力。瑞典已经要求全面禁止使用特别残酷的武器。我们准备继续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

其次，我们将为穷国的发展作出贡献。我们将支持发展中国家它们自己为争取经济，政治独立，为加强国家主权而作的努力。我们将遵守联合国确定的指标，明年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 0.7% 支援发展中国家。这个指标到 1975 年也许只有我们和荷兰能够实现。我们在争取国际发展努力的民主化，办法就是在多边组织中给发展中国家以更大影响。我们高举一条原则：每个国家有权自由使用本国的自然资源。

第三，我们将尽我们最大努力去反对掠夺人类的环境，反对残酷剥削人类共同财产的地球上各地区，将促进公正的分配。我们发起第一次环境会议，我们在这方面将再接再厉。今年我们签订了“北欧环境保护条约”和“波罗的海海上环境保护协议”。我们将用保障公正、保证人类公共资源得到负责使用和很好照顾的国际规章制度来取代目前盛行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状态主要对拥有超现代化技术的个别国家有利。第四，我们希望看到一个更加民主的国际社会。瑞典要促进国际权力结构转向有利于穷国。这也是破坏富国对权力的垄断的问题，是削弱多国公司的影响的问题。我们将继续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动员舆论去反对独裁和侵犯人的尊严。第五，我们要有强大的国际组织，一个强大的联合国。如果我们要避免会引起新冲突的民族主义利益和垄断利益，如果我们想确保新的资源为所有国家服务，就有必要各方面都有一个按国际规章行事的控制机制。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要为一个实用的、

有效的国际主义贡献一份力量。

在现实中，我们是在超级大国、多国公司所代表的国际主义的垄断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合作及国际组织——主要是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一个能够作出有效决议，并在国际法和良好秩序的基础上实施决议的国际组织之间作出选择。

新的世界危机

我们的选择显而易见。

在我们面临这个新的全球形势之时，工业国家国内也面临极其困难的问题。通货膨胀盘旋上升，已突破战后所有记录，主要工业国家中，有几个国家的生产踉踉跄跄步履艰难。由于石油货币的流动，金融问题之严重，其深度和广度实为前所未有，有人把这比作 20 世纪的危机。

世界经济里一个幽灵又回来了：世界经济分成几个孤立主义的经济集团，各自提高防御屏障，与世界其他地区相对抗。

所有这些趋势引起十分悲观的言论。著名科学家著书立说，怀疑世界究竟还有前途否。当我们研究这些悲观的预言时，我们发现所有这些预言有一共同特征：在毫无约束的增长中，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都没有希望出现一个可以忍受的前途。

数周前一位美国教授写道，新资本主义时代行将结束。未来的关键是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可能是专制的，压迫性的，它亦可将其信念寄托在人类有决心负起责任和团结一致地共同工作之上。

附录三

就业与福利

——在纪念杰里·沃尔夫演讲会上的发言

1984年4月3日
奥洛夫·帕尔梅

就业与福利

不久前，布鲁诺·克莱斯基博士(Dr. Bruno Kreisky)辞去奥地利总理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职务而隐退，我有机会在维也纳听他做报告。当我们坐在大厅里洗耳恭听时，我们原想他会向我们谈他那漫长的、事务纷繁的生活，以及他那广泛而成功的经验。然而他演说里对此只字不提！布鲁诺·克莱斯基博士只谈未来。当他辞去公职时，他整个思想已经在考虑未来。

他首先关心的是失业。他指给我们看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发表的报告。报告指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报告材料说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国家的失业数字已创最高纪录，如果想不让失业进一步增加，从1984年到1989年需创造1800万到2000万个新职业。这就是说在这期间工业国家每天要创造2万个新的工作机会。

布鲁诺对未来持此看法，他的演说也从此出发，展开了主题：今日政治之基本区别是对失业，对福利的态度。总理这样表述了他的关切：我担心的是下述哲学的蔓延：失业甚至在繁荣时期也未绝迹，人们会说这不是严重问题，千百万人失业完全是正常的现象。今天我们看到，经济明显上升，但相对来说经济发展对失业几乎没有影响。这意味着我们面临一个漫长的千百万人数月、数年找不到工作的时期。

然后理论家们就振振有词地说开了。首先他们对危机的定义持不同意见。他们说根本没有什么危机，或说30年代也是如此。然后他们说千百万人失业是非常不幸，但这是自然现象。

“我们必须承认，”布鲁诺·克莱斯基继续说。“两个月前我在华盛顿参加一次会议，会上发生的事着实使我震惊。会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杰出代表发了言。例如雅克·戴拉胡斯说，我们必须巩固经济上升势头，怎样才能巩固呢？首先要减缓通膨率。第二，减少财政赤字。第三，继续进行工业结构的改革。第四，抵制保守主义。然而有一件事戴拉胡斯先生只字未提，这就是我们必须为减少失业该做些什么。他对此只字不提。”

然后布鲁诺·克莱斯基接着谈另一重大分野的问题：福利社会问题。事实是，有3500万人失业，但没有造成社会动乱，没有像30年代我们看到的许多国家乱成一团那样。这是因为福利社会已发展到这样程度，蓝领和白领工人都受到保护，“不会被最坏情况所损害。”然而当经济发展举步艰难时，当失业救济增加时，福利社会就受到攻击。许多国家已经受到攻击。

布鲁诺·克莱斯基的两个主题——就业与福利——也是我今天谈论的题目。现在有许多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说，工会权力的上升和福利措施的增加正是经济危机与失业的原因所在。后面我要再谈谈这个问题，但我首先谈的

是为什么消灭失业仍是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从我信仰的价值观念来看是主要目标。

首先，失业是一可怕的浪费。目前全球的生产资源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肯定不是由于人类需要已完全满足，恰恰相反，在世界许多地区，人民最基本的需要还不能满足。所有社会都有许多没有满足的需要。而人的劳动力却是满足这些需要的必不可少的力量。

与此同时，大量的生产能力被闲置不用。人最最希望的是有份工作，然而人也被迫日复一日、周复一周、月复一月地无所事事。所以生产下降了一一很无必要地下降了。这就是为什么说失业是一浪费。

第二，失业意味着痛苦。劳务市场的统计数字固然是无情事实，但还掩盖了人所承受的无限痛苦。人们很容易忘记千百万失业大军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活生生的人。

在发展中国家里，当父亲的眼看着自己孩子挨饿，因为能够给他提供就业并使他能够养家糊口的发展项目缺少资金。或是因为发达国家潜在的劳务市场和他所从事的生产部门已不复存在。

还有从南欧和北非来到工业中心的所谓“客座工人”，他们数年如一日从事最低工资的工作，但还能养活自己和他丢在老家里的亲人。现在他被解雇了，得回老家。

在我自己国家的一个青年就业所里遇到一个姑娘。她没有挨饿。她父母及社区向她提供了她的基本需要，然而她也需要有个用武之地，需要感到她不是可有可无的。她父母和社区对此就无能为力了。

“上午我赖在床上不起来，”她说。“大约午饭时候，我可能进城去一下，到就业所看看。有时就业所有个适合我的工作。在此情况下我就去看看这家公司。通常申请这份工作的人很多。经常是因为我所受的教育不对路而未被录用。有时他们说他们将给我打电话。所以我就回家等候他们电话通知，但是他们再也没打电话。我遇到这种情况不下五六十次了。晚上我呆在家里看电视，或是进城去会友。我很快失去希望和信心，再看看几个朋友的遭遇，我就焦虑不安了。”

我提及失业的几方面情况，因为我要强调：工作虽然主要是谋生手段，但工作远比谋生重要。

工作——即有个职业——是人的社会存在的重要部分。你若问别人“你是谁”，他（她）就会告诉你他（她）姓什名谁，干什么工作。我看过一部工会拍摄的短片，采访许多年轻人，问他们未来理想是什么，每人在回答中都提到要有一个职业。没有一人说是希望失业的。工作与人的价值，例如自信、尊严、生活目的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当我们看到随之失业增加，死亡率上升，健康水平下降，自杀事件、家庭离异增多，犯罪率上升，吸毒、卖淫的人增加，这就毫不奇怪了。

我们毋需提醒便可看到大规模失业造成的社会弊病。30年代的情况我们可从无数研究报告中读到。在经典研究中有一份关于玛丽安塔尔的失业者们的报告，描写一个工业单位，即一个纺织厂，倒闭之后发生的情况。这个纺织厂在布鲁诺·克莱斯基博士所在的维也纳城外的一个村庄里。工厂倒闭后，人们慌忙开始另寻工作。随着时间流逝，大多数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渐渐消失。他们感到羞愧，怕见以前的朋友，最后过着极其寂寞孤独的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大大减少。他们还很年轻，但已不再是作为社会一分子而活着。

这使我接下去谈与失业作斗争的第三条理由。我们坚信开放性民主。但我认为大规模失业最终将对我们坚信的开放性民主形成一种威胁。在不断被高水平失业困扰的国家里开放性民主久而久之将无法存在。失业破坏了民主赖以存在的社会组织。

我们谈论经济危机，我们谈每个人都得为解决经济危机做出贡献。然而当年轻人离开学校需要有份工作的时候，当他们要完全加入成人世界时，当他们要做出贡献时，他们却被告知，他们是多余的，谁也不需要他们。他对解决经济危机的贡献就是失业。这使年轻人失去希望，对自己失去信心；也造成牢骚、不满和悲观徬徨，对社会、对民主机制失去信心。如果我们剥夺年轻人成为社会正式成员的权利，他们就会置身于社会之外。

所以，如果我们想不浪费我们的经济资源，减轻由于失业而造成的社会动荡以及人们遭受的痛苦，如果我们想维护人们对民主政府的信赖，强化民主，那么与失业作斗争是极为重要的大事。全面就业不只是创造福利而已。全面就业是分享福利的一种方法。世上没有一条裂痕比就业与失业人口之间的裂痕更深的了。生活境况最糟的人失业危险最大。

我到现在所讲的每一件事也许非常浅显，几乎是普通常识。问题是这些道理如今已不经常阐述了。这些道理需要再三重复，以不被忘却。

工会是对就业的威胁吗？工会当然说他们主要目标之一是为最终会带来全面就业的政策而努力。但有些人的看法是，由于工会抵制生产结构的改革，因而工会事实上加剧了失业。

工会搞过不明智的工资政策，使各个具体公司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有害影响。这方面的事例不难寻找。工会也曾阻止有效的工业结构改革。这方面例子也不难寻找。经常是由于工会组织上的毛病和工会内部的斗争，而出现这些不明智的政策。

但是也有大量证据说明，国家如有强大而协调的工会组织，就业率就比较高，失业率比较低。奥地利、挪威和瑞典便是例子。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素有工会力量强大的传统。形成这个传统的原因之一是工会不需要去对付为数众多的相互竞争的非工会组织。凡是同一工厂的工人皆属同一工会，雇员按此原则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这条主要原则也适用于拿薪俸的雇员。

这也许是因为为什么这样多工薪人员都是工会会员的主要原因之一。1980年的统计数字是最新数字。1980年瑞典85%的工薪人员是工会会员。这个数字在不断上升。可拿来作比较的英国数字是54%，美国是25%。

将上述国家这些数字与失业率作一比较：1983年瑞典的失业率是3.5%，英国则超过13%，美国超过9%。瑞典参加劳动大军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也很高。1980年，劳动大军拥有81%的劳动人口——妇女则为妇女劳动人口的74%——英国总数是74%，美国是72%；美国参加劳动大军的妇女不超过妇女总数的60%。

其他研究结果表明，工会会员多，也造成收入更加平均的结果。瑞典社会科学家瓦尔特·考尔皮教授提示，与工会力量薄弱的国家相比，工会力量强大的国家里税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较低。他得出结论说：各种影响决策的力量分散以后，它们在具有重要意义的收入分配政策的形成过程中，都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每个国家情况不同。由于这些不同情况的存在而出现人的不同价值和政

治实践。所以我们必须注意进行比较。工会的力量取决于政治关系，也取决于工会会员的数量大小，有些国家工人高度组织起来了，但失业率却很高。然而，在工会力量强大、工会又获得社民党政府支持的国家里，也确实制订了为实现全面就业和收入更加平均的政策。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些政策常常带来更加稳定的劳务市场。

我们看到，工会运动在一个又一个国家遭到猛烈攻击。新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要求给市场以更大活动余地。由于出现这股趋势，攻击工会的运动接踵而来。工会被看成是“市场破坏因素”，工会因此被说成是对自由的威胁。有些对工会持批判态度的人甚至更说工会与民主水火难容。人们也许会问那些最热衷于自由市场的人，他们是否还继续接受集体谈判的制度。

有工会也好，无工会也罢，反正市场经济的效率受劳务市场的严格制约。莱斯特尔·特尔罗教授说得好，“否定工会存在，或是让工会消亡，就是发展一个毫无经济模式。”

我坚信，由于工会是强化了普通工人的声音，所以工会在加强民主方面有着重要作用。它们扎根在民主群众组织里，普通群众聚集在这些组织之中，联合提出自己的要求和主张。如果他们个人逐个提出，他们就太弱，无人理会。工会工作本身就是民主，就是以权利平等为基础的。在诸如瑞典等这样国家里，这是具有根本重要意义的。这完全是民主的实践。工会是一支抵销雇主、政府作用的力量，因而工会在民主程序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数年来，工会除参加工资集体谈判外，还渐渐参加其它领域的活动。工会在争取延长工龄方面定起重要作用。我们发现，如果你要改进和加强在职工薪人员的条件的话，法律上作些具体规定还不是最好的办法。更好的办法是加强雇员在工作单位里的地位，使工薪人员有机会去影响他们自己的境况。在大多数情况下，施加这种影响要通过当地工会进行。

在瑞典，我们有法律规定的工作环境：如果雇员工作中受到工业废气、废水等公害的严重威胁，工会代表根据法律规定有权停止生产；我们有保证工作安定的法律。这个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保证工人不会被无理开除；我们有条法律规定，公司董事会里至少有两名工人代表；我们对工作生活的共同规则也有一条法律。工会根据这条法律有权对工作的组织、公司的管理等所有问题进行谈判。这些法律的结果是工薪人员有了更多的参与，而且大体说来没有造成任何不良经济效果。我们对这些法律的影响正进行评估。

我们还采取了与此性质相同的一个步骤——所谓雇员投资基金。目前对此已进行广泛讨论。雇员投资基金是1984年元月1日开始实施的。投资基金究竟怎样搞？它在我们混合经济里起什么作用？公司从工资总额里拿出一小部分，再从超额利润——就是超过一定水平的利润里——拿出一部分，放入雇员投资基金。投资基金拿这些钱到股票市场上去买股票。股票里赚的钱用于退休金。投资基金董事会要有雇员、公司、公众、以及国家利益的代表。

人们如果看一下瑞典经济发生的情况，就能了解我们为什么推行雇员投资基金。瑞典公共部门非常庞大，但瑞典工业95%以上属私人所有。与西欧所有国家相比，瑞典社民党执政44年后，瑞典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国有化程度最低。事实上保守党政府搞的国有化常常超过社民党政府，瑞典私营工业的大权集中在相当少的金融中心手中。强大的工会和庞大的公共部门平衡了私营力量。这就是混合经济。

像其它国家一样，瑞典也经历了近几年的经济萧条。我们的困难很相似

——生产率增长率低、财政赤字、通货膨胀、失业增加。如何医治目前的经济病，各方意见相左，过去如此，现在仍如此。在这场辩论中“货币主义”、“供应经济”是时髦名词。

我们在野时，曾想搞一个经济战略，如果选民选我们执政，我们就实施这条战略。这条战略的要点是：

- 1、我们必须恢复我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对我们的出口工业依赖性很大。我们是工业国，我们仍将继续是工业国；
- 2、我们将竭尽全力保护就业；
- 3、我们的经济不可避免要进行调整，要搞合理化。我们在调整过程中要保护社会上的弱等成员。

1982年9月大选后我们组建新政府，我们立即宣布瑞典克朗贬值16%。我们采取了削减公共开支的政策，以制止财政赤字上涨，然后逐步削减赤字。我们对我们的资本家和经理们说：到国际市场上去，尽你们力量去促销，我们会帮助你们。一定要赚钱，用赚来的钱去建设新的工业，开发新的产品。我们对工会说，在今后几年里职工的实际工资不会有大的增加。相反，就居民而言，总的来说，我们对以后几年的情况估计不是大好。

这是相当困难的决策。许多问题仍未解决，但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取得的成果：出口大增，工业利润大量增加。通膨率下降了，今年的指标是4%。投资上升，赤字下降，失业率也下降了。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使我们工业强壮起来。很显然，工业确在强壮起来。一个结果是，从工资到利润收入进行了再分配。

人们看我们雇员投资基金时必须参照这个背景。作为社民党人，我可以为提高利润进行辩护，因为以前利润实在太低。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工薪人员坐视增加的利润统统进入资本拥有者的口袋里面无动于衷。他们应该分享这些不断增加的利润，并参与决策，决定这些利润应该如何使用，这才公平。

很自然，工会也要小心，眼界不能太高。然而此时此刻，在工会受到无理攻击之时，我要强调工会在社会上的积极作用，我认为这很重要。有趣的一点是，独裁者——无论是右翼还是左翼的——对工会首先是打垮，并将工会领导人锒铛入狱。

这本身就证明工会在民主中的重要性。我们今天在智利和波兰看到这个进程。右翼独裁者憎恶组织起来的劳工，这不足为怪。然而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有更深沉的含意。这意味着东欧共产党已不能与普通百姓的愿望取得合理的妥协。在此情况下，人们转向工会，以工会作为构建他们未来的民主工具。

我感到荣幸的是能在纪念伟大民主战士和工会领导人杰里·沃尔夫（Jerry Wurf）的这篇演讲里肯定工会的作用。

让我接着谈第二个主题，即福利社会和公共部门的作用。这也是杰里·沃尔夫非常关心的问题，对美国工会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对县市雇员协会（th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这也是受到新保守主义者攻击的问题。

T. H. 马歇尔谈到加强民权——即法律对所有公民的平等保护——问题，公民享有政治权，包括言论自由，和选举本国政府的平等普选权。在福利社会里，这些权利又进一步加强，因为有了社会权。社会权是社会民主的组成部分。

保守党人攻击的正是福利。他们不仅仅是由于一般意识形态原因而不喜欢福利，他们并以经济方面理由强调他们的观点。他们认为，社团仅需帮助社会上最弱小的一部分——非常贫困的人。

假如社会通过选择性的社会政策（选择大体上是建立在家庭经济状况调查基础之上），仅仅将其精力集中在最弱小的成员身上，那么纳税人就将“我们”和“他们”区分开来。“我们”——生活优裕的工薪人员和中产阶级——一向政府纳税，得到的却是零。

破坏社会团结的准备工作就这样就绪了。社会分裂反过来又加剧了抗税斗争。造成抗税斗争的原因事实上并不是赋税负担过重，而是纳税人感到他们缴了钱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从福利制度中获得好处的人是福利制度的最大支持者，因而他们纳税后并不觉得自己受了剥削。

一个高效、稳定的福利国家必须建立在统一社会计划，如医疗卫生保险、养老金、儿童津贴等社会计划的基础上。这个统一的社会计划是为全体公民享用的。官方的“贫困线”或“家庭经济状况调查”没有必要去判断谁是“穷人”（这就是将官僚控制的必要性减到最低限度）。与此同时，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的人也不需要去忍受被划成“穷人”所造成的屈辱。由于他们也像其他人一样享有统一社会计划的同等权利，因而他们享受到高得多的服务——一种富人也会觉得蛮不错的服务。同时，统一社会计划也有助于消灭“贫困陷阱”。人们堕入“贫困陷阱”后就不想去多挣钱，因为他们收入增加后，获得的利益却减少。

按此思路形成的政策显然是扩大公共部门。是批判大政府。对公共部门持批判态度的人往往忘记一些简单的真理。运转良好的公共部门在进步的经济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基础设施十分齐全对工业发展起关键作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广泛的采购（包括物品和服务的采购），直接影响工业部门的利润和生产。许多私营部门的生活依赖地方政府的采购活动。

但是我今天最关心的是公共部门对人民的个人满足和自由是何等重要。公共部门及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工作可用许多不同方法来描绘：是竭尽全力教育我们孩子的教师；是到老年人家中帮助整理家务的家务工作者；是医疗系统里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

我认为我们福利社会中最精彩部分中的一个是在妇产医院、儿童医院里为产妇和初生婴儿提供的照料。这种福利像其它许多福利一样，开始是几位杰出的医生个人主动提供的。我们利用了他们的精湛技术和丰富经验，今天这项服务已成为公共部门的一个部分，每个人都可享用。所有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不论贫富，在这些医院里都一律免费。瑞典的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不搞任何竞争，不讲任何利润，瑞典的妇婴医院服务极好，住院不分社会地位贵贱。瑞典的婴儿死亡率是世界上最低的。

我要想说的是，对社会弱小成员的最好保护，不是给他们特别的待遇，而是将他们纳入为社会所有成员提供的计划之中。只有这样社会改革方能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

福利国家的敌人说，庞大公共部门导致低效和低经济增长率。没有数据能支持这种结论的。没有根据说主要工业国家里，庞大公共部门与低经济增长率之间有何联系。当然，许多国家在与巨大财政赤字和经济失衡作斗争。扩大社会福利和公共部门有赖于总的经济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

然而我所领导的政府，不愿采取单方面打击人民福利并导致更多失业的

政策。我们得出一条结论：问题主要不是公共部门太大，而是工业部门太小，工业部门中闲置的能力又太多。所以我们将精力集中在促进工业扩展上，工业扩展最终能给我们继续加强迫切需要的公共服务部门带来资源。

有时候，甚至在那些艰难的时代，人们谈论未来的理想。有些人将他们的理想完全捆在市场上，捆在市场可能造成的奇迹上。不久前保守派的大理论家之一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在汉堡发表一篇演讲，说市场经济要求必须对人的某些本能进行压制，必须压制人要求一致的感情和人的热情，而以专为保护私人财产、合同自由、竞争自由的抽象规则代之，否则自由市场就不起作用。

我想这就是有些人称之为市场的奇迹吧。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就像是保守派的反革命，反对近60年来社会和民主的发展。我宁愿谈谈人类热情的奇迹。为发现这个奇迹，很重要的一条，是要从普通人的日常经历中来树立我们的理想。

在我们致力于发展社会、发展我们未来的梦想时，必须记住一点：这是连续不断向前发展的——这是人类生活中永恒不变的规律，它们在所有时间里穿越一切国界，相互关联。全人类之间的团结纽带就是生活的伟大奋斗——让我管这叫做生命工程吧——各国人民的奋斗是相同的，今后仍是相同的。

在生命的过程中，我们会感到同样挑战：要成长；要受教育；要有伙伴和朋友；要准备成人后担负起不同的角色；要找到一个工作单位，开始谋生；要找个住的地方，并把这地方变成家；组织起家庭，生儿育女；一生中要保持健康，要对付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疾病与不幸；要能过个说得过去的生活，到了晚年仍保持住我们的尊严——人不可避免地总有年迈力衰的晚年——要自由自在地生活，与社会其他成员平等；对公共有益的事也负起自己的责任。

这些事在人类生活中总要发生——这就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生命工程。所有技术发明——从蒸汽发动机、拖拉机，到核力量和计算机——都是物质水平提高的结果，然而所有这些新的创造发明都没有改变生命工程。我们在处理生命工程时实际上有许多不同方法，但本质却是相同的。由于发展结果，出现了新的机遇，每人在新机遇的框架里继续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只要人类仍是人类（我们知道迄今为止他们未变），生命工程今后将依然如故。

当我们讨论我们要创建的社会时，上述这些就是我们的主要出发点。社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某一想法，一种与人类生活条件无关的想法。社会不是为远在天边的人建的，也不是为显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伟大，也不是为某个集团或某个阶级的利益而建的。社会不是根据某个僵硬设计出来的、完美无缺的未来社会的蓝图修建起来的。

社会及其机制是为此时此地的人们服务的，为的是人们能够实现他们的生命工程，过他们自己的生活。然后他们就不会威胁任何人的未来前程。然后人们就能在前辈生活经历的基础上继续建设社会。

社会的目的和团结的目的是：每人都能利用资源，都能实现人类生活，即伟大生命工程中的基本内容。这些便是构成福利社会基础的目标。这些便是自由社团的基础，一个由独立和自由公民自愿合作构筑起来的社团。

附录四

社会民主与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

——在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1976年11月26日
奥洛夫·帕尔梅

社会民主与南部非洲的解放斗争

在南部非洲，世界上最后一个殖民帝国已经灭亡。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和安哥拉的人民遭几个世纪剥削和经几十年斗争之后，终于从葡萄牙统治下解放出来。然而南非、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的白人少数统治仍安然无恙。我可以列举许多其他人类冲突的地区，太多了。除此公开暴力之外还有一个更隐蔽、但威胁程度一点也不小的威胁——日益恶化的贫困和饥饿、富国拒不伸出支援之手以及不断增加的军费开支。

只要不公正存在一天，就无持久和平可言。人民要求改变他们的状况，要求摆脱压迫和贫困。但有人呼吁他们过苦日子，呼吁他们平静。然而人民的呼喊比他们的声音大多了。解放斗争可一时被强大力量压制，然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迟早会爆发。企图阻挡这一潮流的努力只能使冲突加剧，使态度强硬，使人民和国家之间今后合作更加困难。我们应该帮助国家和人民去获得独立、社会公正和人的尊严。

南部非洲对和平的威胁日益增加

南部非洲正迅速走向前景难测的境地。国际上的注意力以及外交活动都集中在这块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残存的地方。日内瓦这儿正在举行重要会谈。会谈有可能决定津巴布韦的前途。联合国正在加大对白人少数（统治）的压力。南部非洲本身的解放斗争更加紧张，而且换了新的斗争方式。

在高潮即将来临、斗争深入发展之际，各种危险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暴力和不必要的经济破坏，以及错误的外国干涉。错误的干涉是继续给这个地区带来大国的对抗。正确的外来干预是支持解放斗争，减少死守白人霸权不放的力量之顽固抵抗。

几个月前，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表了一份冗长的报告，指出南部非洲冲突直线上升，有可能演变成下一个国际主战场。

种族隔离政权对南非人民的继续压迫，以及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已经是对世界和平的潜在威胁。诚然，由于前葡萄牙殖民地民族运动胜利造成的压力，由于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

斗争的加强，白人霸权受到了威胁，然而这个政权同时又强化了压迫机器，加强了军事力量，并努力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今夏发生的韦索托大屠杀以及屠杀后的一系列事件——数百人被杀，数千人受伤和被捕——说明白人少数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惨无人道的暴力。上星期许多工会领导人和记者遭逮捕或禁止工作。

最近史密斯先生说罗德西亚与南非已达成一致意见，要为了保护白人带到非洲来的西方民主而继续斗争。伍斯特

要求外国支持他们为“自由世界”利益而进行的战斗。难道这些人没有吸取一点教训吗？让我们把话说清楚，民主社会党人永远不会接受史密斯保护的“西方民主”，我们也永远不会将伍斯特的压迫和种族主义归入自由世界。

种族隔离本质上就是暴力制度，只能用武力，用压迫黑人多数作支持。种族隔离，也是以肤色把工人分离开来的社会和经济剥削制度，与此同时，几乎二百万黑人失业。一个用残暴警察行动和任意屠杀来回答人们要求人的尊严和起码生活的社会不仅遭到谴责，它也肯定会陷入永久分裂和冲突之中。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还指出，国际上在南非加强投资将会带来危险：促使冲突国际化。南非丰富的原料和重要的地位使白人政权更有资本吸引它国进一步卷入，而这种卷入又促使其他大国在此地区活动更加积极。

这样，非洲就有成为黑人对白人、东方对西方新战场的严重危险。这是非洲人民不希望出现的局面。

国际社会的作用

非洲民族主义者总是以民族独立为其首要目标。他们都强烈反对南非的种族主义。民族独立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把他们团结起来。

同时，他们取得独立后决心不参加大国之间的全球斗争。另外一个把他们团结起来的因素是他们决心不结盟。

在此情况下，社会民主党人有个重要使命：为和平、自由和社会公正……而努力。西欧作为富国和前殖民国家，在非洲有一特殊责任。欧洲的遗产是个沉重的包袱。我们应该听听博茨瓦纳总统的警告：

独立的非洲与西方世界今后能否继续保持友谊将取决于西方对南部非洲解放的态度。

非洲人的解放是他们自己的事，解放总有一大会到来，这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国际社会能够帮助缩短这场斗争，使这场斗争更容易些，暴力更少些。

社会民主党人面临的任务

那么，我们政策的内容应该有哪些呢？请允许我提一下我们政策的某些方面：

一、社会民主党人应为联合国制定有制约性的决议而努力：禁止向南非出口一切武器，禁止与南非进行一切军事合作。

二、我们应向解放运动和业已获得自治的国家提供物质和政治支持，帮助他们民族独立和经济解放的斗争。外国不断企图破坏安哥拉的独立，我们尤其有理由为此惊呼。如果我们反对外国干涉是值得信赖的，我们就必须停止在我们自己国土上招募雇佣军，为雇佣军筹资、训练、运输和结集。我们也必须毫不含糊地反对南非一再侵略赞比亚共和国和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反对罗德西亚白人政权侵略莫桑比克。

罗德西亚非法政权的总理。

南非总理。

三、我们应更好地协同动作，在联合国里实施一项孤立南非、制裁南非的有效政策。我们拒绝承认所谓独立的班图斯坦(特兰斯凯是其中第一个)，同时还要反对国际资本主义非官方的承认，因为它们在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

四、我们在不折不扣地执行制裁史密斯政权的同时，应支持旨在取得津巴布韦多数人统治的努力。

五、我们决心为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而工作，我们应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

六、我们必须严肃考虑在南非新投资的问题，必须考虑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态度。关于这点，我们(瑞典)观点非常明确，我在此笼统他说一下。我们要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密切合作。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建议，瑞典工会已与在南非有子公司的瑞典公司进行谈判并取得了结果。七、我们应与国际自由工会联合会一起支持南非、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黑人工会和学生运动。

南部非洲如果不是和平发展，那便是灾难性的种族战争。种族战争将会在很长时期里毒化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危害世界和平。所以民主社会党人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民主社会主义永远不能站在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一边。在每一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与贫穷民族和受压迫民族站在一起，给南部非洲解放的继续斗争以支持。

这不只是接触和对话的问题，而是将我们与地球上受压迫的多数解放斗争联在一起的问题。

1976年10月南非政府宣布特兰斯凯“独立”，但没有一个国家承认。

附录五

参考书目

1. Fredriksson, Gunnar :
Olof Palme
Swedish Institute, 1996 贡纳尔·弗雷德里克松著：
《奥洛夫·帕尔梅》
瑞典学会，1996年
2. Wilsford, David :
Political Leaders of Contemporary West Europe :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Greenwood Press, 1995 戴维·威尔斯福德著：
《当代西欧政治领袖》
格林伍德出版社，1995年
3. Freeman, Ruth :
Death of a Statesman : the Solution to the murder of Olof Palme
London, 1989
露丝·弗里曼著：
《政治家之死》
伦敦，1989年
4. Ostergren, Bertil :
VEM A ROLOFPALME ?
TIMBRO, 1984
帕蒂尔·奥斯特格伦著：
《奥洛夫·帕尔梅何许人也？》
蒂姆布罗，1984年
5. Mosev, Chris :
Cruel Awakening : a Sweden and the killing of OlofPalme
N.Y.1991
克里斯·莫塞著：
《南柯一梦》
纽约，1991年
6. Ruin, Olof :
Tage Erlander : Serving the Welfare State, 1946—1969
Pittsburg, 1990
奥洛夫·鲁因著：
《塔格·埃兰德》
匹兹堡，1990年
7. Milner, Henry :
Sweden : Social Democracy in Practice
Oxford, 1989
亨利·米尔纳著：
《瑞典：实践中的社会民主》

- 牛津, 1989 年
8. Davidson, Alexandre :
Two Models of Welfare :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Welfare state in Sweden and New Zealand 1888—1988
Stockholm, 1989
亚历山大·戴维森著 :
《福利国家的两种模式》
斯德哥尔摩, 1989 年
9. Lewjn, Leif :
Ideology and Strategy : a century of Swedish politics
Cambridge, 1988
利夫·卢因著 :
《思想和策略》
剑桥, 1988 年
10. Metcalf, Michael ed
The Riksdag : A History of the Swedish Parliament
Stockolm, 1987
迈克尔·梅特卡夫主编 :
《瑞典议会史》
斯德哥尔摩, 1987 年
11. Hadeniunius, stig :
Swedish Politics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Swedish Institute, 1988
斯蒂格·哈德纽斯著 :
《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
瑞典学会, 1988 年
12. Johnsson, Nans-Ingvar :
Spotlight on Sweden : The country and Its People
Swedish Institute, 1995
汉斯·英瓦尔·约翰松著 :
《瑞典一瞥》
瑞典学会, 1995 年
13. Nordstr om, Alf :
1000 A R 1 Sigtuna
Sigtuna, 1988
阿尔夫·诺德斯特洛姆著 :
《塞格图纳一千年》
塞格图纳, 1988 年
14. Samuelsson, Kurt :
From Great Power to Welfare State
London, 1968
库尔特·萨缪尔松著 :
《从大国到福利国家》
伦敦, 1968 年

15. Palme , Olof :
Social Justice and Individual Freedom
Disarmament and Development
Stanford , 1977
奥洛夫·帕尔梅著：
《社会正义和个人自由》
《裁军与发展》
斯坦福，1977年
16. Palme , Olof :
World Peace , Super Powers and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Sweden 1974 奥洛夫·帕尔梅著：
《世界和平、超级大国及国家独立》
瑞典社民党，1974年
17. Riddv , E.S.ed
Liberation of Southern Africa —Selected Speeches of Olof Palme
New Delhi 1990
E.S.雷迪主编：
《南部非洲的解放——奥洛夫·帕尔梅演讲录》
新德里，1990年
18. Palme , Olof :
Democratic Socialism means Solidarity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Sweden , 1972 奥洛夫·帕尔梅著：
《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团结一致》
瑞典社民党，1972年
19. Palme , Olof : Employment and Welfare
Harvard , 1984
奥洛夫·帕尔梅著：
《就业与福利》
哈佛，1984年
20. 殷叙彝编：
《当代西欧社会党人物传》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1. 张契尼、潘其昌著：
《当代西欧社会民主党》
东方出版社，1987年
22. 李兴耕主编：
《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3. 张小劲、李元庆编译：
《从职能社会主义到基金社会主义》——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24. 黄安森、张小劲编：
《瑞典模式初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25. 黄范章著：

《瑞典“福利国家”的实践与理论——“瑞典病”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26. [瑞] 克拉斯·埃克隆德著刘国来译

《瑞典经济——现代混和经济的理论与实践》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27. [英] 格温·琼斯著

刘村译

《北欧海盗史》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

28. [瑞] 安德生著

《瑞典史》

商务印书馆， 1972 年

29. [芬] 马迪·克林格著

波洛斯·黄译

《芬兰历史概况》

赫尔辛基， 1996 年

30. 于沛、沈永兴、朱希淦主编：

《外国历史大事集》现代部分第四分册

重庆出版社， 1989 年

